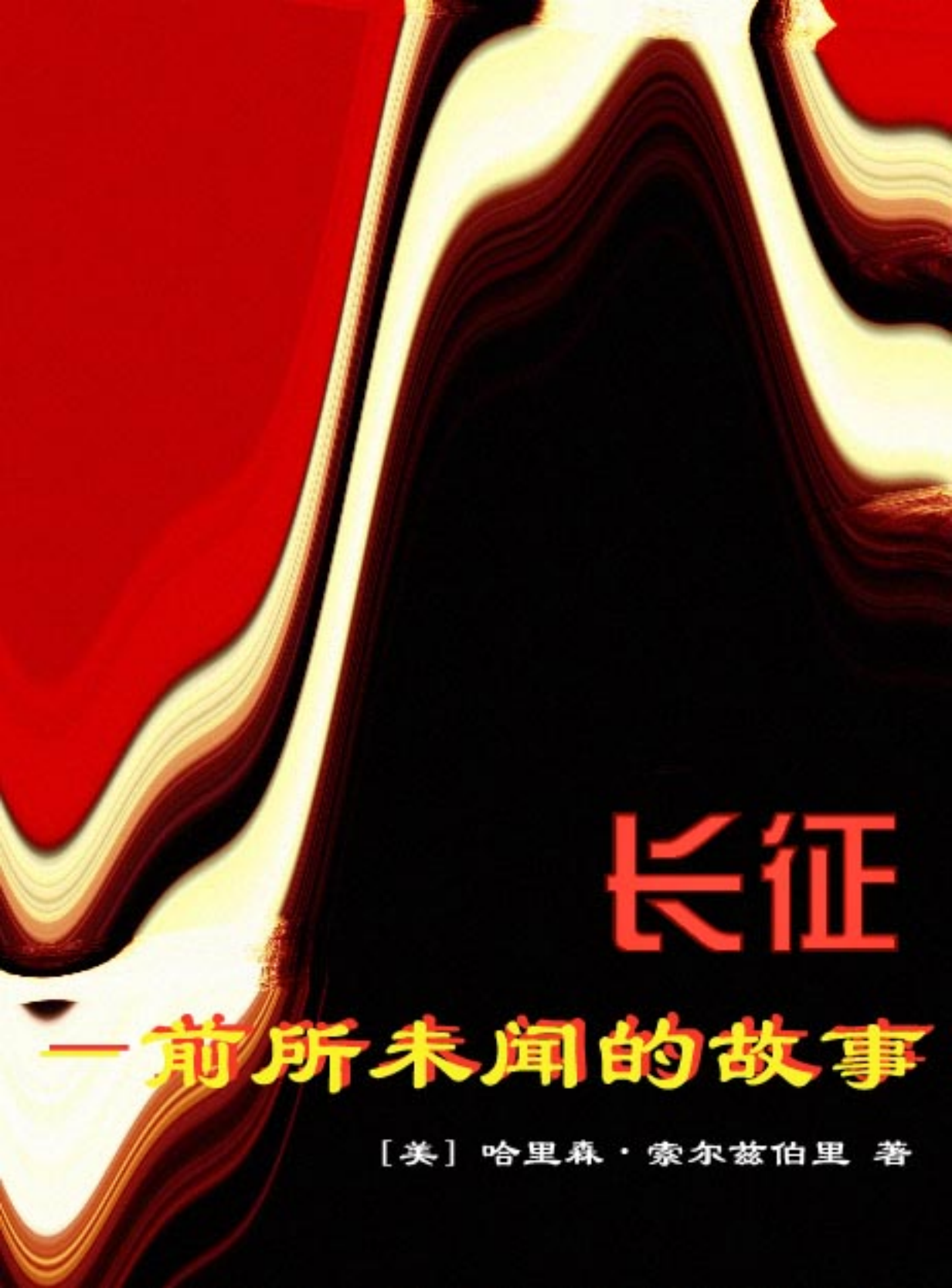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

[美]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著

在于都毛泽东长征启程
处谢伟思（下蹲照像者）为
作者留影。



作者在采访中与总
政治部余秋里主任一起
查阅红军长征路线图





在于都河边



在狮头山下的乱石滩上行走



车至险处停下细观察。



当年帮助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老船工张朝满。



在安顺场同
老船工交谈。



作者夫妇在
泸定桥上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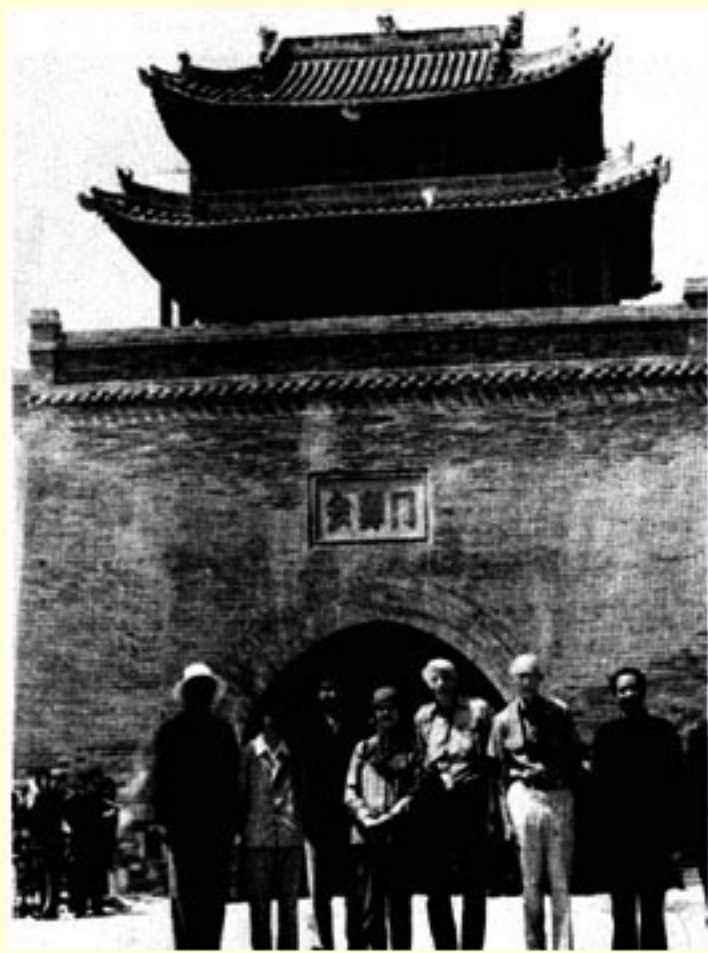
刚翻过白雪皑皑的折多山



在若尔盖与藏族县长交谈。



喇嘛向作者
夫妇献哈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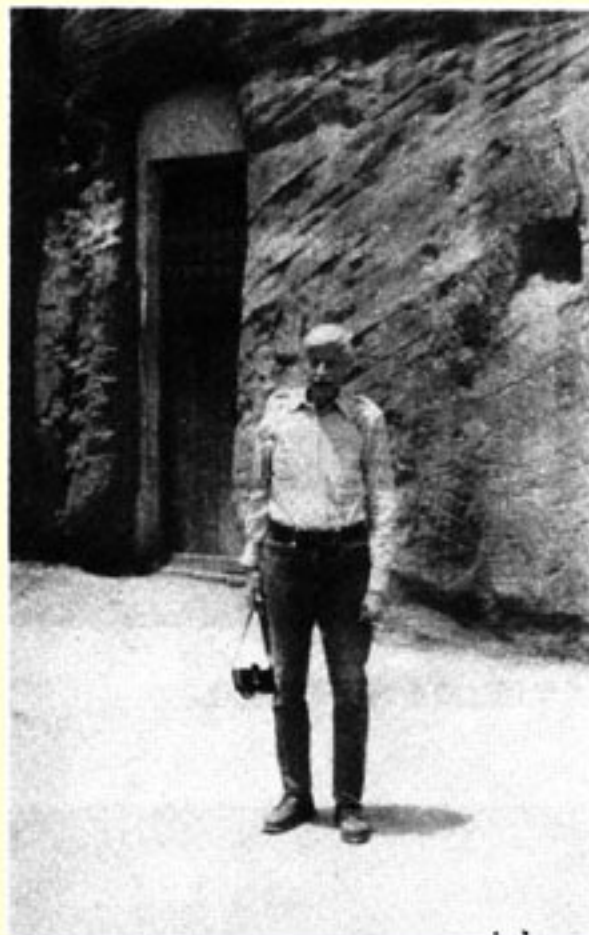
在会宁城的会师
门前。（中立者为作
者夫妇，右二为谢伟
思）



作者夫妇一行来到红军当年经过的黄河源头支流边。



胜利的微笑 - 到达吴起镇。



在保安毛泽东当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的窑洞前。

到达陕北，在毛主席旧居前合影。



长 征——
前 所
未 闻
的
故 事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著

●过家鼎 程镇球 张援远 等译

目 录

中文版自序

《长征》及其由来

第一章	月光下的行军	(1)
第二章	“赤匪”的兴起	(15)
第三章	前夕	(31)
第四章	“独立房子”的主人	(41)
第五章	最初的行动	(57)
第六章	计谋	(70)
第七章	担架上的“阴谋”	(81)
第八章	妇女	(95)
第九章	第一场大战	(111)
第十章	改变行动路线	(129)
第十一章	进遵义	(140)
第十二章	毛泽东掌权	(157)
第十三章	“棉里藏针”	(169)
第十四章	摆脱危局	(179)
第十五章	牵住蒋介石的鼻子	(190)
第十六章	兵不厌诈——毛泽东计胜一筹	(204)
第十七章	金沙江畔	(216)
第十八章	歃血结盟	(230)
第十九章	留下来的人们	(246)
第二十章	死里逃生	(258)

第二十一章	传奇的土地——泸定桥	(270)
第二十二章	大雪山	(284)
第二十三章	毛张会师	(297)
第二十四章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311)
第二十五章	魔毯	(323)
第二十六章	黑暗的时刻，光辉的荣耀	(335)
第二十七章	家	(351)
第二十八章	生死与共	(367)
第二十九章	浪子回头	(383)
第三十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	(399)
第三十一章	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422)
注 释		(431)
译者的几点说明		(494)
编后记		(495)

中文版自序

将近五十年前，美国记者斯诺通过他的优秀作品《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

《红星照耀中国》于一九三八年在美国出版。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括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了了解。《红星照耀中国》后来被译成中文即《西行漫记》，使整整一代中国人首次读到长征的英雄事迹。

我见到斯诺是在二次大战期间。这时我俩都是战地记者，恰巧都在苏联采访关于苏联红军作战的消息。我们一起上前线，报道苏联红军如何击退希特勒的部队，如何把他们从苏联领土上清除出去。斯诺和我自然常常谈到中国。那时，报社的编辑本来要我在莫斯科的报道任务结束后即动身去重庆。可是，后来计划变了。

尽管二次大战期间我未能去中国，但是我同斯

诺的多次交谈，加深了我对长征的兴趣。关于长征，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这样写道：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斯诺本人就很想写这样一部史诗。

岁月流逝，到了七十年代初，中美之间长期的敌对情绪开始消融，美国人又可以前往中国旅行，接触开始增加了。这时，我下了决心：如有可能，一定要实现斯诺的遗愿，争取写出长征的全过程。当然，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斯诺本人没有写一部长征的历史，否则他可以趁几乎所有的长征干部都还健在，趁他们可以提供第一手材料的时候，把这部历史写出来。然而，斯诺未及如愿便与世长辞了。

因此，本书是我热望实现斯诺未完成目标的产物。我能如愿以偿，这多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与合作。

一九七二年，我向已故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要写这本书，请他批准。然而，此事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和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和“四人帮”垮台后，才有了进展。事实上，“四人帮”如不垮台，我写长征的事情，那是不可想象的。

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获得了官方的批准。一九

八四年三月，在我的妻子夏洛特的陪同下，随后在中国人的好朋友、中国社会及历史问题专家谢伟思的协助下，我在北京开始了研究和搜集资料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译员张援远的陪同下，进行了七千四百英里的旅行，几乎完全沿着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行进，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在那边远地区漫长的旅程中，我们主要乘坐吉普车、小型客车和指挥车，行进在当年红军男女战士们完全徒步走过的地方。这在一九三四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今天仍然如此。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特别是过雪山和草地。

在中央、省和地方当局的配合下，我对许许多多长征的幸存者进行了个人采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党和政府中曾担任过或仍担任着要职。我还向中央和地方的历史学家征求了意见。档案工作者还特别为我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历史细节。

这本长征的纪实，就是在这种合作和协助的基础上脱稿的。它完全是中美人民合作、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并不认为它已经探讨并揭示了这部史诗的一

切方面；也不认为每项细节都已披露于世。事实上，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专家们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作更充分的研究。正如我的一位中国同事曾明智地说过的：“这并非盖棺论定了。”在某些问题上，幸存者们的回忆是相互矛盾的。还有一些问题的档案材料已在殊死战斗的混乱中散失了。

我必须强调，关于长征的结论和解释是我本人所作。我曾征询过中国当局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书中的观点和结论由笔者自负责任。

这本关于长征的书自从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出版以来，在很短的时间里为数众多的读者都读了这本书，该书还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以及许多小国翻印出版。那些从未阅读过红军壮丽史诗的人们，现在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解那些为了中国革命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男男女女的品质。他们将从这里开始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他们仅仅从统计数字中就开始明白红军所作出的牺牲有多么重大——一九三四年十月，八万六千名男女从江西出发，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的这支第一方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下大约六千人。

现在，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人们对于这么多年以前由一支规模不大、不引人注目的中国男女组成的队伍所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如果中国读者对此表示不理解，我只能重复埃德加·斯诺就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说过的话——它过去是激动人心的，现在它仍会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钦佩和激情。我想，它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于美国

《长征》及其由来

每一场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美国革命的传奇是福吉谷。福吉谷的战斗业绩已铭记在所有美国爱国者的心中。在度过了那次严峻考验之后，乔治·华盛顿和他的战士们踏上了胜利的征途。

法国革命摧毁了巴士底狱。对俄国革命来说则是攻占彼得格勒的冬宫。当时巴士底狱中仅关押着七名囚徒，而布尔什维克进入冬宫则易如反掌，因为冬宫只有一些年轻人和妇女在守卫。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它们都成了革命的象征。

一九三四年中国革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它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是为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毛泽东曾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他到最后一刻才接到撤离的通知。——但是长征却使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从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共产主义在地球四分之一人口生活的

土地上取得胜利，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清朝的没落是一个缓慢而又痛苦的过程。它国内软弱无能，国外受到西方军事、技术及经济上的强权压迫。历经一百年，中国革命才获得成功。最早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带有假基督教神秘色彩的太平军起义；接着是一九〇〇年同样神秘、疯狂和排外的神拳义和团。一九一一年，孙中山领导的组织涣散的民主革命者终于推翻了帝制，而其后中国却陷入了自公元前四百年的战国时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混乱之中。

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这段时间里，中国政治舞台上充满了英雄主义，人间悲剧，阴谋诡计，血腥残杀，背信弃义，低级趣味，军事天才，政治诈骗，道德追求，精神向往和个人仇恨。纷繁杂陈，不一而足，即使是大文豪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样浩瀚的故事。而令人神往的是，故事还没有完，恐怕永远也完不了。

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在陕北的黄土高原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首次向全世界揭示了这出悲壮的人间戏剧。这些共产党人是一年前到达陕北的。他们经历了七千多英里的行军、战斗，他们挨饿、受冻，他们穿越了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沟壑和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横渡了二十四条江河，据毛计算共翻越了一千座山。

据说一方面军开始踏上征途时约有八万六千名男女战士。一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可能只有六千人与毛一道抵达陕北。

我首次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读到长征。许

多中国人也是从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中得知长征的。这本书使我，也使成千上万的人思潮澎湃。当时斯诺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他曾经想写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于一九七二年首次到达中国。随后，我与中国通谢伟思联名向现已故去的周恩来提出了沿毛率领的红军进行长征的路线采访，并撰写长征纪实的建议。在此以后十几年里，这一建议又反复提出过多次。

建议如石沉大海。那时正是毛泽东晚年的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也是“文革”和“四人帮”当权时期。毛的那些参加了长征的同志，那些曾经在困苦和流血牺牲的战斗中休戚与共的人，都被整得七零八落。许多人离开了人世；许多人在“文革”的恐怖之中去世。有些人是被害而死的；许多人还在监狱里苟延残喘。那些年，谁是长征英雄，谁就会被那些争当毛的接班人的戴上罪魁祸首的帽子。

要在那种情况下撰述历史是没有多少机会的。即使是一九七六年毛逝世，毛的遗孀江青及其死党被捕与受审，我也未能迅速打开通往长征之路的大门。只是在邓小平逐渐掌权，老英雄们得到甄别平反并担任要职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只是在历史逐渐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之后，才开始有了能实现沿长征路线寻访的计划。

那些年变化很大，但我要记录长征史实的决心没有动摇，只要力所能及，我就要实现这一计划。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得到了来自北京的信息：通往长征的大门敞开了！我可以随意使用各种物力、档案和史料。我可以沿长征路线旅行，走

遍两万五千里，一里也不少。后来我听说，这一决定主要是两个人作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和前外长黄华。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我和妻子夏洛特飞往北京，对幸存下来的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有些死于“文革”）的遗孀、档案管理人员和历史学家们进行了一场旋风式的采访。不久谢伟思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之后，我们踏上了寻访长征路线的征途，陪同我们的有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长征历史专家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高级译员张援远。

我们飞到长征开始的江西省的省会南昌。我们考察了共产党人最初扎根的边远山区，采访了参加长征的几十位男女幸存者。我们的脑子里很快就装满了种种危机和冲突的故事，这些危机和冲突都足以使长征成为毁灭性的撤退。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旅程。我们沿着红军的路线走下去。不是每一段路都走到，而是这里略一段，那里跳一段，特别是跳过了贵州境内的部分迂回路线，同时还常拐出去看看非中央红军部队经由的地区。我们从金沙江渡口穿过离西藏不远的火焰山和狮头山，沿着一条崎岖小路攀登了一番，然后骑着骡子和马从群山中走出，向大雪山进发，以感受一下红军旅途中筋疲力尽的情景。时值五月底。小路穿过莽莽雪原，伸向可怕的草地。那里与帕斯钦达耳一样，有多少人滑入了无底的泥淖，并把伸手拉他的人也拖了下去，一道去见阎王。

此次的行程为七千四百英里，在大路和小径上乘坐吉普、面包车和越野车旅行，历时两个半月。随后又不断地进行了采访。我们于一九八四年秋又到中国去了一次。

只有到实地旅行才能感受到毛泽东及其男女战士所经受的艰难困苦。那些地方至今还是穷乡僻壤，没有城市，没有外宾，村村镇镇中没有人记得曾有外国人来访过。

没有一个中国人或外国人进行过这样的旅行，近期内也不大可能有人这样做。

本书记录了五十年前的长征，资料是从数百次采访以及文件和档案中搜集来的。我向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他们尽力作了回答，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查对史料，直到弄清事实为止。

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这种兄弟情谊在毛晚年发生的疯狂动乱中消失了，给这部英雄的史诗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然而，那些幸存者们在现在又奇迹般地掌了权。他们在邓小平领导下使中国踏上了他们所说的“新长征”。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但新长征、“文革”的浩劫以及“四人帮”属于另一篇故事。这里撰述的是长征的故事——是我在中国的史学家及长征幸存者的帮助下所能汇集的长征史实。

很可能人们还会不时地发现更多的关于长征的片断，但这本书所记载的已足以表明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也许，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象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或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而且我惊奇地

发现，还有些象美国人征服西部：大队人马翻越大山，跨过草原。

但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第一章

月光下的行军

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院外阔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屋内躺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着石膏。这时他正伸着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动静，显然发生了什么情况。红军要采取新的行动了。但还没有人告诉他。一个护士从他的门前走过，他喊住她：“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首长。”护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说，“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个病人就是有名的陈毅。他无奈地骂了一声，又躺下了。他自六个星期前因臀部枪伤久久不愈而从兴国前线被抬到这里以来，已咒骂了上百次。伤口中不断发现碎骨片，而当陈毅要求给予爱克斯光检查时，医生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爱克斯光机出了故障啦，没有电源啦，电池太弱啦。

陈毅，四川人，当时三十三岁，已是红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性格开朗，富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然而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变得忧心忡忡、烦躁不安。外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严重的伤情使他一筹莫展。

几分钟后，那位护士又来了。“首长，有人要见你。”她

一边说，一边匆忙地拍松他的枕头，整理一下床单。陈毅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来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后来，陈毅永远也忘不了周恩来看望他的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阴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这一天，陈毅才知道了后来成为长征的消息。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这里是一派安宁富足的景象：天气很好，白天暖和，夜间凉爽，很少下雨。大多数庄稼都已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晚稻、荞麦和红薯。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它东西，有的搭拉在屋檐下。靠院墙放着的红陶罐里装着豆瓣酱。院角堆着绿皮红籽的苦瓜、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农民们都知道，他们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时节了。但这时的于都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进行不同寻常的扩红（招募新兵）。收成相当好，人们一年到头地忙着播种、收割、耙地、插秧，这时本来可以喘口气了，但又担心似乎要出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谁也搞不清楚。中秋节已过，家家户户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对联和凶恶吓人的门神已经有点破旧了。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继续保护他们免遭厄运。

刘英已在于都搞了好几个星期的扩红工作了。她只不过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许多年轻妇女中的一个。刘英今年二十六

岁，还不到五英尺高，娇小得就象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伦·斯诺曾经说她无法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后来，当刘英和党的高级领导人洛甫结婚时，她自己也这样说过。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毛泽东也一直关照着。一天，毛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于都的共青团办事处。他悄悄地要这位小扩红队员马上离开于都，去瑞金赣南中央苏区总部报到，接受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

“我对他说我离不开，”刘英五十年后回忆道，“我还没有完成任务，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扩红定额哩！”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他命令刘英必须回去。刘英虽然困惑不解，但还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两天，当然，与她不久之后将要踏上的路程相比，这不过是小小的散步而已。

江西省会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这时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拿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消息，这是有关承建某座铁路桥合同的事，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社论上。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国民党政权成立的纪念日。社论的主题是当前面临的问题。它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

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报的人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对报上的言词感到满意。其实，这些话都是在他亲自授意下写的。他，就是蒋介石，四十八岁，此刻他亲临南昌指挥对“赤匪”的“围剿”。形势不错，两三天后，他调来自己的专机，准备速赴陕西、宁夏和四川进行视察。

共产党三军团驻扎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稍北的石城地区。该军团侦察分队长姓孔，二十三岁。他身板结实、作风泼辣，是一位朴实无华、坦率诚恳的革命战士。三军团在两周前打了一场恶仗，战绩平平。目前，它正在进行休整，准备新的战斗。这一切都严格保密。孔的战友们只知道他们不久就要开拔。（后来，这种保密的作法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效果适得其反。）孔是个侦察员，所以知道得比别人多得多，但他对此事一声不吭。孔和许多同志一样出身于贫苦农民的家庭。他有四个兄弟、七个姐妹。他全家都反对他参加红军。爹妈认准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是孔还是参军当了兵。他想得到土地，而红军答应给他土地。

在孔参加的头一次战斗中，红军击溃了国民党第十八师，并活捉了该师师长——人们深恶痛绝的大个子红脸湖南人张辉瓒。五十年后，孔对此事的细节还记忆犹新。他说，那天我们在小山坡上召开大会（镇里的场地都太小了），张辉瓒被拖到一大群农民、乡镇贫民、手执红缨枪的年轻赤卫队员和

身披征尘的愤怒的红军战士面前。张站在台上，双手反绑，头戴高帽。人群中有人高喊砍掉他的脑袋。张当场就被砍了头，头颅被放在木筏上沿赣江顺流而下，向其他国民党将领发出了“警告”。孔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情绪还十分激动，讲着讲着就不禁哼起了当年人们唱的一首民谣：“高兴高兴真高兴，我们战斗在龙冈上，活捉了恶霸张辉瓒，砍下了他的胖脑壳。”

有位消息灵通的姓伍名修权的年轻人，身材修长，谈吐文雅，举止大方。那年十月，在苏区的首府瑞金，人们神秘地进进出出，气氛日益紧张，震动越来越大，红军中究竟在酝酿些什么，他几乎无所不知。这个根据地是五年前由毛泽东及其盟友朱德率领的共产党军队创建的。毛与朱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农民们看来，这支军队就是“朱毛”军队。许多农民坚信朱毛是一个人。这也并非完全说不通。实际上，身材魁梧、举止缓慢、纯朴忠厚的共产党将军朱德自己也曾说过朱毛是分不开的。中文中这两个字是双关语，“朱”意味着猪（不同的另一个字），“毛”指的是体毛。

这位年轻的伍修权对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那时正给一个叫李德的人当翻译。李德是莫斯科共产国际派来参加中国革命工作的代表。当时，李德指导中国红军活动已有一年多，可惜毫无建树。

伍修权这时二十八岁。十九岁时，他与一百名中国青年一起到苏联呆了五、六年，学习俄语和革命知识，也学习了军事。这时他回国已有三年。李德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苏区后，伍一直是他的翻译。

伍目前操心的一个问题是烹饪，而不是军事。

当李德来到苏区时，中国人千方百计地要使他过得舒适些，特地为他建造了一套三居室新房子，座落在离红军总部约一英里的一片稻田旁，离中央总部所在地不太远。这所房子孤零零的，它的周围环境促使伍修权和其他人把它称为“独立房子”。不久，“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绰号。

伍修权的烹饪问题是间接地由稻田引起的。他和李德的工作人员在青蛙出没的稻田里养了十来只鸭子。鸭子长得很肥。他不打算在撤离时把鸭子留下来。于是，那几天每顿晚饭都吃鸭子，直到最后离开。他仍记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他们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了美味的香酥鸭块。因此，伍修权总是把这一天和红军撤离苏区的日子连在一起，尽管后来人们普遍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是长征正式开始的日期。

秋天到了，党的干部们说话更公开了一点，甚至出版物中也有所暗示，那些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意思的人可以由此推测出未来的事情，例如，洛甫（张闻天）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这时，红军高级领导层的每个人都知道部队即将转移，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它地方，一些人说是贵州，还有人说是云南或四川。除了最

高领导之外，其他人都不了解。为了躲避蒋介石飞机的轰炸，红军总司令部迁到了瑞金以西的云石山地区。在那里，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说：“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有时他们互相问：“你走吗？”回答不一。一些人答：“当然。”另一些人则说：“不知道。”说这话的往往意味着不走。蔡晓乾回忆说：“这消息传来，就象在一池清水里投下一块大石头”，激起了人们的不安。很快，走留人员名单开始列出来了。一些家属带着柜子、箱子回了家乡，说是“他要走了”（但不说去哪里）；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关于谁去谁留的小道消息也开始流传了。起初，有人说徐老将留下来。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长沙师范的老师。人们说他年纪太大，经不起未来的艰辛。但后来又传说他也走，并被指定与休养队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马，但尚未找到马夫。爱传小道消息的人此时还不知道，有人悄悄地已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之中——他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为她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据说他肺病严重，难于同行）；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毛的建议似乎一个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请求带上瞿秋白的意见也未被采纳。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了留在苏区的特许证，而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⑪

一九三四年秋，毛泽东四十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

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璋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他知道红军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在作出决定之后周恩来给他报了信。周实际上是总参谋长，参加决策。然而，发号施令的是李德，他的命令又自然而然地得到党的总书记博古的拥护。即使周有不同意见，他往往也是以一比二处于劣势。所以他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军人去执行上级的命令。

没有人同毛商量，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这毫不夸张。在党的领导层中占统治地位的“苏俄”派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①早在两年前，他就失掉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仅剩下了有职无权的一个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他主持地方会议，近几个星期，对于都地区的情况进行了有名无实的调查。于都是一个傍河的县城，他那时住在一条小巷深处一所舒适的灰砖房里，紧挨着于都北门。他和二十四岁的妻子贺子珍住在一起。这时，贺子珍已是第四次怀孕了，预产期是第二年的二月份。^②

当时传说毛泽东在于都受到了软禁。他虽是政治局委员，但不能前往瑞金同政治局磋商，他同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多年来，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但看来，他显然未被软禁。与本书作者交谈过的长征时期所有重要的幸存者和当代中国党史学家及档案管理人员都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在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并执行这一决定的日子里却要把毛派往于都，这种主意至少是难以被人理解的。毛

也不可能那么急切地需要亲自去于都搞他的“调查研究”。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⑬

一九三四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泽东转到苏联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显然是李德的主意（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对此只字不提）。但是莫斯科没有同意。共产国际认为，尽管它和毛有分歧，但是毛的威信和名字还是有用的。另外，据翻译伍修权说，毛曾声明：“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⑭

气氛很紧张。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保安的一条街上看到博古时，毛告诉斯诺：“那个人曾经要置我于死地。”^⑮假如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时，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说明确实有过强迫毛留在苏区的计划。

毛到达于都后，很难再去离于都有一两天路程之遥的党政中央机关了。不过，他的私人警卫员还没有被撤掉，而且他依旧可以在于都和附近地区自由行动。

毛在于都的生活和他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云石山的生活很不一样。在云石山时，从一个石崖往上走两层石阶，就到了他住的一所漂亮的小庙，离红军总部不到一英里。他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时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庙的一厢，这使他们俩有机会进行密切的交谈，后来发现这些交谈是非常重要的。那时，毛可以随便出入红军总部。但由于他的意见无人置理，他也就很少前往了。政治局开会他很少得到通

知。由于他是苏维埃主席，所以中央政府机关他还是要去的。那地方不远，名叫沙洲坝。中央政府机关占据了一座一九二二年由杨氏家族建造的颇为壮观的祠堂。毛在那里住过一年左右。杨家祠堂里有一座雅致的两层议事厅，暗红木架房，石板铺地。朱德和妻子康克清，陈毅和周恩来也住在这里。不过，朱德夫妇象陈毅（直到他负伤以前）和周恩来一样，通常是在前线。^⑩

有意把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还不是事情的全部。^⑪这时，和其它一些紧张的时期一样，毛泽东又是疾病缠身了。从一九三四年仲夏到十月，由于身患疟疾，他时而卧床不起，时而只能勉强活动一下。他总是精力很差，情绪低沉。

这也是自然的，因为，由他主要发动的这场革命运动、他和朱德所建立的军队、他在五六年前所开创的苏区以及他建立的整套机构，如今都落入了来自莫斯科共产国际的那位神秘莫测的代表李德和他的献媚者博古的手里。博古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曾经称他为奇形怪状的黑面木偶，而他看起来也确是如此。毛泽东被剥夺了所有重要的权力，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同他势不两立，军事指挥机关也把他摒弃在外。毛泽东表面上显得很平静，其实却心急如焚。对于力量的对比，他并非一无所知。他知道，那时正聚积着一股反对李德和博古的强大力量。当他的追随者林彪和忠于他的聂荣臻这两位主要的军事指挥员溜进他在于都的小院，坐在长凳上向他请教的时候，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小心地问他：“我们向何处去？”的时候，他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也知道怎样用同样隐晦

的话来回答他们：“去命令你们去的地方。”他知道这些命令是什么，也知道这些命令是军事机密。但他守口如瓶，因为还不到说话的时候。他相信，这个时刻不久就要到来。

过了近五十年之后，聂荣臻回忆说，当时他和林彪急切地想多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去向问题。但是，毛泽东毫不留情地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不想让人猜疑他和将军们正在秘密策划些什么，他结束了谈话，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个新开的图书馆。^⑮

十月十日，阳光明媚。正午刚过，一群人开始在梅坑——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大约有一百多个男人和二十到二十五个妇女，看上去不象是军人。他们都是被派往休养队的——老、弱、伤、病和妇女。每人一袋干粮，十斤米，但愿够吃十天的。另外，每人还有一条毯子，一包换洗衣服，一把梳子，一把刷子，一个笔记本，可能还有一个手电筒（这是最难找到的），一些备用电池、肥皂、一两本书及其它一些必需品。每人腰带上都挂着一个大搪瓷杯子，里面塞着牙刷和毛巾。这群人中年纪最大的是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他已年过六十，因此为他配备了一匹马。董必武那时是四十八岁，他和毛一样，也是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他的同志们都认为，如果当时把他留下来，肯定是死路一条。徐特立五十七岁，他曾是毛的老师。徐特立精瘦、幽默，长着一脸胡须。他有一匹马；蔡畅也有马，她是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妇女。此外，还给毛的怀有身孕的妻子贺子珍配备了马匹。

很快，这支杂牌军被编成了排和班，每个男女成员都领

到了一杆红缨枪，以备队伍一旦遭到攻击时作为自卫武器。落日时分，党的保卫部门负责人、整个非战斗部队的指挥员，曾当过水手的邓发出现了。他一反平日的严肃态度，讲着广东口音很重的普通话同这支队伍开玩笑。他想活跃人们的情绪：“这可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呀。我们有音乐家、剧作家、作家。如果我们想演一台戏，那可是万事俱备。”气氛果然活跃了一点。队伍在暮色中向于都进发了。这是红星纵队的一部分。为了使他们不致迷失方向，沿途每隔一段就有红星标记指路。^⑬

毛是过些时候才离开的。他还有任务，其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就是十月十五日要给留在于都的党的干部们讲话。他必须告诉他们，红军正在撤出；还要让他们了解今后的局势，并告诉他们红军主力离开后，他们应当如何工作。这时，于都城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成千上万的部队开进于都，然后又离开，或者过江，或者南下去安远。

当然，大部分年轻的红军战士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相信他们要去打一场大仗，也意识到他们要冲出包围圈。很多人还领到了过冬的棉衣（这使他们很吃惊），所有的人都要在干粮袋里储存十天的粮食。然而，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何在，却一直小心地不予透露。

疾病缠身、面带菜色的毛泽东仍在接受傅连璋医生的治疗。这时他正在对一群党员干部讲话，他尽力使自己的口气充满信心。他的讲话内容没有被保存下来，不过，无疑是传达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说明部队要冲出包围圈，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号召干部要照常

工作；告诉大家部队进行了分编，红军留下了很大一部分兵力保卫苏区，他们不会永远离开，他们会回来的。毛泽东坚信，革命最终必定胜利。

这是一次高、中、低三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对这些干部讲话的时候，周恩来、朱德、博古、李德，所有部队的首长和党的整个最高领导机关已经上路了。中央机关十月十二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一块银元），^②挑着苏区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铸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爱克斯光机、满载重要（及不重要）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等等。毛泽东后来说：“就象大搬家一样”。埃德加·斯诺则称之为“整个国家走上征途”。这太夸张了，还是毛说得确切。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泽东和大约二十名随从，包括警卫员、他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在于都北门旁一所房子的石板地小院子里集合。他们走出院子，和中央纵队的其它单位会合了。毛带了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留下了他那有九个口袋的旅行包。^③东明知危险乃至致命的撤退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共产党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和蓬勃发展的根据地。他们悄悄地行动，希望蒋介石的飞机不要发现并轰炸这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现在是需要坚韧不拔、下定决心的时刻，不允许提任何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将去何方，没有人知道走到哪里才是尽头。毛泽东不知道，博古、李德和周

恩来也不知道。谁也猜不出再过多久蒋介石就会发现这些蠕蠕而行的队伍。没有一个指挥员不为那些如牛负重的挑夫们担心,他们中间很多人挑着他们能够肩负得起的最大重量,一天挪动两英里都很困难。

工兵营在于都河上架起了五座浮桥。当时正值枯水季节,在于都一带,河面不过二百五十英尺或三百英尺宽。河面宽些的地方,河水很浅,人和马匹可以毫不费力地涉水而过。五座浮桥分别架设在于都两侧几英里长的河面上。

毛泽东和他的队伍沿着河岸没走多远,月亮就升起来了,河面很平静,没有一丝风。一会儿他们来到渡口,踏上喀喀作响的桥板,顺利地过了河。很快,这支队伍就到河对岸向西行进了。这静谧的夜,这月光,这河水拍击浮桥的声音,激发了男女战士的兴致。他们成一路或两路纵队沿着狭窄的小道行进,很多人轻轻地哼起了流行的红军歌曲。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

第二章

“赤匪”的兴起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昌登上飞机，亲自前往动乱的西北地区进行视察。这时，他确认此行一切顺利，非常顺利。和往常一样，他的夫人、宋嘉树漂亮的小女儿美龄陪他同行。自他们结婚以来，美龄很少远离蒋介石的身边。他们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的美琪饭店举行婚礼的。一千五百位客人应邀参加，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美以美牧师宣布他们为夫妻。一个俄国乐队演奏乐曲《新娘来了》，另有一位美国男高音演唱《请答应我》这支歌。这次，蒋介石首先要在陕西省省会西安逗留。

在对“赤匪”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和目前第五次“围剿”的四年中，蒋介石长时间住在南昌。他认为，由于采用了他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新战术，共产党人已是四面楚歌了。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翻脸对付他的共产党盟友时，苏联顾问撤走了，他随即聘用了德国人。蒋介石的刽子手们砍掉了无数共产党人的头颅，以致到后来，他们的胳膊酸疼得都举不动屠刀了。

苏联顾问是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时代来华的。蒋介石试图继承孙中山的衣钵，用他自己瘦小的肩膀来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苏联加伦将军和其他几个人曾经赢得了当

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敬重。不过，假如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鞭长可及，他肯定会把所有这些人，连同斯大林在中国的特别代理人鲍罗廷统统杀掉的。后来为了争夺权力，蒋介石决心不惜杀死中国所有的共产党人。

但那是另话了。不过，蒋介石对那些在江西同他作战的共产党指挥员们曾怀有过某种同行间的尊敬。当年，他们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并肩行进的时候，蒋就结识了其中的很多人。“匪首”之一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曾是仅次于蒋的第二号人物、该校政治部主任。还有很多人也进过黄埔军校。毛泽东却从未进过黄埔军校。蒋介石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但对毛的情况却了解的很多。他当然也认识那另一位厉害的“赤色”领袖——年长的朱德（四十八岁）。朱德参加共产党之前是一位军阀将领，还抽过鸦片。

即使蒋介石轻蔑地将这些人称之为“匪”，他也绝不能低估他们。七年来，尽管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却未能把他们消灭。现在，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帮助，他觉得消灭他们的日子已不远了。希特勒把自己最好的将军之一——汉斯·冯·塞克特——派到中国。塞克特制定的碉堡战术，即将置共产党人于死地。

在冯·塞克特的指导下，国民党军队极其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一路上修碉堡、筑工事（上一年共修了三千个碉堡），控制了所有的通道。这些碉堡在共产党人周围逐步形成一个坚固的包围圈。冯·塞克特将这包围圈越缩越小，切断了被围困地区的贸易，使那里的大米或玉米无法出售；没人能出入这些地区；农民们好几个月吃不上盐，用不上煤油，

买不到棉布。

还有另一方面的变化。在蒋的第五次“围剿”之前，共产党人一直采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把国民党军队引进苏区腹地，然后用伏击战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共产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并以成千上万的国民党俘虏来补充自己的兵员。

后来就不是那样了。现在，共产党人正在同蒋介石进行正面的、代价高昂的战斗，以保卫他们的土地，似乎每一寸土地对他们都是宝贵的。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一战，他们和国民党军队打成僵局，至少伤亡了八千人，也许更多。蒋介石的损失也差不多。但是蒋介石可以通过拉夫来补充损失，共产党则不能，即使共产党能打赢这种战争，他们也无力承担因此而造成的牺牲。

蒋介石乘着他那架崭新的、闪闪发光的福特三引擎飞机北上时，踌躇满志地展望着前景。共产党人使他无法积聚力量来对付地方军阀，而这些军阀又无时无刻不在策划反对他。扫清共产党人以后，他甚至可以争取划一个外国盟友，这样，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就更有力了。日本人占领了满洲，现正威胁看中国内地。希特勒在帮助蒋介石打共产党人——希特勒或许可以悄悄地帮助蒋介石。苏联人也可能帮忙，但蒋介石和共产党人打仗时，斯大林是不会帮助蒋介石的。不过，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面对日本的威胁，一个在蒋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对斯大林来说是大有好处的。

蒋介石从南昌向北飞行。他飞过长江，飞过南方的大片稻田，飞过黄土高原的山丘。共产党人还被围困在赣南那个

角落里，包围圈越缩越小。让他们去挣扎吧。这回他们可跑不掉了。照《民国日报》的说法，“今年他们就要被消灭了。他们四面楚歌，溃败已指日可待了。”蒋介石回来后，就要下令发起最后的进攻。

蒋介石坚信，共产党在江西的气数已尽。对于这一点，南昌城里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提出异议。在中国的其它地方，人们只是模糊地感到共产党的存在，而南昌则对共产党比较熟悉。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城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接着南下，企图拯救被蒋介石血腥扼杀在上海的革命，从那时起，共产党就已闻名南昌了。

南昌起义的关键人物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他相貌英俊，才华横溢，能言善辩。他一生都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高级职务。这个人就是周恩来。他自称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和同代的许多中国青年一样，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激进的学生运动，漂洋过海到欧洲（巴黎和柏林）去工作（法国的雷诺工厂）学习，并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建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其高潮是北伐战争。由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一九二六年从广州出发，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作为盟友并肩参加了北伐战争。北伐的目标首先是武汉，第二步希望直取北京。周恩来奉命前去帮助上海的工人起义，却因时机不成熟前两次起义被镇压下去。第三次起义宣告成功，几十万工人涌上街头，夺取政权，准备迎接蒋介石和北伐军进上海。

然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晨，一声号角在上海吹

响，迎来的不是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期待的革命胜利，而是一个“头颅的筵席”。就在工人们手举旗帜，准备欢呼“国民革命军万岁”和“蒋总司令万岁”的时刻，蒋介石和他在黑社会的旧友们达成了一笔交易。法租界稽查局长、青帮头子黄（金荣）大麻子和他的帮徒开始行动了。帮徒们在闸北、南市、吴淞和浦东地区扑向工人，蒋指挥的北伐军却袖手旁观。大刀挥舞，机关枪呼啸。

死难者不下数千，有的被枪杀，有的被砍头，还有的被活活扔进了烈火熊熊的火车头锅炉里，蒋介石悬赏八万元取周恩来的首级。共产党指挥部设在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的东方图书馆。工会领导人顾顺章刚从楼里逃出来，过了一两分钟楼门就被砸开了。

多年来出版的各种书刊报道都说周恩来被国民党军队逮捕，但又逃脱了，可能是化装一个女人。安德烈·马尔罗在他描写上海惨案的小说《人的命运》中也讲到了这件事。但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告诉埃德加·斯诺：“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实际情况是：大屠杀的次日，周恩来由六名卫兵和顾顺章陪同，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二十六军军长是白崇禧将军。第二师的任务是“恢复治安”，它正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他知道二师里有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党的军官。他和顾顺章到那里去是要对当时发生的镇压情况提出抗议。但他和卫兵们一到二师，就被缴了械，而且被关押起来了。

二师指挥官赵舒是国民党的党代表，同情共产党人，他

的女儿是个共产党员。但赵当时不在。接待周恩来的是副师长司列，原以为他的态度会比较友好。因为他的弟弟是地下党员，他本人在黄埔军校时当过周恩来的助手。

但是司列的态度很坏。他们争论得越来越激烈。显而易见，他根本不想放周恩来走。最后，赵舒赶来，把司列叫到隔壁房间。人们可以听见他们争得很厉害。过了一会儿，两人回来，向周恩来道歉，交还武器，把人全部放走了。周恩来向党的总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然后秘密地到武汉去了。如果没有赵舒出来干预，周恩来恐怕会象他无数的党员同志一样，葬身在血泊之中了。

正是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这位瘦瘦的身着灰色衣服、手提黑色皮包的年轻人，于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最后一周悄悄地住进了南昌的江西大旅社二十五号房间。没人知道周恩来登记时用的化名是什么。大旅社是南昌最好的旅馆，建于一九二二年。时至一九八四年，它依旧矗立在南昌繁华的商业中心，周围是些商店、办公楼、饭店和银行。当年，这个十字路口挤满了黄包车，车夫们拉着银行家去他们的办公室，拉着阔太太小姐们到豪华店铺的漂亮试衣室去。

大旅社是外省中国式建筑的一个典型，中间有一个院子，两边是讲究的房间，后面是一个装饰辉煌的宴会厅。这里有穿着软底鞋、彬彬有礼的招待员，能干的厨师，考究的饭菜和一种富裕、幽雅和古色古香的气氛。

这个星期，周恩来并非是大旅社里唯一的稀客。其实，大旅社从顶楼到底层都被占满了，地方军官们租了房间作为专用。住在二十号房间的是国民党二十军军长贺龙，他是个脾

气有点古怪的共产党同情者，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方面军将领叶挺住在二十四号房间，他是正式党员。九号房间是刘伯承（他失去了一只眼，所以人称“独眼龙”），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军队指挥员。林彪没有开单独的房间，那时他资历很浅，只是一个排长，但他后来在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事务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朱德也没有在这里预定房间，他住在自己的司令部里。朱德是在德国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不过对外是保密的。此时，他是南昌国民党省政府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军官教育团团长，这也是党中央选择南昌作为起义地点并派周恩来去领导起义的原因之一。

南昌起义一举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周恩来组织了二万人的部队支援这次起义，而忠于政府的军队只有一万人。

但是对革命者来说，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这时，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位二十九岁的新代表刚刚抵达中国。他叫罗明纳兹，格鲁吉亚人，颇受斯大林的赏识。罗明纳兹对中国一无所知，可是斯大林却认为可以依靠他执行命令。他也确实带来了一项命令，这是斯大林的亲口信，断然下令停止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罗明纳兹宣布，如果坚持举行起义，共产国际将不允许它的顾问参加，（那时还有几名顾问隐藏在中国），也不允许把共产国际的资金用于这一行动。

这项命令是在行动开始前二十四小时下达给周恩来的，他断然拒绝执行这个命令，决定继续准备起义。

起义进行得非常顺利。那天天气晴朗。八月的南昌，天气炎热，无雨。他们把大鱼缸倒空，里面装上开水送到干渴的队伍里。士兵们都在院里露宿，那时的南昌是一个只有

十二万人口的省会。到一九八四年，它已经是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纷乱的大都市了。

天亮之前，城市被起义军攻占。国民党伤亡约八千人，共产党损失极小。不知道周恩来当初是否打算守住南昌，不过，南昌实际上是守不住的，因为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军立即派兵进逼南昌，而起义者们还指望张发奎支持他们，即使不支持如果能保持中立也好。

三天之后，共产党人撤出南昌开始南下。到八月六日，南昌又回到了国民党手里。一起南下的朱德安慰部队说：“这就象一九〇五年的俄国一样。”他指的是一九〇五年俄国那次未遂的起义，列宁把这次起义称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预演”。

不管其军事结局如何，南昌在中国革命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群杰出的人物聚集到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刘伯承、叶挺、林彪、肖克和聂荣臻——都成了领导人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著名的“十大元帅”中有好几位都出自这些人。为纪念南昌起义，八月一日在中国被定为红军建军日。

中国没有一个省份象遥远的江西那样聚集过如此众多的共产党人。江西多山，一条大河——赣江从南向北纵贯全省，然后流往鄱阳湖，汇入长江。

江西地方偏远，赣南很多地区十分贫穷，当局很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这儿山峦起伏的土地上，这里没有公路（到三十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如此），只有山间小径，人们把

东西背在背上，人和马、骡成单线尾随而行。山路太窄了，连大车都难以通过。于是，江西成了造反者的避难所。赣江是江西的大交通干线，也是唯一的商业动脉。这里没有铁路。全省充斥着文盲、疾病、贫穷和愚昧。（江西省人口一九四三年是一千三百七十六万一千人，一九八〇年增至三千三百一十万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按照中央委员会的命令，他正忙于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是一次以攻占长沙为目标的农村起义。毛出生于离长沙不远的韶山的一个富裕中农家庭。他早期的很多革命活动都是在长沙进行的。他熟悉农村，在那里他创造了自己的革命哲学——充分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哲学。这些使他常常和那些比较因循守旧的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由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说教者和由苏联训练、受苏联的熏陶的一群中国年轻人发生争执，他们中很多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先是受卡尔·拉狄克和尼古拉·布哈林的影响，后来又受一位非常年轻但又极为固执的苏联人巴甫尔·米夫的影响。米夫对中国一窍不通，不久前还在乌克兰做党的工作，二十六岁就成了斯大林在中国事务上的重要代理人。

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发动秋收起义，使用一面他自己设计的旗帜——一颗红星中间有一柄锤子和一把镰刀。起义结束了，九月十九日，毛泽东率领所剩的约一千人来到通往井冈山途中的文家市村。在文家市，他站在里仁学校泥泞的操场里临时搭起的讲台上高声问他的部下：“我们有没有胆量把革命进行下去？”人们答道：“有！”

井冈山是峻峭的岩层露头组成的山脉，海拔四千至五千英尺，是毛泽东的家乡湖南与江西的分界线。在中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偏僻了。井冈山位于两省交界处，向两边伸展，没有道路，森林茂密。千百年来，这里是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没有任何一届政府认真地调查过井冈山一带的情况。

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井冈山正好符合他当时的需要——在这里，可以聚集力量，可以检验他酝酿中的暴力革命理论，还可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教育农民。

用湖南人的话说，毛泽东是个“上通天文，下知地理”的人，也就是说，他通晓长沙地区的情况。井冈山这个名字对他并不陌生。政府鞭长莫及，整个地区由王、袁两股土匪控制着。袁自称大刀会，在茅坪周围活动，王的领地在山上。

近来，毛泽东听说王、袁表现出某些有觉悟的迹象。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他们允许一支共产党部队通过他们的领地到上海去参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一月，他们参加攻打永新县城，帮助解救了关在永新监狱的共产党员。假如毛能把王、袁这些人争取过来，他们可以成为一支可观的力量。但如他们反对，准会使毛泽东在井冈山站不住脚。^⑩

上井冈山是一场冒险——这里没有道路，田地荒芜，没有工业，山上没有学校，也没有什么地主的财产可以没收来补给毛泽东的队伍。井冈山充斥着迷信。人们相信鬼神和中国的所谓风水术，在他们看来，风水先生可以预卜男女是否可以结婚，可以使妇女生子，可以测定房屋和水井的最佳位置，能治愈疾病，还能用符咒迷惑敌人或对手。很少有人冒

险进山。也没有人出山。这里对外界一无所知，一支国民党部队竟在这里悬赏捉拿一个名叫苏维埃的共产党领导人。而苏维埃是俄文 Soviet（代表会议）一词的中文译音。

县城里有两三个中医，用中草药治病行医。没有报纸，也没有书店。各种罪恶——奴役、压迫、卖淫、梅毒、高利贷——在旧中国的一切落后现象在井冈山应有尽有。山上居住着很多结有世仇的家族，他们的仇恨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的，有些甚至搞不清起源于何时了。

后来，一些在苏联培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开创井冈山根据地问题批评毛泽东。他们指责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说他没有依靠无产阶级，即城市工人阶级，说他应当攻打大城市，而不应当从他们叫作没落分子的土匪、乞丐、妓女、被遗弃的社会渣滓中拉队伍。他们说毛与土匪头子差不多，说他信奉的是枪杆子而不是《资本论》。

其实，早在到达井冈山之前，毛已经受过批评和处分。（他过去受过批评，将来还要受批评。）理由是秋收起义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攻打长沙！他因而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免除了在湖南省委的职务。这个消息过了几个月才传入荒凉的井冈山。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作出上井冈山的决心。井冈山酷似《水清传》里那些绿林好汉的巢穴，毛泽东正是一辈子颇喜欢看这本中国古典小说的。

毛泽东要实现理想的任务绝非易事。但困难和危险对他并不陌生。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前，他在为秋收起义招兵买马时还被民团逮捕过。士兵们拿走了他的鞋子（作为战利品，而且说是把他的鞋子拿走之后，将来他的鬼魂就不能追赶他们

了)，把他押到司令部去枪毙。后来他回忆说，他向另一个犯人借了几块银元，想用来买通押解者逃跑，结果没有成功。但后来他还是设法在路上逃掉了，他在丛林里一直躲到天黑。第二天，他用借来的钱买了新鞋、一把雨伞和吃的东西，逃到了安全地带。韩素音听说，甚至在他初上井冈山时，他部下的一些军官还密谋要杀害他哩。^①

井冈山地区并不都很险峻。毛泽东也没有（象我一直想象的那样）爬上高耸的山顶，然后象沃尔特·司各脱爵士描写的高地头领那样建寨扎营。整个地区大约有一千二百平方英里，六十多英里长，二十英里宽，全部或部分囊括了六个县，人口约九十万。一共有五个不小的镇子，还有大约十二个小村子。山顶高度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战地钟声》一书中的马德雷山脉差不多。毛在山顶修筑了一个堡垒，周围有五个哨口。每个哨口都有石头砌的枪眼和石头掩体，各面安放了几挺重机枪和三门迫击炮，其中只有一门可以打响。三条陡峭山路通向供哨兵使用的石头小掩体。顶峰几乎是无法攻占的。

毛泽东对高山下的镇子很感兴趣，在这里，他建立了司令部，和部下们忙于组织地方苏维埃，宣传共产主义，招兵买马，扩大根据地。

但是，他首先必须和土匪们搞好关系。袁文才、王佐一伙活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一年。还有一些土匪的历史更长，人们都记不得他们到底存在多久了。每一股土匪都有二三百人，五六十支步枪。毛泽东先从袁文才入手。从理论上讲，袁文才这时早已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了。但他处处

提防着毛。和这偏僻地方所有的人一样，他对陌生人怀着戒心。开始只要一提起毛泽东，人们就纷纷逃跑。但是，出于好奇心并看到这支队伍的行为规矩，人们又开始返回自己的住地。毛泽东的头发又长又乱，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更象个莫霍克族人。他常和人们拉家常，和农民们处得很好。他会走到一个男人面前，问：“你叫什么名字，大哥？”或者对一位妇女说：“大嫂，怎么称呼你？”人们的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但袁文才还是很谨慎，他担心：毛泽东大概想消灭他，然后吞并他的队伍。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茅坪附近的大仓村和袁文才会面。毛解释说，他是共产党，他的部队在那里不是要干涉袁的活动，而是要和人民一起改善他们的命运。他的军队不是国民党军队，不会压迫老百姓。袁终于同意支持毛——但是要有个代价。毛给了他一百支步枪。袁付给毛一些银元，并且同意在毛的司令部所在地茅坪的原攀龙书院的房子里建一所小医院。

茅坪是一个环境宜人的山麓小镇，有一百多户人家，大约七百人。毛找到一所漂亮的带院子的老房子作为自己的住处。这个院子就是谢家祠堂（茅坪几乎所有的人都姓谢），房子的顶层是一个很少见的八角形小楼，毛把它当做书房。星转月移，他在这里写出了两本小册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是他第一次阐述关于使用武装力量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论。

王佐就比较难对付了。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荆竹山停留并会见了王佐的一些人。王同意第二天在靠近山顶的大井

村和毛见面。井冈山由山上的“五井”而得名。五个村子象九子棋一样捞开，分别叫做大井、小井、中井、上井和下井，每个村子都是四周峭壁，危崖高耸。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中国人认为，从上往下看，这些村子都象水井似的。

王总是心猿意马。最后，毛派了一个可靠的人——何长工去做他的工作，把他争取过来。^①何长工发现王佐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他有个难以制服的对手——土匪头领尹道一，控制着赣州附近的三个县，妨碍他的利益。王表示，如果共产党能帮他除掉尹，他就可以帮助共产党。何长工答应了，并于一九二八年二月率领两支小队和王的一些人在拿山伏击并活捉了尹和尹的一些部下。据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说：“王佐手下的人高兴之极，他们把尹道一的脑袋砍下来，连夜带给了王。”王当然也很高兴。这件事使他对共产党的信誉和能力确信无疑，他投到了他们一边，并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加入了共产党。

井冈山绝不仅仅是个盗匪出没的地方，后来很快变成了一个大有作为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朱德带领队伍来到宁冈，同毛的队伍会合，宣布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陈毅也和朱德一起来了。毛和朱在龙江边的一片空地上见了面。这里四面空旷，登上附近一座庭院的屋顶平台，可以看到带有飞檐的灰色槽形的屋顶，他们坐下来，谈了很多很多。在这里开始一起建立朱毛军队和军事政权，这个军事政权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

朱德带来了近一千人的队伍。毛泽东原有一千二三百人。朱和毛逐渐扩大了根据地，奠定了一个独立的苏区的基础，这

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最初贡献。这个基础在赣南的中央苏区得到发展，又在陕北的延安进一步完善，后来成了中国革命政权的摇篮。

初上井冈山的日子是相当平静的。地方军阀相互争斗，无暇顾及这片荒山里发生的事情。但不久形势就开始紧张了。广西的李宗仁和湖南的唐生智握手言和，把部队拉回来要打“赤匪”了。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朱毛部队实力倍增，根据地容纳不下了。他们现有四千一二百人的第四军和八百人的第五军。山里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这么多的部队，必须另找地盘。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朱毛军队开始向山下转移，留下彭德怀（他后来成为红军最优秀的指挥员之一）和滕代远领导的第五军^⑬，任务是尽可能坚持保卫根据地，然后同大部队会合。这个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在敌人强攻之下，第五军溃散，幼年的苏维埃被压垮了。到一九二九年三月，住在山顶苏区村庄里时大约二千人当中，一千人被杀害。有些村子的房屋全部被付之一炬。这都是吴尚和他的湖南军阀们干的。

有一点要说明。毛曾告诉埃德加·斯诺，红军撤离井冈山后，袁、王二人又恢复了他们的土匪习气，被农民们杀了。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故态复萌。在他们进行了一次烧杀掳掠之后，湘赣边区的地下特委会决定处决他们两人。决定是一九三〇年一月中旬作出的。二月下旬，可能是二月二十五日，这两人被请去参加永新县特委会的一次会议。他们带几个随从去了，在当地一个旅馆下榻。半夜，执行小队包围了旅馆，破门而入杀了袁。王跳出后窗，骑上马在夜色中

飞驰而去，但掉到河里淹死了——至少传说是如此。

当地的土匪就这样被瓦解了，其中一些人——但不是所有的人——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还有的人回到山上投奔了王的兄弟王云龙。井冈山又落到了土匪手里。从那以后二十年之久，直至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一个红军战士能够进入这个革命圣地。只是在二十年之后，共产党才又回到井冈山顶。然而，在这里，毛曾建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苏维埃，并开始了名垂中国史册的长期斗争。^⑭

时至一九四九年，王的兄弟早已去世，由他的儿子统治着井冈山。后来红军捉住并处死了他。对于袁和王，特别是对于他们的结局，迄今还有争论。毛告诉斯诺的是这两人碰巧被觉醒的农民杀了。然而，现在井冈山地区的官员却把这件事描述得比较正式：特委会开了会，正式决定处决他们，等等。“文革”期间，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大字报指责彭德怀“谋杀”了袁和王。这是韩素音提到的，但她并不相信红卫兵的话。^⑮

第 三 章

前 夕

周恩来到医院看望陈毅。他带来的消息并不令人愉快。他告诉陈毅，中央委员会（几乎成为李德和博古的代名词了）决定红军主力几天后撤离，突破蒋介石的“围剿”，向西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严冬，陈毅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和他们并肩战斗，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目睹了苏区发展到拥有三十五个县，三百万人口和有一块相当于以色列和黎巴嫩领土总和的土地。他看着这块根据地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瑞金成为“红色的首都”。

现在这一切都将结束，什么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严酷的现实。陈毅看到了这一年多来的惨重损失，红军在反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中一次又一次的失利。陈毅是讲现实的，他没有试图自欺欺人，把白菜清汤说成鲜浓肉汁。红军面临的是惨重的溃败以及艰险的撤退。

周恩来还带来了进一步的消息，中央委员会决定陈毅不随主力红军撤退。他将留下来在苏区指挥军事行动。他只负责军事指挥，另一位老资格的政工干部项英负责全面工作，他们俩将在一起共事。陈毅很清楚，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

切，是“苏俄”路线的支持者。

陈毅将率一支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的部队，其中至少一万人是伤员，许多人象他一样伤势严重，根本不能参加战斗，当时很难估计有生力量究竟有多少，现在就更难估计了。战斗人员的数字虽然高达一万六千人，而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是赤卫队，许多人从未握过步枪。而敌人方面，蒋介石能够部署二十万人，他还可从附近的部队抽调更多的人。陈毅没有问他的部队有些什么武器弹药，他知道武器弹药是不够的，因为从来就没有够过。

周恩来非常敏感，他完全明白他传达的命令不可能激起陈毅的热情。他强调陈毅将起的重要作用，他赞扬陈毅具有经过考验的战斗能力，以及对农村情况的深刻了解。陈毅在这里战斗了多年，没有一条山路、一条蜿蜒的河道他不了如指掌。而且正如周原来指出的那样，陈毅受了伤，长征对他来说是十分艰难的。

“你的伤口怎样？”他问陈毅。他对陈毅的伤势很了解，因为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和陈毅一起去兴国前线，陈毅就是在高兴圩那次战斗中负的伤。

陈毅回答说伤势没有好转，医生还没有把所有碎骨片取出来。他一直要求拍一次X光片，但他们却没有给他拍。周恩来听后马上去找有关部门交涉。原来，X光机器和片子这时都已包装好准备撤离。结果不得不重新打开。因为没有电，周恩来命令把无线电台备用的汽油发电机运到医院，专门给陈毅拍了X光片子。

命令总是命令。陈毅是个好军人、好将军，他执行命令，

接受了中央交与他的任务，即使心里并不痛快。当他发现他的同事项英对于下一步怎么做的想法与他截然不同时，他又增添了几分不快。项英主张硬拚，而陈毅主张避开敌人的锋芒进山打游击。他认为这是生存的唯一机会。然而，他的意见被否决了。

陈毅对他的使命感触很深。他没有公开表示他认为这与反毛的政治斗争有关，尽管他的许多朋友持有这种看法。他承认对他的委任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他比任何其他指挥员都熟悉这块土地，他是个有经验的领导人，他的任命会提高那些留守人员的士气，会使他们感到红军并没有放弃中央苏区。但是，陈毅对这件事的情绪很大，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七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既谨慎又明确地表示，把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一个指挥官，而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这样的作法是不对的。

十月中旬，这是个气候宜人的时节。但从于都出发的那一行人情绪都不高。这个决定周恩来不只告诉了陈毅一人。与陈毅谈话之前，他把毛从于都召到梅坑的总部，告诉他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毛对此事的反应如何，没有记录，但是他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感到日益不安。他两次提出建议，都遭到李德和博古的拒绝。他每次都建议红军放弃阵地防御，迂回穿插到国民党封锁线之后，越过碉堡群，袭击敌人后方。有一次他主张向东挺进浙赣，进而直取南京；后来又建议打进湖南。这些就象对牛弹琴，没有人听他的话。在北京的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说：“我们有一种说法，一项战略一旦开始执行，

就必须坚持到底。”

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新的计划，即红军向西出击，穿过蒋介石在冯·塞克特将军指导下设立的四条封锁线，然后向西北方向的湘鄂边境挺进，与贺龙会合。贺龙已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根据地。周恩来把计划告诉一军团司令员林彪和政委聂荣臻，以及其它军团——第三、第五、第八和第九军团的司令员和政委。据聂荣臻说，没有把这个计划告诉低于这一级的干部。除了这些最高级的指挥员外，大约八万战士——据伍修权说这是“实际数字”，“为了宣传，当时号称十万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根据花名册上的数字，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红军的实际人数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这个数字是本书首先发表的。具体分为：

第一军团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人；第三军团一万七千八百零五人；第五军团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八人；第八军团一万零九百二十二人；第九军团一万一千五百三十八人。还有两个独立纵队：中央军事委员会纵队四千六百九十五人，以及有时被称为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九千八百五十三人。以上总数不包括雇用的担架员（他们有时仅受雇一、两天）。

这八万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他们中有个姓危的妇女。如今虽已七十四岁高龄，但还是个硬朗的小个子老太太，黝黑的面颊，起皱的鼻子，灰白的头发上戴了一顶毛式帽子，灰色的上衣和裤子，白衬衣，黑色的中国布鞋，正配上她那双小巧的脚。危秀英的半生是在红军中度过的。她是随第一方面军长征的三十名妇女之一。她有一个坎坷的经历，我们的

谈话从她五、六岁时被父母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开始，她始终不知道家里卖她得了多少钱。

危秀英仍然记得当初她父亲要把她卖掉时的情景。她准备了一堆石子和一把镰刀，把它们藏在门后。第二天一早当一个男人来接她时，她向他扔石子，并用镰刀砍他。但那个男人力气很大，终于制服了她，并试图把她带走。她又踢又抓，还把他的耳朵咬出了血，他只得作罢。这时他们又把她父亲的兄弟，她最喜欢的叔叔叫来。她不能咬叔叔，就这样被叔叔带走了。她后来睡着了，醒来时已到瑞金。买她的这家在这里开设一家小店。

她是在地里干活长大的，肩能挑百磅重担。当红军到兴国时，她还在象奴隶一样地干活，经常挨打挨饿，还要放水牛、拾柴火。对于危秀英这样的妇女，参加红军无需多少动员。她自动剪掉长发并用头巾裹上，以免家里人发觉（会打她），径直来到红军总部要求参加红军。他们悄悄地把她送回家，但是她坚持要当红军。这样，她主人家终于发现了她的意图。有个朋友告诉她，主人家准备杀死她。危秀英把这个消息告诉红军后，红军才接受了她。

她还记得在吉安第一次参加战斗，在一个小屋里度过的一夜。小屋里亮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她从来没有见过电灯，也不知道怎么关灯。最后她拿过步枪，举起来用刺刀捅破了灯泡。这杆带刺刀的枪比她还高几英寸呢。

危秀英是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参加红军的几万人中的一个。从兴国参军的人编成了一个师，叫模范师。兴国有二十四万人口，其中竟有八万象危秀英这样贫困的农民入了

党和参加了红军。为革命捐躯的烈士达四万二千三百九十九人，中国没有一个县能与之相比。整个江西省的阵亡人数为二十三万^⑩。

参军，参军，参军。这是红军在占领赣南最后一年的号召。当时小刘英正在于都干扩红工作，长征前夕，毛泽东命令她回到瑞金。

曾宪辉当时也在那里做扩红工作。他现年七十四岁，看上去有点象年迈的赫鲁晓夫，帽子戴在脑后，宽宽的（中国的）乌克兰人脸，眯着眼，一副乡村人精明能干的样子。他的父母是于都的贫农，姐姐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红军一到，他就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五月，他在于都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扩红。由于广昌战斗伤亡惨重，部队需要征集每一个可以参军的人。当他登记了一千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参了军。他参加的部队是一个新编师，即第十五师，或者叫做第一军团少年共产国际师，当时才十八岁的肖华任政委。该师平均年龄为十八岁，最大的也只有二十三岁。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六时，曾宪辉踏上了征途。他身上背着五磅大米的干粮袋，一百发子弹，两颗手榴弹，一支步枪和一套棉衣（天气还很暖和，不必穿棉衣），一共加起来负重六十五磅。至此，他只知道部队要转移，对长征却一无所知。但他跟随部队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长征在吴起镇结束。^⑪

参军的人源源不断。组成了新编八军团，第三十四师和

减员较大的三军团也补充了战斗力。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里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万人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里，有二万多人参军，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个月就有二千人参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参军的人中，大多数人参加了长征。^⑭该县为革命牺牲的人达一万七千六百人，尚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大约五万人。研究长征的专家胡华教授估计开始长征的部队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营以下的指战员伤亡惨重。

为动员青年参军，他们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百分之五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光荣匾，他们的家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给军属送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商品盐以及火柴和大米。还举行群众大会让军属到台上发言，使他们觉得自己与红军有特殊的联系。^⑮

由于国民党人的封锁，盐、燃料、棉织品和火柴等物品在苏区当时是无价之宝。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偷运和贸易。这些商人很机灵，他们惯于贿赂，他们能够经常来往这一地区。与苏区做生意有利可图，加上银元的刺激，出高价的激励，使得商人们不惜一切穿过封锁线，与苏区不断地进行贸易。赣江上经常有人用夹层船把煤油和盐（一个银元一斤，比外面价格贵十三倍）运入苏区。苏区有些钨矿，封

锁也未能阻止矿石外运。毛的弟弟毛泽民当时住在于都，组织贸易，监督运输。^⑪

共产党人没有让马克思主义教条阻挡自我生存的道路。那些化装成运粪苦力的小贩在臭气黑人的担子里把电筒和电池偷运进来。铁匠、粮商、米商，受到保护，甚至放贷者都获准做生意，但受到严密监督。共产党的军队在苏区纪律严明，享有良好的声誉。的确，他们没收富人的财产，然而中产商人却倾向于共产党而不喜欢蒋介石的军队。^⑫

农民之所以特别拥护红军，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贫困的赣南农民过着被奴役和被剥削的生活。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利息，借钱的利息是百分之三十，粮食的利息百分之五十，耕牛百分之七十五，食油百分之二十至二百，盐百分之一百五十。贫苦农民的债务越陷越深，根本无法还清。一九三〇年十月和十一月，毛泽东视察了兴国县和另外六个正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县。他发现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六的富农和地主，拥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而贫苦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拥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于是他命令把富人的地分给穷人。他主张免除农民的高利贷负债，给农民分配土地，再免费分给未耕的山林荒地。他号召禁止赌博和抽鸦片，并杜绝抢劫。他说共产党正在建立一种夜不闭户的社会秩序。连残疾人和盲人也可分到土地，由壮劳力替他们耕种。^⑬

老红军吴兴也来自贫困的、但给红军提供了巨大兵源的江西。他的家乡在会昌县吴村，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同乡。他俩在南昌接受采访时，吴兴告诉我：“论辈份，我应叫

吴吉清‘祖父’。”吴村的人几乎都姓吴，一九三〇年当吴兴十四岁参加红军时是这样，一九八四年仍然如此。吴的一生都在红军中度过。他没上过学，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前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红军战士。长征结束时，他被提升为排长，在延安的学校学习，后来当了师长。他小时候跟篾匠学手艺，但挣钱很少。他曾想参加国民党军队，可又觉得他们是一帮强盗。你就是有一把象样的雨伞，这些人都会抢。当朱德率领部队路过他家乡时，吴兴听说这部队的战士都是些公正老实的人，又听得部队里有人向他喊道：“来吧，小兄弟，加入我们的队伍吧！”他就参加了，从那天起便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五十年后他回忆说：“当我们到达雪山时，我想起了这一切。我们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们这些人也许永远也翻不完这些山了，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我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中途失败了，那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革命终将成功。”

不只是吴兴一人有这样的想法，许多战士离家时都曾感到害怕和孤独，但他们也抱着和吴兴同样的信仰踏上征途，勇往直前。^⑪

让红军战士离开苏区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是他们多年的根据地，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江西，而这些人中多数又来自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瑞金地区、于都县、宁都和福建的周围地区。离开他们的故乡是痛苦的。

杨成武曾是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他回忆道：“苏区是这样的好，苏区的人们是这样的亲。要我们放弃这一切，

到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去。我们即将离开这熟悉的山山水水，离开这朝夕相处的苏区人民，叫我们怎能舍得？”

杨成武出生于福建西部靠江西边界的长汀县，那里是共产党根据地的一部分。当红军已开到附近的消息一传开，杨成武家乡的许多农民都来看望并且慰问红军战士。他们爆玉米花，收集鸡蛋，扛来一袋袋的红薯干，织好了袜子，编好了草鞋，并选了十几个代表，包括杨成武的父亲和堂嫂都来了。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是团里的司务长。这些代表走了一百多里路，跨过山山水水，在战士们离开驻地前和他们团聚了三天。当他们准备回家时，杨成武和他的同事们凑了所有的钱（并不多，杨只有五角钱）给他们作为回去的盘缠。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这几天外出不在，直到堂嫂准备离开时，他才回来，他们只能团聚短暂的一会儿，能梅就得出发了。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他们夫妻才又相见。^⑪

危秀英还记得她随第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营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头上戴着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到天亮就停止行军。开头几天没遇到轰炸，因为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后来，有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他们集合在山坡上开会，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下了炸弹。炸弹落在大约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当时董必武正在讲话。董时年四十八岁，已被认为是长者了。他和蔼可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弹坑，炸弹掀起的土溅了周围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后告诉战士们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他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⑫

第 四 章

“独立房子”的主人

拟定红军撤出苏区命令的人是最后一批出发的。一匹马驮着他的给养，包括他积存下的一些珍贵的咖啡和几盒香烟。另一匹良种白马站在那里等着离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还有点儿什么事情没有办完。当黎明的薄雾在于都河上袅袅升起时，他才最后纵马飞驰而去。

从半夜到拂晓，李德一直在与项英进行最后的谈话。项英被留下来负责苏区工作。李德强调——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们这次放弃苏区并不是很快就会回来的；红军西进也不一定能够把蒋介石的军队引走，从而减轻被围困的苏区的压力，使项英在他的军事指挥员陈毅的协助下能够坚持下去。

李德回忆说，项英最后警告要提防毛泽东。他说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应受他的迷惑。毛泽东在军中支持者的协助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表示他有同样的担心，但几天以后，当他把此话转告他的同事博古时，博古显得比他们有信心，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李德与项英谈得很久，以至于直到第二天他才赶上中央纵队。

李德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身高六英尺以上，在

中国同事中如鹤立鸡群。他举止活像一个呆板的普鲁士人，如海伦·斯诺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雅利安人，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他脾气暴躁，当他被秘密带入苏区时，他用一块手帕捂在脸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称他为“一个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诉中国人，他的真名字叫奥托·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隐退后他一直住在东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至今无法确定他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中国人直到一九八四年还不知道“奥托·布劳恩”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而共产国际的秘密特使档案材料恐怕永远是封存的，这就难以进一步考证了。

李德或者奥托·布劳恩在中国留下的记录是矛盾重重的。据了解，他使用过的名字有：奥托·布劳恩（在护照上）；卡尔·瓦格尔；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他认为李德的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华夫是他在中国刊物上发表文章时使用的笔名（他自己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中国男子汉”）。当然他肯定还有别的化名。多年来，除了极少数人外，外界对他一无所知。

他对自己的经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不过在他的回忆录中公布的一种正式说法是，他原籍德国，名叫奥托·布劳恩，生于一九〇〇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军中作战，并在巴伐利亚参加了革命军队，一九一九年四月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一九二〇年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被捕入狱，坐牢八年，一九二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秘密逃往苏联。俄国人送他上了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随后转到共产国际，被分配到中国工作。

传说选派李德去中国的原因是他有多种语言知识（会德文、俄文和英文）以及他在德国革命期间积累了街垒战的经验。有人说他是在慕尼黑参加的街垒战，有的则说是在柏林。

据说，他的街垒战经验是他到中国工作的最关键的原因。共产国际希望中国革命成为俄国革命的重演——搞城市起义。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确实在上海屠杀了起义的共产党人和工人。但是，用朱德的话来说，如果一九二七年是中国革命的“一九〇五年”，那么下一步就将是“一九一七年的彼德格勒”。据莫斯科的设想，上海这样的事件无疑还会再次出现，届时，奥托·布劳恩这位德国的街垒战战士将比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干得更出色。

关于这位独裁、专制而又架子十足的人被派往中国的上述原因难以得到全部证实，不过以上就是中国革命运动中反对毛泽东的所谓“俄国”派所得到的印象。

李德一九三二年离开莫斯科，向东经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到达满洲里火车站，在这里越过边界进入中国满洲里。据他后来说，他身上带了一本“新的护照，一本使用布劳恩这个名字的奥地利护照”。

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的描述，李德于一九三二年春抵达哈尔滨，“去一些地方进行了调查研究”（他没提是去什么地方），随后乘火车到大连，转乘轮船抵达上海，于一九三二年秋天住进了英国殖民者特别喜爱的老式的阿斯特旅馆。几星期后，他搬进了一套“美式公寓”。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讲，而且对中国革命的背景一无所知。与大多数派往中国的俄国代理人一样，他脑子里对中国的了解仅是白纸一张。但是他

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而莫斯科所器重他的就是这一点。尽管莫斯科当时没有、后来也从未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过多少了解，然而，对中国革命却下了很大的赌注。它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花了大笔的钱，而且还通过柏林银行给上海的国际红救会 提供大量资金。

李德在执行任务时是很勤恳的。他拿着史沫特莱的介绍信去了一趟北平。史沫特莱是一位热情但又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美国人。她把自己的命运先是与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后来是印度，现在又是中国。靠她引见，李德结识了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而海伦·斯诺则在该校学习，他们都同情革命和改革。斯诺夫妇当时不信任这位三十二岁的德国人，李德也不信任他们，他似乎怀疑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可能是美国间谍。海伦·斯诺则永远未能改变对布劳恩的反感，在她眼里李德是个好色之徒（不少中国人有同感）。

李德到中国时，本来已危在旦夕的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的打击下已土崩瓦解。最初的几天灾难，在李德到来之前就发生了，许多共产党高级干部被告密出卖，被捕遇害。

白色恐怖使得共产党在中国几乎无安身之处，危险性最小的地方是赣南的朱、毛中央苏区。党的领导人在一九三三年初就从上海转移到了红色首都江西瑞金。李德是后来追上他们的。他先是不得不留下来等待一位新的军事顾问的到达，他是李德的上级。最后，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李德在上海街

头碰上了他的新任上级。此人就是曼弗里德·斯特恩，他的俄国别名叫弗雷德。他后来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作为共和军的“克莱伯将军”而名声大噪。弗雷德长途跋涉，经欧洲、美国、太平洋和日本，转了半个地球，最后抵达上海，却未能与联络员接上头。

上海是苏联地下活动的中心，许多苏联情报人员都是德国或美国籍。美国人最受欢迎，因为正如史蒂夫·纳尔逊——一名在那里工作的著名的美国共产党人所说的那样，美国人持有所谓金皮护照，有了这种美国护照就不大可能被逮捕。李德抵达时，共产国际的首席特派员叫亚瑟·艾尤尔特。李德在德国时就认识他。李德来之前，上海还有一位名叫艾尔·由劳德的共产国际特派员，此人后来成为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另一位名叫尤金·丹尼斯的人，他是李德离开后来上海的，他后来成了美国共产党的负责人。还有一位叫哈里·甘尼斯，他也在上海干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纽约的共产党报纸《工人日报》的主编。

理查德·佐尔格一九三〇年一月到上海，建立了著名的苏联军事间谍网。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当然认识李德。尽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的秘密活动都严格地各自为政，他们常常与对方的人不期而遇。佐尔格与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联系，与苏联设的另一个地下中心哈尔滨也建立了同样的联系，不过共产国际不能利用他的军用联络线。

史蒂夫·纳尔逊和他的妻子在一九三三年担任共产国际的信使。他们当时给上海局带来了中国驻莫斯科代表王明的指示和活动经费。尤尔特是该局的负责人。据纳尔逊回忆，撤

离瑞金的问题在一九三三年就开始讨论了。王明指示他们自己做决定。尤尔特倾向于不撤离，而中方代表却说他们必须离开。

化名克莱伯的弗雷德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曾显赫一时。和李德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奥匈军队中服役，曾被俄国人俘虏。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他参加了俄国内战，随后去了伏龙芝军事学院。^⑩

据李德说，他和斯特恩很快发生了争吵；但是斯特恩的到来使李德有可能继续深入到“红色首都”去。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李德藏在一艘货运船夹舱里被偷运过赣江。在苏区他受到共产党部队负责人邓发的欢迎，陪同邓发的是手持红穗短刀的警卫员。邓发乐呵呵地咧着嘴，李德以为他们俩将成为挚友。^⑪

到中国不久，李德就知道，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博古领导的那一派，是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由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坚决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中国青年人组成。王明是他们的领导。他基本上是常驻莫斯科的。他们一致反对的是毛泽东。

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陀、拿破伦、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豫不定。

在与翻译伍修权及其他人的交谈中，李德一点点地谈出了自己的经历，他讲的情况与这位“街垒战士”的传说在许

多方面都不一致。

据伍修权回忆，李德说自己是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时被奥匈联军征募入伍，派往东部前线作战。^⑫

一九一六年李德做了俘虏，关押在西伯利亚，奥地利的许多战俘，包括捷克人、匈牙利人、拉特诺人和斯洛伐克人都被关在那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奥地利战俘都站到了俄国革命的对立面，而李德却参加了红军，投进了俄国的怀抱。

李德谈到自己曾晋升为骑兵团的参谋长，（一些当事人对李德所在的部队和军阶、职务的追述都不一样）。在俄国内战中，他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之后，由于在军队服役中表现优异，被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三四年。

由于他的知识和背景，他被选中派往中国工作。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共产党训练骑兵。此时中共的部队里缺少骑兵（鉴于山区地形崎岖不平，道路狭窄，骑兵部队行动不便，因此也不大需要骑兵）。^⑬

无论是伍修权还是任何别的中国人都从未怀疑过李德自我介绍的可靠性。李德告诉伍修权说，共产国际给他奥地利护照的原因是，他一旦被怀疑，可借此掩护自己。他的战争经历对博古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来说是太专业化了，他们不可能提出异议，因为他们都没有多少军事理论知识。

据伍修权回忆，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现在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常规战争，不能放弃一

寸土地。李德深受伏龙芝军事学院盛行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顾问冯·赛克特如出一辙。李德认为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冯·赛克特的碉堡战。

据有的中国指挥员后来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或者任何红军指挥员继续开展或恢复他们随心所欲的作战体制。李德把他的进攻战术归结为“猛烈的短促突击”，从而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然而这个战术并未能有效地消灭国民党军队，而朱毛却从国民党军队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给养和兵员补充。毛泽东用地地道道农民式的语言来对比红军和蒋介石的军队。毛说，红军是叫花子，而国民党不仅是国王，而且还是龙王。红军靠从龙王桌子上攫取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⑭

党纪是严格的。李德有共产国际做他的后盾，并得到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伙人的全力支持，而正是这些人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他们为了保全性命而逃离了上海，现在却控制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就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际，蒋介石对共产党控制地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苏维埃共和国被迫不断地缩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产党失去了他们控制地区的百分之五十八，只剩下六个县了。^⑮

共产党人之间的争论当然不仅仅是关于军事理论问题，还涉及到毛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独立房子”里，有他的一间卧

室，另一间稍大一点作会议室，还有翻译和警卫住的一间屋子。年轻的伍翻译耳听四方，那里几乎没有一件事能逃过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一九三二年二十五岁时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书记）背地里对毛泽东大肆嘲弄。^⑩说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说他强调重视农民是肤浅的表现，“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博古断言：“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⑪这些说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斯大林手下年轻的中国事务专家巴威尔·米夫和中国党内苏俄派头头、同样年轻的中国布尔什维克王明都认为无论毛泽东还是朱德对马克思主义都知之甚少。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过是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所描写的绿林好汉而已。^⑫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排斥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剥夺他手中的权力；限制他的影响；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开除他的党籍，等等。他们使了一着又一着，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比较起来，莫斯科总是更关心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太注意中国的现实。

那时，国际上出现了日本对远东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欧洲的威胁，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价中国。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在毛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恢复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地位，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对毛泽东的批评，出版了经过大量删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篇讲话。^⑬

这些变化丝毫没有影响李德对中国军事方针的全面控

制，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周恩来所组成的“三人团”手中。

尽管李德至死坚持说，他被派到中国来仅仅是作为顾问；尽管中国现代的分析家认为，从技术上来说，博古说的顾问一职也没有说错。事实上，正是中国人自己把权力拱手让给了李德。

李德在回忆录里写道：“尽管我一再提醒（中国）干部们，我的职务仅仅是顾问，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种局面，好像我掌握了最高权力。”

担任过翻译的伍修权将军同意上述估价。他说：“我认为，李德自己并没有篡权，而是博古把权力交给了他，失败的责任在中国人身上。”

伍修权认为，用中国的话讲，李德来到中国真是“如虎添翼”般地助长了中国的“左”倾政策。

伍追述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伍修权承认周恩来对这种局面的形成也负有责任。无论周恩来是否同意李德的意见，有证据表明他最终还是对李德产生了意见分歧和不信任感，但他确实没有或者是未能进行有效的抵制。^{②①}

如果李德的建议使红军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一切也就无关紧要了。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的建议使红军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损失，没有得到任何收益，没有战利品，没有增强兵力，

相反，却使红军控制的区域不断缩小。

起初，李德得到了军事指挥员们的广泛支持，连朱德也几乎每天去那所“独立房子”拜访他，向他请教。其他将军对他的态度也一样，李德还得到有影响的洛甫（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当过报纸编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图书馆馆员）和受伤的军队负责人之一王稼祥的全力支持。

也有一些部队指挥员，尤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第三军团司令彭德怀很早就与李德发生了争执。第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彭的态度非常相似。而第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的态度却比较暧昧。他请教李德，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后来有人指责他有时显得有点溜须拍马。^②

象刘伯承这样的指挥员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公开对李德提出质疑。有时即使是遇到一些小事情——如有一次李德在战场上打了刘部队里的人，还撤了那个人的职——两人都有争执。

有时是遇到更严肃的事情。例如，有一天李德痛骂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翻译伍修权并没有把这些骂人的话都翻译过去，他觉得自己有义务设法缓和关系。但是刘伯承完全听懂了。他与李德一样，也在莫斯科伏龙芝学院学习过，他的俄文水平很高，是一位坚定而带点学究气的将军。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瞎指挥下，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每

次战役似乎都要损失二千到三千人，一个又一个县落入了敌人的手中，引起了指挥员们的抱怨。在毛泽东指挥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曾告诉埃得加·斯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损失了六万人。过去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最严重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广昌战役——四千人阵亡，二万人受伤，这是红军遭受的最惨重打击。这就为蒋介石迟早占领仅有五十英里之遥的瑞金扫清了道路。事实上，战斗尚未结束，红军的前线指挥部就已转移到瑞金了。^②

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战场上总是首当其冲，彭对这种打法颇为恼火。李德和博古来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时彭痛心地说，战斗的第一天就损失了一千人。派去守卫“永久性”碉堡群的一个营全部牺牲。这个碉堡群是根据李德的命令修筑的，国民党飞机大炮的轰击把阵地夷为平地，而红军既无飞机也无大炮。彭指出，这个仗不能这样硬打。

当天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李德说彭应该发动反击，彭反问他军队没有子弹怎么反击。彭激动得几乎喊了起来，说李德的命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即在李德指挥期间）红军没有打过一场好仗！他继续高声喊道：“你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只不过是地图上和纸上谈兵的战术专家。”

彭德怀接着说，多亏红军战士觉悟高，否则“第一、第三军团早就全军覆灭了。”^③彭喊道：“你的计划造成了大量的牺牲，难道你不感到良心责备吗？你就不痛心吗？”^④彭把李德比作“崽卖爷田”那样不感到心痛的人。翻译伍修权把彭德

怀的漫骂翻译了过去,但是他听不懂关于子孙卖地的故事。杨尚昆将军解释说,这是湖南人的说法,彭总以此批评李德随随便便牺牲红军战士的生命。

李德并没有发火,这使彭感到惊异,原来伍修权在翻译时缓和了他的措辞。他请杨尚昆将军再给翻译一遍,这回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李德听明白了,李德开始咒骂他,说他是“封建脑袋”。彭德怀也不客气地回敬了他,然后收拾起自己的背包,准备被调回瑞金,撤去指挥官的职务,被审讯、判刑;准备丢掉党籍,甚至枪毙。他回忆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什么都不在乎。”使他惊讶的是,居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②③}

彭德怀和刘伯承都是心直口快的人,许多别的指挥员都不愿意公开表态,他们害怕遭到非难。因为李德这个人惩罚别人是从不手软的。对他认为失败或犯错误的人,动不动就处分。后来担任中国海军司令的肖劲光,当时已是老资格的高级指挥员。他第一次去苏联是在一九二一年,比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早得多。一九二七年他再次去苏联,在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他的战绩优异,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指挥第七军团。他军中的战士许多是未经训练的新兵。在防守黎川县城时,面对压倒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两三个师的进攻,他们无能为力,败退了下来。李德于是下令审判肖,判了五年徒刑。毛泽东等几名高级指挥员提出了不同意见。亲苏派的王稼祥拒绝签署命令。这样,肖劲光才免进监狱,而被分配做教学工作。李德请博古帮忙,以压倒军方意见,但

是博古不肯过问。^{②①}

那时，共产党人处分之严厉，是司空见惯的事。湘赣边区苏维埃主席张启龙曾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被贬为运输队员。他的上级省委书记王首道被撤职，但很快又恢复了职务。^{②②}

根据一种说法，当时还是红军一名年轻负责人的邓小平受到的待遇也不比别人强。他受到“亲苏”派的攻击，说他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支持者。在党内斗争中，罗明被当作毛泽东的替身，因为亲苏派不敢公开攻击毛泽东，于是，邓小平、毛泽东的兄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和其他几个人被当作“罗明派”的成员而受到了批评。邓小平丢掉了职位，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参加了长征。有的说，他在由几千个民工组成的运输队中当担架员。几位中国现代史学家都否认邓小平曾当过担架队员，但是，无疑他在这件事中是倒霉的。^{②③}

红军干部一般都害怕被指责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被指责背离党的路线。这类指责并不少见。他们对一次次清洗至今仍记忆犹新——反AB团分子的斗争（AB指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队伍中来的反布尔什维克特务分子），例如在富田事件中，据说有几千名毛的部下遭到清洗；反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尤其从苏联回国的年轻学生，他们被指责在苏联受到托洛茨基代理人的影响）；还有反对各种右派、资产阶级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偏离倾向的运动。这些斗争有的反映了

内部的政治争执，有的则产生于对秘密阴谋组织的恐惧。

十月十七日上午，李德匆匆走过于都河上的木板浮桥，尽管表面显得信心十足，但实际上内心是情绪不高的。

眼看要进行一次灾难性的撤退，要越过陌生的荒山僻野，随时会受到数十万敌军的攻击。此外，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可能突然使他失掉控制权（甚至危及他的生存）。

还有一个问题，当时没有人议论过，而且也是无法解决的。这就是李德与上海的联系，实际上也是他同莫斯科联系的问题。一年前李德逃出这个大都市时通讯就已经相当困难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李德一向是通过上海与莫斯科联系的，红军虽然也有无线电台，但功率不够大，无法接通远隔几千英里的红都瑞金与红都莫斯科之间的联系。一切信息都须经转上海，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秘密电台。

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弗里德·斯特恩德被召回莫斯科，很快就要派往西班牙，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他。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每个去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秘密的俄国名字，伍修权叫普雅塔库夫。）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六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据

了解，中央苏区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发出的。电报说，毛泽东一月份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发表了。^{②①}

李德只好自行其事，博古也是如此，再也不能征求莫斯科的意见了；同时也无法援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了。差不多两年后这条联络线才得以恢复。当时大家只能各自为政。过了近四十年之后，李德还特别提到：当时的那种状况，“对毛泽东是最有利不过了”。^{②②}

第五章

最初的行动

毛的警卫员小吴是从家里逃跑出来的。他与他的亲戚吴兴一起逃出吴村参加了红军。那是一九三〇年，当时吴吉清正在一个地主家放牛。他没上过学，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这并不妨碍他加入红军，因为红军里大多数士兵都是文盲。

如今，七十四岁的吴吉清还具有杰出的军人气质，他经常昂首挺胸，长着浓密密的眉毛、棱角分明的下颚和一副又宽又平的肩膀。他极象堪萨斯州已故的威廉·怀特，但缺少怀特的风趣幽默。是博古说服他参加红军的。也许由于体格健壮，他一入伍就来到了警卫连。一年之内，他被选中当上了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同时，另一个名叫王亚堂的也被选上了。他们都是被共产党保卫局长邓发挑选来的。邓发对他们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审查。他们合格的主要条件是，出身都是赤贫，对统治阶级和剥削制度非常仇恨，所以都圆满地通过了审查。从此，吴吉清跟随毛工作了七年。

有时，吴吉清也担任其他任务。有一次，他和王亚堂被分配到毛的弟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那里去工作。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二年。当时三十六七岁的毛泽民负责共产党的财政工作——红军从地主、土豪及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大批金锭、银锭、银元、珠宝及各种贵重物品需要管理；

红军还有自己的小型造币厂，可以铸造银元（银元是中国标准的硬币）；部队有制作金扣、发卡及鞋拔子的模具。他们往往以铸造金扣等方式携带出去，而不携带金子，因为装饰品较易隐藏。

据吴吉清回忆，当时有很大一批财宝，领导决定把这些财物藏到瑞金附近的山上去。两个警卫员被派去帮助毛泽民完成这项任务。被雇来的搬运工扛着这些财物沿着蜿蜒的小路走上陡坡。这并非易事。金银很重，一块银元大约重一盎司，价值相当于五十美分。每个搬运工大约搬一千枚银元。一共雇了一百多名搬运工，当搬运工快到山顶的时候，卸下担子，领了工钱，即被打发走了。只有两个警卫员和毛泽民留在那里。他们把财宝运到一个秘密的山洞里——这项任务可不简单。据吴吉清回忆，总共有一百多万枚银元。毛泽民封闭了山洞，三个人才下山，苏区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钱财藏在什么地方。

苏区没有发行过硬币。共产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纸币是互相通用的。在苏区以外做生意和支付走私者的报酬都需用银子或国民党的钞票。红军靠着袭击地主的钱柜和挖掘地主埋在地里的藏钱泥罐弄到银子和钞票。一些农民的明亮眼睛常常能够发现藏钱的地方。

红军的这批财物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才叫搬动。这一次，财宝是从山上往山下运了。吴吉清又被调来协助毛泽民。他们雇来了搬运工，启封了山洞，把财物运回瑞金。后来，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了红军战士，这样，他们一旦离开苏区，就可以有钱自己

买东西了。红军的规矩最严格——从老百姓和农民那里买一只鸡，一袋米，从果园里摘一个桃子都必须付钱。除地主以外，任何人的东西都不许抢劫。

一九三四年春为什么要把财宝从山上运下来？答案很明确。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决策核心，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他们已开始准备撤离中央苏区。后来，对于何时决定放弃苏区，何时开始考虑进行长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毛泽东同亲苏派之间的论战中，毛泽东的支持者认为，长征是一个仓促、轻率、无准备的冒险，是惊慌失措的产物，不是有计划的行动。

证据有利于对方。“十万”大军的行动不可能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的事情，早在数周或数月以前就作好了安排。不管是否下令长征，详细计划必须早就作出，否则长征将成为一场溃逃。将财物搬下山来的决定是同制定长远计划相吻合的。

根据伍修权的看法，“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首先是开始大规模扩红，壮大红军力量，拆卸和包装重型装备就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

伍的回忆同李德的回忆是一致的。李德说长征的准备工作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就已开始了，当时正值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失利。

“我同意他的意见，”伍修权说，“虽然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据伍的回忆，长征的计划工作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

一九三四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

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与此同时，另一项运动是征集粮食。红军下达了很重的征收任务，呼吁农民作出捐献。同时开展了借贷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做好了棉衣。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从老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铜壳里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制弹头。李德参与了监督准备工作。伍修权记得有一天曾同他一起检查新手榴弹的爆破试验。不是所有的手榴弹都能拉响的。

很明显，这些都说明，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同时，他们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农家妇女为战士编草鞋。草鞋很容易穿破。战士们想在长征开始时多背上几双草鞋。他们让妇女们把草鞋编得厚厚的，这即是将进行长征的某种暗示。

迄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还未能发现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任何具体指示、备忘录或命令。讨论这些问题似乎经常是限制在博古和李德两人之间，连周恩来都未能参加全部的商谈决策。后来听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怕蒋介石的奸细获悉红军的计划。经过仔细研究国民党的新闻报道，没有发现泄密的迹象，国民党官员也没有自称发现过长征的秘密，国民党的评论却暴露出他们对红军是极其无知的。那时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博古和李德，下台几年了，而国民党还一直以为他是红军的领袖哩；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懂得共产党的斗争阵势。

一位最小心谨慎的共产党历史学家至今依然承认说：“我们无法知道长征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决定开始的。”

一九三四年夏天开始的若干行动，后来被说成是长征的准备工作，包括突围和几支红军部队的转移。

第一支转移的部队是第七军团。七军团七月份撤离了瑞金，并编入了方志敏领导的第十军团。方志敏是位很有能力的指挥员，他是毛泽东的一位老同事，一九二八年一月领导弋横起义。第七军团是由另一名有经验的指挥员粟裕领导的，他一直活到一九八三年末。

据有些人估计这支部队有一万多人，但实际人数可能要少得多。他们向闽浙皖赣开进。这支部队被改编命名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既有战斗任务，又有宣传任务。它的目标是争取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结果没有成功。国民党粉碎了这支队伍。方志敏被捕后，被关在一个竹笼里，装在车上，游街示众，最后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南昌被砍了头。粟裕和一小部分人转为打游击而幸存下来，最后于一九三八年编入了新四军。

紧接着又有一支部队进行了一次突围。这次是肖克为首的第六军团。六军团的根据地是在湘赣边界地区。肖克回忆说，他是七月二十五日接到出征命令，八月七日出发的。他得到的指示是穿过湖南，与驻扎在偏僻的黔、湘、鄂、川一带的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师。肖拥有一支九千多人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武器弹药不足。五十年后他说，他奉命带上全副装备，包括一台沉重的印刷机，这很不利于他的行动。

后来发现，他所走的路线基本上就是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跟上的路线。根据肖克的回忆，一路上恐怕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地人都是文盲。一些人甚至象野兽一样地生活，他们抽

鸦片成瘾，半裸着身子，对农村的地理一无所知。

肖克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他的部队被认为是红军中最强硬的一支部队，国民党怕他，恨他，同时也尊敬他。）半个世纪以后，他成了北京军事学院的负责人。当他谈起当年贵州的艰苦条件时仍然心有余悸。第六军团没有地图，只有从学校地理书上撕下来的一张普通的中国地图。这张地图只有 10×12 英寸大，上面仅标有省会、非常重要的县城以及大的山脉和河流。在边远地区打仗，这样的地图是没有什么多大用处的。他们在迷宫般的群山峻岭中行军，当地的农民连那里是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更无法告诉他们到下一个城镇该怎么走了。

十月二十二日，第六军团同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师了。军团的兵力减到四千人，据肖克回忆，他们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曾把任何敌军引出了中央苏区。

这些部队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仲夏时期的部队行动怎么会有助于十月底红军的大规模转移呢？这一时间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两者没有什么联系。

北京的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后来说：“这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秦认为物资准备和新的扩红工作开始得较早是为了使红军能有准备地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红军在被迫的情况下是可以撤离根据地的。然而，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突围的时间则是另外的问题。他们与十月中旬的长征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即使他们牵制了大批的国民党部队——其实他们没有——也没有证据说明早在仲夏时节博古和李德就

已打算放弃这一地区。

翻译伍修权是个有学识的将军，他听过李德和博古之间（还有周恩来）的讨论，他可能比任何幸存者都更了解一九三四年的指挥决定，然而连他也无法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线索。他说：“我觉得很难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由你自己来回答了。”

他认为第六、第七军团的行动是在红军大量征兵以补充缺员的时候用来转移国民党的视线的。当我问道，七、八月份的转移怎么会有助于十月中旬的长征时，他回答说：“你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称红军起初的行动是“交响乐的序曲”，但是序曲同交响乐似乎不是一个调子。

更使人不解的是第二十五军的转移。二十五军是留在鄂豫皖边远地区的一支残余部队。它原属第四方面军，后来四方面军撤到了川北。二十五军原有大约七千人，但到秋天减少到了二千九百人。

一个名叫程子华的红军政委五十年后回忆道，关于这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曾把他叫去谈过好几次话。程子华现年七十四岁，身上还带着红军生涯给他留下的伤疤。他的双手双臂都受过重伤，右手现在还捏不起拳头，而是象一个爪子。他用左手写字，而左手也被子弹打伤，从未经过很好的治疗。

如果程子华的记忆准确的话，他同周恩来的谈话证实了长征之前进行长时间准备的理论。程回忆说，周曾告诉他，红军处境困难（当时正值广昌战役惨败之后，也正是把财物从

山头上搬运下来的时候)。周恩来说,国民党比红军强大得多。共产党的根据地正在缩小,这就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来源。红军面临着“现实的危险”——如果红军无法获得自给,根据地就将丧失。怎样解决呢?周自问自答说:红军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得到物资和人力,重新开始壮大队伍。

周恩来说,如果红军这样做,国民党就会撤回他们的封锁部队,这将会对形势发生莫大的影响。周就是要同程子华讨论这一形势——即二十五军的处境。这支红军部队的压力很大,它急需加强领导班子。地方党要求给予帮助。周派程子华负责二十五军的军事工作,并把它转移到新的根据地。周告诉他,红军主力即将采取的行动会有利于他执行这项任务。

程子华匆匆离开了瑞金,然而要到达二十五军那里却并非易事。他先到苏维埃根据地的南部,再从那里偷越边界进入广东“白”区,接着去汕头港,从那里再乘汽轮去上海。他从上海经长江至汉口,最后于九月到达鄂豫皖地区。这时,长征很快就要开始了,但他在几个月后才获悉长征的消息。程子华和地方领导决定把二十五军转移到距鄂北更远的山区去,转移到豫西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区。这支部队被重新命名为第二抗日先遣队。第一支先遣队是已被消灭的第七军团和第十军团。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程子华率领二千九百人出发了。

二十五军的行动只与当地情况有关,同任何其他因素联系起来都是牵强附会的。同时,似乎也不可能假设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就为红军的大转移作了充分的筹划。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也在这时遭受了莫名其妙的挫折。它驻在紧挨着苏区的福建，是一支独立的、非常爱国的部队，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世，却被蒋介石流放到福建，因为蒋介石惧怕它反日的爱国情绪和对他的政策的挑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军长们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独立的政府。这是对共产党人有利的形势，本来可以利用这一时机联合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使全中国共同反日——共产党宣传的主题。如同一九五一年十二月那样，这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善于利用的一种机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驻在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在共产党的配合下，举行反蒋起义。为了等待一批共产党需要的冬装和补给物资，起义甚至推迟了一天，改在十二月十四日举行。十四日晚，参谋长赵博生请他的部下到宁都梅河畔布满圆柱的路德教堂内共进晚餐。他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军官们在二楼用餐，警卫员们在楼下用餐。席间，赵博生派出亲信部队包围了这幢房子并宣布起义。两名军官从二楼阳台跳下来，企图逃跑，其余的都参加了起义。最后，十一个团中的九个团，总共一万七千人起义。投入共产党方面的事业。这些起义部队改编为共产党的第五军团，成为红军中最可靠、最守纪律的队伍之一，在长征中发挥了很好的后卫作用，一次又一次地使主力摆脱危境。

在宁都起义中，共产党人工作沉着，有条不紊，信心十足，而与第十九路军打交道时，某些人似乎都成了呆子。最初的接触还不错。八月上旬，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正在闽西作

战。这时，一名代表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陈先生”（陈公培）拜访了彭德怀。彭请“陈先生”吃饭，并象彭后来写的那样，用一个铁皮大脸盆盛满了“从恶霸那里没收来的”猪肉、鸡蛋招待他，当晚谈得很成功。陈先生从如何联合抗日到存在的疑虑无所不谈，很多问题都得到了解答，陈先生接着又去了瑞金，并在那里找共产党中央进行谈判。但是消息传到上面之后，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和他打任何交道。他们反而批评了彭德怀——不是因为他与“陈先生”进行了交谈，而是因为他在宴会上用洗脸盆盛菜太失礼了。

这件事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从瑞金派了两人去同蔡廷锴会谈。一位是吴亮平，后来当了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部长（也曾担任过李德的翻译），另一位叫潘汉年。他们是由作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本人和相当于总理的洛甫派出的。据说谈判是成功的。这两人回来后向毛泽东、洛甫和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他对大家能够联合一起反对蒋介石感到高兴。这份报告在沙州坝散发，当时洛甫和毛泽东住在这里同一幢房子里。

关于十九路军发动事变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它一旦成功，就可以确保共产党人突破蒋的封锁，使他们的事业得到全国甚至国际上的支持，使红军被外界所知。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外国也很少有人知道红军）以为红军只是偏僻山区的一小股叛匪而已。

除了福建本身的意义外，甚至还有其他有利因素：当时，广东军阀对蒋介石持敌对态度。如果共产党人与第十九路军结盟，广东军阀也许有可能加入这一联合力量。有了广东的

支持，其他军阀也可能参加进来。福建有福州这个海港城市。另外，苏联还有可能——尽管实际上不大可能——通过福州建立一条对外的运输线。

这个机会丧失了，因为共产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曼弗雷德·斯特恩仍在上海。他激烈反对与十九路军结盟，他称这支军队“只不过是一支军阀部队”。李德似乎对此半心半意，认为只能按照弗雷德的指示行动。后来，他声称博古和周恩来都赞同联盟，但其他人，包括毛，都对此表示反对。当代历史学家找不到根据证实这种说法。他说最激烈的反对者是“中央委员会上海局”。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当时，此“局”是由一小部分下级干部主持的乱摊子，不久就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消灭了。

乘共产党人自相争吵之机，蒋介石把十九路军消灭了。

一九三四年共产党领导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内部不和——朱、毛坚决果敢的战略已不复存在。决定是由那些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人作出的，这些人更加缺乏与人民（他们称之为群众）打交道的经验。莫斯科和上海相距几千里，却企图发号施令。李德已在中国一年多了，但仍不了解这个国家，不了解中国。他不懂中文，也不肯学。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地形和地理，他不知道江西人和贵州人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江西人在福建，或一个福建人在江西时，由于不懂当地方言而不能与周围人讲话，离家几百里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能不能回家，对这样的人的心理状态他一无所知。

长征开始两天以后，一些战士冲到杨成武政委面前提出问题，李德大概是无法理解他们的。那天，队伍在弯曲狭

窄的山路上行进，没有一个人说话，战士们低着头匆匆向前赶路。突然，两名江西的战士气喘吁吁地跑到杨成武面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

这两名战士——事实上整个队伍——都处于焦虑的状态。这是往哪儿走啊？这是在做什么呀？到底还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杨成武怎么能回答他们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诉他们目前是朝西北方面行进；告诉他们将冲破敌人的封锁，给国民党沉重的打击，并保卫苏维埃根据地。^⑩

李德从未意识到，要红军打得好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觉悟，让红军战士了解他们自己在干些什么。这些红军战士不是机器人，没有被训练成普鲁士军队或俄国军队那样只是服从命令，而从不思考，也从不提什么问题。

而李德却是一个信奉这类原则的人。他是个欧洲军人。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他这种人和他所指挥的这些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来指挥是由于莫斯科一些外国人的一个考虑不周的命令。在中国，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他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至于那些“苏俄”帮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大都不比李德高明多少。他们是知识分子，镀了层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的金，而且这层金使他们脱离了真正的中国。他们在莫斯科学到的重要知识是如何进行官僚主义派别斗争。而毛泽东和他的实干家们却大

都受过战争的考验，到过山区、农村，和农民共同生活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和毛泽东一样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中国，尽管他们不能随时恰当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语录。他们目前没有掌握实权，还是局外人，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而毛泽东在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生涯中，很长时期来一直是个局外人。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就要开始了。

第 六 章

计 谋

起初，红军都是在夜间行军。白天，战士们不是躺在樟树的树荫下就是蜷曲在桉树丛中睡大觉。行军时他们尽拣小路走。赣南和毗邻的广东都没有公路，即使有，红军也要尽量设法避开。红军是悄悄地撤出根据地的，各部队的政委后来在对战士们讲话时，还说这次“重大行动”，没有任何迹象被敌人察觉。

夜间行军倒也并不枯燥。正如一位红军干部告诉史沫特莱的那样：“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在长征初期，红军周围往往没有重大敌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洁，微风徐徐的好天气。

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

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一般来说，红军战士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宣传队又为他们加油打气。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样干，都有人告诉他们。但在长征初期却没有这样做。张盛继是在家乡江西兴国模范县参加红军的。那是一九三一年，他才十五岁。三年以后离开苏区，整个长征他都在作战。他记得一九三四年九月，他所在的部队仍驻在兴国。有一天，他看见两架国民党飞机在空中相撞，一团火球坠落在地，场面惊心动魄。一周以后，他所在部队奉命转移。他们为的是去湖南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五十年后，这位六十八岁、相貌堂堂的老战士回忆道：“当时我们对红军的困境一无所知，大家的情绪还是那么高昂，不知道后来要走那么远的路。一个晚上赶五十英里路，夺下三座县城，要是情绪不高那是干不了的。”另一位江西人叫彭海清，是个七十五岁蓄着短须的小个子，风湿病使他半瘫了。他也说，部队并不了解红军正在节节败退，也不知道正在进行长征。彭是三军团的战士，经历了蒋介石发动的所有围剿，广昌战役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但他不知道这一仗红军打输了。至于长征，“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宣传鼓动在过去的战斗中是那样有效地帮助了红军；而现在如果仍旧进行这样的宣传鼓动的话，就会产生对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指挥失误的激烈反感。

突围的红军摆出了奇怪的阵型。“独眼龙”刘伯承把这一

队形比作皇帝的轿子。两个纵队分别由一、三军团打头阵，组成一个矩形的方阵，方阵的中间行进着总部各纵队和五千名挑着各种行李辎重的挑夫。

红军的指挥系统是复杂的。在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团”的中央军委之下有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总参谋长刘伯承。

行进在方阵中间的两个纵队，其一是军委第一纵队，由后来的红军领导人并担任多年国防部长职务的叶剑英指挥；其二是军委第二纵队，由罗迈（李维汉）率领。罗迈的副手是共产党的保卫局长邓发。

长征开始前，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代号。军委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安”；第二纵队叫“红章”；一军团叫“南昌”；三军团叫“福州”。

军委第一纵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里有最高指挥部的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这个梯队的负责人是彭雪枫。第二梯队基本上是后勤部队。第三梯队有工程营、炮兵部队和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是干部团，陈赓和宋任穷分别担任团长、政委。中央纵队（军委第二纵队）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教导师，负责人是张经武；第二梯队有供应、维修、通讯、训练等部门，以及挑夫；第三梯队是贺诚领导的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由政府和党的官员……及一个保卫团组成，它由保卫部门负责人姚喆指挥，政委是张南生。

刘伯承把中央纵队比作轿子的坐椅部位，该纵队的行动不能象作战部队那样迅速，数千名挑夫和他们的重担——伤

病员和老人拖了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纵队成了沉重的锚链，拖累着行动较快的作战部队。最后，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还抬着办公桌椅和文件档案）。

中央纵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伤亡极少。出现的伤亡更多是由于敌机轰炸和偶然事故，如惊马带着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涧，而不是由于战斗。

在这个纵队里，当然有指挥作战行动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负伤至今未愈。这里还有三十位妇女干部，她们大多数是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干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级干部。

红军象拖着圆木的象队，转移到苏区的西南角，从那里悄悄地越界进入白区。

十月二十一日夜，红军几乎没有遇到象样的抵抗就冲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碉堡防线。这条防线设在江西西南端的桃江河畔。桃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进入广东省境内，红军行军的方向仍旧是向西偏南。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条奇怪的路线，因为通知下来的行军目标是向北向西前进，同二、六军团会师。

长征出师大吉，红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锁线，随后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并于十一月三日以同样的速度顺利通过。此后推进的速度稍有减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红军已全部通过尚未竣工的粤汉铁路。

这是指挥有素的旋风般的作战行动。尽管李德曾提到指挥员之间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特别提到因为缺少地图使一军团裹足不前，耽误了时间。

长征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为周恩来通过谈判已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在长征途中，对峙双方的军队指挥员之间进行秘而不宣的接触是屡见不鲜的。

这样做的原因很多，它符合中国传统的兵家之道。中国人是特别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安排，他们决不会执意非要血染沙场不可。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没有能够破除这一传统。许多今日兵戎相见的人过去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那时他们都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共同作战。国共两党曾有过多年的合作。

在错综复杂的中国政治棋局中，蒋介石并不总是万能的。他面对着地方军阀和政治掮客排列组合的万千世界，联合也好，结盟也好，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军阀们担心一旦蒋介石过于强大，自己的地盘（和财路）就会丧失。对他们来说，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共产党变得过于强大都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如果和共产党搞交易可以捞到好处，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对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爱国主张表示欢迎。

这些因素促使广东方面的陈济棠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向周恩来发出秘密信函，建议举行私下谈判。李德认为陈济棠这样做的动机是惧怕国民党中央军冲破红军的防线，把军队一直开到广东边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共产党的根据地是广东的一道屏障。不管动机如何，粤系军阀派了一个密使去见周恩来，周当即作了积极的表示。他说：“我们可以利用陈将军的反蒋态度，我们必须吸取在十九路军问题上失败的教

训。”

周恩来派了两位负责同志，一位是何长工（他曾劝说王佐参加了井冈山的红军），另一位是潘汉年（他后来负责同莫斯科联系的秘密使命），去粤北的一个小山村，在那里达成了一项互不袭击的协议。双方还商定交换情报，广东省长还答应向红军提供通讯设备和药品器材。因此，长征中的红军穿越广东及毗邻地区有时就象游客散步一样消闲自在。广东军阀的军队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红军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它对敌情了如指掌。

这项中立协议对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有一定影响。虽然到了九月，转移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大的变化已不可能了。这一协议也许促使共产党领导人确定从毗连广东的一隅突围的选择。还有证据表明，广西军阀也同红军达成了某种谅解，由其在广西东北部让出一条“走廊”，以利于红军迅速通过。

广东军阀根据秘密安排向红军提供通讯器材并非孤立的一例。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在川北边境建立根据地时，已经拥有一支相当干练的无线电通讯队伍。陕西地方军队的参谋长、师长杨虎城将军秘密提供的设备器材使其如虎添翼。杨将军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这样的同情者遍及蒋介石军队的各个角落）。但是，他没有能够活着看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由于参加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绑架了蒋介石），他被国民党逮捕，一直关押到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前夕被处决。

对于红军来说，是否真正得到广东军阀答应提供的情报，这都无关紧要，因为红军本身已有一笔特殊的秘密财富，它

可以侦听和破译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电讯。红军对蒋介石拥有的这一优势，就象二次大战中的盟国能够破译绝密的德军电讯一样。红军有这种本事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周恩来。自一九三〇年始，周就负责党的安全保卫工作，他同莫斯科关系密切，安排中国的专业人员在苏联接受电子、暗语、密码和破译方面的训练。更令人叫绝的是，他还安排地下党学习魔术师哈利·胡迪尼的特技，一旦被捕，他们就可以打开手铐脚镣逃脱。至于他们是从哪里受到这样的训练，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在江西根据地初建时期，红军还没有可以发射到上海的无线电台。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们从蒋军手中缴获了两部一百瓦的电台。不久以后，在俄国受训的第一个重要的电文破译专家刘鼎从上海来到苏区。他把整本密码都记在脑子里，从此，毛泽东就能够同上海、并通过上海，同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了。

刘鼎开始了截听和破译国民党电台联络的工作，而国民党方面似乎从未在这方面起过疑心。

开始，国民党仅使用简单的密码或根本不用密码。第一次围剿期间，他们用明码发电，第二、第三次围剿期间，他们便用了简单的密码，这种密码不用什么特殊技能即可破译，而红军的侦听工作早已顺利进行多时了。后来担任电子工业部（原四机部）部长的王诤就是这一工作的负责人，他可以破译国民党前线部队联系的全部电文。几乎没有一次红军不知道蒋军的部署和接到的命令。往往国民党军队自己还没有接到电文，红军却已得到了。

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也在忙于同一任务。长征开始后，他不断向一方面军发出截获的国民党电文。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一连几天彻夜坐在电台边，监听电讯往来，并向一方面军发去重要情报；但他不知道发出的电文对方能否收悉，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知道一方面军究竟在何处。有时候，一方面军的电台功率不足，无法同四方面军联系。

共产党勤奋不倦的侦听工作使当时仍在上海的李德能够清楚地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和战斗命令，胜过了解红军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国民党电文抄件。

由于报务员和设备器材长期紧缺，红军要想方设法俘获敌方的报务员和缴获器材（红军对敌方的医生和他们的药箱也有一个专门的俘缴计划）。为了鼓励被俘的报务员留下来工作，红军给他们各种优待，如额外报酬，优厚的食物供应等。一些报务员知道国民党军队的密码，对红军来说，这更是一种意外的收获。

由于设备紧缺，电台在长征中只用于军团之间的联络，同下级单位联络都使用电话或通信员。通信连要背着大捆的电话线走在司令部的前面，并在侦察队选定的地点架好线，这种办法非常累，效率低，并且经常造成通信兵的伤亡。

根据红军自己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军队从未截获过红军的电文。

随着红军长途跋涉，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即高层指挥员的生活方式要服从通讯工作的需要。白天，全军不是打仗

就是行军，或者边打边走，除了战场上紧急联系外，指挥员没有时间阅读报告。只有夜幕降临，安营扎寨后，电台才开始工作，通信员才匆忙返回，也只有在这时，指挥员才能对战况有所了解。

作为从事秘密活动的革命者，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已经习惯于夜间工作，而今战场上的局势又迫使他们连续彻夜不眠地工作。战士中流传着许多毛和周半夜三更还在工作的故事。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休息的呢？部队每天清晨六点钟开拔，战士和干部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收拾营地，吃一顿米粥，喝点茶水。领导人起床的时间是八、九点钟，此时他们的炊事员或警卫员已经出发三个小时了。他们在三小时路程的地方生好了火，做好了领导人的早饭。在这三个小时里，领导人通常是睡在自己的担架上，被抬到吃早饭的地方。他们被结实的担架员抬在肩上，就象摇篮中沉睡的婴儿一样。

“他们知道后面没有追兵。”一九八四年担任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李一氓这样说。他在长征中同干部团在一起，经常看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他说：“除了养成吃安眠药的习惯外，睡担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有害的影响。”^①

直到十月底国民党才察觉到红军转移的一点风声，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搞清楚已经发生的情况。

这一点直接反映在国民党报纸的报道上。十月十八日的南昌报纸发表了一篇祝贺十四日攻克所谓“兴国模范区”的消息，据说该地从七月起就被包围了。当时，蒋介石正在西安，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成都。十月二十七日同一家报纸报道

说,“赤匪”正企图突围逃跑,并说攻打信丰和安远的红军被击溃,损失达万人,还说是毛泽东和朱德指挥这些行动的。同一篇文章还说到红军已向瑞金方向撤退。次日,这家报纸又发表了一大堆失实报道,二十八日宣布宁都攻陷,三十一日宣布“赤匪根据地”已被粉碎,红都已从瑞金撤往他处。^①

另一家国民党报纸于十一月八日报道说,共产党屡遭失败,但依旧“十分顽强”,“彻底剿灭,尚需数月”。

诸多新闻报道中没有一篇对实际发生的情况提供任何线索。诚然,有一篇报道提到红军正试图逃跑,但重点是指对某些城市的争夺,而红军这时对夺取城市根本毫无兴趣。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一日,南昌的报纸头版刊出社论,标题是:“前赤区的清理工作”,文中提到共军伤亡近万,被俘四万。这一天,南昌召开了市民庆功大会,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实际上,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已一败涂地。或许这是由于蒋本人不在南昌的缘故,或许是由于谨小慎微的冯·赛克特顾问担心共军埋伏而禁止军队穷追猛打。国民党军队先是筑好碉堡,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慢步前进。根据秦兴汉将军的看法,最早在十月三十日,国民党才开始意识到共产党正在采取重大的行动。

在十一月以前,以及在穿过第四道封锁线遭到攻击之前,红军没有受到敌机轰炸,敌机的空中侦察也很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红军到达湘江,国民党才大规模地动用了空军。这是一支由约二百架飞机组成的战斗轰炸机部队,进行空袭时通常三架一组。红军撤出瑞金后很久,国民党还在轰炸瑞金。

蒋介石情报工作的失败是惨重的，而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无知却更为严重。^⑫在《纽约时报》一九三四年十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次提到蒋介石，没有一处说到红军，没有一丝一毫有关中国的白银买卖和铁路事故的消息。

这个月《纽约时报》的大新闻是棒球世界大赛，糊涂的迪安，希特勒，日益激化的西班牙危机以及连日报道的林白绑架案。总之，这家有闻必录的报纸不认为中国有什么值得报道的消息。

十一月九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到长征已经开始。

三个星期之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

第 七 章

担架上的“阴谋”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农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瑜在六星期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他们沿路乞讨，这是肖瑜的主意。两人身无分文，衣衫褴褛，带着破伞和小包，装着笔记本和换洗内衣。他们靠农民、偶尔也靠城里人的施舍为生。这次外出周游既是一次探险，也是一次考察。他们发现，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们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开始用分析的眼光来研究农村。

这次与肖一道外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一九二七年一、二月考察农民运动的预演。当时中国革命正风起云涌，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旗帜下一同北伐。毛这时回到农村，开始进行历时五个星期，足迹遍及湖南五个县的旅行。正是在这一次旅行的基础上，他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报告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对此表示怀疑和反对。

毛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起来，其

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他写道：“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

只能选择第一条道路，这在他的心目中是没有丝毫疑问的。“一切革命同志须知：”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无须为“过分”问题担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

基于这些调查的结果，毛泽东才坚定地高举起农民运动的旗帜。后来，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

毛泽东和肖瑜的旅行以及历时五个星期的农村调查，也为日后的长征做了准备。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上的肌肉变得坚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傅连璋用最好的奎宁药，治好了他的病，但未能有效地使他恢复体力。傅大夫一直鼓励他多吃点东西。一天晚上，他给他带来一只炖鸡。但他说这是特殊化，一定要傅分吃了半只。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动。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

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濛濛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差不多所有坐担架的都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那时患了肺病，不时地吐血，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也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一九八四年身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青年团的领导人。长征开始后三天，他便患了疟疾，一个多月才康复。他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应归功于担架和良好的医疗。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

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但他却执意要上学，结果到上海，进了进步的上海大学。他参加了激进的青年运动，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莫斯科。他不能算在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内，但他支持过他们的观点。

王稼祥长得瘦削。他受伤前就瘦，受伤后更瘦，一辈子都瘦。他的夫人朱仲丽形容说，他的脸略呈方形，前额显得较宽。他善于演讲，虽不象毛那样质朴，但也不乏幽默感。他最喜欢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不过他什么书都读。从俄国回来后，他特别喜欢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洛甫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因而听不懂他们的讨论。但他猜到了大意，劝解这两人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李德的劝说没有奏效。洛甫和博古等人愈来愈疏远了。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他们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进行斗争，矛头是指向博古和李德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的问题。事情发

展到这一地步，李德和博古注定要失败了。

李德对于担架上的“阴谋”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毛正在同别人谈话，而且也知道这对于他的事业没有好处。在回忆录中，他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来了对博古和他本人越来越多的批评。

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三人被称为“核心小组”，或者用李德的话来说是“三人核心”。^⑩不管叫它什么名称，这三人正渐渐地夺取着长征的领导权。

坐在摇晃不定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泽东不是什么乡巴佬，而俄国人和中国“布尔什维克人”却常常这样描绘他。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这些布尔什维克人大都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由同样年轻的帕维尔·米夫及其追随者把他们象填北京鸭一样填满了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逝世后，四人帮被逮捕和粉碎，在邓小平领导下树立起一种新的、较为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把毛泽东从造神者手中歪曲了的形象中解脱出来，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代。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一九三四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长征开始时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呆了四年。长驻莫斯科领导博古他们的王明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

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大量外流时，他没有象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前。

毛泽东出生并生长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四十英里的韶山冲一个农民家里。这四十英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省城。韶山冲和中国大部分村子一样，是个家族性的村庄，村里两千居民大多都姓毛。毛泽东的父亲是位强壮的、尽力想发家致富的农民，在俄国人们称之为富农，是一些冷酷无情、野心勃勃、贪婪而爱财如命的人。他的祖父把家里的土地卖给了放债人，父亲又把这块地买了回来，并设法积攒了四英亩土地，每年产七吨稻米——在当时来说，他们的生活算是不错的了。^①

毛的父亲下决心要让他的长子上学念书，部分是从自身利益考虑——他很快地发了家，从事粮食买卖和放债，自己却没有文化，极需要有个儿子能写会算，能记帐——同时他也渴望提高毛氏家族的社会声望。

毛泽东七岁上学。他从四岁开始就象所有农家孩子一样在地里干活。他上的是一所乡村私塾，在五年的时间里，熟读了《论语》、《孟子》、《左传》（左丘明为注释《春秋》而撰著的）。

许多年之后，毛对自己学过的四书五经又加以贬低。他对罗伯特·佩恩说：“我从八岁起就讨厌孔夫子。”^②但实际情况是，他把五经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到处引用孔孟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论点。在他的最后十年里，报上常常

发表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贵宾的照片，可以看到他的书房从上到下都堆满了中国线装古书。中国的古典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里，体现在他后来发展的复杂的个人哲学体系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是“古为今用”。^⑬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中国最好的教学机构之一——的课堂笔记，就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把孔、孟的思想结合到自己的哲学中去的。孔子和孟子主张改变现实，而不是逃避现实，这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中心的地位。

毛泽东在他的笔记（《讲堂录》）中抄录了孟子的话：“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毛在这段引语下面又加上北宋政治家范仲淹（989——1052）的一句话：“三思而行”。

这些准则将贯穿在毛泽东的整个政治生涯中。^⑭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杰出的传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⑮和《西游记》。

他熟记《三国》和《水浒》中的许多故事。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反复阅读这些稍加故事化了的的中国史实。他多次对这些故事进行评论，并且在游击战争中参考这些故事用兵打仗。他的敌人挖苦他在井冈山和长征中是按照《水浒》中的办法来打仗的。他们说对了，这实际上是对他的恭维。

他阅读了两千四百年以前有关中国军事战略的经典著作《孙子兵法》，以及清朝末年曾国藩和胡林翼对之所作的评注。这两人密切共事，以曾——胡著称，正如后来毛泽东和朱德

被称为朱——毛一样。

毛泽东对中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这是他对世界进行更广泛探索的坚实基础。他发现了十九世纪后期批判腐败的清帝国的改革派，特别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呼吁中国朝资本主义和现代西方制度发展。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废寝忘食地进行学习。他的父亲却要他专心学习算术和记帐，认为哲学探索毫无用处。

他的母亲对他早年有很大的影响。他崇拜她，一再表示对她爱戴。她是位勤劳、善良、有思想的妇女。她乐意帮助他人，有时把米饭给挨饿的农民吃——但她这样做总是避开冷酷的丈夫的。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在她的影响下，毛也信佛。母亲生病时，他就求神拜佛，保佑她恢复健康。十五岁时，他还到离韶山一百英里以外的衡山大庙去拜佛——衡山是中国古代五座圣山之一。象所有的拜佛者一样，他几步一拜，一直拜到衡山。

母亲于一九一九年去世时，毛还写了一篇悼词。

不久，毛便不再信佛了，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留下了深刻的佛教痕迹。李锐是一位学者，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私人秘书，后来被毛放逐，在监狱里待了二十年。他认为佛教使毛相信，社会变革必须先破后立。

毛泽东在师范学校的《讲堂录》里写道：“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①

毛泽东和父亲争吵一番以后，才争取得升学的机会。他

父亲一心要他在附近的湘潭为一家粮商干活，为以后一起经营不断兴旺的毛家家业作准备。此时，毛家已是个殷实人家，他与两位弟弟和堂妹都各有自己的房间，父母占用厢房，另有冬夏分用的厨房及一间宽敞的起居室。房子还有个侧厢，大概也是毛家的，由姓邹的亲戚居住着。现在任何一位参观者都能看出，这决不是贫苦农民的茅舍。屋外有一个很好的鱼塘，可以养鱼，养鹅和鸭，还有宽敞的粮仓。附近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房子了。

他在与父亲的争吵中获胜。一九一〇年初，他进入东山高小，学习自然科学、英语和中国古典书籍。他从未掌握一门外语，但晚年还努力学习英语，想强记一些刺耳的音节。他表现了写作和演讲的巨大才能。学习中他交了两个朋友，即肖氏兄弟肖三和肖瑜。

毛泽东的眼界由于学习再次开阔起来。肖三借给他一本书，叫作《世界英杰传》。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拿破仑、卢梭、彼得大帝、孟德斯鸠等人的故事。华盛顿使他着了迷。许多年以后，他还对埃德加·斯诺说：“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第一次听说美国的，这篇文章叙述美国革命，其中有这样一句话：‘经过八年苦战，华盛顿赢得了胜利，建立了国家’。”他曾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象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如果说，那些年里他已开始考虑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①

此时，毛泽东又知道了中国改良运动的两位领导人。一八九四年日本打败中国以及一九〇〇年发生义和团运动以后，改良运动风起云涌。这两位改良运动的领袖就是康有为

和梁启超。毛泽东发现他们的时候，这两人的影响已在下降了。湖南农村对外界的消息不很灵通。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光绪死去两年之后，毛泽东才听说。

但是他前进的步伐正在加快。经过一段时期的阅读和思考之后，他来到长沙，恰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剪了长辫子，这是象征反抗旧制度的行为。他投身于动乱之中，写了一篇文章，暴露了他头脑里的混乱思想。他呼吁成立新政府，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有点象（美国）由罗纳德·里根当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和乔治·麦戈文分别当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政府。接着，他借了一双胶鞋，打算匆匆赶往多雨的武昌去参加革命。在他启程之前，革命已发展到长沙，他便报名参加了新革命军（但这并不是太革命的军队）。

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校（他曾考虑进警官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甚至教怎样制作肥皂的学校），后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和卢梭的著作，斯潘塞的《逻辑》，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有关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和地理的著作。他阅读中国诗词和希腊古典文学的中译本，就象吃面条一样，狼吞虎咽地阅读各种书籍，从中国的传统思想到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哲学，再到当代社会批判。许多欧洲作品都是中国的改良派严复翻译的。毛泽东阅读了他翻译的每一部著作。

毛泽东饱览了丰富的中、西方思想精华，于一九一三年

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作文上写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是促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博学而被誉为“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老”徐特立（他后来同毛一起进行了长征）、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罗学瓚和张昆弟，他们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但全部在革命中牺牲了。^⑮

李锐在研究了毛泽东那个时期的笔记（《讲堂录》）后，感到难以区别毛泽东自己的思想和杨教授的思想，两人的思想似乎融为一体了。毛正开始把自己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融合成一种较为有条理的学说。他在弗雷德里克·泡尔生的《伦理原则》一书上批注的一万二千字笔记就是明证。

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后来，他把这一点发展成这样一条原理：“知识来源于实践。”

长沙师范学校大门的石头上刻着“实事求是”。这是“徐老”的手迹。毛泽东后来把这一格言当作他政治哲学的基础。

他学习知识如饥似渴。过去他从未读过报纸。实际上，他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报纸。现在，他对能弄到的每一份报纸，决不放过任何一页。

泡尔生是康德的信徒。于是他又开始发现了德国人。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成绩在全班学

生中名列第三，受到同学们的推崇，被他们誉为在品德、勇气和学识方面均属第一。^⑮有些教授认为，他过于标新立异，太爱挑剔，太喜欢打破常规了。

一天晚上，他在蔡和森（他的同班同学，未来的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家里感叹道：“中国如何才能有一位象俄国的托尔斯泰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伦理方面的革命者呢？谁能象他那样清除人们的旧观念，发展新思想呢？”^⑯

他毕业时二十五岁。他谙熟孔子、孟子和中国的伟大文学。他懂得佛教和西方哲学。他学习了美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他吸取了中国古典的军事智慧和孙中山先生的改良思想。他能言善辩，是位诗人、爱国者，是位年轻但迅速成熟的哲学家。他熟悉中国的遗产，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农民，了解中国的问题，了解中国的特有的遗产和政治弊病。他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他正在为领导这一变革作准备。

他努力使自己了解外部世界。他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他知道冯·兴登堡、德皇威廉二世、伍德罗·威尔逊、克里孟梭和福煦等人的名字。他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情况的书刊，并以乔治·华盛顿作为自己的楷模。^⑰

但是，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以前，他还没有阅读过马克思或列宁的任何著作。他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但这时“共产主义”一词尚未出现在他的任何笔记本中。他的朋友、老师或熟人后来也都回想不起他当时知道或听说过《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

但他已处于脱胎换骨的边缘。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步行了好长一段路程，然后来到北京。几个星期之内，他便开始阅读《新青年》杂志里李大钊的文章和谈话，从此一头扎进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没有中译本，他到一九一九年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但是他已经全神贯注于俄国革命了。正如他后来说的：有三本书铭刻在我的心里，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卡尔·考茨基（列宁的死对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缔造者）的一部著作，书名他已记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马斯·柯卡普的粗制滥造的作品《社会主义史》。他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多，但认为这是他所信仰的东西。他同六十年代一些激进的美国青年不无相似之处。这些美国青年连毛泽东的书一行都没有读过，却自称为“毛主义者”。

毛泽东开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他倒相信门罗主义，他也没有摒弃乔治·华盛顿的楷模形象，依旧相信美国及其革命的进步性质。他同许多中国青年一样，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强烈吸引。

毛泽东此时才二十五、六岁——和他四十岁坐担架长征时一样——他智力过人，知识渊博。这个读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人并不是胸无点墨的人，而是一个珠玑满腹，思想深邃的人。

长征中，他的同事里没有一人能与他的博学多才相比。特别是那些自称的“布尔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国中层知识分子出身，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状况了解甚少，而对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活则一无所知。他们生吞活剥地吸收了辩证

法去为自己服务，而这些都是斯大林用以训练列宁之后的政治机器人的。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于有头脑的中国青年是不感兴趣的。他们要的是把俄国及其利益放在首位的作为工具的人。

毛的智力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常识和中国落后农民的特点之大成，在悉心运用时，几乎是无往而不克的：不论他的目标是二十六岁的布尔什维克，是象朱德那样四十出头的将军，还是象林彪那样野心勃勃的青年。

“担架上的阴谋”所导致的结局，是不会使了解毛的为人的人感到吃惊的。

第 八 章

妇 女

毛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按规定夫妇不能在一起，而且这个规定很严格。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只有三十名妇女干部，女护士和女勤务兵也寥寥无几。但并非其他各军都是如此。四方面军就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

有关妇女的规定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二十三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过，但这有其特殊的原因。康是战士、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支步枪，以帮助劳累的战士，从而做出了表率。

康克清是位健壮的农妇，渔民的女儿。一九二九年一月，就在朱、毛撤离井冈山之前，她在井冈山与朱德结了婚，当时她才十七岁。朱德这时已四十三岁。朱的原妻伍若兰（一位革命妇女）已于一九二八年遭国民党杀害。康克清从十五岁起就一直在井冈山战斗。

象大多数妇女一样，她分到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她背着额外的枪支徒步行军。长征结束后，她对海伦·斯诺说，她觉得长征并不十分艰难，“就象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

大约五十年后康克清女士说：“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这话。”

一九八四年康克清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强有力的、信心十足的领导人。多年来，她一直是中国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她是演说家、决策人、政治家。她并没有象她在长征中所期望的那样一生从事军事工作，而是献身于重要的社会工作和政治工作。

她对长征的感受至今未变。

她说：“我很善于走路和骑马。我总走在一群人前面几十米，这群人中有蔡畅（另一名党的妇女领袖）和几位留过学的党员。他们整天谈论他们的经历，谈论在国外的学习情况，吃过的好东西以及去过的地方。

“他们每天谈呀，笑呀！还开玩笑。和他们在一起感到鼓舞。他们不断地说笑，有时还唱《马赛曲》。我确实对海伦·斯诺说过，长征就象在野外散步一样。与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她的同伴中，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与她有同感的人却并不多，大多数认为长征是一次艰巨而又危险的行动，自始至终都是如此。

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与毛见面，而这种休整在初期是极少的。他们可能比别的夫妇见面机会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一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幸存下来的指挥员和医务人员都坚持说，长征中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部队行军途中接触妇女的机会不多，当然，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妇女。一九三六年朱德却告诉过海伦·斯诺，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由于严明了纪律，这种现象得以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部队到达延安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但是，当时在陕北城镇居民中，梅毒仍很流行。

尽管红军的领导人原则上已经打破了有关两性关系的所谓封建观念，但红军仍有浓厚的清教徒色彩，干部战士未经正式批准不得结婚。干部和军官获准才能结婚，但并非轻易能得到批准的。

很多年之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产生了离婚问题，党不得不进行审议，并对于是否允许离婚作出裁决。红军在极大程度上是由青少年组成的。约百分之五十四的战士都在二十四岁以下。据傅连璋大夫估计，百分之九十的人未曾有过性生活的经历。危秀英是个黄花闺女，曾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她记得当她和一位年青战士一起趟水过河时，引起了那位战士的惊慌。她的黑裙子一直卷到臀部，这位战士喊道：“你受伤了吗？”她意识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经流血。他不知道妇女还来月经。在这方面许多战士与他一样无知。

不仅是无知和规章制度限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的精神。身材娇小的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结婚）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

“有时，”刘英说：“我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

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我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这就是为什么领导干部中不论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李德的性要求感到极为不快。李德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在苏区没有妓女。他们于是便努力为李德找个女性伴侣，可这也无济于事。中国妇女很快就对他退避三舍，说他长得太肥大，太粗暴，使她们肉体上受不了。

李德的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中国人对李德的怨言之一就是他的伙食和供应比任何人都好。）李德的作法实在不够策略，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他们找到了一位年青的农妇名叫肖月华，当时她在胡耀邦身边工作。胡现任党的总书记，当时在共青团机关工作。

肖月华长得并不漂亮，但是她贤惠壮实，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红军控制苏区期间，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但在长征开始后，她象大多数妇女一样，被送往休养连。这就引起了麻烦，不论是肖月华还是李德都不识事务。他们不仅自己吵架，肖月华还与周围的女同志吵架。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和康克清等人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来平息风波，但都无济于事。

康克清五十年后说，“他们怎么能相处得好呢？他们怎么

交流？李德根本不会说中国话，而她只会讲中国话。他们怎么办呢？叫伍修权给他们翻译吗？我不知道肖月华内心是怎么想的。但他们怎么共同生活呢？我想，作为李德的妻子，她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代表的。但他们却没有共同语言。

“然而她还是凑合着与她丈夫一起生活了。我们有一句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⑩

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她说，“她是傅连璋大夫的勤务兵，没有多少本事。”丁玲说红军有责任使李德得到适当的照料。他需要女人，红军便给他提供了一个。她说：“他受到了很好的待遇。”^⑪

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她甚至在他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她还给他生了个儿子。这孩子长得挺黑，毛泽东开玩笑说：“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海伦·斯诺报道说，最后，肖月华提出要与李德离婚。这是个丑闻百出的过程。肖月华要求给她六百元的赡养费。离婚要求被批准了，但她是否得到了赡养费，我就知道了。她后来到了长沙，在那里工作了多年。于一九八三年去世。她死后，胡耀邦亲自过问，满足了她生前要求^⑫。

长征过来大多数的夫人都不操持家务。康克清宣称她从来没有照料过朱德。他有贴身警卫为他做饭缝补，也为她做饭。康克清没有当过家庭主妇。她的父亲是渔民，一贫如洗，家里把每一个出生的女婴送给另外一家贫苦农民——甚至是

分文不取的白送。女孩子便成为仆人、雇农或守着锅灶的家奴。康克清生下后刚满月便送了人，她奴隶般地生活，直到十五岁才逃出去参加了红军。朱德的身世也一样，他家有五名婴儿都因养活不起而被溺死。他自己被送给一家没有后嗣的亲戚，并进了一个地主子弟学校读书。他如是个女孩子，一出生就会被溺死。也许正因为朱德和康克清有过共同的遭遇，才使他们这样情投意合。康在与朱德结婚前一直是个普通战士。当时她本应做政治工作，长征前夕，她正好在一个拥有八百名战士的营里，营长在一次进攻中阵亡，战士们让她来指挥。他们击败了敌军。红军称她为“女司令员”。她无意安居下来生儿育女。长征结束后，她就埋头学习，希望成为一名高级军官。^⑬

贺子珍则不同。她喜欢照料毛泽东，而且一有机会就这么做。她善于烹调，为毛制作他爱吃的湖南风味菜。毛泽东非常喜欢吃辣椒，特别是贺子珍做的辣椒汤。“不喜欢红辣椒，你就成不了好的革命者。”毛泽东喜欢对李德这么说。李德则喜欢醋溜肉和酸白菜，为此李德极不愿听毛泽东这句话。^⑭

贺子珍相貌隽秀，有点脾气，是个热情奔放的革命者。长征开始时，她二十四岁。她与毛在井冈山相会时仅十七、八岁。^⑮

贺子珍并非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毛的父亲曾强迫他在十五岁时就娶了一个比他大四、五岁的媳妇。他顺从地按礼仪拜了堂，但是拒绝接触那个年青女人。她的名字从未透露过（因为这是一次没有圆房的婚姻）。^⑯

贺子珍也不是毛泽东的第一个爱人。他的第一个爱人和

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他的老师的女儿。这位老师便是杨昌济教授，毛泽东跟随他到了北京。在北京毛开始信奉马克思主义；几乎在同时也热烈地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是个身材苗条，才华出众的女子，比毛泽东小八岁，她立志献身于建立新中国的事业。两人对革命志同道合，并携手合作。

毛泽东和杨开慧一类的青年人蔑视中国的旧习俗。他们嘲笑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一九一九年，毛的知心朋友及革命同志蔡和森与年青的湖南姑娘向警予（很多人后来都把她看成革命的化身）在去巴黎的船上相遇，并开始相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结了婚。他们在巴黎举行婚礼，并照了结婚照片。照片上除了小两口之外，前面还放着一本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照片下面顺序写着“向”、“蔡”两个字，这两个字包含着有趣的双关意义：既是他们两人的姓，又可解释为“向上的结合”。大家看到新娘的姓写在新郎的前面，既惊讶又赞同。^⑪在革命者中，这对夫妇的命运最为悲惨。向警予在汉口的法租界被捕，并被押交给国民党。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四点杀害了她。蔡和森于一九三一年在香港被捕，也被押送给国民党，国民党残忍地把他的手脚钉在墙上，用棍棒把他活活打死。死后还把他的前胸和肚子切成了碎块。^⑫

毛泽东和杨开慧对传统婚姻的反抗没有他们两个朋友那么强烈。他们只是宣布他们“试婚”。他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开慧生了三个儿子。一九二二年出生的毛岸英是一位才貌双全的青年，一九五〇年在朝鲜被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一九二三年出生的毛岸青，一九八四年仍生活在北京，已与一位叫

邵华的女子结了婚。据某些人说，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出生的。^①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的时候，把开慧留在了长沙，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一九三〇年十月，开慧住在长沙东郊时遭国民党军队逮捕。她和长子毛岸英一起被关进监狱，国民党企图让她背弃毛泽东。她拒绝了，于是便遭到酷刑。当时岸英可能也在场。她于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刑警处决。一个名叫陈玉庭的护士把毛岸英带回了家。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实际上是堂妹）是地下工作者，她比开慧被捕得早，于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日在衡山遭杀害。她们两人的死是没有相互联系的，但两人都与毛有关系。开慧的殉难则与一九三〇年九月毛奉第三国际之命对长沙发动一次未遂的进攻直接有关。在毛的军队被赶出长沙后，国民党省长下令在长沙逮捕和处决了许多共产党人和共产党嫌疑分子，杨开慧便是其中之一。^②

据“文化大革命”期间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说，毛泽东的几个儿子由一位姑姑照看。一位基督教牧师也曾经照看过他们。孩子们被带到上海，进入一所由共产党秘密监护的学校。但是学校被暴露了，警察把孩子们赶到街头。毛泽东的几个孩子颠沛流离，靠乞讨和卖报为生。他们露宿在街头巷尾和破旧的庙宇里，在庙宇门口贴上一张纸标说：“我们能讲故事——一个故事一分钱。”孩子们最后得救了，被送往延安。

毛在同开慧离别之前的几年里已经难得同她见面。他们常常在不同地方担任工作。离别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开慧的思念日益深切。一九五七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蝶恋

花》的悼念开慧的诗词：“我失骄杨……泪飞顿作倾盆雨。”^{②①}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相遇。她是个刚从福音教会中学出来的优秀生，身材苗条，充满活力。她加入毛在井冈山的队伍之前就已在当地农民秋收起义中作过战。

不仅仅贺子珍本人是个革命者（她于一九二六年十六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②②}她的全家在其父亲的影响下都从事革命工作。她父亲是个开设茶馆的小商人，但也是主张变革的爱国者。共产党放弃江西，踏上长征之路的时候，贺子珍的父亲是遭国民党报复屠杀的首批人员之一。贺的一家住在井冈山北面永新县的黄竹岭，属红军的作战地区。贺子珍的母亲是位聪明能干的人，主持家务。从一九二七年起，贺家的其他成员都投入了革命工作。贺子珍的四个兄弟都参加了革命。其中之一当地下交通员，在送信时被截获，遭杀害。妹妹贺怡，于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婚。毛泽东和贺子珍一九三二年在瑞金生下的儿子小毛，后来留给贺怡和泽覃抚养。一九三五年毛泽覃在江西游击战中牺牲后，贺怡把小毛留在福建的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孩子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五〇年，贺怡在福建寻找小毛时，死于车祸。

贺子珍是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降生的，她父母因此给她起了一个娇滴滴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桂圆”。在中国，桂是八月的意思，而桂圆即龙眼，与荔枝差不多的一种水果。她长大成人后，觉得桂圆这个名字“太软绵绵了”，便改为子珍，

意为珍贵的孩子。她长得很漂亮，可算得永新城里的一位美人，白嫩的皮肤，明亮的眼睛，活泼热情，又娴熟诗书。她是学校里最早从事革命事业的女子之一。她领导同班同学剪去长辫，推倒了庙宇神龛里的菩萨。她高昂圆润的声音和善于表演的才能更使全县的人望尘莫及。她是永新县中遭国民党通缉的首批人员之一。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她参与领导了三个县的起义，使监禁在狱中等待处决的二十八名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她的一个哥哥）得救。贺子珍他们在起义时仅有几支老式步枪，但是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终于取得了胜利。（井冈山王佐这帮土匪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贺子珍就在井冈山地区活动，后来跟随毛泽东上了山。不久她便从事敌后的危险工作。有一次她不得不装成奄奄一息的病妇人才使自己免遭逮捕。另一次，她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时，把遭伏击的毛泽东和朱德救了出来。她跳上一匹马，双手各握一支手枪，一口气奔驰了十几里，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使毛和朱德得以脱险。

象这样的事迹使贺子珍在游击队中出了名。在井冈山早期斗争中，贺子珍多次与其他男同志们一起并肩作战。^②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相遇不久，就在井冈山共同生活，但是直到一九三〇年杨开慧牺牲后才算正式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出生于和江西省接壤的福建边界地区。一九二九年七月至十月，毛身患疟疾，在这里的一座山上养病。这个女孩出生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不详，也许是龙岩县的古田。

毛泽东在赣南和闽西南的根据地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

他一恢复健康，就迅速转移。孩子交给当地农民照料。据说一九三二年，他曾寻找过这个女孩，但没有找到。时值漳州一仗，战斗就发生在毛泽东遗留孩子地区的南面。毛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傅连璋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

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毛泽东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尽力保护她免遭长征之苦。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第一道和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派他的贴身警卫吴吉清和王亚堂去照料贺子珍。贺在休养连，毛在干部团。两人虽相距不远，却无法见面。^{②4}

毛泽东自激进的学生时代起，就是妇女平等权利的积极拥护者。他最早的著作之一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他创造了这样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他并不是长征的总负责人，主力部队三十名女干部的生活每况愈下，简直就象走向阴间地狱一样。不论由谁来管，都弄得一团糟，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许多早期发生的问题都是涉及一些基本生活问题，如食物的分配和搬运，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妇女们都很年轻，但没有几个是象康克清那样结实的农妇。她们整日整夜在嶙峋的山间小路上行军；往上爬三千尺，往下走两千尺，再往上爬三千尺；越过一座高山，又去一个长达三英里的崎岖山口，就这样翻来覆去，哎！这些妇女她们哪来这么大的劲呀！

博古的夫人认为她的经历是典型的。长征开始时，她二十七岁。她工人出身，祖父的职业是掏粪，并把粪便卖给农

民。十一岁时，她被卖给一位工程师，充当童养媳。十四岁时，她逃了出来，在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屠杀之前，她加入了共产党，被派往苏联。她在苏联耽了四年，与博古结了婚。在去苏联前她已在苏区工作了一年。

她有两个孩子，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男孩，在上海生了个女孩，现在第三次怀孕了。在长征前约一个月的一次空袭中，一块弹片击中了她的头部。她流产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她与其他人一道撤出瑞金时已基本恢复健康。

过了三四年，当她回忆长征初期的情况时，就觉得往事不堪回首。“行军非常艰难，”她说，“我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

由于组织工作没有做好，妇女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整天饥肠辘辘。男人们则宣称妇女的待遇比男的好，公平分配给她们的米袋也不背。“于是，男女同志之间发生了口角。”博古的夫人说。

接着，试用了新的编队办法。把妇女们单独编队，由博古的夫人当队长，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负责粮食补给。实行了严格的纪律，不得自由散漫。情况果然有了很大的好转。^{②③}但是，正如矮小的危秀英说：“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我们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毛泽东从于都带回的小刘英被分配在中央纵队的第三梯队（在第二梯队的是休养连，行军中大多数妇女分在休养连）。

第三梯队是一支后勤部队。这支部队的五千名男的扛着

沉重的印刷机、制币设备、邮票印刷机、制造枪支弹药的工具等。第三梯队的战士大多是新兵或非军人。搬运这些辎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没有。要完成这些任务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把印刷机和工具部件拆开，一个齿轮、一个机器外壳或一台钻床也往往要由六个人来抬。然而，羊肠小道常常连两个人都走不开。行军又大都在晚上，一下起雨来，道路泥泞易滑。由于敌军离得太近，又不能点燃火把，经常有运输人员连人带物从一千英尺的悬崖峭壁摔下，物毁人亡。

长征开始后一、两天，一些运输员便开始开小差溜回家去了。士气低落。他们看到面前是愈来愈陌生和险恶的深山。他们觉得再也找不到返回江西的路了。天黑之后，他们便不声不响地潜踪匿迹……。小刘英等人必须设法制止所面临的队伍瘫痪的危险，但实际上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五十年之后，刘英苦笑着承认：“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¹⁹²⁰

担子是那么重，道路又是那么崎岖曲折，走了整整一夜也只不过能前进五里路。这支后勤部队拉下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包括第四突击团在内的战斗部队以及后来因战果辉煌而出名的袭击队，不得不来保护笨重的行李车免遭蒋军的攻击。这简直就象一部糟糕透顶的西部影片的镜头：印第安人越来越迫近，而没有第七骑兵团前来解救。

刘英与这些运输人员一道行军，在休息时，她还要努力鼓动，以提高他们的士气。她要给那些精疲力尽、思家心切、半饥半饱和常常神思恍惚的人们灌输革命热情。

“招募运输人员很困难，”她回忆说，“很难雇到，也很难

征募到。”许多人的肩、背磨破了，疾病缠身，体质虚弱。他们担心，如继续同我们走下去，他们或他们的家属会遭到敌人的报复。”

即使是刘英钢铁般的精神也无法消除运输人员的颓丧情绪。他们开始甩掉背上沉重的负荷。已经没有那么壮汉来运送所有的辎重了。队伍必须采取某种措施。^{②①}

三十名女干部中无一人长征中牺牲。有些人就说女干部在长征中没有干多少事情，而李一氓对这一说法表示难与苟同。再如李伯钊，她本人是参加长征的幸存者，她的评价看来比较中肯。直到去年她七十三岁时，谈起革命征途中的女同志、女英雄和烈士们，她仍充满敬意。

她谈到了蔡畅。蔡畅是名门闺秀。她是清代著名将领曾国藩的后裔。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他在南京屠杀了十万太平军。蔡的母亲有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五十岁时，她与富商丈夫离婚，进入小学，完成了学业。其子女成为共产党人，受她的影响极大。蔡畅在长征期间一直把她母亲的一张旧照片带在身边。^{②②}

中国没有比蔡畅一家更为革命的家庭了。她在著名的周南女子师范学校读过书，这个学校是一个殷实地主朱剑凡捐助开办的。李锐说：“朱在今天会被称为‘民主人士’。”他很激进，把自己的很多房子和花园赠给学校使用。（他的女儿朱仲丽后来与受了伤的王稼祥结婚。他另一个女儿与肖劲光——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结婚。）这个学校的另一名学生向警予，她后来与蔡畅的哥哥蔡和森结了婚。

蔡畅及其兄长蔡和森，按照与毛泽东共同发起的第一期勤工俭学计划，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前往巴黎。他们的计划是“拚命念书，拚命翻译。”他们的母亲也去了。他们从亲戚处筹款六百元作为旅费。蔡和森受到新兴的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强烈影响，可能是选择共产主义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他和周恩来同是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创建人。蔡畅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哥哥对毛泽东有很大影响。他们同是湖南人，又是同班同学。蔡和森在欧洲、毛留在中国期间，两人书信来往极为频繁。蔡畅、蔡和森与毛泽东是非常密切的挚友。他们三人曾一同发誓都不结婚——可是谁也没有遵守誓言。^{②9}

一九三七年海伦·斯诺在延安见到蔡畅时，她一家已有三人被蒋介石杀害，另有两人身陷囹圄。她到国民党地区从事地下工作，一旦暴露也必定送命。她当时举止文雅，表情生动，说起法语略有点口齿不清，她一辈子都是如此。只有在细看之下，才能从她深邃的棕色双眼中看出忧伤的神色。^{③0}

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那时，她二十四岁，身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她和刘英一道行军，也象刘英一样，不仅翻越了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岖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我为什么要说起蔡畅呢？”李伯钊反问道，“因为她深得

妇女以及我们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一九八四年蔡畅仍生活在北京，时年已八十四岁。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双目已经失明。但是她仍尽力工作。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末，这个圣徒便是她。

第九章

第一场大战

在长征的头三场战斗中，红军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胜利地穿过了蒋介石为阻止他们突围而设置的三道防线。但是，五十年后，正像中国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所说，长征所遇到的不仅仅是枪林弹雨，长征面临的是同时进行的三种战斗——与蒋介石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还有最关键的是，在共产党内部领导人与领导人、一种方针政策与另一种方针政策之间的斗争。

决定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秦将军沉思地说，“即使到今天，许多事情也还是搞不清楚。”

在长征途中，高山悬崖、冰雪雨雾、湍急的河流、莫测的风暴、灼热的沙漠、无底的沼泽、饥饿的威胁、无休止的行军，都使战士们随时面临着比蒋介石的枪弹更大的危险。而在这一“狂飚运动”的背后，一场关于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殊死斗争正在最高领导层进行着。

红军的指挥员都是些精明能干和久经锻炼的人。他们参加过多年的游击战争，共同经历过多次战斗。他们熟悉自己的国土，熟悉人民。他们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林彪的一军团在突击和伏击方面是超群的；而在正面作

战和短兵相接方面，彭德怀和他的三军团最为擅长。他们学会运用策略和计谋战胜优势的敌人。他们行军神速，当敌人以为他们距离很远时，却又突然出现在敌人眼前。他们行装轻便，不怕艰苦，到处都能生存。他们很年轻，都是壮实的农民出身。他们体格健壮，不怕劳累，能像山羊一样地翻山越岭，可以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一天只睡几个钟头——或者根本不睡觉——又投入战斗，而且打则必胜。

红军战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全心全意为事业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但是一九三四年春夏突击扩军时招来的新兵就不同了。他们仓促应征入伍，军事上、思想上都准备不足，又没人告诉他们要到哪里去，或者去干什么。也许，部分原因是最高领导自己也心中无数。

不论原因如何，付出的代价可不小。那些没有明确目标的人从一开始就陆续落伍。有些士兵是掉了队，更多的是拨开双腿开了小差，就象传说中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前夕从俄国军队溜回家的农民士兵一样。这些人趁走得不太远，还不至于找不到回家的路时，索性就往回溜了。

按红军的标准来说，开始长征时他们的装备相当不错了。他们拥有步枪、卡宾枪、手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等共计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三支。其中，六百五十一件是轻重机枪。有三十八门迫击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径火炮很早就扔掉了，他们携带了积存的一百八十万零一千六百四十发子弹，二千五百二十三发迫击炮弹和七万六千五百二十六枚手榴弹。

这是一支强大的部队，但它的对手却是比它还强大许多

倍的军队。据红军指挥员们估计，蒋介石纠集了大约一百个团三十万到四十万人来对付他们。总参谋长刘伯承估计敌人总数为四十万。八军团的莫文骅说，“粗算一下”，人数有三十万到四十万。一九八四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一位年仅十八岁的红军青年团领导人，他估计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达三十万。

蒋介石了解到红军活动的动向和规模后，当即组织部队去遏制红军。十月三十日，他命令两位可靠的中央军将领薛岳和周浑元带领四个师，配合广东的一支南路纵队和湖南军阀何键率领的一支西路纵队，去攻打红军。

两周之后，蒋改变了主意。他封何键为追剿总司令，并提出让何键同薛岳和周浑元会合，诱惑并消灭红军于湘江。湘江由南向北，流经广西进入湖南。这几位将军共有十五个师约七十个团的人马。蒋要求广西和广东军阀（他们还有三十多个团）协助把红军拦截在湘江前的全州、兴安和灌阳三个城镇，长约八十英里、宽三十英里的三角地带。

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两广的地方军阀在同红军交战中会受到严重削弱，从而给蒋提供一个吞并他们的良机。

踏上征途的红军，已无法隐蔽自己，它不得不勇往直前跨过湘江。过了江就必须按预定目标挥师北上，同湘西的贺龙和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一看地图就可以知道红军的路线，这就是两个月以前六军团经这里同贺龙会合的路线。

五十年后，一九八四年时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

当年是六军团的一名二十岁的农民战士。他回忆说，六军团绕道去道县，然后一直向西走，在兴安附近过江。他记得当时“没遇到什么麻烦”。他说：“经过一些战斗，我们占领了一个山头，越过这座山，到达江边。江上有一座浮桥。我们从桥上通过，到黄昏时刻过了江。我记得当时士气很高。”

是否有人暗地里对广东和广西军阀打了招呼？没有可靠的证据，可是六军团的行动没有引起广西方面的丝毫反应。就好象有人向他们说过：“我们只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下你们的道路”（也许有人说过这些话）。

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处于强烈反共的桂系军阀白崇禧控制的地盘。尽管白崇禧极其仇恨共产党，但他也害怕蒋介石，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保存自己。他不愿意上当受骗，不让蒋介石借机削弱和搞垮他。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秘密“安排”，使红军得以顺利渡过湘江，翻越前方湘桂交界的五岭禁区？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探索。

没有人提起过周恩来同广东独裁者陈济棠之间有什么秘密交易这样的具体事情，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存在一项谅解。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一九三八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十三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六十至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

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和他的上司秦兴汉将军没有使用“走廊”这个词，但他们承认广西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江。

何键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起全面负责蒋介石中央军的指挥大权。国民党的主要将领薛岳沿共产党军队的右翼或北翼移动，与往西行进的共军平行，并从北面拦截他们。周浑元则在共军的后面不断骚扰他们。

红军以其通常的队形向湘江挺进。林彪率领的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几乎是直线前进。九军团正好在行动缓慢的中央纵队前面。中央纵队现在已减轻了一点负担。不少挑夫开了小差，把包括戏装和道具等在内的重担都甩掉了。

八军团里集中了许多夏季入伍的新兵。这个军团在军委和中央纵队的左翼行进。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洛甫和毛泽东等多数军事领导人都在这个纵队里。

跟在这个指挥部后面的是拖泥带水的挑夫，他们中有些是受纪律处分被分配来的红军战士，包括一些降职的军官，可能有一些是被关押的军人。

忠实可靠的五军团殿后，他们是后卫，用当时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将军的话说，后卫的职责是挡住国民党的“看家狗”，这些走狗不断对行动迟缓的辎重大队进行袭扰。伍回忆说：“敌人在紧逼、包抄、堵截和骚扰。”

蒋军有三四个师在与红军赛跑，争夺“走廊”北端湘江岸边的全州市。全州位于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是一座四周有城墙的古城。当红军侦察兵接近城墙时，发现国民党（何

键的军队)已占领了这座城市。

这就引起了红军指挥部的一场争论：应当攻打全州，还是向南转移另找地点渡江？

红军正向湘江的这块铁三角地区集中，他们还不知道这里已被蒋介石圈定为屠杀他们的地方。此处南起桂林以北。桂林境内遍布圆锥形的石山和云雾，是中国画家所喜爱的名胜之地，是大自然爱好者和诗人的仙境。

这里景色的特点是藓石成林，障眼的巨岩直插云霄，指向天际。湘江流域一向是广西到湖南的主要通道。由石灰岩构成的地质，经风雨侵蚀，已形成一条条深水的江河和奇妙的山峦。

兴安以南的灵川，是红军走廊的南分界线。从桂林到灵川，湘江沿岸石山林立，有如徘徊的鬼魂。接着，再往前走，江岸又变换成坚硬的花岗石山峰。圆锥形的丘陵消失了，不时地又突然进入壮观的花岗石山峦的画面之中，就象一群游荡的幽灵在寻找一块可供休憩的场所。

这里是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此处有一条运河叫灵渠，据说是公元前二百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修建的，为的是把湘江和漓江连在一起，这样就出色地造就了一条从长江流域的上海到珠江流域的广州绵延而下的内陆河道。一九八四年，这里仍然运输繁忙。

在这个新月形的三角地带，正在酝酿着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战。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队伍拖在后面长达五十英里，红军几乎肯定可以越过湘江，通过蒋介石的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尽管红军先头部队未能抢先到达全州，他们还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全州以南跨过了湘江。一军团和三军团的部队到十一月二十六日也都过了江。恰在那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从兴安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佯作保卫桂林，实际上是开放走廊让红军从兴安前往全州。十一月二十七日晚，三军团和一军团的先遣部队没有遇到多少阻力便并肩渡过了湘江。在他们之后，九军团继一军团，八军团继三军团先后过江，中央纵队跟随在他们中间行动。界首和脚山铺是两大渡口。江水很浅，大部分人索性趟水过了江。

本来红军在两三天内就可以全部过江，而且不会有多大损失。但是，行动迟缓的庞大的辎重队伍和那些未经训练的蹩脚新兵改变了这个形势。

当时林彪的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的年轻政委杨成武可以作证，长征在开始的几个阶段，一切都很顺利。杨成武在长征开始时还是个小伙子，他十七岁离开福建省农民老家参加红军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打游击。红军成为他的学校、他的事业和他的生命。

一九八四年，七十岁的杨成武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一些，黑黑的头发夹杂着几丝银发，身着深蓝色的制服衣裤，回忆起往事来确切而了如指掌。他说话流利自如，圆圆的脸有点象已故的毛主席。他一开始就说，“长征开始时我

二十岁，结束时我二十一岁。对我来说，长征经历了整整一年零两天。”

四团打第一场大仗是在湘江。在潇水西岸的道县县城以东约五十英里处有一个叫祠堂圩的小镇。杨成武的团在那里停留时，接到了紧急通知，命令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前进，赶在国民党军之前夺取道县和渡口。道县控制着山口，是通往湘江的咽喉要地，必须在第二天早晨拿下来。

他回忆说：“时间非常紧迫，在我们下达命令的同时，队伍就出发了。”途中他们遇到一批农民。农民说在道县潇水上有一座浮桥，那桥是用铁链子把一些渔船串在一起而建成的。如果浮桥被拉到对岸，四团可以派人凫水过江把它拖回来。

队伍距道县五英里时，天空出现三架国民党飞机。战士们迅速隐蔽起来，没有被飞机发现。黄昏时刻，他们到达道县城郊。一道高高的城墙和很深的护水壕护卫着这座城镇。午夜，一排士兵凫水过江，夺取了船只。拂晓，先头部队进城占领了天主教堂。

杨成武政委走在挤满人群的大街上，听到两位老人在谈话。留胡子的老人问没有胡子的同伴：“他们的子弹都不多，怎么总是打胜仗？”另一个人神秘地答道：“他们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刀枪不入，他们哪里还靠子弹打仗？”

杨成武继续往前走，到了镇上的一座城隍庙。红军宣传队员们正在为召开群众大会作准备。会上将有讲演，还要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和衣物分发给穷人。他说，老百姓帮助了红军，没有他们，这座城镇是拿不下来的。

第二天拂晓前，杨成武和他的突击团飞速向湘江挺进。他们毫不费力地过了江。

但是，现在开始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杨成武等许多人都说渡江容易，伤亡不大。

但是，对于那些慢吞吞的人来说，等待着他们的却是一场浴血混战。八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目睹的这场战斗是这样的：八军团经过道县前往湘江，他们比行动迅速的突击队晚了二十四小时。莫文骅看到形势急剧变化。敌人正在步步逼近，国民党飞机在轰炸，而且撒下了大量传单，宣称：“共匪们！听着！司令部命令我们等候你们。我们正等着呢！赶快！我们已经为你们撒下了一个小小的天罗地网。请你们赶快！请你们赶快！”

莫文骅一听就知道，这意味着又一场苦战。八军团奉命从道县强行军赶到湘江。他们不能停留，只能强行通过。离湘江约七十英里，一支国民党纵队在他们北面只有八英里，正与他们争时间赛速度。国民党猛烈的炮火象浇下的“一场弹雨”，但八军团仍在继续挺进。

夜幕刚一降临，八军团就进入山区，在闻名的桂林山水中的一块绿洲——水街镇停了下来。黎明前部队又开拔。莫文骅说：“很遗憾，我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去欣赏这些名胜风光了。”

八军团跟在三军团后面步履维艰地前进，在他们之后是处境日益困难的第三十四师。先头部队正在突破国民党的最后一群碉堡。这些碉堡都是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用钢筋水泥

构筑的，机枪火力也打不透。而红军的碉堡则是用木头构筑，用泥土加固，几乎什么也抵挡不了，连一场大雨也挡不住。但他们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的周围有壕沟和一排排错落的尖头竹签，这些竹签非常锋利，可以刺透穿着破鞋的士兵的脚掌。（北越对付美国士兵也用过同样的武器。）

为了干掉一个碉堡，红军战士不得不悄悄地爬上墙，从炮眼中把手榴弹投进去。红军的任务就是摧毁这些工事，然后渡过湘江。江水本身并不是很大的障碍。江上有几处地方可以涉水过去，江面大约三百英尺宽，而水深却不超过腰部。江水冰冷，流速湍急。但果敢的战士们还是可以趟水过去的。

当八军团向前挺进时，可以听到背后三十四师与敌人交火的枪声。三十四师正在守卫水街。前面也传来了主力部队渡江时战斗的枪声。几小时之后，八军团又听到水街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三十四师的战斗声音了。这个师在这场战斗中被消灭，只剩下师长及几个散兵。

经过激战摆脱敌人以后，八军团有一段时间是在没有任何干扰、周围突然静得有些可怕的山野里推进的，但是走不多久，这暂时的寂静被嗒嗒的机枪声打破了。和莫文骅一起走在队伍前头的一位指挥员应声倒地身亡，他是被第一排子弹射中的。而刚刚过去的九军团并没有遇到敌人的袭击。显然，广西军在一个小时内赶到了。他们埋伏在路旁的小山密林中，向红军突然开火。当时是下午三点钟。一群国民党的飞机出现在八军团的上空，距地面不到一千英尺，用机枪向下扫射，但战士们没有止步，队伍继续前进。敌机飞得很低，

战士们可以看到飞机底下卸空的炸弹架。直到黄昏时刻，敌人才中止了进攻。精疲力尽的红军指战员们跌跌撞撞，边行军边打瞌睡。天将破晓时，江岸上出现了依稀的亮光，看上去那是在堤坝上露宿的红军后卫部队。但莫文骅没有看到哨兵或岗哨，也没听到喝问口令的声音。这是红军用的计谋，是由几名侦察兵组成的有名无实的小分队，燃起篝火是为了诱使敌人相信，那里有一支大部队正保卫着渡口。这时莫文骅听到马嘶声，原来是他自己的战马。他的勤务兵已提前到达在那儿等待他的到来。

太阳升起了。莫文骅环顾四周，到处都是书籍和文件——军事手册、地图，兵法书，关于土地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马列主义读物，各种小册子以及英、法、德文书籍。红军的挑夫一路摇摇晃晃挑来的图书馆全部在这里了。书页被撕得稀碎，书面沾满了污泥。莫文骅回忆说：“我们全部的思想武器，所有的军事文献，都被扔到了一边。”

如果莫文骅留神观察，他也许还会发现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在湘江岸边为减轻装备而扔掉的剧本。总之，一切都扔掉了。从那以后，红军演出的话剧都是新编的。李伯钊是位矮小的妇女，过湘江有困难，因为个子不高，江水可能会漫过她的头顶，无法趟水过江。刘伯承看到了，急忙让她揪住他的骡子尾巴过了江。

由于敌情严重，指战员们不吃饭，不睡觉，又继续连夜赶路。上午八点，飞机又出现了。国民党已把他们的指挥基地往前移到衡阳，离这里只有一百英里，使共产党处于不断挨打的态势。队伍冒着敌机的扫射继续前进。除了前进，没

有别的选择。如果部队停下来，就无法及时过江，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虏，不是现在被杀死，就是以后被杀死，所以他们只有一往直前。莫文骅评论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在飞机的扫射之下行军，但是我们已顾不得自己，不能考虑生命安全了。我们看到战友们在敌人的射击中倒下，真使人难过。但是，我们相信，飞机能打死打伤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使我们的前进更为困难；会夺去一些人的生命；但它们不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部队依然前进。然而，当他们到达湘江时，已无法过江了。他们处境险恶，不得不与敌人展开一场新的生死存亡的战斗。^⑩

在以后的年代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起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一日这两天，认为那是长征途中最危险的时刻。

一军团和三军团的精锐部队顺利地渡过了湘江。可是后续部队再渡江已经没有时间了。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伤病员、妇女、还有辎重队伍都还没有过江。^⑪

白崇禧的及时撤退本来已给红军提供了涉水过江的条件。但是，现在一切都在变。不仅何键派了四个师来攻打红军的北翼；而且最令人吃惊的是，白崇禧竟也卷进了这场厮杀，为的是向蒋介石证明，他还是忠于职守的。

这时红军处于典型的军事危机之中——队伍被分割在湘江两岸。何键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起进攻，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三天的激烈战斗。

杨成武的四团和五团接到命令向北进军，保卫中央纵队，使其免受刘建绪指挥的湘军的攻击。国民党嫡系部队沿着湘黔公路向南进攻。杨成武在公路的两侧各部署了一个营。在战斗最激烈时，他右膝受伤。几位战士为了救他也受了伤。最后，他终于爬过了公路，他的警卫员小白把他背到隐蔽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担架，又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小白威胁要开枪打死抬担架的人，才把杨成武转移到安全地带。十天之后，他又回到部队。

在红军中，聂荣臻是最有才能、最可靠和责任心最强的指挥员。一九三四年，三十五岁的聂荣臻已经算是一个“老人”了。这位红军高级将领出身于重庆附近一个富庶的农民家庭，一九二〇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小组。他在比利时（应为法国——译者注）施奈德尔军工厂做工，同毛泽东的好友李富春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聂荣臻曾在莫斯科的红军学校学习过，后来在广东黄埔军校做过政治工作。他是一个遇事不慌的人。他随一军团来到湘江，在先头部队到达西岸之后，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也过了湘江。他接到的命令是让他保卫渡口，阻击国民党部队，直到两个中央纵队和红军大部队全部过江。^①

十一月三十日，战斗整天都在激烈地进行。一军团全部投入了战斗，并且逐渐被压到了第二道防线。

那天夜间，聂荣臻无法入睡。他心潮澎湃，想到红军主力面临的危险。他和林彪以及其他指挥员花了几个小时来分析形势。十一月三十日午夜前，他们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

朱（德）主席：

“……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一、二师明天继续抗敌。”

十二月一日凌晨三时半收到了复电。电报是以最高军事机关的名义发来的。明确指示：一军团必须坚守阵地。

“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十二月一日战斗更加激烈，一军团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大约正午时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

在一军团的历史上，从未遇到过如此巨大的威胁。军团指挥部多年来第一次受到敌人的攻击。指挥部设在一个山坡上。突然，警卫员邱文熙冲进来报告说：敌人上来了。

聂荣臻不相信，认为一定是警卫员搞错了。他连忙出去看了一下。警卫员没有错。一支国民党部队端着刺刀正向山坡上爬来。聂荣臻命令收起电台赶紧离开。他一面组织指挥部一部分工作人员抗击国民党小分队的进攻，一面命令刘辉山（后来成为中央警卫团团长）将敌军进攻的事告诉山下的刘亚楼（后来为空军司令员）。当刘辉山往山下跑的时候，他的草鞋叭哒、叭哒地拍打着快掉下来了，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鞋底，但没有伤着他的脚。五十年后聂荣臻还记得这件事，

他说：“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奇特的场面。”

一军团不仅要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而且还要掩护新成立的几个军团，特别是八军团和九军团。聂荣臻说：“我们既要完成我们自己的任务，又要掩护他们。”^②

这是长征突围中很多部队面临的共同问题。当八军团指挥部在湘江东岸被阻时，它不得不担负起原来分配给第三十四师的后卫任务。军团宣传部长莫文骅回忆说，三十四师“走了另外一条路”。事实上，他们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几乎全军覆灭。八军团先头部队不得不在湘江岸边接应所有其他部队过江。然后，才跳进齐腰深的冰水里过了江。八军团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③

十二月一日下午，八军团的一位指挥员向聂荣臻请求紧急援救八军团一部分被敌人阻隔在江东的部队。聂荣臻不得不告诉他，此刻已毫无办法。因为夜幕已降临。

十二月二日，聂荣臻获悉，被阻滞在江东的有彭绍辉和肖华政委率领的少共国际师。一军团指挥部派了一支救援部队把他们接过来。

聂荣臻的结论是：“我们行动太慢，敌人来得太快。”少共国际师、三十四师、三军团的十八团，还有八军团的几支重要部队都被打垮了。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如长征开始时，第一师第三团有二千八百人。过了湘江后，只有一千四百人了。^④

湘江这一仗，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三日，打了一

个星期。根据多数人的记述，这是一场灾难。刘伯承写道：“虽然（红军）最终渡过了湘江，但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秦将军说：“部队在每道防线损失的准确数字尚不清楚。突破湘江防线时的损失最为严重。红军到达遵义时（大约一个月后）所余兵力只有三万来人。”

肖华将军是当年在湘江覆灭的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一九八四年时六十八岁，是一个矮胖而活跃的人。他的头剃得光光的，有点像蒋介石，这一点不大讨人喜欢。虽然他穿着一套讲究的制服，但却带着歉意说，“我没有穿军装”，因为他最感到舒适的服装就是军装。

少共国际师奉命同彭德怀的三军团一起担任后卫，它的一万名年轻的士兵损失大半。最后，幸存者被编进担任前卫的四团。^⑬

据零散而且往往互相矛盾的记述表明，许多装备包括X光机和用来给陈毅的伤处拍照的感光胶片，都被扔进了湘江，剩下的较重的枪炮也多半扔掉了。比较沉重的电台设备和发电机可能也在过湘江时扔掉了。辎重队伍大大减轻了负荷，挑夫的数量减少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增强了。

彭德怀在回忆录中作了对比，他的三军团与广西军队交火时“战斗艰苦”，“困难重重”；“右翼”的一军团与湘军作战时则“情况比较顺利”。^⑭各种记述有许多矛盾。中国专家们认为，一军团和三军团分别位于左翼和右翼。事实上，在渡口，红军部队都紧紧地挤在一起，原有的正规行军序列都搞乱了。

湘江一战究竟损失了多少部队，又有多少人脱离了红军，

中国现代的党史专家们众说纷纭，谁也提不出准确的数字。在长征的头十个星期中，如果说红军损失了四五万人（这是种种估计数字的平均值），那么战斗伤亡至少有一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数是在湘江伤亡的），这样的估计似乎比较恰当。

红军的新兵部队损失最为严重。据伍修权估计，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几个月中，新征了五万兵员。

李德估计，红军过贵州省边界时，已损失了一半新兵和百分之七十五的“后备兵”——所谓“后备兵”，他指的是那些挑夫。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挑东西的任务了，曾经打算把他们也编入红军。李德说，八军团的二十一和二十三师，九军团的二十二师都被消灭了。据他说，由老兵组成的师损失不大。^⑪

湘江战斗之后，李德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削弱了。周恩来更多地接管了工作。然而李德没有轻易放弃他的特权。三十四师师长周子昆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叫到面前辱骂了一顿。他说，周子昆的部下都没有了，而他自己怎么会逃出来？为什么不执行他的命令？为什么全师都消灭了，而他的妻子却仍和他在一起？

李德气愤地说，周子昆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并枪毙。他命令警卫人员把周子昆捆起来送往军事法庭。可是警卫人员拒绝执行。博古当时在房间里，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毛泽东也在场。当李德大发雷霆时，毛泽东走向前去，把周子昆从房间带了出去，他说：“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吧！”^⑫

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很少谈到湘江战斗。他暗示，尽管红军受到损失，但它的战斗素质提高了，部队还是增强了。他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周恩来。他说，周恩来起草了撤离计划，计划要求从中央苏区撤走大量的重型装备，这些装备使红军负担过重，因而迟缓了前进的速度。他不承认，既然他能支配博古，他就对长征的一切组织和作战计划都拥有否决权。^⑬

久经战斗的红军指挥员经过湘江一战的惨败之后，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愤慨将化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

不久后就有人说，三十四师被消灭时发出的最后几阵震撼的枪声和红军辎重大队沿途百里丢盔弃甲的惨状，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统治的结束。

第 十 章

改 变 行 动 路 线

红军过江进入贵州省后，侦察员孔宪权遇到了麻烦。每天他都得远远地走在部队前面，侦察地形，了解敌军部署，估量路途中高山和江河的艰难程度。他有时穿军装，但更多的是穿便服，竭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孔宪权是在湖南出生和长大的，在与湖南毗邻的贵州省，他只要一开口，人们就会发觉他是“外乡人”。还有，在湖南，他可以和大家一样用扁担挑东西；而现在，来到贵州境内，他必须象贵州人一样地用背篓背东西。如果他“露了馅”，就会被抓去枪毙。

越过湘江是够艰难的了。但红军过江为什么很不顺利，侦察员孔宪权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因之一是用浮桥。马和骡子对浮桥很不习惯，以致惊恐万状，途为之塞，队伍出现了混乱。当红军一半人马过了江，一半还在对岸等待渡江时，国民党的飞机进行了狂轰滥炸。这样，红军的损失当然很大了。

孔宪权告诉我，爬老山界也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这座当地人所说的老山可能有五千英尺高，上山时坡陡路长，下山时坡也陡，但路程短。山路狭窄，战士们只能排成单行前进。据说，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他们这时才明白“里”是个“活数”。中国老百姓说“里”，是随着路途艰难的

程度而变化的。上山的“里”只有下山“里”的一半。不管这个“里”是如何算法，“老山界”是很难爬的。根据陆定一的回忆，队伍上山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天就黑了。肚子饿了，没有干粮，也无法做饭。黑暗中，队伍不知为什么停止不前了。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战士们站在那里睡着了。最后才知道，有人传话说，前面有一段危险的峭壁，有些人和牲口掉了下去，大家要等到天亮才能走。陆定一走在红星纵队的后面，红星纵队里有许多重要的老干部。大家时醒时睡地过了一夜，队伍才又出发了。昨天没有吃晚饭，今天也吃不上早饭。

湘江一战之后，伤员大大增多，许多人都被抬在担架上。但是，当队伍来到前面那一段名叫雷公岩的峭壁时，不论多重的伤员都要从担架上下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爬上陡峭的雷公岩。雷公岩与地面几乎是九十度直角，上面只有宽一英尺的狭窄石阶作为通道。峭壁实在太陡，红军伤员无法坐担架上去。许多马都摔断了腿，躺在悬崖之下呻吟。伤员们在别人的帮助下，缓慢而又痛苦地爬上石岩，一次只能上一个人，有些是被推上去的，有些是用绳子拉上去的。牵马往上走就更困难了。有的人用尽了所有的气力也未爬上去。有些马连同马夫一道跌了下去。陆定一认为，红星纵队的妇女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她们照顾伤员，扶伤员爬峭壁，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肩膀，许多伤员就完了。

曾宪辉是江西省的一个贫苦农民，他从未见过如此贫瘠的山地。红军开始向贵州挺进时，就进入非汉人居住的地区。红军来到苗族居住的地方。苗族是少数民族，原居住在汉人

居住的地方，后被赶到这些偏僻多山的丘陵地带，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妇女们无法走出家门，因为她们没有衣服穿。她们一丝不挂地待在屋里，蜷缩在烧草的灶旁，炊烟从屋顶的隙缝中冒出去。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赤身裸体在田间劳动。许多人家三四个成年男子才有一条裤子。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对他们来说，军队就意味着奸、淫、烧、杀，意味着掳掠、抢劫大米和小米。

这个地方盛产鸦片。正如曾宪辉所说，十五岁以上的人几乎个个都抽大烟。男人、妇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目光呆滞，吸着鸦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还缠着一块布，妇女身上连块遮羞布也没有。棕褐色的鸦片象晒干的牛粪一样堆在棚子里。这里看不到温顺的水牛在稻田里精耕细作，而是由农民自己拉木犁，或者用瘦骨嶙峋的黄牛拉犁。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年轻姑娘赶着几条没精打采的狗时断时续地在粘乎乎的泥地里耕作。贫苦农民住的房屋，墙是用木条涂上泥巴做成的，屋顶铺着茅草。有钱人家比较好的房屋用乌木建造，灰瓦铺顶，屋檐象飞鸟展翅一般。这里的草堆都堆成圆锥形，好像小丑的尖顶帽子。在这里看不到江西的樟树，只有梧桐树。

鸦片这东西最坏不过了。那时贵州的鸦片已到饱和状态。它使这些赤贫如洗的穷人变得迟钝，浑浑噩噩，丧失劳力。鸦片也侵蚀了当地的军队。贵州军阀部队被称为“双枪兵”，每人一支步枪，一支烟枪。

在讨论红军应当到什么地方去、下一步应往哪里走时，鸦片却起了令人信服的特殊作用。因为大多数地方军的素质差，

吸鸦片使他们的战斗力降到了最低点。这对红军是有利的因素。

人们说贵州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这大体符合实际。这些农民从法律上说不是奴隶，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连奴隶都不如。他们没有土地，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们就卖孩子。将女婴闷死或溺死是司空见惯的事。男孩子卖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们的价格是浮动的。一九八三年，一位在贵州出生的华侨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七岁时被人贩子用五块银元买去，这个价钱已经很不错了。人贩子把他带到香港，又转卖了四次。最后，他终于逃走，去了美国。去年他回到贵阳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

一九三四年，贵州的婴儿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五十。由于婴儿死亡率太高，孩子刚出生是不庆贺的，至少要到满月才庆贺。贵州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岁。由于这个地方太穷，所以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别不大，至少在苗、侗这样的少数民族之间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文盲。

朱德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他对农村的印象。关于贵州，他写道：

“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老百姓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榨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穷苦大众吃黑盐巴。……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玉米秆和竹片编成小门。……老百姓从地主旧谷仓地里挖掘陈米。和尚称之为‘神米’——老天爷给穷人的米。”

贵州农村的贫困状况给农民出身的曾宪辉出了难题。作为干部，他的任务之一是监督没收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然而在贵州东部，他找不到多少地主和富农。对于少数民族，红军又有严格的规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要十分慎重，因为他们曾经受到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一九八四年，曾宪辉还记得当年的情景，那些衣衫褴褛、几乎一丝不挂的人们蜷缩在路旁。红军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衣服分给他们。至于鸦片，曾宪辉记得，当时打开存放鸦片烟土的仓库，让大家全拿走。他说红军不需要鸦片。曾宪辉的回忆也许不完全准确。鸦片在这个落后地区是值钱的东西。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曾宪辉记得很清楚，红军没有销毁鸦片。他说：“我们打开地主的库房让农民把鸦片拿走，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用劳动和汗水生产出来的，是属于他们的。”

从于都河开始长征之时起，红军指挥部里就出现了缓慢而微妙的变化。损失惨重的湘江战斗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这时毛泽东越来越活跃起来了，他经常同王稼祥和洛甫商量问题；有些将领也悄悄地同毛泽东谈问题。越来越多的下级指挥员谈话时表现出关切甚至惊恐。很明显，由于伤亡实在惨重，部队减员太大，因此重新整编，势在必行。

周恩来是一个严守纪律、性情温和、有教养的共产党人。据人们所知，党的规定凡已形成决议的，他总是坚决执行，从未抵制过。然而，这时他似乎也对李德失去了耐心，这是人

们所知道的他对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开始感觉到了这一变化。

红军过了湘江进入山区之后，军事压力减轻了。两广的地方军队确信共产党军队不会进入他们的地盘，便掉头回去了。湘军似乎只是在红军的后卫虚张声势地骚扰一番而已。只有薛岳率领的国民党嫡系军队继续与红军齐头并进，但他们也避免与红军交战。

一天夜里，在五岭苗族县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约午夜时分，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被一阵“救火！”的呼叫声惊醒了。他听见火焰发出哗哗剥剥的声响，急忙从床上跳下来，发现周恩来的住房着火了。他帮助周恩来离开熊熊燃烧的房屋。这时，街上已挤满了人。其他领导人也来了，其中有国家安全局局长邓发。看来很可能是有人纵火。有三人被抓起来并就地枪决。但在红军宿营的苗族城镇和村庄，每夜都发生神秘的火灾。这场大火究竟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放的，始终没有弄清楚。双方都利用火灾作文章，各方都指责是对方干的。

代替敌人枪炮威胁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碍：险峻的山峦，危险的河流。还有部队的极度疲劳，食物的匮乏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红军电台截获的情报表明，如果红军部队挥戈北上去同贺龙和肖克的部队会合，就要一路同二十万或者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其中十万人已在湖南等候。虽然没有全面清查过人数，红军知道自己的部队已经减少到三万人左右，这是很危险的。包括非战斗人员，总数也超不过三万五千人。

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时间进行有组织的讨论。但是当部队到了位于贵州边界上的通道县城时，召开了一次仓促的非正式会议，主要的军政首脑人物都出席了。

人们通常说通道会议是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根据周恩来夫人的回忆，^⑩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李德说，这次会议是领导军队的党的机构——军事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两年多以前，毛泽东曾被军委撤职，而现在，他又被请回来参加会议，并且立即起了主导作用。

讨论的问题是，红军是否应该继续按既定的路线向北前进与贺龙会合。关于通道会议，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至今尚未发现文字记载。红军长征的文字记载在行军途中很多都已失落，为减轻负担，他们不得不把宝贵的文件和器材烧毁或投入江河之中。正因为如此，尽管事情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参加者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珍贵。

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学者的儿子。长征结束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他写一部长征的历史。一九三六年徐梦秋告诉海伦·斯诺，他已收集了七百份文件，其他几乎全部丢失了。一九三八年他在上海发表了第一集有关长征的个人记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不得不截肢。他于一九三八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共产党疏远。一九四五年后，他投入国民党的怀抱。一九四九年，他在南京被解放军俘获后，在狱中死去。^⑪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政治形势多变以及对中共政治和军

事人物的态度不断变化，至今还难以弄清长征中许多具体事实的细节。

尽管关于通道会议连一片纸也没留下（人们只是在最近几年才慢慢知道举行过这么一次会议），它作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参加了那次会议，这是他自一九三二年以来第一次在军事委员会上发言。他建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打算，改变路线，不向湘西北挺进，而挥师向西，而后向北，进入贵州。他认为到贵州情况要好得多，因为黔军力量较弱，类似在广西走廊遭受两面夹击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在贵州有可能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便整顿被打散的部队，研究今后的行动计划。而如果继续按原定路线前进，就会遇上蒋介石部署来截击的强大部队。

会上几乎没有什么争论。朱德和其他军事指挥官立即接受了毛的建议。其余的周恩来、王稼祥、李德也同意了。在李德表明同意之后，博古也表示赞成。长期以来红军领导人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这还是第一次，更不用说的对毛泽东的建议了。不过，毛泽东向他们指出，采取别的办法几乎肯定会导致全军覆灭。

红军在通道会议作出的改变行动路线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决定。说明了毛泽东等人“担架上的阴谋”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中国人开始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形成反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的阵线。李德说，在非正式的讨论中，中国人说话太快，他听起来有困难。第二天，他要周恩来跟他详细说说，周恩来显得不耐烦，说红军累了，需要休息，大概要到贵州才能休息。他从前同李德说话可从来没

有这么生硬过。^⑫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红军又踏上了征途，向黎平挺进。

黎平位于贵州东南部，刚过湖南省边境，是一座比较繁华的县城，当时全县人口约二十万（一九八四年为三十七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红军几乎没打一仗就占领了黎平，一军团二师六团和三团首先发起进攻。主力部队和中央军委是十二月十五和十六日到达黎平的。毛泽东、王稼祥和洛甫先前曾一致同意，一有“合适的机会”就召开会议讨论军事计划和方针。在匆匆召开的通道会议上，大家默认了这一决定。现在，军事压力暂时没有了，最艰险的高山激流也已经越过（指的是中国贵州这一地区最艰险的路程，实际上更艰难的历程还在前头）。在黎平给养又比较充足，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这是难得的好机会。

十二月十八日晚，进黎平没几天就举行了政治局会议。^⑬

会议在红军总部举行。总部设在黎平市中心一个徐姓商人的相当漂亮的店房里，隔壁是德国路德教教堂。^⑭徐老板听说红军要进城，早就逃离了黎平。那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王稼祥、洛甫、毛泽东、朱德和林彪都参加了。李德和其他领导人大概也参加了。会议开得很紧张，发言人都提高了嗓门。周恩来几次发言，公开批评李德。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他正式建议放弃北进与贺龙会合的计划，而提出红军西进贵州，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并在该地区建立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他强调指出，现在红军不再受到湘军的袭击了，黔军又有烟瘾成疾的致命弱点。

因此他建议在遵义召开一次正式会议。据说,李德又提出,如果能把国民党部队引开,还是可以北进的。李德借口有病,未参加黎平会议。他在会前向周恩来概述了自己的意见,他建议红军避开贵阳,因为有情报说,“国民党六七个半机械化师”正向贵阳集结。他极力主张红军渡过乌江,把遵义作为同蒋军作战的临时基地。李德的计划(据三十年后的回忆)同毛泽东的计划分歧不大。博古作了一番争辩之后,会议接着便通过了毛泽东的方案。红军决定向乌江挺进,渡过乌江,向遵义前进,并建立新的根据地。^⑬

在黎平至少对两支部队进行了改编:红八军团的残部并入后卫五军团;取消“特别军团”,即大部分附属于中央纵队的后备队和后勤队伍,其士兵被派去补充减员严重的部队,包括三军团。^⑭

十二月十九日,向二军团、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了电报,向他们通报了两项决议(改变行军路线,向贵州挺进以及准备另开一次会议)。各军团奉命作相应的配合。二军团和六军团向湘南挺进,意在牵制湘军对主力红军的压力。红四方面军则要向四川出击,吸引川军向北,使其放弃在黔西北作战的计划。此外还给在瑞金附近基地作战的陈毅发去了通报。这个基地很快就要消失了。^⑮

十二月十九日晨六时,红军按照新的指示开始行动。到二十日,所有部队均已离开黎平地区向乌江前进。他们的行动相当顺利,没有遇到多少抵抗。乌江成为他们向遵义前进的主要障碍。

黎平会议结束了,会议作出的简明扼要的决议得到了贯

彻。没有迹象表明李德意识到他指挥中国革命军队的日子从此宣告结束，除非他有了什么疾病，可以得到某种心灵上的暗示，他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毛泽东也未必意识到他当时已赢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后来便一直掌权，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肯定也没有别人想到这一点。事实上，除了少数几个共产党领导核心人员外，多年来无人知道曾经举行过黎平会议。

第十一章

进 遵 义

黎平距遵义约二百英里，途中无高山大河，直至遵义东南约四十英里处才进入乌江流域。一路西行，乡村景象越来越富裕。茅草房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是半用木料造成的房屋，颇象古英格兰式的造型。庄稼也长得不错。这里看到的不是圆锥形的草堆，而是以树干为轴心码起的草垛，绕在树的周围，活象跳舞穿的大裙子。这里是汉人居住区，少数民族多住在山的那边。

红军快到乌江时，正值一九三四年的十二月，寒风刺骨。乌江是贵州境内一条最大的河流，奔流在两岸深灰色的坚硬山岩之间，江底也都是大块的板状岩石。水深且急，而沿江几乎没有渡口，桥梁就更少了，根本没有可供涉水过江的浅滩。红军沿江飞速前进，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沿途的县城里倒有小股民团驻防，但这些地方民团经常不发一枪一弹就逃之夭夭了。

阳历除夕，红军部队抵达距乌江约三十英里的集镇——猴场，意思就是猴子镇。附近的森林里常有猴子出没，据说古时候这里猴子更多。除夕，政治局的人员开会，毛泽东参加了。会议迟迟不散，致使他的警卫员（除了照顾贺子珍的两个警卫员，毛现在有四个警卫员）开始发愁他们准备好的

年夜饭可能要耽误了。政治局内又发生了争执，这次可能是李德提出的一个新意见引起的。据情报部门报告，三支敌军正在迫近。李德认为，红军应停止前进，打一仗再走。毛泽东反驳了李德的意见，坚持部队应继续全速向遵义进发。那天给部队的命令是：“先抵黔北，夺取遵（义）、桐（梓），发动群众。”

警卫员陈昌奉认为，分配给毛当时住的是长征路上他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比在中央苏区时的房子还好，（我可以作证，那些房子的确非常高级，很多都是家族的祠堂。）新的住房象征着毛泽东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是一所很大的院落，四周都有厢房。院门两侧各堆起一个威风凛凛的雪人。院子里的砖石非常干净，可以在那里吃饭。供毛泽东使用的是三间朝南的屋子。正屋中央挂着一盏煤油灯。屋子一侧靠墙放着一张古老的中式桌子，墙上挂着一幅画，画上是笑嘻嘻的弥勒佛，把双手搭在袒露的大肚子上。警卫员们领到了可以美餐一顿的食物，期待着将军们和领导人来同主席一起进餐。

政治局会议终于结束了。外面阴沉的天空，纷纷扬扬地落下了雪花。警卫员们在送毛回住处的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对他讲着他们怎样准备吃年夜饭的打算。听着听着，毛提高嗓门对他们说，今晚不能大吃大喝了，必须抢在敌人三个师之前赶到乌江。大家匆匆赶回住处，他对大失所望的警卫员们说，他在开会时已经吃过饭了。当他走进那雅致的房间，看了一眼准备好的饭菜，说：“真象个过新年的样子哩。”说毕就伏案工作了。一个警卫员忍不住说：“可是我们还特意准备了您最爱吃的酒酿呢！”毛泽东听罢，本来严肃的态度变得温

和了一些。他和警卫员们一起坐下来，吃了一点东西，然后又去工作了。清晨四点，消息传来，先头部队的一支分队已到达乌江。于是，毛泽东和司令部人员一起收拾行装，直奔乌江而去。大家都希望成功地渡过乌江——这将是新的一年的吉祥之兆。

和往常一样，这次又是林彪的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领受了强渡乌江的任务。二师政委刘亚楼直接从林彪和政委聂荣臻那里接受命令。遵义是地方军阀柏辉章的司令部所在地。柏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走卒，统管着这片被称为贵州的“西北王国”的地方。贵州的这块宝地靠的是生产、贩卖和走私鸦片（鸦片走私多在四川），酿酒（以茅台为中心），以及贩卖奴隶——这是贵州原始封地王冠上的一颗“珍珠”。

元旦凌晨，作为先头部队的四团在团长耿飚和现已康复的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到达乌江。指挥员们观察了地形，河面约二百五十码宽，流速每秒五、六英尺。通向河边的小路约有两英里长，陡峭难行。河对面的小路也大致如此。两岸是悬崖峭壁，一条渡船在水上飘来荡去。四团试图夺取渡口，但开始没能成功。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激烈战斗之后，才攻占了渡口。毛连长带领一支队伍渡江到达江北岸，但又被敌人困在悬崖之下。他们等了三十六个小时开始突围，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形势非常险恶，直到第一营派出的两个班偷渡乌江，爬上峭壁，从侧翼压向守卫的敌人时，才解了围。

战斗进行的同时，一个工兵营用竹子搭了一座浮桥，由大约一百节竹子连在一起，好象小孩的结构玩具一样。这里水流湍急，架桥工作很难进行。敌人炮火打伤了几个工兵，但

没能把浮桥破坏。有一次，由于一节竹子被冲走，险些把三百英尺的浮桥整个冲垮。一个叫石长阶的红军战士为保护浮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月三日或四日早上，红军大部队开始跨过浮桥。最困难的问题已解决，其余的事都好办了。刘亚楼命令二师六团立即夺取遵义。六团在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到离遵义约十英里处，他们与当地一营敌军遭遇，将敌军全部俘虏。他们想方设法说服这些俘虏帮他们的忙。他们诱压兼施，还给了每个俘虏三块大洋。午夜过后，他们到了遵义城门外。化了装的红军和他们的新盟友大叫开门，还吹起了军号，故意喧闹。他们声称是自己人，是外卫营逃回的残部，红军正在后面追击，赶快打开城门放他们进去。半小时后，他们终于进了城。一月七日拂晓，遵义被攻克。第二天，全城被占领。一月九日，红军总司令部、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都先后到达。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雨一直在下，战士们满身污泥。他们在城外停下，洗脸洗手，然后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了城。歌词是朱、毛为部队制订的行动准则。

三大纪律：

- 一切行动听指挥；
-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 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

- 说话和气；
- 买卖公平；

借东西要还；
损坏东西要赔；
不打人骂人；
不损坏庄稼；
不调戏妇女；
不虐待俘虏。

宣传队员举着红旗，张贴标语。人们都站在街道两边。这时，四团和六团已经出发去攻打桐梓了。

三十年代初，也就是红军到达遵义前一年左右，柏辉章在城中心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的住宅。柏是贵州的一个自由商贾和银行家。在约五万（一九八四年是三十万）人口的遵义市周围的凡是有利可图（而且经常是非法的）的企业中，都有他的股份。柏辉章和他的几个兄弟一起振兴着家业。柏的豪华的新居象征着他的社会地位。他被贵州省长官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任命为其所辖的第二师师长。

柏的住宅是二十年代中国军阀的典型住所，这是一所二层柱廊式的灰砖建筑，屋檐略微突出，二层上有带顶篷的阳台，可算得上现代军阀的摩登式样，是中国传统建筑和少许西方风格的结合体。房子周围当然有围墙，漂亮的大门正对着遵义一条主要街道。外院是青砖地，房子旁边有一棵大槐树，一九八四年仍挺立在那里。

在这所古色古香的房子里，到处都是沉重的中国古式红木家具，中国式的屏风、轴幅和小巧的暗房。奇怪的是，这里居然没有内院。

柏的住宅自然是遵义最好的房子，很快就被用来做了红军的司令部。中央军委和第一方面军都在这里设了办公室。周恩来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住在二楼一间靠阳台的舒适房间里。邓颖超记得她曾站在二楼阳台上摘槐树叶子。她这时还患着肺结核，咳血。不过，在遵义她难得地有机会和她的丈夫团聚在一起。朱德和妻子康克清也住在柏宅。另外还有刘伯承和其他军事指挥员，如张云逸、彭雪枫等人。彭德怀、刘少奇和李卓然也在这儿住过。

毛泽东没有住在这个大宅里，而是住在另一个军阀的宅子里。那是黔军一位旅长易怀之的房子。这房子也是砖砌的，二层有带顶篷的阳台。这里还住着王稼祥和洛甫，他们和毛泽东一起被人称作“中央队”。

毛的妻子贺子珍和其他养病的妇女一起住在遵义第三中学。那时，三中是一所有名的学校，后来的林业部长雍文涛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

在住房安排中，引人注意的是，这几个地方都没有博古和李德的住处。他们住在城边一所漂亮的老式中国庭院房子里，对面是一座宽大的罗马天主教堂，已被征用为医院和公共集会的场所了。一月十五日，朱德在这里发表演说，纪念被害的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

住房安排很说明问题。博古和李德搬出去了，被孤立在外；毛泽东和“中央队”则搬了进来。

决定于一月十五日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在柏辉章的住宅内，目的是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后果和长征迄今失败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

双方都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在博古一边，主要是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他四处游说，争取支持。他找聂荣臻谈过好几次，一谈就是半天，试图争取聂支持博古和李德，但未能得逞。

占领遵义后，并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花来进行政治讨论，头几天主要用来巩固军事阵地。一军团和三军团负责保卫整个地区，而且花了很大气力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苏区。接着，遵义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桐梓和湄潭县也开始建立革命委员会。由邓小平主编的军报《红星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号召加强革命宣传工作。

然而，黎平决定带来的乐观情绪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消失了。红军情报部门离开黎平时报告说，守卫贵州的只有王家烈的四个师，这些部队都是大烟鬼，因而确实虚弱，不堪一击。可是，就在毛泽东进入遵义的当天，国民党的两个高级将领，周浑元和吴奇伟率精兵也跟着进入了贵州，并迅速接管了首府贵阳。贵州司令王家烈倍受鼓舞，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派遣他的第三师共七个团的兵力，去攻打彭德怀的第六师。

红军的情报部门很快掌握了敌人的这些调动情况。他们得知，蒋介石亲自坐镇重庆，指挥这次行动，并且调动了湖南的四个师、川南的两个旅和云南的三个旅。共拥有一百五十个团大约四十万兵力，这些兵力可能都是用来对付红军的三万人残部的。

在黎平时设想的建立新根据地的美好前景破灭了。不仅

如此，其它令人不愉快的问题也出现了，遵义地区经济落后，盛产鸦片，却没有多少粮食，所以很难维持一支不断扩大的红军。

在地理位置上也有不利因素。这个地区三面环水——三条重要的河流——乌江、赤水，这两条河在西边形成了一条曲折的边界，北边是滔滔长江。如果红军在这里驻扎下来，就会被围歼。从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的想法是不能实现了。

一月十五日晚饭后七点钟，二十个人来到了柏宅里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挂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二十五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摆成了一个半圆形，还有一个小铁火炉（当时天气相当冷），以及几个摆得颇为得当、粉红和白色的搪瓷痰盂和烟灰缸。间或，警卫员进来冲茶倒水。

从某种意义说，这二十个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长征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则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导和方向的彻底改变。后来很多人都说，这是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

屋子正中坐着三个人，在历时三天的会议里，他们始终坐在那里。会议主持人是二十六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和名义上的领袖博古。他长得很瘦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由此得了个绰号叫“黑面木偶”）。他聪明、用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四年使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早年曾在共产党在上海办的一所大学里学习过，所以英文也不错。他受共

产国际中国处的苏联领导控制，是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亲密伙伴和坚定拥护者。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第三个人是周恩来。其他与会者不断地掉换座位，哪儿方便就坐在哪儿。椅子的摆放没有什么既定的次序，而且始终有位子空着。

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翻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越生气。伍十年后也承认，他那次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有两个人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其中一个就是王稼祥，他自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反“围剿”时在乐安县古公村负伤后一直躺在担架上。那次战斗中他带领周恩来、肖华等几个人去防御工事的路上被一颗国民党炸弹击伤了。一块弹片穿过他的臀部进入肠子，伤势很重。外科医生在不施麻药的情况下为他做了八小时的手术也没能缝合伤口，只好塞进一根橡皮管。他一直发着高烧。因为要经常使用吗啡止痛，结果上了瘾，直到一九三六年被送到莫斯科治疗时才断然戒掉了。

大家都知道，王稼祥是要支持毛泽东的。人们普遍传说“王、毛成亲了”。

这些人相互知道底细，甚至连大便的情况都知道。例如，大家都知道，只要时间允许，周恩来就要拿着一叠文件到厕所去，经常在那里读上一个钟头。他们也都知道，毛泽东患有慢性便秘。他经常一个星期才大便一次。后来在延安时，只要人们一听说“主席大便了”，就要欢呼一阵。他曾告诉埃德加·斯诺，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最正常的是他早年

攻打长沙的时候。

直到一九八四年春天，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例如时间和与会者的身份——还是不甚了了。然而，从未有人对遵义会议的结果产生过疑问。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党中央的历史学家们透露，他们在档案里翻出了一份很早以前的备忘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资料。

按现在的说法，参加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他的丢失多年的回忆录提供了很多失传的细节）、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和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安全保卫负责人）、刘少奇（多年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牺牲品），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共十人。

七位红军指挥员：刘伯承、李富春（他接替受伤的王稼祥，担任红军政治部代主任，一直是毛泽东的伙伴）、林彪、聂荣臻（林的政委，毛泽东的坚定的追随者）、彭德怀（第三军团司令，态度强硬，反对李德）、第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以及第五军团政委李卓然。

红军报纸《红星报》的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他们是列席代表。总共有二十人出席会议，中国的前途就取决于他们做出的决定。

博古首先发言。

他谈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把共产党的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中央苏区以外的共产党军队配合不灵。博古没有稿子，是即席发言。他着重讲了形势的客观

一面。据翻译伍修权说，他相当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并批评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同时又力图为自己辩护和开脱。

秘书们不得参加会议。可能除了邓小平以外，与会者都没有做记录。大部分发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这些发言的内容也未全部公布。现在在世的几个与会者凭记忆也很难把内容凑全。

博古显然没有赢得听众的同情。他的同志们说他企图推卸责任。李德列席会议，但态度并不客观，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博古干得不错，他强调蒋介石正在从“帝国主义列强”那里得到贷款、武器和军事顾问。（博古显然没有特别提到冯·塞克特。）李德在回忆时还说，博古认为，共产党的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错误而已。

第二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承认政策不对头，特别是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说，这是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他自我批评的态度很坦率，丝毫不想推卸责任。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认为周强调了主观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为毛泽东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间划清界线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一向总是等到最后才发言，这次一反常态，他首先讲了话。他作了一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比任何其他人讲得都长。他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政策。李德的“短促突击”取代了朱、毛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毛反驳了李德认为失败是由于数

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这一观点。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所以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伍修权回忆说，毛泽东坚持认为军事路线错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发言说，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即战士也是人，也要用双脚走路，也要吃饭、睡觉。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⑩

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未能和十九路军联合这件事。他说，这就使红军失去了一个迂回到国民党防线背后、从后面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而周恩来、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经主张和十九路军联合。^⑪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说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久以来没有说出的心里话。

李德被毛泽东的话深深地刺痛了。三十年后，他对遵义会议只讨论军事问题而没有同时也讨论政治问题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指出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苏联和世界政治。但是，中国人早在会前就已决定只讨论军事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一讨论政治问题，会议很可能会开崩。^⑫

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

全停了下来。李德长得体阔肩圆，平时总是不动声色，除非要发言，否则总象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现在他却怒形于色了。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⑬

王稼祥接着毛泽东发言。他已经对聂荣臻说过：“到时候要把他们轰下去，把李德拉下台！”他拥护毛和毛的立场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为他们一直注视着王稼祥在担架上与别人讨论的情况。他明确地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⑭

李德在回忆录中声称，他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言，因为他对当时的发言情况没有全面的了解，所以他决定在研究了会议记录或至少是总结性决议之后再说。看来并没有会议记录，而决议也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才公开发表。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同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长篇谈话中，也没有人提起过遵义会议。

李德回忆自己没有参与讨论的说法和别人的回忆不一致。翻译伍修权记得李德为自己作了辩护，坚持说，他只是作为一个顾问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这一点完全正确。）他为总的作战路线进行了辩护，但却说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糟了，应受谴责的是中国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等等。他没承认有任何错误。伍修权认为李德问心有愧，但是读过他的回忆录的人却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情过去三十年了，可他的态度似乎还是和他在遵义

时一样坚决。

李德一再说，他只不过是个代表。他确实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⑬根据中国的档案材料，胡华教授说，李德断然拒绝了一切批评。

批评火力持续了三天。会议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开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措词越来越激烈，翻译伍修权也感到越来越紧张了。

白天主要是处理军事事务。这期间正在对部队进行一次重大的改编。解散了中央纵队及其庞大累赘的挑夫队伍。剩下的重型设备或者被破坏，或者被埋藏起来以备后用。必须携带的东西都分散到各个部队去了。中央纵队的年轻人和留下的挑夫都尽可能被编进战斗部队里。第三梯队的政委李林凯病了，所以这些工作大都由小刘英负责。^⑭

征兵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又增加新兵四千人。清点人员后证实，红军现在只有三万人。

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很多指挥员指出长征缺乏思想准备的问题。他们认为，部队的严重损失，特别是因开小差而造成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新兵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往常执行任务不同，这些新兵不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为什么必须作出牺牲。指挥员们认为保密工作做得太过分了，连很多指挥员都不了解情况，这样就影响了战斗意志和官兵们的士气。

洛甫和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发言，认为毛

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路线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①

李富春的发言给伍修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富春是毛泽东在湖南时的老朋友，他和毛的另外一位老朋友、才华横溢的蔡畅结了婚。聂荣臻的发言也使伍修权深受感动，聂荣臻对李德的表现非常生气。伍修权同意聂荣臻对李德的批评，因为他本人也经常领教李德的粗暴态度。有一次，他曾对一个部门的领导说，“李德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绝不给他当翻译。既然分配我给他当翻译，我只好干。”^②

聂荣臻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发言的（过湘江时，他的脚负了伤，尚未痊愈）。他说话时很气愤。每次见到李德，他就恼火，因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挥，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部署都作指示，而这些细节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亲自过问。^③聂荣臻对李德的尖锐批评，伍修权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聂荣臻作为第一军团的政委，对李德的那种只允许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命令，并不是一概照办的。有时，他们用传统的朱毛战术诱敌深入，因而仍然打了一些胜仗。^④

彭德怀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刘伯承也是如此。令人奇怪的是，李德倒觉得，和其他人的发言相比，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还是比较“温和的”。^⑤

看来林彪在遵义会议上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当然，他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未遂政变可能歪曲了人们

的记忆。和我交谈过的大部分军人都曾受害于他。伍修权断言说，林彪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因支持博古和李德而受过批评。聂荣臻同意伍修权的说法。^{②①}可是其他有些人记得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的建议。据说，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②②}

会议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何克全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聂荣臻认为何克全“相当狂妄自大”。何对毛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尽管遵义会议采取了行动纠正错误，何还是一味坚持己见，直到后来，才勉强承认他是错了。^{②③}

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改变路线，打过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认为，那里的条件比贵州好得多，——四川省比较富裕；而（公路）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得靠两条腿走路、且行动迅速的红军占了点优势；那里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另外，四川省人口较多，可以补充兵员。^{②④}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据说没有进行表决，整个会议期间一次正式表决也没有。军事指挥权现在落在朱德和周恩来两个人身上。没有提到毛泽东。但在另一项决议里，毛被选为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

管纸上写的如何，大家都知道谁当家。另外一项决议写进了洛甫为毛的批评发言所作的摘要。最后一项决议指出，常委内部的分工以后再讨论决定。

这时彭德怀已经离遵义去对付国民党将军吴奇伟了，吴正在威胁着他的第六师。^{②③}打点行装，收起帐篷，毛泽东和司令部的人马也于一月十九日离开了遵义。出发前，在罗马天主教堂召开了一次军事指挥员会议，博古（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和毛讲了话。可惜，发言稿未被保存下来。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②④}

第十二章

毛泽东掌权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上午，红军在毛泽东的实际指挥下撤出了遵义，与三个月前渡过于都河时的力量相比，此时只剩下很小一部分部队了。

红军丧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员和所有的重武器。它已无任何大炮，只有一些破旧的迫击炮和两门山炮。出于宣传目的，仍号称四个“军团”——第一、第三、第五和第九军团，而实际只有十六个战斗团和一个干部团。尽管不遗余力地招兵买马，兵力仍不到三万五千人。

红军离其原定目的地越来越远了。它到了更加偏僻的内陆。它夺取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的位置。红军的地图很少，而且这一带的许多地方从未在地图上标出过。

的确，红军已突破了蒋介石在江西苏区周围所设的包围圈，成功地渡过了湘江。然而，它并未也根本没有摆脱蒋介石的军队，蒋介石就在北面的重庆忙着调集更多的军队，如狼似虎地企图围歼“赤匪”。他部署了四十万大军来拦截红军，不管红军走哪条路，他都要封锁。如果说，蒋介石在江西、在湘江几次围剿都未能得手的话，他可不愿意在贵州再次失手了。黔军之涣散不堪、烟瘾缠身，这已为共产党所知。可是，

此时蒋已集结了四川、云南、湖南的军队和他自己的嫡系军队，准备在红军一接近贵州同邻省的边界，特别是当红军往北向滔滔的长江移动时，来一个迎头痛击。对此决不能低估。

红军已有两次被迫改变前进的方向，先是放弃了与湘、鄂、黔地区的贺龙和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接着是放弃了在遵义周围建立根据地的想法。离开遵义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日——在通往桐梓路上的凄凉的泗渡村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将行动方针上的最新改变确定下来。这一回是准备同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但第四方面军究竟在何处，他们并不知道准确地点。一、四方面军之间的通讯联络很差，他们几乎是盲目地寻求会师。毛泽东以为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有个繁荣的基地，拥有十万以上的大军。但他却不知道四方面军不久就要拔营，向“荒无人烟的西部”和川藏交界地区转移。李德认为毛在离开遵义后，会派出通讯员与第四方面军联络，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通讯员到达第四方面军的总部。

情况也并非一片黑暗。例如在武器装备方面，由于人员伤亡严重，红军的步枪和机关枪现在差不多够用了。他们在遵义又弄到了一些毛瑟枪。红军使用的枪支五花八门，但是毛瑟枪算是标准的，因为它们是国民党政府兵工厂统一制造的，而国民党军队正成为共产党军队武器的主要来源。再说人员虽然减小了，但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在甩掉辎重大军之后，红军又恢复了快速和灵活机动的特点，这是红军最宝贵的财富。他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蒋介石用来对付他们的任何部队。他们徒步行军，一天走四五十英里，真是

不同寻常。有时他们一连几天都保持这种速度，而且还是翻山越岭，强渡江河。五岭早被抛在后面，然而贵州、云南和四川又是山峦重叠，山山之间都有河流相隔。在江西南部有些地方固然根本无路可走，这里可走的道路也是为数极少，只有一处不同——有一条虽未经铺面，但却是一条真正的公路，可以通行各种车辆，这条公路从贵阳往北，通过遵义和娄山关至川黔边境的赤水河。

至于其余的路程，红军总是在窄得只能二人并行的羊肠小道上翻山越岭。今天一眼望不到头的“S”形和“之”字形的柏油公路，在当时是根本没有的。这些羊肠小道通常是直上直下，根本不管山坡多么陡峭，红军必须从这里通过。在一九八四年，农民们仍然走这些羊肠小道，因为走山间小道的路程要近得多。平地走十英里，而山路只要走两英里。今天的电话线和电线就是顺着这些过去的羊肠小道竖立的。贵州北部的人说，任何一个老太婆进城赶集都能赛过一辆汽车，因为她顺着羊肠小道走，比车子少用一半时间。

由毛泽东指挥后，军队就感到放心了。政委们终于可以明白地告诉战士们为什么要行军，以及行军的目的地在哪里；部队士气也高涨起来了。中国和全世界都没有任何部队能象红军这么快地翻山越岭。共产党军队每每突然在一个城镇出现，人们无不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在这之前不曾听说附近有什么共产党军队。红军战士大多身材不高，但是意志都坚如钢铁。他们离开遵义时，体质比长征开始时好了。大多数人已休息了十天。他们吃得也不错。军队到达遵义时，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银元。遵义有一家川菜馆子，花一元钱就

可以美餐一顿。不到一、两天的工夫，红军就把遵义好吃的东西吃得差不多了。许多人品尝了毛泽东喜欢吃的名菜——四星伴月——这是用羊肉、鱼、鸡、蔬菜、特别是芋头（叫做天麻）（原文如此——译注）层层摆好，放入米粉之中，蒸一个晚上。据说这种肉汤可以医治头晕头痛。有些人还买了一种珍贵的草药天麻，当地传说天麻能治体虚。

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笠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不少煤油、糖和盐。

毛泽东有理由感到乐观。红军在朱、毛制定的十六字诀方针的指导下又重新前进了——在“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李德到来前的岁月里，这十六字诀曾指引着红军取得胜利：

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这是游击战的精髓，它使朱毛部队成长壮大。现在要靠这一方针来挽救军队免遭覆灭了。

遵义会议之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地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在以后的二十五年里，世界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独立性，但斯大林却早已把这种独立性同毛泽东的名字连在一起了。

遵义会议还标志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大联合，从此

以后，他们一辈子保持了这种伙伴关系，至少一直保持到他们去世前的一、两年。

直到遵义会议前夕，周恩来还是毛泽东的对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泽东被解除了党中央局书记的职务，而同年十二月来到中央苏区接替这一职务的正是周恩来。接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又替代他担任了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周恩来确实曾表示反对解除毛的职务，主张让毛留职。但是他服从决定，于一九三三年五月成为红军全军的总政治委员。实际上，他与博古、李德一起组成了大权在握的“三人团”。从宁都会议时起，毛泽东在红军事务中没有发言权，这也是事实。宁都会议期间他身患疾病，奉命“休息”，但会后也一直没有返回红军。

那时，周恩来与“三人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边，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周、毛之间没有什么合作。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计谋。

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悲痛地承认，自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表示希望毛恢复健康，回到红军来。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泽

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与其丈夫一样，严守党的纪律。一九七六年春，当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游行遭到“四人帮”的谴责时，她没有表态，只是在毛去世及“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和党修正了官方的立场，她才表态。当杨尚昆将军请她帮助查明她丈夫对一些问题的态度时，她很干脆地说：“他从来不跟我讲他认为我不应该听的事情。”

对于党的决定，他与毛泽东的态度不同。毛对于每个决定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长征开始前后一段时期他就是这样。周偶尔也表示反对意见。他在一九三四年夏也曾提出从中央苏区突围的建议，但因“三人团”中的多数——博古和李德——表示反对，他就让步了。

毛掌握领导权前后，不时感到自己与斯大林有矛盾。有时他向斯大林屈服，那是因为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在三十年代，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出于维护苏联作为世界革命堡垒的需要，他们只能把苏联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

在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之后，这种情况也发生变化。斯大林曾强烈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战争，竭力敦促毛泽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毛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一九四八年末，当毛抵达河北省的平山县，准备拿下北平并挥师南下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带来了一个特别口信：不要南下长江，让蒋介石生存下去。毛不仅表示不予接受，相反，他还向米高扬提出了为什么要打过长江去的强有力的论

据。他认为，他最终使斯大林的特使信服了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他把米高扬送回莫斯科后，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他是这样答复斯大林的：“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而是敌人的朋友了。”^⑩

周恩来象领导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个“外国通”。他在法国和德国度过多年，他在莫斯科度过的岁月也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要长。他对外部世界见多识广。在文化方面，他对巴黎也许比对任何其他地方都更感兴趣。他没有象毛泽东那样在青少年时代双脚沾满牛屎，也不象毛泽东那样熟谙农村的习俗，更没有毛泽东那种中国农民的天性。周恩来与邓颖超是志同道合的伴侣，在欧洲和中国大城市的共同经历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间的密切关系是世界上少有的。

周恩来以其政治家的风度和杰出的才智而著称。他有丰富的军事经历，曾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在莫斯科学过军事，并在血雨腥风的上海和大胆的南昌起义中进行了实践。而在长征之前他还在南方打了三年多仗。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他都是杰出的人物，他具备足以担当一名领袖的才能和背景。他现在已全力支持毛泽东，直至一九七六年生命终结之时，他都从未对毛的领导提出过任何异议。对于周恩来之所以作出这一抉择的复杂因素，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对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人们没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从遵义以后，不论他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这种伙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显而易见，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政治观点和作风上存在着、而且将永远会存在分歧。毛很“土”（这是王炳南大使的用词），他是个乡下佬。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他来到上海码头，向那些去法国半工半读（他本人也积极地参与制定这个计划）的最好的朋友挥手告别。但他自己却没有同他们一道去。

学者们对毛泽东的这一举动早就有所猜测。有的人认为他因为没有盘缠而回去了；或者是因为学习法语有困难，或许是因为他与那些穿着比他讲究、比他富有的人在一起感到不自在。

这些解释看来都没有充足的理由。花了大半辈子研究毛泽东的中国历史学家李锐认为，毛从未打算过出国。毛认为他的朋友应当吸收西方文化，把其中有用的成分带回中国。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但毛的天地就在中国。要是他出国的话，留在国内的领导核心就会分崩离析。

李锐认为，毛泽东那时就已经得出结论，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和重建，而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靠他，他一定要当领袖，因而感到有责任留在中国。他对西方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兴趣。李锐觉得，这是一个缺点。^①

上述情况在毛泽东的整个生涯中都起着作用。“洋包子”与“土包子”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和关系紧张。有的人认为，毛历来妒忌周恩来的处世手腕，后来还妒忌他的国际威望。尽管如此，这两位不同人物之间的联盟却是牢不可破的。他们两人相辅相成。毛是哲学家、诗人，头脑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幻想。他具有一种炽热的精神，准备作出任何

牺牲；准备为实现自己的见解而采用任何谋略。他追求目标，坚定不移，不容改变，但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则机动灵活。（直至生命最后几年）他还是位善于用人的天才，不断地把自己的敌人和对手变成有用的盟友。周恩来则是一位实干家、外交家、人道主义者，是一位“管家”。

多年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早已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当周依靠其敏捷的思维、雄辩的口才和大无畏的勇气度过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的难关（毛却坐视不救）之后，他感慨万千地谈到毛泽东：“我们都是他的学生，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得象他那么好。”我相信他这番话是完全真诚的，是肺腑之言。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这样认为。但是，他对毛的晚年几乎使他本人和整个中国遭受灭顶之灾的大动乱是怎么想通的，我却无法想象。常听到外国人和一些中国人说，周是位十全十美的朝臣，是忠实可靠的政策执行者，是位务实的行政管理大师。尽管毛有时心血来潮，无法无天，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却稳稳地把握住了国家的航程。除这一切之外，他还具有许多可贵的品质，这是任何人都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他事无巨细，对人和蔼可亲。长征途中，他亲手把伤员轻轻扶上担架，唯恐别人的手用力太重；当他得知他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医院里奄奄一息而身旁没有任何亲友陪伴时便大发雷霆；在他晚年动荡的岁月里，晚上他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疲乏不堪，忧心忡忡，在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又一次正式宴会之前，他会像普通工作人员那样，先溜进北京饭店的厨房吃一碗面条，等等。难怪近年来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在遵义会议之后，长征的许多事情有了头绪。二月五日，红军抵达黔滇川三省交界处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小镇时，博古的中央委员会常务书记一职便悄悄地由洛甫替代了。毛正式被指定“协助”周恩来作军事决策。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当然，毛在其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毛泽东最初的行动之一是设法同莫斯科取得联系，把遵义会议的情况告诉他们。当时除了派信使前往外，没有其他别的联络办法。派出的第一名信使是潘汉年，他曾奉命执行过多次对地方军阀的秘密使命。潘汉年先到了上海，但在那里没有找到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党组织已被蒋介石的秘密警察破坏了。^⑫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东派出第二位秘密使者陈云，即新发现的有关遵义会议记实的作者。他化装成商人，在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便动身。他在上海同宋庆龄取得了联系，宋庆龄安排他坐船去海参威。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陈云等人一起坐船前往海参威。同行的还有何实楚，她是毛泽东在长沙时的朋友、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何叔衡的女儿（何叔衡被留在中央苏区）；已经去世的四川官员陈刚的夫人；潘汉年；党的前领袖瞿秋白之妻杨之华；以及陈潭秋。这时瞿秋白已于六周前被国民党处决。国民党对瞿秋白被处决一事大肆渲染了一番。他的遗孀杨之华同国际红救会有联系，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机构，为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和地下工作者提供援助。陈潭秋同毛泽东和何叔衡一样，也是一九二一年建党时的共同发起人之一。

陈潭秋当时留守福建,他接替罗明担任那里的党的书记,他本人也受到了批评。这也许就是他未能参加长征的原因。他比一些人幸运,因为他设法离开了福建,同赴苏的这些人会合,一起前往莫斯科。(但他后来于一九四三年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盛世才同俄国及共产党毁盟后,转而同蒋介石结盟。)

陈云后来说,他们一行共有七八个人。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小组,此行目的名义上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当时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曾于一九三四年向中国人发出邀请,请他们派遣一个有六十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原定于一九三四年召开的会议,但是会议后来被推迟到一九三五年夏天。^⑬

代表团未能及时赶到那里。他们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抵达,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已来不及向大会报告遵义会议或其他任何问题的情况。大会本来可以利用一点来自中国的第一手信息,但没有这样做。在缺乏真实情报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听取了王明关于中国革命不断高涨的讲话。最后,一九三六年二月,共产国际的杂志发表了陈云题为《英勇的西征》的文章(用假名施平发表,此名无人知晓,文章也就完全被忽视了),文章没有提到遵义会议的情况。遵义会议是绝密的。

陈云的文章只字未提军事和政治领导的变更。他提到从中央苏区撤出的情况,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被说成是失败;说西征大军“伟大的行动”正胜利地取得进展(实际上红军早已抵达陕北,但这一情况没有说明);说红军正在保存实力,

其目标是要壮大到一百万人。全文提及的唯一的消极面是，在他们离开中央苏区时，背着沉重的行李。^⑬

此后，共产国际立即采取秘密措施，重建同中国的联系。潘汉年被派遣回国，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或十二月抵达上海，他带来了密码本，这样就能恢复密电联络了。关于他是否带回电台一事，不甚清楚。大概没有带回。但是，据说他们曾安排使用安置在宋庆龄寓所中的一部电台，宋庆龄的寓所座落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她和孙中山过去曾在这里居住。

多年来，对宋庆龄寓所中是否有一部共产党电台在工作一事，一直是众说纷纭。她的许多密友，包括路易·艾黎，都矢口否认，他们说国民党的警卫日夜把守着寓所，电台怎么可能工作呢？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两名主要历史学家胡华和向青声称，电台确实在那里工作过。

潘汉年是一位老于世故、文化水平很高的人。那时，他乔装成宋庆龄的秘书，实际上是共产党同共产国际和孙夫人之间的正式联系人。直到一九五三年他被指控为日本间谍而遭逮捕前，一直是宋夫人最亲密的同事之一。他被监禁二十年之后去世。但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之后，他已被全面平反，恢复了名誉。^⑭

第十三章

“棉里藏针”

邓小平是在阴影的笼罩下开始长征的。那时他才三十岁。他被撤销了军政职务，受到了严厉的“斗争”，被武装看押和公开批判，连妻子也跟他离了婚。虽然这还不是他生涯中的最低点，但确实也是一个低点。有关这一时期的某些传说肯定是不真实的。看来没有证据表明，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真的被送去劳改了。他作为红军总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像数以千计的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扛着自己的行装，开始了长征。但他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了五千名用肩膀扛装备的挑夫中的一个。然而，这些都是有关邓小平的早期典型情况的传说。

遵义会议改变了邓小平的低级地位。就如在他的生涯中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情况那样，他从政治上的底层上升到参与毛泽东的高层梯队。

邓小平降职后又东山再起的所有细节在参加长征的人的记忆中并不都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提升却是毫无疑问的。

他支持毛泽东，但因为脾气急躁和心直口快而吃过苦头。人们形容四川人是有名的辣椒罐子，邓小平恰好就是这种人。他出身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广东常见的“客家人”，后来往北迁至四川，在重庆市北面约三十英里处

的广安县的仕绅组织的地方保安队中任队长，主管一支一百人左右的队伍。邓小平早年便离开了家，上了中学，接着在重庆上专科，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十六岁时，他随一批九十二名中国学生一起乘船去法国。

在巴黎，他先在雷诺公司的一家工厂做工，后来在火车上当司炉。他钱很少，也没有多少东西吃。他对杨尚昆将军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邓小平认为，他身体矮小（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点）可能与他贫乏的饮食有关，因为他吃得太少。他在巴黎的日子使他一辈子喜爱法国食品，特别是羊角面包。一九七四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讨论经济问题的特别大会，领到了三十元（约十六美元）的零用钱，他决定用来买羊角面包。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建议他在回国途中经过巴黎时再买，这样回家时面包就比较新鲜。他采纳了这个建议；他一下买了一百个羊角面包，带回国送给周恩来和其他那些早年在巴黎就爱吃羊角面包的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在柬埔寨失败后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他有时就做上一顿法国饭菜赠送给邓小平品尝。在巴黎时，邓小平学会了自己做饭，还为同住在一所老房子里的其他中国学生做饭。

他在一九三六年时对埃德加·斯诺说，他在国外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工，而不是学习。他是从法国工人同伴那里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以后才加入由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青年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在这方面，他走了另一名亚洲革命家胡志明的道路。胡比他年长一些，也在法国工作，他们两人在巴黎相遇，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也

常常见面。在那些日子里，邓小平与周恩来搞得很熟。他在由周恩来创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表现得很活跃。他散发传单，刻写蜡板，干了很多工作。

邓小平于一九二六年经过蒙古和宁夏回国，在这之前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个月。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在那里学习。后来邓小平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这所大学当时既面向国民党也面向中国共产党。回国之后，他在接近共产党的“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了一段时期，还在西安附近为冯玉祥建立了一所军事训练学校。蒋介石在上海实行恐怖统治之后，邓小平被派往武汉，接着又到上海转入地下工作，他在上海曾担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这是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职务。

他在党内的第一项重大使命是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广西西南部去组织一次以所谓第七和第八军为中心的大规模游击战，他被任命为政委。

邓小平有位弟弟叫邓垦，后来任武汉市市长，一九八四年时已退休。还有位妹妹，一九八四年仍在北京的一所科学研究所工作。他们的母亲在孩子们幼年时便去世了，孩子们是由继母抚养长大的。

第七和第八军并非真正的满员军——充其量不过数千人。鉴于第八军的基地在广西和印度支那的边境龙州，邓执行这次使命时极其困难。为了前往该地，邓不得不从香港乘船至海防，穿越印度支那北上，过了边界到龙州。他得到了印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该地下组织正在龙州对面的印支边境地区举行起义。至于胡志明本人是否积极参与了这次

作战行动，不得而知。印支共产党于一九二九年五月才成立，它是在上海跑马厅举行的一场足球赛期间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胡志明曾与中国人密切配合，在上海、香港和广州开展地下活动。

邓小平在第七军的生涯很快便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斗争的影响。他被撤销了前委书记之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邓岗的人——人们有时把他与邓小平混淆起来，邓小平的真名是邓斌。（在法国时，人们知道他叫邓希贤。）到第七军奉命从广西撤至湖南时，他又恢复了职务，但是第七军只剩下很少一点点人马了。它号称有三个师。空架子的二十一师留在广西，由韦拔群指挥。邓指挥十九师，陈豪人指挥二十师，此时两个师已分别改称为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这倒比较符合实际。不久，邓被派往上海向党的地下中央领导汇报广西的情况。他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抵达上海。

邓小平在第七军里至少已有两次大起大落。后来，在毛逝世以后，他终于成为中国的领袖。有人问一位知情的中国人：邓小平坦率而固执，这使他卷入一次又一次的党内纠纷，那么人民究竟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位中国人说：“正因为如此，我们信得过他。”

当邓小平一九三一年八月回到中央苏区，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时，他陷入了困境。该县正在搞“肃反”运动，这是定期在秘密革命运动中搞的清洗运动之一。肃反运动是因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事件引起的。

一九二六年，南昌的一些中国的民族主义右翼分子成立了一个亲国民党的组织，叫做AB团。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

期。AB团是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但许多年青的中国爱国分子都曾加入过AB团。

一九三〇年，当许多中国青年从苏联回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时，党的保卫人员就要他们交代过去曾参加过的组织。不少人说他们曾参加过AB团。一系列的主观推断和无端猜疑使得保卫人员相信AB团就是国民党企图渗入共产党队伍的特务组织，“AB”二字代表了“反布尔什维克”的缩略语。这一危险的胡诌尚未全面传播开来，便发生了三四千名AB团嫌疑分子被逮捕，许多人被枪决的所谓富田事件。

由于国民党造谣说它有地下组织（实际并不存在），更增加了人们对AB团的恐惧感。党的保卫人员采取逼供手段，使数百人无中生有地“坦白”自己是AB团的成员。邓小平接管瑞金时，在瑞金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坐待处决，没有可靠的估计。但是大概不下数百人。

邓小平制止了这一政治迫害。他下令对所有被关押的人进行详细的审查。大部分人恢复了原职。如果发现他们滥用职权或犯了错误，则予以撤职。周恩来在一两个月后抵达苏区时，也支持采用同样的办法。在制止这种疯狂行动的过程中，邓小平得到了谢唯俊和瑞金其他党的干部的协助。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杀人的现象停止了。

那些被捕者被称为“隐藏在党内的敌人”。所有这一切同三十多年以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统治时期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邓小平在这个时期成了一个著名的受害者。一九三一年在瑞金与一九七七年在北京一样，他最终制止了歇斯底里的发作，释放了无辜的人。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时间不太长。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宣布成立“临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瑞金成为其“红色首都”。几个月之后——邓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他被调离瑞金，去担任不太重要的职务——会昌县委书记，紧接着又兼任寻乌和安远县委的书记。这听起来相当不错，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三个县都是不久前才获得部分解放的新区。当时红军并没有占领这三个县的县城。

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冬，邓小平的日子又不好过了。众所周知，他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此时，博古及其反手派开始接管中央苏区，发起剥夺毛的剩余权力的运动。

邓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他担任三个县委书记之职约半年之久。尽管邓告诫他的同事们对于编写和研究历史必须精确，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他厌恶以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⑩

那时的反毛运动是由党内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写的。“布尔什维克”们不敢公开攻击毛，而是采用中国政治中指桑骂槐的方法批评福建省委书记、毛的坚定支持者罗明。文章没有提及邓小平，但是谁都知道，邓与罗明的观点相同，并且都拥护毛泽东。

罗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职务。邓小平被调至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长。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邓的运动便公开了。洛甫公开点名，首先指责邓小平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被点名的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的弟

弟毛泽覃，还有帮助邓反对清除 AB 团歇斯底里运动的谢唯俊和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职务。^⑪红军开始长征时，其中毛、古两人被留下来，而且都丧了命。

此时，邓被送到了红军的总政治部接受“批斗”。有关这次“批斗”的报导是相互矛盾的。斗争绝不是温良恭谦让的。用暴力伤害肉体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斗的人被关押起来，显然，邓也不例外。五月六日党中央局杂志《斗争》上发表罗迈（李维汉）的一篇文章，文章号召对邓和“罗明路线”的其他追随者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罗迈是党的组织局书记。他激烈要求对邓进行处分。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这是否促使罗迈对邓采取严厉的态度，无法证明。阿金是广东人，人们记得她是一位颇具天资的女人。和邓一样，她在瑞金时是党的一位书记，而且据说有点个人主义。阿金和罗迈一起完成了长征，但他们在延安离了婚。^⑫

邓小平被指责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因为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分给穷人，而不去触动中农。他还认为应当在各县保留地方武装力量，而不应当象“布尔什维克们”所坚持的那样，把所有的武装都统一到中央指挥之下。他还支持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⑬

邓小平在被批斗时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他低估了“进攻路线”，但指控他的人对此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说：“我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说罢，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了。^⑭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

妻子唐义贞。陆定一是苏区宣传部长。“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曾把他打成重伤。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红军撤出苏区时，唐义贞被迫留在苏区。她的丈夫走完了长征，并幸存下来了。^⑮

邓小平在被“批斗”期间的表现同他在以后年代中的表现是一致的。他愿意承认错误，但当他相信自己正确时，他就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在这一点上毫不动摇。

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大约有六七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⑯杨尚昆将军说：“他被送到基层去了”。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⑰最准确的一种说法是，他被派到离瑞金很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了。但似乎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巡视了些什么。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那是个很低的职位。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很短，可能不超过十天。那是个游击区，用军史研究员阎景堂的话来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在这片无人地带周旋，打得“难分难解”。瑞金有些人担心“会出事”，所以又把他调了回来。^⑱

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受伤的王稼祥。他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有两三个月时间，后来据说他主动请求解除了这个职务，成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员。另一种说法是，根据邓自己的请求，担任红军机关报

《红星报》的编辑。但是，李一氓指出，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所以在总政治部邓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军。李一氓后来又纠正自己的说法，说他们每人分到一匹马，实际上是骑马行军。^①

不论情况如何，在遵义会议，或在此之前不久，这些都发生了变化。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的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不过，据他回忆，在遵义会议前不久召开的黎平会议期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或按照刘英的说法，他担任“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

这个职务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实上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

邓出席遵义会议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成为历史研究的问题。邓自己记得是出席了会议，杨尚昆将军亲自进行过一次调查。杨出席了会议，但记不得邓是否也在场。七十年代初，杨曾问过周恩来总理。周说邓确实在场。后来，杨回忆起他看到邓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不是为了《红星报》，就是因为他是秘书长才记笔记的。不管多么重要，这些笔记也象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乎所有文字材料一样都丢失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就在红军翻过雪山之后，毛命令后方机关所有人员都必须在前线担任军事职务。邓小平去第一军团领导政治宣传工作，身材矮小的刘英接任秘书长，一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为止。红军到达陕北时，邓患了某种伤寒病，病得很厉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工作。^②

没有一个人象毛泽东那样使邓小平经历了那么多的大起大落。毛有一次发脾气说，每次他讲话，邓就故意坐在屋里很远的地方；邓耳聋，反正也听不到毛在说什么。可是在一九七三年，当周恩来身染重病时，他把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炼狱中解脱出来，并热情地称他为“棉里藏针”，意思是邓柔中有刚。毛还说，邓“行方思圆”。

红军从遵义出发时，邓已不在部队的下层了。他有了自己的马，而且从毛那里接受了新的任务。但是，随着邓的时来运转，另外一个人却倒霉了。红军向西北方向开辟新的路线时，骑在马背上的高高的李德已从红军最高指挥部里消失了。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就要求并被批准参加了林彪的第一军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要“通过在前线的亲身体会，了解毛推崇备至的中国内战战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这又招致了中国人的一阵臭骂，然后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都是他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当红军第二次打下遵义并再次短暂停留时，翻译伍修权来看望过李德。伍被任命为第三军团副参谋长，上了前线。李德坐在桌旁，不慌不忙地砸核桃吃。伍坐下来，也开始砸核桃。李德抬起头来看了看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军事关系，和砸核桃毫不相干。”^{②①}

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

第十四章

摆脱危局

队伍出了遵义向北进发。这是自从长征开始以来，红军第一次踏上一条真正的公路，毛泽东也是第一次骑着高头白马走在队伍的前头（该马已制成标本现陈列在延安博物馆内）。他的老战友朱德和新战友洛甫也骑着马，分别在他的右手和左手与他并辔而行。疲惫不堪的部队进入桐梓时受到两千名群众的热情欢迎，景象十分壮观。桐梓是两周前由林彪的一军团攻克的。

在桐梓，红军开进了一个神秘的王国——仙女洞和天门洞。那是一片充满传奇故事的土地，一片富有诗意和历史传统的土地。地下是巨大的石灰岩溶洞，深邃的洞身，岔道横生，还没有人进去探过路。有人说，天门洞是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溶洞，它的主洞可以容纳几万人。

桐梓城不大，以出武将而闻名。桐梓县出的武将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多。这里是不少小军阀的栖身之地，每个军阀都为自己造了一栋小楼，式样千篇一律，第二层有个阳台，院子里大多停着一辆小轿车。这些军阀个个都有不少黄金和小老婆。桐梓和在它西南五十英里处的茅台是有名的鸦片和酿酒中心。红军到达桐梓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石灰岩溶洞里寻找军阀和地主逃跑前仓促藏匿起来的金银财宝。红

军在这里富裕了好几个星期，因为它没收了大量的银元（但是缺乏大米和其他食物，这个地区除了生产黄金和鸦片外，其他出产极少）。

仙女洞和天门洞这样的人间奇境在二次大战中出了名。当时国民党为了避开日本人的轰炸，在这个偏远而隐蔽的地方建了兵工厂和地下发电厂。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劫持了蒋介石的“少帅”张学良曾被押来囚禁在这里，看守们令其在洞里不断地转圈，直到他晕得辨不出方向，才让他出来重见天日。张学良被安置在一座小公馆里，墙外就是小西湖，因仿照著名的杭州西湖而得名。张学良单独住在那里，身旁只有一位才华出众、忠贞不渝的女秘书赵小姐。他们倾心相爱，一起生活。当蒋介石离开大陆去台湾时，把他俩也带走了。一九六四年张学良和赵小姐在台湾正式结婚。

一九四九年红军再次攻入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角落。军阀们再次把财宝藏进洞里。红军很快又把它们取了出来。可是逃进深山的许多国民党军官和部队，是好多年以后才被全部消灭的。

参加过长征的罗炳辉将军告诉海伦·斯诺：红军打贵州时“象是一只猴子在小巷里耍弄一头牛”。

我想，毛泽东不会做那样的描述。他的目标是清楚的——找到一条北上渡过长江的通道，以便同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的心里也已早有打算，毛泽东想北上，他就调动精锐部队来堵截。

毛泽东离开遵义前，就已派林彪率先遣部队先走一步，希望他能扫清道路，使红军得以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位

于重庆西南的这段长江长约九十至一百五十英里，蒋介石就亲自在重庆坐镇指挥他的部队，企图在云贵川地区将红军团团围住，就象他早先在江西红色区域所做的那样。

毛泽东自有对付的妙计。他已分兵几路，由林彪亲自率领精锐的一军团第二师行动。该师突击团四团正尝试从赤水县一带渡过赤水河并为横渡长江做准备。他自己则亲率一军团第一师和其他高级机关离开桐梓西行。这条道路泥泞不堪，同遵义城外的公路无法相比。陈云（笔名廉臣大夫）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是长征途中他所见到的最糟糕的一条路。他看见毛泽东拄着棍子爬山。天下着雪，泥浆没过他的双膝。他显然滑倒过，因为他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泥巴。

毛泽东率领部队西行朝赤水河前进，准备在林彪突围成功后立刻向北尾随林彪的部队。彭德怀的三军团（“军团”仅比师稍大一些）几乎沿同一路线单独向西运动，比毛所在的位置略靠北一些。九军团的任务是摸清敌情；五军团象往常一样，担任后卫，几乎紧跟在三军团后面。毛把有限的兵力分成这么多的几路是否明智，对此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目的在于迷惑蒋介石，使蒋摸不清红军的意图，并趁其不备，在蒋介石尚未设防的地点强渡过江。他希望蒋和四川军阀本来的矛盾关系能对红军的行动有利。

但是战争中常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林彪素来机警、稳健，善于绕过敌人前进，现在却遇到了麻烦。他顺利抵达赤水河畔的土城，老百姓举着红旗欢迎他。黔军惊慌失措逃过赤水河。林彪接着向土城以北的不远的赤水城挺进。他料想会受到同样的欢迎。城里一个小军火库的工人于一月十六日举行

过一次反政府的示威，林彪以为这可能对他攻城有所帮助。林彪手下有四千人。他们为能见到赤水城而兴奋不已，因为城里有电灯，而他们大多从未见过电灯。但是，当林彪抵达赤水附近的黄洞陂村时，他发现敌人在道路的一侧筑有坚固的碉堡，在另一侧的小山顶上修了强大的工事。敌人的重机枪朝着红军猛烈扫射。第三团竭尽全力战斗，仍冲不出敌人的火力网。林彪派出一支队伍绕到小山后寻找通路，但是找不到，战士们打了一整天，还是毫无进展。这时，他们又看见一英里以外的公路上尘土飞扬，显然，那是国民党部队在驰援赤水。林彪坚持着打到黄昏，然后撤过公路，拉回一段距离。他无可奈何地连夜向毛报告了失利的消息。

毛泽东率领的主力这几天也受到一股敌人的追击。但这似乎没有引起他多大的注意，而任凭敌人穷追不舍，他想那不过是几团黔军“双枪”兵而已。一月二十七日，毛率部来到赤水河边的土城郊外。彭德怀的三军团就在附近，五军团离这里也不远。当晚决定，三军团第二天一早迎击追兵，把他们消灭掉，估计敌人有两个团，约二千至三千人。这类战术是朱毛的拿手好戏。成功后既可摆脱追兵，又可在林彪打出一条道路后，立即跟进过江。他们估计林彪随时可能报来得手的信息。届时，他们将把敌人甩掉，并在蒋介石醒悟过来前就到达长江北岸。这是个大胆的方案，但又似乎完全有可能做到。

一月二十八日拂晓，三军团发起攻击。毛在位于土城以东数英里的青杠坡村建立了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村外的小山

顶上，视野广阔，几乎可以环视四周三百六十度。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类战斗通常只需几个小时。五军团这时已摆开了速战速决的阵势，准备全歼“双枪”兵。

不料，毛于清晨收到了林彪突进赤水受挫的消息。林已在前一天晚上下令他的部队停止前进。他的位置在毛以北二十英里，急行军大约半天就可以到达青杠坡。

林彪失利的消息很快就使毛泽东明白了这场歼灭“双枪”兵的速决战出了毛病。到了上午十时左右，敌人显然没有仓惶溃逃。红军固然打得很好，敌人打得也不错。实际上敌人反而越战越强了。中午时分，毛和他的部下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斗。敌人并不是不堪一击的黔军，而是驻守宜宾的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精锐部队，前线指挥官是外名叫“熊猫”的郭勋祺。敌人的兵力也不是他们原来所想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即四个团。不仅如此，激战当中，又出现了更多的川军，总数增至八个团，至少一万人，而且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就数量而言，川军人数大约同毛部署的人马一般多。他原来预料兵力对比是四对一，现在成了一对一。离战场不远的地方确实应当另有一万或一万五千名红军部队，然而从未让他们投入战斗。林彪率领的大约四千人还在二十英里之外。半天以后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险情。

高级指挥员两次亲临战场。朱德和刘伯承离开总司令部到前沿阵地督战，表明情况已很危急。川军指挥官显然已把八个团全部投入战斗，红军成败未定。

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亲自指挥战斗。

红军手中只剩下两门幸存下来的山炮。战斗后期，朱德动用了其中的一门。开炮猛轰充当急先锋的川军教导旅。仅剩的那三发炮弹打完后，朱德下令把炮扔进赤水河，因为再没有什么用处了。

下午两点，出现了新的紧急情况。二十英里以外的林彪接到命令，要他火速赶到青杠坡增援正在激战的三军团。但林彪最早也要到天黑以后才能赶到，这表明他们当时担心凌晨时红军的处境会更困难。

下午三点，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伤亡越来越大。朱德的妻子康克清也遇到了突然袭击，她从密集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⑩军事委员会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大家知道的红军在战斗中召开的唯一的一次紧急会议。可见这绝非是一次普通的战斗。现在清楚了，战斗中红军的命运可能危在旦夕。如果敌人投入更多的兵力，红军能不能顶住？谁也不敢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军委干部团——司令部的近卫部队、后备中的后备也都投入了战斗（他们表现得很出色）。紧急会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命令黄昏时停止战斗，迅速毁掉赤水河上的桥梁。取消了北上渡江的计划。主力红军究竟能不能、以及何时才能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合，要看事态的发展。眼下红军不得不推迟入川，暂时栖身云南。

军委向林彪下达了新的命令。让他必须在敌人封锁渡口之前过河，同其他部队一起撤退。要竭尽全力后撤，以保存红军的战斗力。毛泽东指挥红军已有十天，而现在红军的命

运是生死未卜。

毛泽东终于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时间：林彪数天前到达土城时，夺取了赤水河上的一座浮桥。浮桥还在原地。下午六时，工兵奉命把桥修好，并再搭两座桥。夜间，周恩来三次来到河边视察，鼓励工兵加快进度，强调桥必须在日出前架好。

天气温和，没有再下雪。五岭的严寒稍有缓解。河面很宽，河水很浅，每年这个季节赤水河水流总是比较平缓。工兵修桥进展顺利。浮桥象公路一样宽。林彪在略往北一些的猿猴（现元厚）及时渡河完毕。一月二十九日拂晓前，红军迅速渡过赤水河。这一仗实际伤亡数字没有记载。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一些材料看，双方伤亡均十分惨重。国民党的统计材料认为，共产党方面伤亡了两千多人。共产党方面现在无人敢于估计当时的伤亡情况，甚至也不愿提到国民党的数字，因为数字“太高，容易造成错觉。”

红军到达云南扎西（现名威信）时，号称约三万人。如果这个数字确切，他们的伤亡一定很大，基本上抵消了红军在遵义一带招募四千多新兵的人数。

红军进入云南后，川军和黔军就开走了。红军和毛暂时脱险，但确实是一次侥幸的脱险。毛在掌握领导权后的第一仗中幸免于难。青杠坡这一仗不会载入史册。事实上，这是它第一次见之于书本。^①

天亮前，红军川流不息地走过三个浮桥。到了十时，全军包括林彪的部队，均已抵达对岸，浮桥被拉上岸毁掉了。接着，毛指挥红军向四川的古蔺前进，随后又转向扎西。红军

将在那里进行整编，招募新兵，重新部署。

很可能是在刚过赤水河以后，悲惨的遭遇再次降临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身上来了。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璋医生的看护下，她生下了一个女孩，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正在追赶红军，毛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十六到二十四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这对夫妇保证照管好小孩。天亮前，毛、贺和红军又启程了，后面是紧追的敌人。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

这个故事是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讲的，他当时负责照顾贺子珍。开始说这孩子出生在名叫白沙的地方，但白沙离赤水有一百三十英里。后来他说也许出生在遵义北面的枫香坝或云南境内的威信（扎西）。可是这几个地方都同红军当时在行进中的情况不完全吻合。——尽管红军总是在相当紧张的情况下行军的。^⑫

贺子珍的不幸反映了长征路上妇女的不幸。尽管刘英直到长征结束后才同洛甫结婚，但她很了解妇女的处境。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

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象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前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漂亮妻子一九三六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七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为她围出十英尺见方的一块露天地，四面的墙约有五英尺高。她在那里生了一个男孩。

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一九三六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祖母家里。后来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当地死者多达一万余人。^⑬

托付给农民照料的孩子大都夭折了。有几个后来找到了。有些母亲把孩子领了回去，有些孩子对亲生父母一无所知，就让他们留在把他们抚养大的那些农民家里。

刘英说：“妇女必须作出选择。爱革命还是爱自己的孩子？她们更爱革命。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⑭

丁玲认为长征中当女人最难。丁玲是中国著名的作家，长期生活在争论的漩涡之中。她是革命者、浪漫主义者，也是文学、道德修养和政治方面的人物。她没有参加长征，但红军抵达延安后不久，她就到了那里。她对红军里的人都很熟

悉。她是中国最桀骜不驯的人物之一。她被蒋介石监禁过，她的情侣是个诗人，被蒋杀害。她一度觉得毛泽东有大男子主义，为了维护妇女权利反对过毛泽东。自然，在“文革”中她是个受害者。

她说，参加长征的妇女当然是“贤惠的女性，但她们又是一批能吃苦耐劳的女性，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两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陕北”，不错，她们有马，但她们常常不骑。不少人有丈夫，但她们常开玩笑说：“骡子比丈夫好。可以没有丈夫，但不可以没有骡子。”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⑬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同长征中贺子珍等妇女一样历尽艰辛的是另一个诗史般的远征——美国开拓者的车队穿过大草原西行的壮举。在那次远征中，不少美国妇女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是带着孩子而危及全家，还是扔掉孩子继续前进？

毛泽东带领他的部队迅速地避开同川军交锋。长征途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旦地方军断定红军已经改变路线，离开他们的地盘，他们就减弱攻势甚至逐渐停止对红军的进攻。毛在滇北的威信（原扎西）过了中国农历猪年的新年。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刚过，先头部队便到了威信。毛泽东于二月六日到达。没有举行会餐。既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也没有食品。有些部队已经饿了整整两天。天气很坏，阴冷而潮湿。

部队进行了整编，压缩了部队番号。他们休息了一天。陈云记得很清楚，他概括地指出：“天气很冷，夜间下起了雪。”^①

红军原计划西行，然后转而北上入川。毛及时改变了计划。因为他得到的情报和电台截听来的消息表明，蒋介石正向西调动部队，打算在红军再次靠近长江时一举予以歼灭。毛决定采用朱毛式出其不意的战术。二月十一日在扎西开会通过了毛泽东的决定。全军掉头转回贵州，并回师攻占遵义。他的打法越来越象《水浒传》中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当红军成一路纵队前进时，许多人丢掉了文盲的帽子，洛甫发明了他称之为“看后背”学文化的办法，战士们在背上都挂块白布，上面写着汉字。他们边走边认字，懂得文化的重要性。

第十五章

牵住蒋介石的鼻子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那天，红军得到的命令可作为长征的口号：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

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我们决不能损坏财物，因为我们还可能回来。”

虽然这是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可读起来纯粹像是出于毛的手笔。在以后的六周里这个口号主宰了红军的命运。红军忽而前进，忽而后撤，令人难以捉摸（这种情况以后就不再发生了）。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对此困惑不解。共产党军队行踪的情报往往过了近一个星期国民党才收到。毛自己的将军们有时也迷惑不解，尤其是他的门徒林彪。他抱怨说，部队的调动太快，压力过重，需要休息。他的反对意见被否决了。

蒋介石预期红军将采取新的行动，穿过贵州西部，向长江挺进，因而调动了他的军队。可是，当他的军队部署就绪时，红军却在向相反方向运动。红军在太平渡和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后，迅速折回，在回师遵义途中于二月二十四日重新占领了桐梓，一个连的地方军在红军到来之前就望风而逃了。

当时，一部分红军指挥员反对令人晕头转向的曲线行军。

林彪就是其中之一。至少在今天反林彪的气氛中，人们是这样回忆的：他为了减少行军的压力，建议缓慢地接近遵义的咽喉要地娄山关。据情报说，娄山关有敌人的重兵驻守，林彪力争晚一天行动，给部队以喘息的机会。骁勇的彭德怀说，他们最好利用敌人的弱点，在第二天——二月二十六日——拂晓发起进攻。军事委员会赞同彭的意见。长征期间，彭德怀与林彪多次发生争执，彭的意见总占上风，这是其中的一次。

部队以强行军速度疾进。甚至连彭德怀也承认，连续的行军使他们疲惫不堪。二十六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十一点钟，彭德怀得到了这个情报。对方部队距离娄山关还有四十五里，（十一或十二英里）的路程。彭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几天来他们常常跑步行军）。

这是同时间赛跑。在这次行军中，三军团归林彪指挥。但是，是彭德怀率领三军团于二月二十六日下午三时左右比敌人提前几分钟占领了陡峭的娄山关，取得胜利的。当他的部队登上顶峰俯视遵义方向时，发现山北侧的敌军距离他们只有二三百码远。好险啊。彭报告，他的部队仅伤亡一百人。

今天的娄山关，看上去象一个宽阔而相当平缓的斜坡，载重卡车和大客车汇成了一眼望不见头的车流，向黑色的峰顶爬去。五十年前，陡峭的娄山关双壁中间有一条可通行汽车和畜力车的宽宽的土公路。红军并没有利用公路乘车行军。因为走公路反而会偏离命令中规定的小路而减慢速度。

彭德怀的部队比敌人早五分钟占领了娄山主峰，这是红军和毛泽东在长征中取得伟大胜利的第一个捷报。守卫娄山关的敌人只有一个团，被彭的部队打垮了。在夜幕降临之前，红军已牢牢控制关口。但是，在娄山关与遵义之间有王家烈的八个团，敌吴奇伟将军率领两个师正向这里靠近。

二月二十七日，三军团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娄山关上压了下来，会同一军团迅速向遵义挺进，沿途所遇敌军都被粉碎。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消灭了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人三千，俘虏二千，缴获步枪一千支和子弹十万发。国民党新闻机构承认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

但是，红军也蒙受了损失，亲自指挥攻打遵义的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在第十一团攀登城墙受挫时，他正在四百码外的一个小山丘上用野战望远镜观察。他让该团政委张爱萍（一九八五年时任国防部长）下令再次发起进攻。一名侦察员前来报告说，一道内城墙挡住了进攻部队。侦察员的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向观察所猛烈射击，邓萍被一颗子弹击中，当即阵亡。

久经征战的老侦察员孔宪权率领他的部下作为突击队参加了娄山关战斗。他们配备有轻、重机枪，孔挎着自己的驳壳枪。他们在第一次攻克遵义时，每个人都领了新军装，可是现在服装仍然不够用。孔的部下每十二个人只有四件棉上衣，只好大家轮流穿。突击队来到娄山关以南的绥阳县，距遵义还有一半路时，一颗国民党的炮弹在孔的近处爆炸，弹

片打烂了他的臀部。他被人用担架抬到遵义，送进了一座罗马天主教堂，在那儿，一个外科医生用“鸦片水”给他麻醉，动了手术。

那天晚上，这座旧教堂中挤满了伤员。国民党的飞机企图用轰炸来阻止红军的进攻。一九八四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当时是一位十八岁的共青团领导人，属彭德怀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胡耀邦是参加长征的三十二名共青团中央委员之一，抵达陕北时，他们中间只有十四五名幸存者。胡身材矮小、精力充沛、消瘦而结实，长征开始不久就患伤寒病倒，此时已痊愈。他是红军中央工作队队员，他对此非常自豪。

二月二十七日下午，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一旦部队打垮了敌人的主要抵抗力量，胡耀邦就进城帮助维持秩序。一群低空飞行的国民党飞机吼叫着俯冲下来，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右臀部，造成重伤。

胡耀邦被人用担架抬入遵义，送进天主教堂。在那里，王彬医生给他动了手术。一九八四年，八十多岁的王彬医生仍健在。胡耀邦认为他是红军中最好的外科医生。王彬是后来在长征中为患肝脓肿而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治过病的几个医生之一。他是被红军俘虏后受到优待而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外科医生。他曾是一位少校。胡耀邦回忆说：“红军的政策是争取技术人员，尤其是争取报务员、医务人员和会使用重机枪的人。”^⑩

动手术后，胡耀邦坐了几天安架，然后就骑马了。在马上颠簸，他感到伤口十分疼痛。他骑了八九天马，又把马让

给更需要的人了。

“我已经把死亡置之度外了，”胡耀邦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没有任何选择。我们只能战斗下去。不战斗，也得被杀死。”

胡耀邦对侦察员孔宪权印象很深。在遵义，还有一些红军的重要人物负了伤。一个是著名的“罗明路线”的代表，前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他也被一块炸弹片击中。三军团的一个政委钟赤兵也是如此。

“孔害得我们一夜睡不着，”胡耀邦回忆说，“他一直喊：‘杀！杀！’这是红军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喊的口号。”

孔宪权是在娄山关南一个叫黑神庙的小村庄负伤的。在遵义做手术后，用担架抬着他走。他的胯骨被打碎了，伤口不愈合。他又坐了约两个多星期的担架，一直到赤水河畔的毕节专区黔西县，他才被留在当地养伤。他在床上躺了二十个月。

但是，孔宪权的处境并不算太糟糕。红军领导为他作了很好的安排。一位医生和一位卫生员留下来照料他，并发给他三百多块银元的生活费，并把他安置在当地一个财主家里。红军告诉那个财主：你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你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还给医生和卫生员留下一些银元作生活费和药费。给孔留下了他所需药品的单子。^①

这是非常特殊的待遇。当时的红军条例规定：如有必要，负伤或生病的团级和团级以上的军官必须用担架抬着走完长征全程。孔仅是营级军官。他以胆大勇敢而出名，所以给予

他特殊的待遇。留下的普通红军伤员一般发十至十五块银元。^⑫

那个收留孔的财主对红军有好感。他迷信，觉得红旗是交好运的兆头。把孔送到财主家的红军战士，把财主和他的一间房子拍了照，对财主说，“别忘了，”他们警告说，“我们有照片。我们会回来检查你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接着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了统一战线。此后不久，当地的省长呼吁所有红军战士从隐藏处出来，保证赦免他们。但是，孔的房东财主不放他走。他说，“三四年后假如红军回来了，你不在这里，怎么来证明我保护你不受伤害呢？”

后来，孔恢复了健康，出去作了泥瓦匠，别人称他为“跛子瓦匠。”一九四〇年，孔结了婚。他老婆死后，一九五〇年他再次结婚。一九八四年他已有七个孩子，四男三女。他说：“今天要是生这么多孩子，人们就会把我送到医院‘阉’了。”共产党掌权以后，他担任了一个小小的行政职务。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中把他抓了起来，说他是叛徒，让他站在卡车上游街。^⑬

国民党将军吴奇伟率领两师残部向南往乌江方向逃遁。一、三军团紧紧跟踪追击，他们整整追了一天，没顾得上吃饭休息。追到乌江边，国民党将军吴奇伟正命令他的军队开始过浮桥，尚未全部渡过河，一看红军赶到了，吴奇伟就下令砍断固定在南岸的桥索。浮桥摇晃着掉进激流中被撞得粉碎。吴将军的一千八百多人被丢在北岸，孤立无援，只得向

红军投降缴械。^⑭

娄山关的胜利令人欢欣鼓舞。几周以来，红军战士跑步行军、吃不着饭，睡不上觉，一仗接着一仗，人人都已疲乏到了极点，这一胜利提高了他们的士气。正如彭德怀所说，红军实际上是赢得了两个胜利，一个在娄山关，另一个在乌江畔。胜利使红军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补充。红军将俘虏的官兵集中起来，由共产党宣传员讲话，然后动员他们参加红军。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参加了，组成了一个新的红军师。每个新兵领到三块银元，还发了缴获来的枪支。不想参加红军的就发给路费，并告诉他们到哪儿去都可以，东南西北都行。朱德与被俘的军官不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都亲自谈了话，他介绍红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并希望全中国的军人能够组成统一战线。^⑮

彭德怀有了一位新的政治部主任，他就是刘少奇。刘后来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和“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刘当时三十五岁，在中国人中算是个高个子，但是没有毛那么高。他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民家庭，家乡距离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约三十五英里。在发家致富方面，刘家让毛家落后了一代人。刘的父亲和叔叔成为中农时，毛的父亲已经是富农了。刘少奇的兄弟后来也成为富农，并象毛的父亲一样雇农民为他劳动。

刘少奇到长沙第一师范要比毛泽东稍晚一点，他随后来到了北京，并在那里认识了毛泽东。刘少奇本想到法国勤工俭学，但是钱不够，因此他于一九一九年去了莫斯科，并于一九二一年成为共产党员。他和毛泽东在一起组织了安源煤

矿工人大罢工，这使他们的关系密切起来。刘少奇精力充沛，纪律性很强，襟怀坦诚，有演说家的天赋，但是在个人生活中举止文静。他喜欢与自己的孩子玩耍，他教给孩子们的一个游戏是打扑克。^①

长征开始时，刘是红八军团的中央代表，在湘江惨败中幸免于难，后来又调到了五军团。现在，他开始与彭德怀共事。他参加了长征的全过程，后来被派到中国北方去作危险的地下工作。^②

刘少奇参加了遵义会议。他和彭德怀进行了长时间交谈。彭告诉刘少奇，他的士兵不怕强行军或夜行军，但是怕生病掉队。^③

红军又疾速向西进发。这时毛和周恩来、王稼祥一同自三月十一日起正式当选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从那时以后，红军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声东击西，迷惑敌人的战术。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摆脱敌人，向北转移。蒋介石已派周浑元的一个装备精良的军驻扎在遵义以南。国民党的各路将军接到命令：全力阻止共军过江。而且规定没有蒋介石的手谕，他们不得擅自行动。在蒋介石看来封锁长江，已是万无一失。除非毛能把这些军队从堡垒中引诱出来，否则它们对红军任何试图渡过长江的行动都构成致命的威胁。^④

实际上，毛泽东已放弃了从这里直接渡过长江的计划，不过他要使国民党人相信这仍然是他的意图。其实，这时他已决定向西移动到长江的上游——金沙江渡江。

刘伯承回忆这段情况时说，“红军掌握了主动权，它在晕

头转向的国民党军队之间快速穿插。有时，看来红军似乎正在向东行进，而实际上是在向西走。困惑不解的敌人以为我们在计划渡过长江向北渗透，而实际上我们准备转过身来再一次打击他们。”^{②①}一天，毛泽东在地图上划了一条线，他说：“我们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滇军引出云南。”只有这样，毛才可以渡过金沙江。

田野里，油菜开始泛黄，小麦一片葱绿，黑土地里高粱茁壮，水田里稻秧葱绿。在桑树成荫的大路上，红军在行军。他们时而走，时而跑。他们的目标是拿下茅台。柚子成熟的时节尚早，这种硕大而难看的果子看上去好象大个的畸形葡萄柚，籽粒极多；大田收割的季节尚未到，而田野中的罌粟已开出浅白、淡蓝、粉红的花朵。

尽管急行军使人精疲力尽，但部队的士气是高涨的。红军取得了大胜利，摆脱了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长征开始以来如乌云一般压在红军头上的沉闷情绪。在青杠坡的惨痛经历之后，毛泽东又充满了信心。他写下了长征中他的第一首词以祝贺娄山大捷：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②②}

部队顽强地行进着，穿过一座座村落，经过一家家榨糖小作坊。他们随手抓起些甘蔗秆，用牙齿咀嚼着，让粘粘的蔗汁滋润着干渴的喉咙。在温暖的阳光下，妇女们坐在屋前，

用大红土罐捣米。半赤裸的孩子们在尘土中戏耍。接近茅台时，红军看到了一些小酿酒坊，每家作坊里都有铜做的大蒸锅，鹅脖状的管道和发酵缸，一种无色透明的烈性酒就是在这样的作坊里酿造出来的。

茅台是一个又脏又乱的小村镇，大约有三千到四千居民，拥挤不堪地住在赤水河畔六十英尺高的陡岸上。街道狭窄泥泞，房屋是灰泥或泥和枝条混合结构的，有些是茅草顶，有些是红瓦顶。在小村上的上空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味。这就是茅台人做的生意——酿制一种近乎纯酒精的烈性酒，并将酒和鸦片运往四川。茅台是运输这两种货物的中心。它也是盐巴的大转运站。盐巴是马帮从四川驮来的。商人卸下货物后又装上酒和鸦片带回去。茅台的百姓是贫苦的，而酿酒厂老板和商人却是富有的。红军突然出现时，这些富人都已逃之夭夭了。^{②③}

今天，茅台酒主要由国营酒厂酿制生产，这些酒厂集中在沿河一英里多长的地段。赤水河与以往一样仍是一条浑浊、缓缓流动并令人望而生厌的小河。（在整个长征路线上，茅台酒厂是唯一不让我进去的地方。不要问我原因何在。）

据传说，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以至酒汇成河，流出作坊，淌入泥沟。也许，编造这个荒诞的故事是为了表明红军的清教主义。实际上，部队是禁止进入茅台酒作坊的。当然，还是有人进去了，而后果当然可想而知。（有三家雇用三四十人的大酒厂，还有许多小的家庭酿酒作坊。）据谣传，李德喝茅台酒过量，以至一个

星期不省人事。这仅仅是对这位从前的红军顾问种种恶意传说中一个典型例子罢了。^{②③}几乎每个人都品尝了茅台酒，并将没有喝完的酒装起来带走了。^{②④}

几乎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茅台。一军团第二师的精锐部队攻占茅台仅伤亡二十人。三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红军大模大样地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部队在一个渡河点日夜过河，似乎故意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立刻发现了这个情况，派出飞机骚扰红军部队。一枚炸弹在周恩来附近爆炸，击中了他办公室旁边的一所房子。人们竭力劝他隐蔽一下，他拒绝了。轰炸并不猛烈。有些飞机投下的是漆有白色弹药号码的大石块。当时国民党可能暂时缺少炸弹。^{②⑤}

看来这次的行动非常奇特。当然，毛泽东自有他的用意。红军刚一过河，毛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派出一个团向北跑步行军一百多英里抵达古蔺。古蔺是刚入四川境内的一个人口稀少的大县。该团又向镇龙山前进，沿途虚张声势以引人注意。他们忽东忽西，令人莫测。一些国民党报纸错误地报道说，贵阳已被红军攻陷。实际上，毛的目的是要使蒋介石以为红军正奔向长江某个渡口，尽可能促使蒋介石把部队向西调遣。当向长江挺进的那支红军部队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开时，毛泽东率领主力悄悄返回了赤水河。三月二十一日晚和三月二十二日拂晓，他命令部队从三个渡河点再渡赤水河。

毛泽东的战略奏效了。蒋介石在重庆密切注视着形势。现在，他认为红军行动反复无常，相当混乱，已是瓮中之鳖，正

在垂死挣扎，危在旦夕。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他的澳大利亚顾问W·H·端纳以及夫人宋美龄陪同，从重庆飞抵贵阳，在一幢宽敞的新楼房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楼前有一条小河，景色宜人。现在，这幢楼是贵州水电林业厅的办公楼。当年，蒋和随从人员住在二楼，除了他的贴身卫士以外，在楼梯口设了双岗。他还带来了十几位将军。

用蒋的话来说，此行任务就是收紧对已陷入绝望的红军的包围圈，将其消灭。他在这个地区部署了五十万到七十五万军队，各部队防区之间衔接紧密，以防红军从北面漏网渡过长江（蒋认为这是毛的意图），或向西进入四川或云南，或向南穿过贵州去广东和广西，或向东返回湖南、江西。蒋确信无疑，这一次他把毛泽东真正套住了。

实际上，蒋介石在贵阳并没有多少军队。第二十五军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在前线，贵阳警察局局长王天锡成了城里军阶最高的军官。蒋介石让他来汇报当地的情况，当面委任他为警备司令，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请他搬到司令部来住。王天锡当时年轻，容易受人影响，这一点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蒋介石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上当了。”没过几天，蒋介石对红军令人不解的行动开始感到担忧了。他的司令官薛岳因为三天没有搞到空中侦察情报，被他在电话里臭骂了一顿。他的一个贴身卫士告诉王天锡，蒋介石真发火的时候，会把电话听筒摔在地板上，捶胸顿足，破口大骂。

数天后，有情报说，红军正在穿过息烽和开阳县向东运动，显然企图渡过乌江进攻贵阳。三月三十日，红军又打了几场硬仗，突破了乌江。这时，贵阳城里也开始紧张起来了。

蒋介石把自己的军队分派到四五个方向去阻截红军，而贵阳城里却兵力空虚了。^{②③}

据有些人说，蒋的妻子宋美龄十分恐慌，开始向全国各地发报，要求派兵火速驰援贵阳。^{②④}蒋介石命令警备司令王天锡加强贵阳的防务。王天锡组织一营宪兵以及两连消防队员和警察，共四百人，花了二十四小时沿城墙修建了一道新的防御工事。蒋不相信这项工程会完成得如此之快。清晨，他和宋美龄、端纳出来视察。他们到达城墙时，顾祝同将军跑来报告，红军已到贵阳东北方向，离城只有七八英里了。（实际上，红军这时正在路过扎佐，离贵阳几乎有二十五英里。）

蒋介石已下了命令，尽管他不知道命令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却使毛泽东的高明计谋获得成功。这个国民党领袖电令云南的滇军司令孙渡将军率领三个精锐旅火速救援贵阳。他认为这样就足以抵御毛的任何进攻了。可是毛并没有进攻贵阳的任何意图，他却非常希望蒋介石相信这就是他的计划。蒋介石让孙渡驰援贵阳，实际上为毛的部队奔向金沙江让开了路。

当然，毛和蒋当时尚不清楚这一点，孙渡距离贵阳尚有一段路程，而毛的部队可在一、两小时内抵达贵阳城下。

“这儿离机场多远？”蒋介石焦急地问。警备司令王天锡开始估算距离。他还来不及答复，又来了一个报告：在机场附近已发现共产党便衣队。

“想乘飞机逃跑已为时太晚了。”蒋介石焦急地考虑着，默默地来回踱步，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对王天锡说：“给我找二十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

好。”王天锡飞跑出去张罗组织逃跑的车队。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他集合好车队便回来向蒋报告。他正报告时，又来了一个情报：红军正绕过贵阳，向东面二十五英里的龙里方向运动。

蒋介石沉默片刻，手拿红铅笔仔细地查看地图，然后他说：“我想他们正在返回湖南和江西。”正当他在讨论这个可能性时，滇军孙渡将军到了。他报告说，他的三个旅正在进城。蒋介石问孙渡对形势的看法。孙渡圆滑地回避了蒋的问题，说：“我相信您的看法。”

“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疲劳，”蒋抱歉地说，“可我还得让你帮个大忙，率领你的部队向龙里方向前进。”

蒋介石进一步向孙解释说，他已指示薛岳从遵义向东前进，去截击红军，他还打了电话让何键在湘西部署部队。

“你的官兵一定很累了，”蒋介石再次强调说，“我将赠送数千元以示犒劳。”

次日凌晨又出现了新的警报：城南面枪声大作。

另一位国民党将军陈诚对警备司令王天锡说：“我们这个敌人真是狡猾透顶。它突然改变方向向西，现在又向南运动。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王天锡后来若有所悟地总结道：“这是一次非常机动灵活的军事行动。红军牵住了蒋介石的鼻子。”²¹

第十六章

兵不厌诈——毛泽东计胜一筹

兵不厌诈。毛泽东的计谋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蒋介石及其将领们被搞得晕头转向。他搞不清红军的去向。在他们眼里，红军成了令人讨厌的海丝草，这儿有，那儿也有，到处都有。

事实上，红军的确是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它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令人难以捉摸。这种神出鬼没的行动，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甚至红军官兵自己也常常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干。队伍里已经有人开始抱怨毛方向不明，缺乏计划，全凭一时冲动行事。这种议论也许有些根据。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被搞糊涂了。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指挥确是天才。

要重新画出毛泽东反复穿越贵州的复杂路线是不容易的。当年蒋介石的指挥官弄不清，今天读者们要弄清也同样困难。

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毛给九军团下的命令了。正当九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过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它停止渡江，原地待命。他让九军团停在那里好几天，摆开了北进湖南的架势。

九军团军团长是罗炳辉，尽管他也摸不透这样做的用意所在，但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他原是福建一名有经验的游击队员，极能干，被提拔为第十二军（早因改编而不存在了）军长。现在他领导着九军团。毛泽东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对他评价很高。他后来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他的妻子随他一起参加了长征，是参加长征的唯一的缠足女子（自幼缠足）。用她这双伤残的（小）脚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路程。这比男人所面临的所有考验都更为严峻。此外，她还怀了孕，在长征途中生了个孩子。

九军团留了下来，与其它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络，既不知道以后要命令他们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与主力会合。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长的王首道回忆说，他的一位同志当时说，他们肯定会回到自己的总司令朱德的身边，不会孤零零地死去。他的话反映了人们确曾有过这种担心。九军团在乌江地区与黔军将领犹国才作战，打了几次胜仗。直到四月二十九日他们才奉命南渡北盘江西进。

毛泽东将他的主力第一和第三军团分开，派他们沿贵阳周围的大道和小路运动，直趋贵阳。一部分部队先是向东佯动，然后转向朝南，再折向西南。而蒋介石误以为红军向东运动是主要威胁，这也许是因为他断定红军将返回它在湖南和江西的老家。红军在贵阳附近又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先是迅速南移，然后朝西向云南方向急进。

蒋介石命令他手下最能干的司令官之一薛岳率部跟踪追击。他沿着红军的北翼几乎跑遍了贵州全境。当蒋介石确信红军不是在威胁贵阳时，他命令滇军也参与了追击。

贵州以雨雾闻名，然而初春过后，天气逐渐好了起来。只要是好天，蒋的飞机便来轰炸，红军往往无处藏身，连过夜的住处也很难找到。一军团某教导营政委陈士榘当时率部队从龙里地区南移，但找不到宿营的地方。差不多过了半夜，才找到一座破房子，里面早已挤满了红军战士，有的睡着了，有的在脱衣服，有的在烧水。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春夜，微风和煦，万籁俱寂，唯一的声响是报务员“嘀嘀哒哒”的按键声。在一个小棚子里，陈士榘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他们正在制定第二天——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的行动计划。他们要陈士榘继续前进，找个象样的地方让战士宿营。部队又走了好几里路才找到一些茅棚。陈士榘将部队安排在棚子里，战士们分享了两块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肥猪肉，在火上烤着吃。吃完后，一躺下就睡着了。这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钟，而他们从头天早晨六点钟起就一直在赶路。

早晨，全营官兵狼吞虎咽吃完了剩下的猪肉，便向大约十英里以外的定番（现为惠水）开去。定番位于贵阳以南二十英里。那天早晨春光明媚。部队沿河行进。吱吱作响的古老水车声与战士们的歌声交织在一起。辽阔的田野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麦子，来自河对岸的微风轻拂着微颤的柳叶。陈士榘感到心旷神怡。他几乎不能相信此时此刻人们正在几里之外的地方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和厮杀。

教导营在温暖的阳光下前进，把苦和累全抛在脑后。他们接近定番时赶走了当地的民团，在定番休息了一天，而其他部队却超过了他们朝西南方向前进了。

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红军仓皇逃窜，溃不成军。薛岳、

龙云一类的国民党将领报告说，共产党损失惨重，每天死伤在一千人以上。红军当时的兵力可能只剩下两万多人。如果每天损失一千，五月一日以前就该被消灭光了。可是红军并没有被消灭。

从国民党报纸的报导来看，蒋介石或他的司令部对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掌领导权这样的大事一无所知。实际上，材料还说明国民党根本不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曾经失势。对朱德也是一样。蒋介石自始至终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和朱毛的红军作战。不知朱毛的关系。共产党人对内部政治争吵是严守秘密的，有的至今仍秘而不宣。

英国路透社记者托马斯·周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的一条电讯中报道说，朱德在进攻贵阳时在猪头山战斗中丧生了；还说朱德的战友抬着他裹着红绸的遗体继续前进。该电讯又宣称，红军只剩下一万人。当美籍传记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几年后向朱德问及这篇报道时，朱德大笑起来。他说，尽管国民党常常报道说他死了，可是在长征途中连受伤都没有他的份。近五十年之后，朱德的遗孀康克清证实了他丈夫的话。她说：“他在整个戎马生涯中从未受过伤。我也一样。”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朱德从一家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他住在玉溪的第二个妻子陈玉贞和住在花溪的儿子的家被抄，他的妻子被抓走，逃跑了的儿子受到“通缉”。此后两人便都杳无音讯了。

据国民党的报纸报道，贵州军阀王家烈在贵阳以北又和共产党打上了。王家烈宣称红军试图向北突围，要与贺龙和

肖克会合，他将进行十次激战把他们全部歼灭。没有证据表明这是真的。相反，老红军们都说，甚至有些国民党报纸也这样报道，王家烈张皇失措，因为乡村和城镇的人民都成群结队起来反对他，而去欢迎红军。王家烈的部队是不战而溃。后来当了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也说王家烈对红军的到来“怕得要命”。

形势十分混乱。红军和国民党部队在贵阳西、南、东三个方向相互交错。然而在动乱之中，红军仍招募了数千新兵，补充由于战斗和疲劳造成的减员。

有一件事本来可以归功于王家烈。四月十九日，他报告说红军正在向云南方向前进。这是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第一份确切的战报，他反映的情况是正确的，但这已经救不了他了。贵州的危局一结束，蒋介石就把王家烈调往军校，另外安插了一个听话的新军阀。

北盘江流经贵州的西南角，自西北向南，流入滔滔的西江，在广州周围的三角洲上通过众多的出海口流入南海。有人把北盘江称为“小黄河”，这是相当夸张的。

毛的战术使国民党将领们晕头转向。但是他的行动指南却是最质朴的现实主义。红军根本不可能渡过长江，因为防守太森严了，各条通道都有国民党重兵把守。蒋介石可以迅速地沿长江宽阔的两岸把部队由一地调往另一地。

对毛泽东来说，北上的唯一可能就是渡过金沙江。但如何渡江，他的选择余地也十分有限。金沙江发源于喜马拉雅山，波涛汹涌，渡口很少。除非他能够在滇川两省交界的金

沙江大转弯处夺取一处渡口抢渡，否则就会被迫西进，走上通往西藏的危险道路。西藏到处是无法翻越的大山，缺乏粮食，居民稀少而又深怀敌意，根本不可能招募新兵，以弥补兵员的损失。

毛不得不冒极大的风险。他能否渡过金沙江取决于两个条件：迷惑敌人，再次让蒋介石摸不透他的意图；加速行动，争取顺利渡江的时间。

曾任一军团主力二师师长的二十岁的青年农民肖华写过一组关于长征的史诗。他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都很喜欢这组诗。（一九七六年一月，周因患癌症而即将去世时，曾要求播放肖华所作的这首谱了曲的长征组歌，但根据“四人帮”的命令，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周恩来特别赞赏其中一首，这首诗说，毛主席在贵州战役中“用兵真如神”。在国民党将领看来，往往也是如此。但李德不这样看。当时，李德已经离开林彪和一军团，重返中央纵队。他不同意说毛有什么计划或战略指导，坚持认为长征“越来越象一次撤退，并且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逃跑”。当时，部队疲惫不堪，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谈到有次夜行军，他走着走着便睡着了，直到跌进一条冰冷的小溪，从头到脚都湿透了才醒过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渡过北盘江是后来抢渡金沙江的一次排练。

先派了几支突击队去夺取渡口，其中有政委杨成武率领的四团。一九三三年，当福建青年农民杨成武加入该团时，这

个团就已经很出名了。它是由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的人和另外一些与毛泽东一道在井冈山上打过仗的人组建的。杨成武在所有激烈的战斗中——在反“围剿”，抢渡于都河，突破四道封锁线，湘江以及贵州大战和后来的所有战斗中，始终和这支部队在一起。他说，在整个长征途中他一直与这个团在一起，这对他写回忆录很有帮助。杨成武在长征中两次负伤，但离队的时间都不长。

四团对北盘江的进攻是从奇袭紫云这个集镇开始的。全团行军一百里，于凌晨四时抵达紫云，迅速赶跑了张皇失措的守敌。四团得到了意外的缴获。当地的裁缝说，他们为国民党缝制了二百套军装。可那些国民党士兵还未来得及将衣服取走就逃跑了。四团付钱买下了这些军装，后来发现利用这些军装很能戏弄当地国民党部队。紫云的群众挂起了红旗欢迎红军，大开店门，晚上还向四团赠送了两千块银元。

四团途经一片彝族居住的地区。那时彝族人极端仇恨汉人，可是四团却成功地说服这些彝族人让他们通过。红军向他们担保毫无恶意，绝不停留。彝族人竟然给红军拿来了食物，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四团到达了北盘江，在河边发现了大片的竹林，又砍了一些树，悄悄地搭起一座浮桥，于暮色中开始渡江。

十一团担任了彭德怀和杨尚昆政委率领的三军团的先头部队。团长张爱萍奉命夺取并确保北盘江一处渡口。需行军五六十英里才能到达北盘江。出发时气候反常，大雾弥漫，寒气逼人，但行军却很顺利，因为地方军都愿意与红军谈判，以

便在红军通过他们的地盘时平安无事。当地的民团头头同样也允许红军自由通过，并且赠送了大米和猪肉。因此，十一团一路顺风地抵达了江边，发现可以涉水过河。于是一营便沿江下行十五英里赶到白岑，在这里，为军团指挥部和五军团等重要单位抢占了一个大渡口。他们对当地守军说：“我们只想过河，别无他求。”当地守军同意不予干涉，还给了他们一些渡河的船只。^⑩

毛泽东在白岑渡河时说了些什么，没有文字记载，不过他的胸中一定涌起了对祖国往事的回顾，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吧。这时，他身在白岑，与诸葛亮安息的地方孔明冈相距不过一二英里。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传奇式的战略家和受人爱戴的大英雄。他生于公元一八一年，卒于二三年。《三国演义》一书使他英名永垂。这本书是毛少年时代的“圣经”，也是他进行长征的“兵书”。穿插迂回，避实就虚，安排巧妙的贵州战役和南下云南以打开北上之路的战略，完全可能是（也可能就是）从诸葛亮那里学来的。事实上，红军中许多将领都称毛为诸葛亮。在白岑，毛有没有花上一两个小时拜谒他所敬仰的大英雄的安息之地呢？没有文字记载说明他去过，可要使人们相信他没有去过也是不可能的。^⑪

国民党的飞机象一群围着红军打转的铁蚊子。红军每天都有伤亡。第三军团还未跨过省界进入云南，一群国民党的飞机就飞了过来。军团司令部设在沾益县白水镇外约五英里处一片平坦的开阔地上。唯一可以隐蔽的地方就是一小片树

丛。军团政委杨尚昆和翻译伍修权正策马前进。伍骑的是一匹大白马，其余人骑的都是棕色或黑色的马。在红土地的衬托下，白马显得十分突出。轰炸机群发现了它，扔下一串炸弹，杨尚昆的小腿被弹片炸伤。他每次见到伍，总要抱怨那匹马。虽然那匹马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了，但还不够解气。伍安然无恙，杨却不得不坐了好几天担架。然而那条路太糟糕了，快到金沙江时，他不得不下担架走了好长一段。三块弹片有一块直到一九八五年还在他腿里。^⑫

一支红军部队距离主要渡口以北的云南边界越来越近了，傍晚抵达云贵边界上的盘县羊场。贺子珍在赤水河渡口附近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养连。此刻队里的伤病员分散在绿色的山坡上，正在阳光下休息。许多伤病员都无法立即离开担架。

“快！”贺子珍喊道，“快把伤员隐蔽起来！”

大家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一架飞机就俯冲下来，扔下了一串小炸弹，并用机枪向人群扫射。好几个担架员被打死了。贺子珍看见一名受伤的干部正努力从担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娄山关受伤的团政委钟赤兵。当那架飞机返回来再次攻击时，贺子珍扑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弹的弹片使她十七处负伤，包括头部的一处重伤，她倒在血泊之中。她一连昏迷了好几天。醒来后，她告诉护士不要让毛知道她负了伤。她说：“他很忙，我不想让他操心。”她要求医生把她留在一个农民的茅棚里养伤。医生坚持不同意，而是用担架抬着她上路，有时走到难行之处就背着她走。^⑬

从此，贺子珍就和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她到了延安，体质虚弱。她在那儿生了个女儿，取名李敏，昵称娇娇。她因为毛与一个来自上海、名叫吴丽丽的漂亮女演员眉来眼去而与毛吵了架。吴丽丽的中文名字是吴匡柳。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曾担任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的翻译。她是在她与史沫特莱和海伦·斯诺合住的窑洞里认识毛的，因毛有时上那儿去。毛喜欢喝咖啡，用饼干蘸着咖啡吃，爱玩单人纸牌或在她们采访时听史沫特莱的手提式留声机。吴丽丽在延安剧团上演的剧目中担任过角色，包括高尔基的《母亲》。贺子珍曾责怪史沫特莱怂恿她的丈夫与别人调情。据斯诺夫人说，有一次她还威胁说要杀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当了真，与斯诺夫人易床而眠。后来，这场丑闻使吴丽丽被调离延安，史沫特莱也提前离去。^⑭

一九三七年，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想从那里去上海治病，可是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上海。她得到了毛的同意后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她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据刘英回忆，当时，贺心情很愉快。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路都很高兴。刘英是随行者之一。同行的还有毛以前在长沙的老师、年长的徐特立，党内历史学家、失去了双腿的徐梦秋，以及在长征途中被贺子珍救过命的指挥员钟赤兵和独臂将军蔡树藩。^⑮

毛泽东是同意此行的。他觉得贺子珍怀孕生孩子占去的时间太多，从来没有真正的学习机会。她在莫斯科也许既能得到治疗，又能学习。但事与愿违。她的小男孩在托儿所得肺炎死了，那里没有青霉素。从此她精神深受刺激，在莫斯

科长期待了下来。毛把他们的女儿娇娇送去陪她。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与毛通过娇娇通了几封信。她给他送了些礼物——他喜欢吃的新鲜雪里红，一只冬笋和几个瓜。毛给她送了些中国水果。

直到一九四八年贺子珍才回到中国。这时毛早已与她离婚（得到了党的批准），并和江青结了婚。江对贺十分冷漠。西方的一些猜测是不对的，江青到延安与贺子珍去莫斯科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用小刘英的话来说，“毛身边无人，江青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贺子珍想回北京，可是江青设法让她最近只能到天津。一九五〇年，贺子珍和毛在上海见了一面，后来在庐山又见了一次。她的身体在一段时间里还不错，但恢复得不很稳定，有时会产生幻觉和偏执的恐惧感。在上海的时候，她住在一所普通公寓的一个小间里。老司令员陈毅当时是上海市市长，听说她在那儿，便出面帮她的忙。一九六〇年陈离开上海时，将她迁入了他原先居住的二层小楼，但是她的生活依然与世隔绝。江青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她。江青甚至一度使娇娇疏远了自己的母亲。老战友照例是不允许去看望她的。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要求去北京。但直到江青“四人帮”一伙被捕以后，她才获准透过毛的玻璃棺瞻仰了遗容。（北京有未经证实的谣传说贺子珍曾在调查江青时作过证）一些与贺子珍一起经历了长征的妇女到她住的军队医院来看望她。她坐在轮椅上接待了她们，热泪盈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九七九年六月，她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她的名字第一次在报上出现。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贺子珍在上海去世。公布死因为中风。实际上，多少年来，她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当然，早在长征时她就负伤了，现在去世，就如同一九三五年那颗炸弹在贵州把她当场炸死一样。她的死，使她成为随一方面军完成长征的三十位年轻女性中的第十五名死者。

刘英说：“她是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在长征中曾照料过她的毛的警卫员吴吉清说：“她是个勇敢刚毅的女同志。”

第十七章

金沙江畔

云南府，现名昆明，是个宁静的城市。

在这座省城小小的法国区内，离火车站不远的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有一座小楼，那是法国体育俱乐部的所在地。楼前有两个水泥地网球场，来打球的人可以坐在舒适的走廊里，喝一杯佩诺德酒或加苏打的威士忌，等着轮到自己上场。

法国体育俱乐部是当地外国人活动的中心。里面没有酒吧，但是有一位中国服务员，他认识每一个人，不用吩咐，就会端来黑醋栗酒或调好的社松子酒。这里没有烈性威士忌，只有苏格兰威士忌。可以要葡萄酒，但要葡萄酒的人不多。

外国人一般下午到法国体育俱乐部来，打网球，玩桥牌，打麻将，同时喝点酒，交换一下当天的马路新闻。他们当中的常客你一扳指头就能算出来：法国总领事和他的两位副领事，英国和美国领事以及他们的助手，中国海关署的美国署长，负责邮政的法国人和负责食盐专利的法国人。一九三五年新来了一位日本领事，但他既不懂法文，也不懂英文，所以很少露面。

在这个偏僻的中国西南角还住着一些其他外国人。其中有基督教男青年会的罗杰·阿诺德；脾气古怪的美国博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博士；几个法国商人；四个希腊旅馆老板；几

个美国传教士，其中多数人属于规模较小的教会。有一个传教士家庭有十二口人，不得不依靠乞讨为生。

三十年代初，昆明有十万人口。整个城市带有淡淡的法国色彩。在一九〇〇至一九一〇年期间修成的窄轨铁路把昆明同北越的河内（当时称东京）和海防连接了起来。市中心有几条林荫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树（中国人至今仍然把它们叫做法国梧桐）。火车站周围是法国“区”，有几家希腊人经营的小旅馆，还有几个从河内或西贡来的法国商人或法国——希腊商人开的铺子。当时云南被称为法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晚，年轻的英国副领事赛伊·卡尼正同年轻的美国同行约翰·谢伟思及其夫人卡罗琳共进晚餐。两周来，他们不断听到有关共产党的传闻。红军在邻省贵州十分活跃。从贵阳来的旅客带来了打仗的消息。这几天，外国传教士也因害怕“赤匪”迫近，纷纷离开贵州，派来昆明。

传说要外国人撤出昆明。卡罗琳·谢伟思已经把贵重物件装入一个箱子，其中有从蒙哥马利·沃德商场买来的婴儿衣服（她的第一个孩子将在七月份出生），结婚时买的银器和谢伟思的金表。因为近来流传减少了一点，所以她装箱还没有完毕。但是四月二十九日那天晚上，卡尼副领事去谢伟思家时一路上颇费周折，所有的人力车都被当地军队征用去运输沙袋和弹药。一路上巡逻的士兵多次拦住他，要他别在街上行走。士兵在主要街道和南郊高级住宅区的一个外国人称之为匹克迪利广场的地方用沙袋等筑起街垒。卡尼决定在谢

伟思家过夜，免得回家还要穿过这些路障。

深夜二时，有人砰砰地敲谢伟思家院子的门。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派人送来一张便条，报警说城东八英里一个叫大板桥的地方发现三千名共军，后面不远还有七千名共军。法国人准备了一列专车，准备把外国妇女和儿童疏散到东京（河内）。火车定于早晨七时四十四分离开车站。

于是，谢伟思和卡尼天没亮就在昆明市里奔走，把消息告诉那些传教士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外国人。一清早，卡罗琳·谢伟思带着她的那只箱子（从此她再也见不到谢伟思那块金表了）和装在籐篮里的两只暹罗猫上了火车。她决心设法把这两只猫送到上海她婆婆那儿去。火车上挤满了人。同车的还有一位孕妇。昆明市所有的外国妇女和儿童都上了车。洛克博士也在车上，他考虑到由于他身体虚弱，他的书籍和文物又是无价之宝，所以决定这次拿着所能带走的东西一起离开昆明。火车在滂沱大雨中扑哧扑哧地向北越的东京开去。

昆明对“赤匪”的恐惧不亚于贵阳，所不同的是昆明的防卫能力更为虚弱。市内只有五百名当地的民团。如果共产党想拿下昆明，他们完全可以不战而胜。

但是共产党并不想占领昆明。他们只想使蒋介石和云南军阀龙云调回更多的军队保卫昆明，如同蒋介石以前抽调滇军去保卫贵阳那样。毛泽东对蒋介石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则象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蒋介石果然从金沙江附近撤回三个团到昆明，一下子使金沙江变成了几乎是不设防的地带。

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文章里都说蒋介石本人匆匆跑到昆明去了，事实并非如此。他留在贵阳，召集了一次高级军官特别会议，然后才离开贵阳。与许多人的报道相反，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并没有在昆明吓得半死，也没有沿着法国铁路仓皇逃往河内。蒋介石离开贵阳后，去的是成都。

毛为渡过金沙江向北突围，极为小心地做了一切准备。红军大体分三路从贵州向云南挺进，部分原因是蒋介石手下最得力的一员大将薛岳率领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部队在黔西摆下了阻截的阵势。

红军主力，即中央直属队，第一、三、五军团，穿过从南面的南盘江到北面的盘县附近共一百二十英里宽的地带进入云南。

进入云南后，毛运筹帷幄，巧妙地调动部队迷惑国民党，尤其是云南军阀龙云。龙云在昆明胆战心惊地注视着红军的行动。他已经把精锐部队派到贵州去了。无法迅速调回保卫昆明。他急不可待地召来了民团，尽管这些民团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红军的对手。

毛把第一、三军团调入云南，从东面直逼昆明，然后又让他们迅速向北穿插。当红军总部向昆明以东六十英里的马龙前进时，空中出现了一中队国民党飞机。这些飞机没有扔炸弹，在东边消失了。红军指挥官开始感到困惑不解，后来才明白，原来国民党没有料到红军正深入云南腹地。不久，周恩来及其警卫看到从昆明方向开来三辆卡车，扬起一片尘土。他们一直开到红军队伍面前。直到周恩来命令部队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才惊慌失措，停了下来。车队是云南军阀龙云

派往国民党将军薛岳驻地去的。应薛岳的要求，车队给他送去云南地形图。龙云本来想派飞机送，但是驾驶员正好病了，于是他改用卡车送。车里还装了食品——云腿，同美国的史密斯费尔德火腿差不多，被视为中国最好的火腿，此外还有医药用品，都是给薛将军的礼物。现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毛充分利用了这些地形图，制订了抢渡金沙江的详细计划。正如他的同事所指出的那样，这与毛所爱读的《三国演义》一书的某些战争情节十分相似。英雄人物刘备就是在云南王张松献给他的地图的帮助下才征服云南的。（原文如此——译注）

扼守乌江北岸的第九军团接到新的命令：开到云南的咽喉要道附近坚守阵地，不让国民党军队接近金沙江渡口。同进入云南的大多数红军部队一样，第九军团遇到的困难少得惊人，因为当地人民对他们很热情。九军团先后攻占了好几个县城，先是宣威，然后是昆明以北一〇五英里左右的东川（当年称云泽）。东川离金沙江二十英里。这里的民团同别处的民团一样不愿同红军打仗，但是县长杨茂章坚持要保卫县城。居民纷纷起来反对，他们欢迎红军。他们把杨县长和当地的一个“恶霸”拉到有一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判处他们死刑，就地枪决。红军把云腿、小麦、大米分给贫苦群众。红军从地主手中缴获了六万银元，还吸收了几百人入伍。第九军团缴获的银元太多，只能蹒跚前进，用很多骡子来驮银元。在同第一军团重新会合后，他们同一军团分享了这笔财富，用来买煤油、电筒、电池、棉布和新的武器。云

南省博物馆的徐继涛对我说：“红军这下可发大财了。”

一、三军团的主力向北挺进，而五军团同往常一样担任后卫。毛派了精锐的干部团赶在前面抢占了金沙江往南拐入云南的第一个渡口。

关键任务落到林彪的肩上，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雄鹰。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车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

毛交给他的任务是对他的能力的最大考验。这一任务是使龙云、薛岳、蒋介石相信红军的目标是攻克昆明。林彪必须率领部队尽量逼近昆明，仿佛真的要拿下昆明。调给林彪的是整整一个师的第一流部队共六个团，据估计近一万人。

林彪从贵州的新义进入云南，稍稍南进后，即从东南方向插向昆明，四月二十九日到达昆明以东八英里处的大板桥。在早晨明亮的阳光下，林彪部队的侦察兵从山上可以看到昆明。昆明城内一片惊慌，外国人的女眷仓促逃往北越的东京。林彪在大板桥一带停住脚，以使昆明更加惊恐，同时也让急行军后的部队稍事休息。与此同时，毛的精锐部队干部团已于同一天到达金沙江边，他们派一个特遣组到江对岸寻找适合的登陆点。就在四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毛完成了渡江计划的部署。第一军团在最南的渡口龙街渡江；第三军团在东北方下游三十至四十英里处的洪门渡江；然后干部团在皎平渡渡江，他们已在渡口附近进行侦察。五月三日，干部团拿下

了皎平渡。同一天，林彪收到毛发来的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停止对昆明的佯攻，尽快回师金沙江。并说，如果五月七日前还到达不了，最高指挥部便无法保证仍能守住渡口。^⑪

林彪的部队按照命令，以空前的速度行军，同时仍装着要进攻昆明。他们先绕到城北，然后向西，占领了昆明西北二十英里的富民。昆明城内的惊慌情绪依然有增无减。龙云不断调部队增援昆明。国民党嫡系部队也向南直奔昆明，而不是向西朝金沙江前进。^⑫

当时没有公路，没有今天这种两旁种着桉树（最初是英国人从澳大利亚引进的）的柏油路。山坡上的桉树还没有成林。当战士们翻山进入云贵高原时，看到满山遍野全是异常红艳的罂粟花，如今这里到了春季则是小麦一片金黄。做鸦片用的罂粟是云南的财源，红军没收了大量鸦片。在农村，鸦片同粮食一样重要。红军把鸦片当钱花，用它换给养，或者干脆分给农民，心想反正这也是农民流血流汗种出来的。解放初期，人民共和国继续遇到了这个可怕的鸦片问题。于是禁止种罂粟，还尽一切努力医治吸鸦片者。虽然进行了说服、教育、治疗和惩罚，但还是不能在一夜之间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残部造成的土匪问题也不能一下子解决，他们躲在深山里，靠做鸦片生意为生，一直呆到五十年代初。^⑬

林彪把追兵远远地甩在后面，向北前进，五月三日晚到达元谋，金沙江已近在咫尺。他的部队从大板桥出发后四十八小时内走了一百英里。林彪的部队行军速度极快，不少战士跟不上大部队的行动，结果落在后头，其中许多人被国民党抓获就地枪毙。^⑭

金沙江附近一带道路十分崎岖，甚至到现在离金沙江大转弯处二十英里之内还没有一条南来的道路。如果长征老干部或历史学家想重访这一昔日的战场的话，他们也只能步行或骑骡子。

第二天，林彪继续前进，抵达指定渡江地点龙街。他在那里遇到了困难：没有船，江面很宽，水流湍急。他用竹筏搭了一座浮桥，很快就被江水冲走。五月六日，毛命令林彪率部队到皎平渡，这样他就要沿江翻山越岭行军五十至六十英里，而五月七日渡江的最后期限并没有改变。^①

皎平渡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渡口，满载食盐、白银、皮革或粮食的车队，从四川进入滇北都要从皎平渡过江；由于进出西藏的孔道就在附近，从西藏运出来的草药、藏药、金银丝细工饰品也从这里摆渡。从云南运出来的则是鸦片、黄金（产自金沙江沿岸的金砂矿，金沙江自古以来就因出产沙金和块金而闻名）、贵重的金银丝绣品以及其他特产。

金沙江北岸（或西岸，因为江水在这里大转弯，方向都给弄乱了）有一个骡马大店。四月底或五月初时，约有三十名商贩带着驮马和骡子在这里歇脚。他们的货物已运到江边，等云南那边的车队渡过江来，同他们做买卖。

这家骡马大店是洪门场村张姓四弟兄中的老大开的。他的弟弟张朝满一九八四年时已七十一岁，身体依然健壮，行动矫捷，肌肉发达，只是有点谢顶。他坐在位于四川一侧能够俯视金沙江的一家接待站的阳台上，同我谈起五十年前的经历。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九三五年春天发生的事：

有一天，几个人找到他，这些人原来是干部团的宣传队

员，正在找渡船。其中一个人对他说：“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是来消灭地主劣绅的，现在想找船准备渡江。十年后我们还要回来把地分给你们。”

张说，红军找不到船，因为船全被藏起来了。他们一再表示需要船只和艄公。张去找他的哥哥，他哥哥也说无法搞到船。宣传队员自己在江边找到一条一半沉在水里的船，他们从商贩那里买了布，想堵住船上的洞，与此同时又发现江对岸有几条船。他们拼拼凑凑，最后总算一共搞到了五条船，两条在四川一侧，三条在云南一侧。艄公尹梦之很有本事，同意送九个红军战士到对岸搞偷袭。他们带着盒子枪和电筒，用灯光吓跑了当地的驻军。

他们接着又来回渡了几次，把一些红军战士送到对岸去偷袭当地一个税务所。他们“砰砰”地敲税务所的门，让艄公用四川话叫门，说是他们要来缴税，“不开门我们就不付税了。”转瞬之间就有人开了门，红军一下冲了进去。屋里正有几个人在打麻将，抽鸦片，这些人很快交了枪。红军战士把搜到的五千银元的税金带走充入“抗日储备基金”。他们抓了大约六十人，其中一半是国民党当地部队的士兵。第二天，他们又发现两条船。先后一共找到了七条船和三十六位艄公。

刚搜查完税务所，红军部队就开始渡江，一共渡了七天七夜。艄公每天领一块银元的工钱和一块银元的奖金。如果愿意要鸦片，一天可以领五两。大一点的船一次可运六十人，而最小的船只能运二十人。渡一次要三分钟时间。每条船都编了号，还指派了船长。

渡口两岸都是峭壁，云南一侧到渡口的路又长又窄，要

在峭壁上爬行二三英里，才能走到很窄的沙滩上。离金沙江边五十英尺处有一块十英尺高的圆石（现在还在那里）。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他的助手叶剑英担任渡江指挥部政委。^⑬

敌人的侦察机两次飞过，但是江面太窄，无法轰炸。马匹不敢上船，只好让驭手牵着，随船游过江。夜间燃起大堆大堆的篝火，使渡江能昼夜不停地进行。他们为妇女和伤员安排了专门的渡船。整个行动没有损失一个人。渡江自始至终顺利地进行。

五月四日黎明前，毛泽东、周恩来和司令部其他人员摸黑渡过了江。那天他们骑马走了整整六十英里。四川一侧的金沙江岸没有云南那样的金色沙滩。船到了对岸缓缓地靠近石滩，狭窄的石滩很陡，坡高约有二十英尺。有一条羊肠小道从江岸通向另一处更高的石坡。几乎找不到驻扎部队和存放给养的地方。坡面上有几代船工打出来的十一个砂石洞。总部就设在这些洞里。毛、周各占了一个石洞，其他指挥员、电台报务员、警卫人员以及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也都分住在砂石洞里。

在这里，毛婉转地批评了警卫员陈昌奉，因为他没有抓紧去找一块能当桌子用的木板。警卫员为毛在地上铺了一块油布，上面再铺上一条毯子，这便是毛的床了。砂石墙上钉不进钉子，所以警卫员无法把毛的地图挂到墙上。

一九八四年时这些砂石洞还在，五十年来没有多少变化。洞很小，里面黑暗、阴森，洞外是条从峭壁上开出来的小路。住在洞里可以躲避空袭，但是我想司令部人员会觉得在峭壁

顶上搭个帐篷住进去更舒服一些。现在那里盖了一座招待所。^⑮

天气十分闷热，干部团向北急行军到金沙江的途中吃尽了炎热天气的苦头。我曾在天气炎热的五月去过那里，深知在那种气候下翻山越岭走山路的滋味。红军的行军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国民党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总是比红军的实际行踪晚五至七天。例如，五月五日天津的《大公报》还在说，红军的目标“看来是四川”。此刻，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已有六天时间，再过三天，整个行动计划就完成了。

第三军团在皎平渡下游的洪门（现名新村）渡口遇到了困难。他们在江上搭了一座浮桥，派了先头部队十三团过江，但是江水冲走了浮桥。周恩来命令他们转移到龙街第一军团那里的渡口去，可是很快就取消了这一决定，因为第一军团发现那边也没法过江。

于是，第一、三军团的主力都转到皎平渡过江。五月七日，第三军团渡江完毕；五月八日，第一军团渡江完毕。后卫部队第五军团约有三至五千人，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在皎平渡以南的禄劝县阻击着吴奇伟率领的一个近一万人的国民党师。直至五月八日和九日才渡江。^⑯

第九军团仍在为主力部队阻击敌人，到五月六日才抵达位于皎平渡以北下游三十五英里左右的树节渡，并于五月九日渡过金沙江，不久，在西昌以北的泸沽同主力部队会合。

五月三日，干部团渡江后几小时内就把从皎平渡上岸的道路打通了。他们只睡了两三个小时就奉命出发，攀登离上

岸处不远的山坡，坡高足有三百英尺，有一条曲折的小路直达坡顶。坡上是一块长长的冲积平原，有好几个橄榄球场那样宽，地上到处是玄武岩和花岗岩，有的有一人高，有的只有篮球或垒球那么大。左边是险峻的石山，右边是通向较平渡的悬崖。许多人都记得这么一句民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悬崖边的小路窄到两个人都难以并肩前进。

就是壮实小伙子也很难在这种山路上连续行军。红军在烈日下艰难地走了四英里，爬上一条陡峭的山路来到另一片高地。这里一半是石头，一半长着青草，抬头往西望去，怪石嶙峋的“狮子山”就在眼前，“狮子头”拔地而起，高一千英尺，俯视整个高地。山岩上，国民党军队早就筑好了阵地，以逸待劳，正等着向干部团开火。干部团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昨天一天走了六十英里，接着又渡江和在冲积平原的卵石地上行军，已经累得半死。险峻的“狮子山”看来真是“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

红军战士开始冲锋，敌人从山顶上滚下来的沉重的石块向战士们飞来，有的战士腿被砸断，有的战士头被打中，失去知觉。国民党的机关炮打到岩石上，火花四射，碎石飞溅。

红军隐蔽在大石块后面一点一点地向前进攻，有些人利用地形，躲进沟壑掩护自己。然后一步一步地逼近敌人。突然，冲锋号吹响了，他们高声喊着“杀！杀！杀！”，向敌人冲去。国民党的一营人是地方部队，他们慌忙撤离山头，向通安逃窜。

先头部队继续追击。山路越来越陡，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七百英尺高的悬崖。山路迂回曲折，盘旋上升。他们爬呀，

爬呀，爬得肌肉酸痛，两腿发软。烈日当空，照得左侧的山岩如火炙人。战士们汗都流干了，一些人脱水了。尽管如此，他们又咬牙前进了七至八英里，接着是一段弯弯曲曲的下山路，路陡得好比瀑布，飞流直下，山谷中的小镇就是通安。守敌业已逃走，红军先头部队在镇上等候，但是既见不到后续部队，又见不到增援部队，他们只好拖着疲乏的身子返回狮子山，筑起一道防线待命。^⑪对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来说，这只不过是戎马生活中的又一天，而对五十年后步行追索他们足迹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奇迹。

毛泽东在皎平渡等到五月八日第一军团全部渡过了江，然后他同中央总部纵队一起翻山越岭到了通安。前方，红军已经在进攻这个地区的中心会理县城了。

总参谋长刘伯承站在大圆石上，一直坚持到最后。他指挥部队架起机关枪，保护后卫部队不受迅速赶来的敌人的最后袭击。同时，他们把大船全都带到红军这边的江岸，然后，割断绳索让船随波而下，很快就在湍急的江水中碰上岩石撞得粉碎，被金沙江的激流冲走了。坚持摆渡到底的艄公每人得到三十块银元。红军没有赔偿船主的损失。只有一条船是艄公自己的，他获得了八十块银元的赔偿。

红军一走，许多艄公就被国民党抓了起来，惨遭迫害。张家老大被捕，挨了毒打，还罚款二百八十元。包括张朝满在内的其他三兄弟都跑了，没有被国民党抓住。^⑫

红军全部安全渡江并将所有船只破坏之后，刘伯承骑上马，迅速登上山路，准备迎接下一个战斗。^⑬

红军过了金沙江，等于在追兵面前关上了大门。虽然毛

泽东尚未完全摆脱蒋介石的追赶，但他已到了长江以北。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以来，红军的行动第一次如此成功，第一次赢得了主动。他们辗转作战已有七个月之久，伤亡很大，现在只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毛的战略成功了，横渡金沙江将成为红军历史上史诗般的壮举。

还有一个因素不应该忽略：红军在云南各地均得到群众的支持，地方部队又不肯卖力作战，地方官吏对红军常抱同情态度。在矛盾面前，军阀龙云在走钢丝。他没有帮助红军，但也没有让滇军同红军作战时过分消耗。在他看来，贵州王家烈的遭遇是前车之鉴。王家烈被红军打得一败涂地，损失惨重，威信扫地。蒋介石曾向他提出，他可以在黔军司令和贵州省省长两个职务中选一个，但不能兼任。王家烈选择当司令。蒋介石接着便唆使王的部下要求增加军饷。事情闹得不可收拾，蒋介石趁机解除了他的职务，调他去军事学院，另外委任了一名傀儡取而代之。龙云不想让这种事落到自己头上。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龙云收到香港一些有影响人士的代表打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说：“我同湘黔人士晤谈后得出印象，他们只希望红军早早离开这一地区，而红军是想借道云南进入四川，因此最好让他们过去，不要动武。”龙云批注：“此文符合西南的利益。”

龙云未以全力对付红军，可能与这封电报有关。^{②①}

穿越粤、桂两省的边远地区时也有类似情况。中国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他们对蒋介石的疑虑以及保住自己地盘的想法，使共产党在关键的战役中得到了无形的优势。

第十八章

歃血结盟

古城会理建于十五世纪的明朝，它坐落在皎平渡西北大约三十五英里的地方。毛和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马上挥师攻打会理。红军在渡江还未结束时，就派部队把会理围了起来，但是城市还未落入共产党手中。

毛希望能在这一带使红军得以休息几天，并在向北进入彝族聚居的山区之前补充给养。

当时有不少政治问题有待解决。从遵义会议作出决定让毛来领导，已经过去四个月了。而红军还在继续减员，只剩下两万多人了。在彝族地区以及山那边的藏族地区补充兵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时，毛已把红军安全地带到了长江上游的北岸，他再次挫败了蒋介石，然而前面等待着毛和红军的是过不完的河和爬不完的山。

毛的对手蒋介石又怎样呢？早先，他原以为共产党已被他封锁在江西苏区，但是红军突破了封锁；他以为能在湘江一带歼灭红军，但是红军却打过了江；他以为红军已落入他在黔西设下的圈套，但毛却又从中脱了身；最后，蒋自以为能在毛到达金沙江前抓住他，结果又没有成功。

这场战斗看上去有点象沃尔特·迪斯尼早年拍的一部动画片。影片中，米老鼠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大笨猫的爪子。

用现在的话来说，毛似乎一直是个赢家。他一切如愿以偿。但他的同事并不都这么看，特别是林彪不这么看。自从毛重返领导岗位以来，林彪一直干得很出色。他几乎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攻克了遵义。他虽未能在黔西北突围打过长江，但这对任何指挥官来说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他出击昆明的大胆行动，他回师金沙江时的神奇速度，无不显示出他的才能。

但是林彪内心对毛的指挥十分不满。几个星期前，他曾抱怨说，毛变化无常的运动战术把部队搞得精疲力尽。现在拿出来的一些证据表明：在毛指挥部队迂回前进的过程中，林彪多次对毛的命令感到不快（尽管他总是执行这些命令）。“文革”期间，林彪迫害了不少老红军，他们提供上述情况时可能言过其实，但由于林彪玩弄的阴谋，使他们当中确有不少战友死于非命，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长期坐牢，甚至还受过刑。

毛泽东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让红军在会理喘口气，以便组织政治讨论和进行整编，并补充人员、物资，但是他的希望破灭了。会理几乎是座中世纪的古城，三百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结实。红军本想出其不意地攻下会理，但未能成功。被国民党第二十四师某部一千人挡住了。国民党兵紧闭城门，守在城墙上，击退了彭德怀的第十、十一和十二团。第一次进攻时，十一团攻进了东城门，十二团攻进了西城门，但都未能攻破第二道城墙。

两道城墙之间的空地上挤满了房子和草棚。城防部队把居民撤走，放火烧着了这些建筑，大火迫使红军撤回第一道城墙。国民党下令让居民用大锅熬稀粥，然后把滚烫的稀粥

浇到竹梯上正在往上爬的红军战士头上。三军团许多战士被严重烫伤，掉下梯子。第二次进攻也于五月十日被击退了。

红军接着采用了过去从未用过的办法。他们在东、西城楼下挖了地道，进行爆破。会理居民对此十分害怕。但红军仍未能突破敌人的防线。

五月十二日晚，毛泽东在城外的一家铁匠铺里召开了会理会议。

这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十八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杨尚昆、何克全（即在遵义反对毛的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洛甫、彭德怀、李卓然、董振堂、邓小平和邓发。

李德说他在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接到邀请。他没有翻译，全靠博古一边听一边简单作些介绍。据李德说军人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别人都不记得有李德在场。而那几位军人却能详细介绍他们和其他人在会上的发言。李德的回忆很可能是错的，他经常出错，因为没有当时的笔记，而且是事隔三十年之后凭记忆写的。

会议集中讨论了林彪的意见。这位二十七岁的指挥官起草了一封信交给毛泽东，要求毛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三十七岁的彭德怀。彭是三军团的老领导，是个土生土长性格倔强的红军指挥官。他看上去有点象倔强的牛。他为人粗豪，长得膀阔腰圆，这是他自小从事劳动的结果。用彭的亲密战友和同志杨尚昆将军的话说，“彭的脸象雕塑，两眼又黑又亮，充满了力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中国农民在生活中忍受的所有艰难困苦，彭德怀都经历

过。他的祖母七十岁了，还要在过年时拖着一双小脚带彭的三个弟弟一步一扭地在湖南乌石坪沿街乞讨。彭最小的弟弟不久就饿死了。彭只讨过一次饭，后来再也不干了。他宁肯上山光着脚在雪地里砍柴，也不低头向人乞求。他放过牛，每天挣五文钱，后来在煤窑拉过“孔明车”，每天工资三十文。后来这家煤矿亏本倒闭了，欠下彭一年的工钱。

彭的一位伯祖父，参加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他在彭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常同彭讲太平军的故事，什么有饭大家吃啦，女人放脚啦，平分田土啦等等。

“这使我产生了打富济贫的思想。”这是彭德怀在“文革”中为那些拷打他并最终把他折磨死的人所写的自传提纲中的一句话。

一九一六年前，彭一直在湖南洞庭湖做堤工，后来加入一支军阀部队，月饥五块半银元。此后，他的军事生涯从未中断过。他毕业于湖南讲武堂，一九二八年参加红军，后来在朝鲜指挥过中国军队抗击美国人。

彭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彭写文章措词明白有力，篇幅往往很长，言词诚恳而激烈，使人一听就了解他的观点。他的部下常说，“他和革命结了婚”。面对那些折磨他的人，他捶着桌子，厉声斥责他们，响声震动了牢房的墙壁。“我什么都不怕，”他大声吼道，“你们可以枪毙我。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林彪看上去不象彭德怀那样直率和精力充沛。他比彭年轻十岁，长得十分瘦小。他的脸是椭圆形的，肤色浅黑，显得很清秀。彭经常和部下交谈，而林却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

对许多人来说，林似乎生性腼腆和含蓄。找不到说他对部下热情和爱护的故事。他在红军指挥官中的同事都尊敬他，但他一开口就是谈正经事。

长征期间在林彪司令部的警卫连里任排长、一九四八年担任师长的吴兴说：“林会打仗，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又说：“林对那些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很好。”吴也承认，林彪这个人健谈，吴回忆说：“林喜欢单独行动。”

红军到了延安后，每逢星期六，就在枣园院子里举行跳舞晚会。毛泽东和朱德常拥着舞伴跳起华尔兹，他俩不停地带着一个又一个兴奋的年青舞伴转圈，彭德怀也是一样。周恩来舞姿优雅。但是，林彪却从不上场，尽管有许多从上海、北京跑来延安投奔革命队伍的年轻女子劝他跳。他最终还是和一位外来的美人结了婚。^⑩

林彪是毛泽东的宠儿。林在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的宠儿。那是在蒋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对共产党翻脸之前。林彪的父亲在湖北开厂，因无力纳税而破了产。林彪这个工厂主的儿子竟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连在一起，他投奔周恩来后，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南昌起义”。一九三二年林才二十四岁，但已成为第一军团的军团长。召开会理会议时林才二十七岁，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任何人。不过，据说他只在有十分把握时才出战。

毛手下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虽然秉性各异，但在长征中他们配合得很好。林彪善于声东击西和隐蔽自己，善于奇袭和伏击，善于从侧翼和敌后发起进攻和使用计谋。而彭德

怀总是从正面进攻敌人，他打仗极为勇猛，对手一次又一次被消灭。彭认为打一场战斗，必须使得失相抵，或得大于失，要多缴获枪炮，多抓俘虏，并更多地把战俘转化为红军，这样才能算打好了仗。

红军到了会理后，官兵们已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大家不断地问：到底要到哪里去？有什么计划？红军中江西人和湖南人很多，现在到了四川的边远山区，他们觉得周围的一切都很陌生，茫然不知所措。他们不会讲四川话，他们担心再也找不到回江西或湖南老家的路了。

李德是一个不十分可信的见证人，据他说当时问题十分严重，而且由来已久。他认为，遵义会议后不久，人们便开始对毛的领导感到不满。娄山关一仗的胜利起了缓和作用，但不满情绪并没有消失。他声称，洛甫和林彪曾指责毛“在敌人面前逃跑”，是“军事破产”。还说彭德怀和杨尚昆将军也“基本同意”这种指责。没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情况有这么严重。看来可以肯定，由于李德与毛不和，他夸大其词了。李声称洛甫曾向他暗示，希望组成一个新的三人领导班子——林彪、彭德怀和刘伯承。李德说博古所害怕的是红军会被挤到西藏或缅甸一带去。

一天，李德意外地发现，毛要找他谈谈。毛承认局势严重，但确信最终会渡过金沙江。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带领红军取道西康和青海前往新疆，向苏联请求援助。^①

毛挽救了红军，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他们未能同贺龙和肖克会合，未能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还

在转移中，离开遵义以后，就失去了同他们的通讯联系。下一步怎么办？人们在议论。

使林彪感到不安的正是这些问题。他曾和一些指挥员讨论过这些事，其中包括他的同级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参加议论的还有参谋长左权、保卫工作的负责人罗瑞卿和高级参谋朱瑞。

林彪建议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让毛集中精力与周恩来和王稼祥等军委其他成员一起考虑全面政策和规划。

林抱怨说，毛迫使部队走冤枉路。他把红军的路线比作一张弓，说部队是沿着弓背而不是弓弦行军，走的不是捷径。

林说：“在此情况下，部队的精力已消耗殆尽，毛这样指挥不会成功。”

聂荣臻激烈反对。他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

林建议让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负责作战。

据聂荣臻回忆，彭断然拒绝了这一意见。^⑪彭在监狱里写的材料说，他在会理会议时看了林的信。彭说：“当时也未在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他指出，林指挥的第一军团和他指挥的第三军团常在统一指挥下行动。^⑫

由于人员减少，红军再次进行了整编。第一军团从三个师的编制减为两个师，第三军团从三个师减为四个团，第五和第九军团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

毛决定从中央直属队中裁减人员，把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邓小平便是其中之一。免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后，邓调往第一军团。代替他担任中央

秘书长的是瘦小的刘英，她兼作“中央直属小队”的书记。这一调动成了刘英一生的转折点。这种工作她以前从未做过，作为小队成员的洛甫给了她很多帮助。他教她如何整理会议记录，如何查档案，如何起草命令。刘英在莫斯科时就认识洛甫，当时她是中山大学的学生，而洛甫是该校的教员。他们回到中央苏区后，刘英偶而能见到担任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洛甫。她以前说过不想结婚，不愿意“被孩子拴住”，此刻两人却开始接近起来。当她在1984年回顾那些日子的时候，不禁笑出声来。她说：“毛主席当时常常开我俩的玩笑。”不过她和洛甫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更大的进展。^⑪

拿到会理会议上来讨论的还有一份材料，那是一份由刘少奇和杨尚昆将军签字的电报，提出了对下一步行动的建议。遵义会议后刘去了第三军团，彭德怀常同刘少奇交换看法，这些建议就是来源于他们当时的谈话。彭的看法是，红军疲劳，国民党部队也疲劳，因此目前可能是按原计划同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会合的好时机。^⑫

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些对他的权威的挑战对付了过去。他讥笑林彪道：“你知道什么，你还是个娃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⑬

用彭德怀的话来说，毛认为林彪的建议以及刘少奇和杨尚昆的电报代表着一种“右倾情绪”，这里毛显然是指他们没有表现出进取精神。彭德怀当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这件事后来给彭德怀、杨尚昆和刘少奇（但不包括林彪）都带来了不幸和严重的后果。当时，这件事似乎就这样过去了。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写道，“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⑭然而

结果并非如此。

会议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毛已经决定，他们必须向北穿过彝人地区，渡过大渡河。大渡河是一大障碍，蒋介石有可能切断他们的退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过藏族山区突围，而这是非同小可的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一旦过了大渡河，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就有希望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到这里，还有一个小问题：他们不知道第四方面军的确切去向，而且也许还不知道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边界的根据地，正在别处行动。两支部队之间最近一直没有听到对方的消息，无线电联络似乎从一九三五年初，一方面军在贵州一带行军起就中断了。双方都知道对方在行动，也知道对方活动的大概区域，但都没有确切的消息。^⑮

没有人对毛的决定提出异议。李德记得也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大家一致感到目前需要的是团结一致，而不是相互责备。他们面前的困难够多的了。^⑯

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认为，会理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缓和了遵义会议以来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虽然有人私下表示了和林彪类似的看法，但是没有人发言反对毛，毛借此机会向到会人员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又传达到部队的指挥员和干部、战士中去。

如今最重要的是就下一步如何行动作出坚决而明确的决定。毛提出的向北穿过彝区、越过大渡河的计划得到了批准。

这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红军知道会遇到困难，因为无线电侦听到的消息表明，蒋介石也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部队。红军又要开始和时间赛跑了。

从会理到大渡河距离大约一千里，一半是上山，另一半是下山。两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三百英里，但是红军战士要走的山路则将近有五百英里长。这条路一大半和从皎平渡经狮子山到通安和会理的路一样，是在悬崖峭壁上开出来的小道。

下达的命令同以往一样：抢在蒋介石前面占领渡口。红军分别于五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开始行动，错开出发时间是因为道路太窄，同时通过的人不能太多。

天公还算作美。五月中旬的四川，春色正浓。群山换上了五彩斑斓的盛装，几百尺长的山坡上到处都是杜鹃花，大片大片的蝴蝶花正在怒放，看上去犹如蝴蝶张开了蓝色的翅膀。空气中充满了夹竹桃和玫瑰花的清香。这里简直象天堂一样美，无论是一九八四年还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中旬路过这里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没有多少红军老战士记得当时山间的美景了，但他们都记得，红军翻山越岭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的场面，群众打着旗子向红军欢呼，把他们当作凯旋的英雄。行军几个月来，要数这里的群众最热情、最好客。他们送上一桶桶糖果、甜食，一筐筐新摘的杏子和一串串红樱桃。红军多数在夜间行军。这时他们似乎已在国民党飞机搜索的范围之外。当红军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到达四川中南部的冕宁时，^{②①}他们已经连续八天夜行军，行程五百五十里，完成了去大渡河一半以上的路程。人们放起了鞭炮，摆出了

茶摊，请红军喝糖水。战士们要付茶钱，反而惹得老乡生气。街上到处挂着标语：“欢迎红军”、“拥护共产党”。红军的政工人员提前到达，为安排这次热烈的欢迎场面做了准备。^{②①}

部队在大街上露宿，以解除行军后的疲劳。有些人去了天主教堂，受到中国神父的欢迎。教堂里有五名避难的外国传教士，文彬政委劝他们留下来，并向他们介绍了最新消息。^{②②}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号令在安宁河谷一带起不了多大作用。冕宁的老百姓告诉红军战士，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为等红军进城，城门整整开了一夜。有钱人早跑光了。当时群众蒸了猪肉包子招待红军。红军打开监狱，释放了所有的犯人，其中有许多彝族人。^{②③}

到达冕宁意味着红军已接近一个令人生畏的地区，这就是许多汉人称之外“僮僮”的地区。“僮僮”是对住在这一带的彝族的蔑称。这些汉人不知道，彝族远在汉人到达之前就已来到这里，彝族是中国西部——藏民族中的一支。长得身材高大，肤色较深，外表同汉人很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宗教，迷信魔法和鬼神，信奉黄教。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还不完善。他们惧怕汉人同时也仇视汉人。这种恐惧心理，如果不是几千年前至少可以说几百年前就已存在。发达的汉族文明和原始的彝族之间的冲突造成了这种心理。汉人统治者把彝人逼上山，彝人只好靠在山上放羊和种点玉米、小米来糊口。他们穷得大多数男人只有一件破烂不堪的斗篷，妇女只有一、两身破衣服，孩子们则什么也不穿。后来，他们又受到军阀和国民党的压迫。不待说，在他们眼里，这些当

兵的个个都是土匪，他们采取一切办法对付这些当兵的，他们唸过咒，施过魔法，放过滚石，射过毒箭，也放过从国民党游哨那里缴获来的冲锋枪。他们甚至用神奇的泉水当武器：离冕宁不远有一股神秘的山泉，只有彝族人知道这股泉水。水中含有一种物质，能彻底破坏人的声带系统。这种水类似笑气，能使人大笑不止。彝族人用这种水对付过敌人，使他们狂笑致死。^{②1}彝族社会是一个奴隶社会，彝族人分成“黑彝”（贵族）和“白彝”（奴隶）。白彝常常不是彝族本族人，而是俘虏来的汉人、苗人、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种等级制度十分森严，任何人不准越雷池半步。黑彝妇女和白彝男子发生了性关系，这个黑彝妇女就要处死。如果黑彝男子这样做则要罚一大笔钱。人们外出必须带把刀或带付弓箭，或带支枪，没有人敢不带武器外出。抢劫东西被认为是件光荣的事，抢汉人的东西更是如此。举行各种仪式，唸咒、宣誓和歃血，构成彝族社会的生活。^{②2}

红军对少数民族执行了开明的政策，非常尊重体谅他们，希望这样能够挽回过去汉人压迫少数民族所造成的影响，把他们争取过来。在红军进入彝区之前，毛泽东在冕宁已向红军领导人就此作了说明。红军必须尽量避免和彝人发生冲突，因为要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大渡河，一点时间也不能耽误。

毛在这里把部队分为几部分。一部分红军直奔正北面七十英里以外的安顺场，那是大渡河的一个重要渡口。另派了一支牵制性的小部队走小路迅速赶到越西，然后直插南面的大树堡，渡河到对面的富林镇。据说国民党在富林镇驻有一支小部队。^{②3}

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的主力部队准备翻过湘山插向安顺场。先头部队是第一师第一团，肖华率领的一个特别工作组随先头部队行动。先头部队还配备有一个工兵连，带了不少在冕宁搜集到的架桥材料、木板、绳索、托梁和滑车。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九点左右，先头部队到达彝区边上的大桥镇，距离冕宁已有十五英里。

这天的天气是晴间阵雨。战士们在山路上奋力攀登，两旁山崖上到处都是红白相间的杜鹃花。

到了牯麻子村，几百名彝人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不让肖华率领的工作组靠近。彝人高声喊着：“我们要钱！留下买路钱！”

五十年后，军人兼诗人的肖华还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时所发生的一切。肖华对彝人的要求早有准备，随身带了一些银元。他递过去二百块银元，彝人接过钱走了，但不久又返回来要求给更多的钱。看来给钱解决不了问题。工兵连先是被彝人包围，后来被迫退回出发地，设备也给没收了。

肖华请一名翻译（一位当地的汉族商人）向彝人解释，说明红军只是路过此地。一些彝人喊道：“不能过！”，正在僵持不下时，一个身材高高的中年彝人骑着骡子来到了阵前，他是头人小叶丹的叔叔。肖华告诉他红军的领导刘伯承希望同头人小叶丹谈判并与小叶丹结拜为兄弟。肖华送给这位叔叔几支步枪和一支手枪，以表示诚意。

过了一会儿，小叶丹带着十来个随从，骑着马来了。小叶丹长得身材高大，十分英俊，看样子就是个好骑手。他的

坐骑是一匹黑色的烈马。肖华把刘伯承介绍给小叶丹。刘伯承戴着眼镜，对人和蔼，是红军有名的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小叶丹见了这位红军高级指挥官，慌忙跪下，刘伯承把小叶丹扶起来，和他亲切地谈话，并发誓要同彝人结拜兄弟，答应在推翻国民党之后，帮助彝族兄弟恢复自己应有的权利。小叶丹欣然同意了。

他们随后来到一个湖边，湖水清澈见底。他们舀出两碗清清的湖水，拿来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小叶丹和他的那位叔叔都跪在碗前。在蓝天和阳光下，刘伯承举碗发誓：“我刘伯承对着苍天和大地发誓，我愿与小叶丹结拜为兄弟。”说罢，他举碗一饮而尽。小叶丹和他叔叔举起另一只碗，把水喝光，然后说：“如果违背誓言，让我们象这只鸡一样死去。”仪式结束了，誓言正式生效。^②

红军部队退到一个汉族村庄过夜。第二天早上，小叶丹带着一队随从护送红军穿过彝区。他们骑马和红军一起走了五十公里，到达第一座汉族村庄。那里的汉人想杀死小叶丹（仅仅因为他是个彝人）。共产党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进行调解，接着继续行军。此后，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只是山路不好走，急行军使人感到疲劳。

五月二十四日天亮前，他们来到可以俯视大渡河的一处高地，透过晨雾，可以看见安顺场闪烁的灯光和河边的百余座草棚。

但是，后面某些部队通过彝区时，就没有这样方便了。照例担任后卫部队的第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了不少人。他们

都是掉队的战士，只要一掉队，彝人就闪电般地扑过来。彝人并不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是拿走枪支，抢走粮食和背包，扒光他们的衣服，然后把他们留在树林里。这些扒得一丝不挂的战士能活着回去的很少，不是活活冻死就是饿死。

七十五岁的彭海清仍然清楚地记得过彝区时的遭遇。彭个子矮小，由于患了关节炎行动不便，干瘪的脸上长看稀疏的胡须。他的老家在江西吉安，家境很苦，毛当年下井冈山作战时，彭海清告别了父母和三个兄弟参加红军，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红军拴在一起。他参加过江西境内的所有战斗，长征中一直在林彪的第一军团任职。那时，他不知道中央苏区的情况十分不妙，只知道广昌战役是一场恶战，也没有人告诉他部队要长征。他所在的部队只知道要开始行军，结果是走了一路打了一路。当问到关于彝人的情况时，他仰起头来，发出刺耳的喊声：“喔……喔……！”这种声音和二次大战期间，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在延安下飞机去见毛泽东时，发出的印第安人柴罗基部族战争的叫声一样惊人。

据彭说，彝人冲下山就高声喊着：“喔……喔……”上级事先认真交待了政策，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和彝人动武，不许放枪。因此，当百名彝人呼啸着冲下山来，把彭和他的四名红军同志包围起来时，他们没有动手。彭说：“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的。”他带着一挺重机枪，其他同志都拿着步枪，然而他们却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彝人拿走他们的枪和衣服后一哄而散。彝人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但是没拿彭的重机枪，因为太沉。彭和他的伙伴还算幸运，他们很快就被部队发现，又继续行军了。^{②③}

一九三二年十五岁时参加红军的丁甘如，一九八四年已经离休。他原来是成都军区副参谋长。整个长征途中，他都在第五军团。他回忆说：“我们是后卫部队，当好后卫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彝人的主要问题是太穷。彝族妇女穷到下身只围一块类似短裙的破布。彝人从山上向第五军团打冷枪，“幸运的是，他们瞄得不准”。第五军团为安全通过彝区，给了彝人不少钱，但用处不大。丁又说：“彝人把自己的锅拿走，同稻米一起埋起来，然后跑上山。尽管我们愿意用一百块银元换一百斤稻米，他们还是往山上跑。我们有时挖到稻米后就留一张借条。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一些彝人还拿借条来找我们，我们照样给他们付钱。”

偶而，他们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规定，从地里收走一些稻谷，不付钱。这是因为除此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搞到粮食。^{②③}那支牵制性的红军分队——似乎没有起到任何牵制作用——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穿过彝区越西镇之后，于五月二十三日到达大渡河边。他们刚进大树堡，驻守在那里的一小支国民党部队未放一枪就退到河对面富林镇的兵营中去了。

红军终于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了大渡河！下一步就是准备渡河。

第十九章

留下来的人们

主力红军现在已经西行到很远的地方，陈毅再也无法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位于江西东南隅的五岭山脉在薄雾细雨中披上了春装。从山顶上望去，陈毅的眼里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花岗岩的山脊不时从乳白色的云海露出头来。蒙蒙细雨下个不停，竹编的蓑衣难以抵挡久雨的浸透。透过轻纱般的雾幕，那绿色的森林、褐色的山谷以及新种满了水稻的梯田隐约可见。屋顶上青烟缭绕，炊烟弥漫了那些简陋的茅屋，令人窒息。

这是中国赣南这片土地上典型的春天。这种日子已经缠磨了人们不知多少岁月了。现在，在这个阴郁的下午，陈毅的一小股队伍集合到了一起。这是红军开始长征时留下的一支武装。放在脚旁的被装被雨水淋透了，剩下的枪枝弹药用蓑衣遮盖着。他们正在等待命令，准备撤离。

红军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渡过于都河时，大约有三万人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万名伤员。现在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这支武装大部已被消灭。红都瑞金以及于都、会昌相继于十一月十日、十七日和二十三日失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了。

事情一开始就如陈毅所担心的那样糟。当时正是晴朗的

十月，周恩来到病房来看陈，让他留下来。陈毅同政委项英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而项英是博古和李德的支持者，又是陈的顶头上司。项英不懂得，这支训练很差的小股武装——第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的十个团以及正在康复中的伤员——是无法同蒋介石派去围剿他们的十万大军抗衡的。

蒋在南昌的一次会议上向他的部下发出训令：绝不允许“革命政府死灰复燃”。

陈毅对项英说，“失败就是失败”，唯一的出路是进入山区。项英则斥之为“悲观情绪”。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和陈毅共事多年的陈丕显那时只有十九岁。一九八四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身着军装式样的橄榄绿服装，身材瘦小，外表整洁。他带来陈毅四个子女中的三个和我们交谈。陈毅的这些子女现在都在当代中国发挥着积极作用。小名“小虎”的陈毅长子陈昊苏，现在是北京市副市长。陈丕显说，他和陈毅共事多年，一九三四年时，他是共青团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上级要他留在中央苏区，这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其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就在陈毅身边战斗。

在留下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上，他认为陈毅是对的，而项英是错误的。他对留下来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命运极为关切。他记得见到过曾经是党的领导人的四十六岁的瞿秋白。瞿患有肺结核病，却不得不用潮湿的木柴点火煮粥和鸡蛋，作为新年晚餐。“象瞿秋白这样，怎么可能在游击战中幸存下来呢？”他激动地说。

政委项英似乎相信，红军将会很快赢得重大胜利，而他

们将在新的苏区同其他红军会合。他不让人们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

陈丕显还记得到工农剧场看演出的往事。长征之前，剧场是李伯钊工作的地方，后来李伯钊同丈夫杨尚昆将军一起参加了长征。在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别人合作写过一个剧本《为谁打仗为谁死》，她自己还写了个剧本，叫《我们一定胜利》。陈丕显看到的节目同往常一样，是些民间舞蹈、话剧、独唱、小合唱，如《胜利的炮声》。这个剧场是个露天礼堂，尽管天天晚上下雨，但也阻挡不住群众带着雨伞、草帽，披着蓑衣赶去看演出。

主力红军撤走后，这里的一座座城镇落入了国民党手里。地主还乡团到处屠杀，还建立了专门的反共组织——“暗杀团”。地主们把农民撵出家门，说“看你这辈子还红不红”。

红都瑞金原来只受到国民党小型炸弹的轻微破坏，而现在国民党军队把共产党使用过的建筑统统付之一炬。有共产党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折磨，遭到处决。仅在大柏地一地，就活埋了一百人。惨遭杀害的人难以胜数。瑞金全县的人口由一九三四年的三十万，降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十万——减少的人并非都参加了红军。

一九八四年，我见到一位名叫钟启松的骨瘦如柴的七十九岁老人。他嗜烟如命，非常健谈，他为自己的家庭感到十分自豪。他的妻子已七十二岁，有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八个孙子，四个曾孙，共十九口人。他说“这都是共产党给我的”。

长征开始后，钟启松留在红色模范县兴国的长冈乡。兴

国县有很多人参加了红军。那些隐瞒不住与党有关系的人都逃进了深山，有的去了瑞金。他们得到的指示说：决不要承认党员身份，只承认为共产党做了点杂事。如果承认了党员身份就要被杀头。国民党回来大赦的时候，他们去投了案。他们得到宗族的担保，每个人都承认为共产党做了一点事。宗族出人为每个人做保，一个保一个。如果离开了本县，只要靠同姓宗族，也可得到担保。由于大家彼此做保，所以都没受到处罚。当然也有一些人因为被仇人出卖而受到了惩处，有些是交了恶运。留下的九千名红军战士和党员中，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有些被公开处死，有些则是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钟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从兴国逃到了山里，没人知道此事，他和妻子没有遭殃。一九五四年他重新入了党。

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留下来的红军损失已十分巨大，不管是否出自自愿，陈毅和项英组织幸存的红军开展了游击战。他们两人加上老共产党员贺昌组成了一个三人指挥部。他们带着党政机关留下的人员，开到于都以南的仁风等候指示。同时把小股部队派往山里。到二月的时候，陈毅和项英已被敌人包围。他们大约有两千名士兵和两千名伤员。一天，陈丕显听到一个干部在向部队大声训话，说什么他们即将进行一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国民党之间的决死战斗”。陈认为，这简直是荒谬绝伦。

第二天，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召开了一个干部会。会上，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宣布，“我们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换句话说，要开展小股部队的游击战争。

陈丕显看到了中央红军发来的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通

报了遵义会议和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等人事变更的情况。第二份电报指示他们在“中央苏区内外”开展游击战争。

当小股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发后，陈毅便着手处理棘手的伤员问题。伤员们都不想留下，但又无法跟上游击队的活动。陈毅召集地方干部和老乡开了一个会。他十分激动地说：“把这些战士带回家吧。他们是我们大家的儿子。他们都很年轻，可以当你们的好儿子、好女婿。他们能给你们干活，你们家里会多一双手，多一份劳力，也许还会多一个为你们报仇的人。”陈毅还没讲完，这些农民和伤员都已流出了眼泪，陈毅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半天之内，伤员们都安置到了农民家里。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分散到广大的乡村里，每个人都带上了几块银元，少许药品和五斤盐。在国民党封锁区盐是无价之宝。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早晨，余下的部队集合了。大雨倾盆。在一间小茅屋里，报务员正设法同在贵州东部的中央红军取得联系。项英仍然觉得他们的撤退必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电台不停地呼叫，但是没有回答。

最后，大部分部队已经出发。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堪，百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楚。陈丕显是和他的部队，包括党政机关及第六独立团共一千八百人一起上路的。他们在傍晚安全抵达里坊桥，在那儿吃了一顿饭，然后在黑暗中继续前进。天上没有月亮，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穿过一道山谷，开始爬上一条狭窄的山路，这时候响起了枪声。他们停止前进，枪声消失了。原来是地主武装的卫兵把他们当成了本地民团，向他们鸣枪致意。凌晨三点钟他们到达大麻

岭，在那儿休息了一下，用干粮充饥。他们预料拂晓时要打一仗，他们已作好了准备。

中午到达仁风，电台仍联系不上。到了下午一点还联系不上，天又下起雨来。贺昌决定不再等了。他带上两个营大约几百人开始突围，但很快便陷入国民党的埋伏，部队打散了。他们设法在石韩村重新集结，并渡过了会昌河。不久，部队又被包围，打了几个小时仍无法突围。贺昌身负重伤。国民党士兵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贺昌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大声呼喊“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贺昌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时曾同陈毅、周恩来及其他人共同战斗过，他曾担任党的中央委员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指挥部仍在仁凤等候。雨一直未停。最后终于联系上了。他们发出了要求中央批准突围计划的电报，大约在下午五点收到了回电。但是由于密码已经更换，陈毅和项英谁也不懂，人们看着满纸的密码一筹莫展。他们把电文烧掉，命令报务员用油布把电台裹起来，埋在坑里。这份看不懂密码电文是三年中他们收到的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次信息。^⑪

陈毅曾向延安美军观察组属下的外交官谢伟思说过，从那时起，“我们就象野兽一样生活”。

当时，陈毅和项英的身体条件都不适宜打游击。陈毅的伤口远未愈合，他不得不常躺在担架上。项英是个近视眼，而且还患了夜盲症。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傍晚，这支三百人的队伍准备下山了。他们下山后几乎立即遭到了袭击。当他们重新集合时只剩下了二百人。当晚他们又碰上一场战斗。国民党飞机撒下传单悬赏五万元捉拿陈毅和项英。他俩随即决定带着几个警卫悄悄突围出去，这样会减轻全队人的压力。

他们在山间密林中躲藏时，碰上一个打赤脚的人，此人骨瘦如柴，头上戴一个又黑又脏的旧钢盔。他是代英县县委书记，名叫曾记财，一九二九年他见过陈毅。后来别人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斗争了他，解除了他县委书记的职务。他一直在乡间流浪行乞，把讨来的米放在那个钢盔里煮饭吃。陈毅收留他做向导。他们在山中藏了一天，然后走到曾的老家。他的家人已被国民党杀光，只剩下老岳母，老人胆战心惊地给了他们一些吃的。^①

一九八四年，担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六十多岁的刘建华，看起来象个商人，讲起话来带点官腔。五十年前，他在赣南游击队中还是个小鬼，是一位名叫危秀英的女士的朋友（他们现在还是朋友和同志）。当危女士奉命于一九四一年去延安时，她把手枪留给了刘建华，说道：“如果你活着，我们再见面时，请把枪还给我。”一九四九年危女士回来时，写信给刘建华，刘回信说：“你活着，我也活着，但是你的枪和我的枪都找不回来了，它们都被叛徒抢走了，但是你和我都活着，这证明党已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刘建华还是个年轻的共青团员。中央苏区尚未被敌人占领，他同其他共六百名战士一起，在李乐天指挥下到油山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是座落在江西和广东

交界处的一个林区。这个根据地的领导人还有杨尚奎。

刘记得陈毅和项英政委来到的情况。他们化装躲过了国民党的大批巡逻队，于三月九日抵达，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⑫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幸存的人马都到了。突围时，整个部队的损失是惨重的。他们分两批到达，一支是由曾经领导过党政分支队的相貌英俊的蔡会文率领，另一支由陈丕显率领，各有八十人。

陈毅热情地迎接这些疲惫的战士。他自豪而诙谐地说：“国民党吹嘘说他们要在仁凤把我们消灭，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油山聊天。”^⑬

刘伯坚是突围时牺牲者之一，他是在蔡会文领导的部队突围时负伤被俘的。他骑的一匹白马被击中。正当他带领一些人往山上冲击时受了伤，好几个人去营救他，都被打死了。他被解往江西南部的大庾监狱，由蒋介石的“绥靖公署”审讯。然后给他带上脚镣游街。他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义，年仅四十岁。牺牲前他作了一首诗：《带镣行》，诗中说道：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⑭

刘伯坚是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之一，于一九二二年入党，并在苏联学习过。象邓小平

一样，党派他去“基督将军”冯玉祥那里工作，他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第二十六路军任职。宁都起义后，二十六路军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并成为最可靠的后卫第五军团。刘本人成为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他同毛的关系，他几乎注定成为留下来的人。^⑬

一九三五年一月，杰出的作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党的总书记并在其最后几年曾是毛的亲密朋友的瞿秋白，会同毛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老战友、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以及其他几个人，离开瑞金附近的藏身之处，动身去闽西，希望经过汕头或广州到上海或香港。瞿秋白当时三十六岁，在年轻的红军中算得上是个“长者”，何叔衡已经是六十一岁的高龄了。^⑭

一队女同志与他们同行，包括古柏的夫人，古柏是长期支持毛的；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梁是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陆定一的夫人唐仪贞，陆是宣传官员，参加了长征（唐就是给邓小平炖鸡的那位女士）；钟亮，可能是李六如的夫人，她是中央局的成员；项英的夫人；还有一名党的工作人员，名叫黄长娇。

这些妇女的命运都很悲惨。周月林长期被指控为叛徒，要对何叔衡的牺牲负责。大概是在毛逝世之后，她才恢复了名誉。一九八五年她仍然健在。钟亮的命运（也被指控为叛徒）无人知晓。项英夫人也是如此。唐仪贞的命运最为悲惨。有人指控她向国民党出卖党的领导人，红军把她处决了，后来证明是错案。黄长娇尽管历经磨难，仍然幸存下来了。^⑮

许多年来，何叔衡牺牲的情况一直是个谜。据说三月四日他和一支队伍一起从仁凤突围，在去闽西的路上被消灭了。他保管着党的经费、印章和文件。他宁可跳崖自尽，不愿被俘。他受了重伤，被两名国民党士兵发现后枪杀了。^⑬

何叔衡的老友徐特立（原文如此，应为谢觉哉——译注）老人认为，何被生俘，在试图逃跑时被卫兵击毙。另一种说法是，何叔衡所在的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他没有逃走，而是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抽出手枪自杀了。

这些说法都不确实。事实是，何叔衡和瞿秋白都化装成商人，并有人护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们在福建长汀县水口城的小彭村吃早点时被人发现。由李玉率领的国民党十四团二营就驻扎在附近，派兵包围了村子。何一行决定分散开来。在战斗中他受了重伤，倒在稻田里，被两个国民党士兵发现。当士兵们俯身搜查他的口袋时，何跳起来同他们扭打。其中一个士兵向他开了两枪，把他打死。^⑭

瞿秋白躲过了那场劫难，但不久就和大部分人一同被捕了。敌人把他解往长汀监禁，并关了四个月之久，这期间国民党似乎一直在争论如何处置他。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他不仅是有名的共产党人（尽管是已经下台的党的领导人），而且是杰出的文化人。他在狱中撰写的未完成的自传《多余的话》中，的确把自己看成“文人”，而不是政治人物。然而这不是很认真的文字。虽然他在莫斯科度过多年，翻译了许多俄国作品，撰写了一部关于俄国的特写《俄乡纪程》，但他仍是共产党的主要成员。

他在牢房中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一杯接一杯地饮酒，思索着他的一生和中国的未来。在中国，有一段时间把他的《多余的话》说成是伪造的或者是篡改过的。这些说法看来都不确。他没有背叛共产主义。他特别写道：“说我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正确的。”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他写下了一首诗，诗前附有简略的序言：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泉呜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夕阳明灭乱山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同；
已忍伶仃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诗刚作完，就来了一名卫兵把他带到刑场去。他点燃了一支香烟，将一杯威士忌酒一饮而尽。他虽然身体虚弱，却镇定自若地走向刑场。当子弹射向他的胸膛时，他屹立在那里，用俄语高唱着国际歌。^{②③}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年方三十，在长征开始时也被留了下来。一九三五年二月底或三月初，毛泽覃带领大约二十名游击队战士离开于都以东的山区去闽西。他可能是向长汀进发。^{②④}

他在离瑞金十英里的山区红林附近一所土房中停留了一夜。四月二十三日早晨天亮前不久，泽覃嘱咐一个战士站岗警戒，注意可疑的迹象。谁知，这个哨兵找到一块草地，躺下便睡着了。一队国民党巡逻兵经过那里发现了他。他招供

附近男子里有十来个人带着枪，其中有毛泽覃。国民党兵立即包围了这所房子。泽覃把其他人送出后门，自己挡住前门作掩护，击毙了最先闯进来的敌人。可是一名国民党士兵从背后开枪射中了他。^{②②}

毛泽覃死后，国民党大事喧嚷，报纸作了大量报道。他的尸体被送到瑞金示众，报上登了许多照片。蒋介石传令，特别嘉奖他的第二十四师师长。^{②③}今天，泽覃牺牲时所在的村子以他的名字命名。那个漫不经心（或叛变）的哨兵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

死者的名单就是革命运动的名人录。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

古柏带着一队二十到三十名游击队员从广东山区到湘南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而遭杀害。毛在一九三七年得悉他已牺牲的消息时，写道：“我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以完成自由解放之目的。”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李才莲也被杀害了，但是没人知道是什么时候和怎样遇害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方维夏在赣西被杀。他是毛的岳父杨昌济教授的朋友，也是毛的老师。^{②④}

在反“罗明路线”过程中同邓小平一起受到打击的两个人——毛泽覃和古柏，都留在苏区，也都牺牲在游击区。随中央局一起来到中央苏区的中央局秘书长顾作霖，已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在瑞金病逝。^{②⑤}

死者和失踪者的名单连绵不断，永无尽头。

第二十章

死里逃生

油山的战斗打个没完，陈毅和政委项英在战斗中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白天藏进密林深处。他们几乎成了受人追捕的野兽，因而也锻炼出一种只有野兽才有的警觉。稍有不慎，一个脚印，一缕炊烟或砍树发出的声音都会使他们暴露。他们两人从未在一处过夜。黄昏之后和黎明之前，他们经常要数次转移住地。

他们的斗争是在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离去的红军是否还存在，长征是否已经结束，不知道红军是否打了胜仗。他们没有电台，附近也没有邮局，搞不到国民党的报纸，常常一连几个月看不到报刊。贫困的山民目不识丁，根本不了解山外的情况，很少有人关心世事。

在远方长征的那些陈毅的同志们，听不到任何有关留在苏区的同志们的消息。既得不到他们的口信，也见不到他们的信使。除了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情况报界公开渲染外，其他什么消息也没有。而且毛泽覃和瞿秋白的死讯还是几个月后才慢慢传过来的，是真是假，当时也无法核实。因为国民党也曾多次谎报过毛泽东和朱德的死讯。

长征结束很久后，这里对情况仍然不明。当时红军已在

陕北保安的窑洞里安顿下来，埃德加·斯诺也已设法进入红区采访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夏，斯诺曾向毛和周恩来询问过留在苏区的人的消息，毛回答说，他不知道，没有听到任何消息，最后一份电报是一九三五年初收到的。他不知道这些人是死是活。

陈毅是位有文化教养的人，他和许多革命者一样老家在四川，父亲是乐至的地方官。他在成都上过学，并在当地的基督教男青年会里学会了打篮球。这个青年会当时的负责人就是谢伟思的父亲。陈毅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如果是现在，他绝对不可能当上篮球队员。

一九四四年他在延安对谢伟思说：“别人会告诉你，他们都是贫苦农民或无产阶级出身，而我不是，我是资产阶级出身。”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回国后，他加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当时并不矛盾），在武汉军事学校任助理政治教官。他参加了共产党在南昌、井冈山和赣南的全部或几乎全部军事行动。在红军这支队伍里，许多将军会写诗，有些写得不错，有些写得一般，陈毅是其中最好的一位，仅次于毛或同毛一样出色。他从未写过回忆录，但他用诗描写了自己富有戏剧性的一生。同许多建党初期入党的人一样，陈毅坦率而奔放，甚至在他生命的晚期，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可怕的年月里，他也未能学会管住自己的舌头。

在阴沉沉的油山浓雾中，对红军来说生存是最重要的。刘建华回忆道：“我们有六百人，他们有四万人。当时生存高于一切。我们没有帐篷，想搭个竹棚，又怕砍竹子发出响声。于

是就用杉树皮，但树皮用的太多，敌人也会发现这些剥了皮的树。我们只好割草盖屋，可是草只长在森林的边缘，去那里割草太危险。当时我们不得不住在密林深处。最后我们设法让农民替我们在村里买布，做成布帐篷，上面再苫上油布。”

陈丕显回忆说：“搭棚子最好用杉树皮。有些地方能找到采蘑菇的人搭的窝棚，我们就用树枝把它们伪装起来。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露宿过夜，睡在树下或草上。有时也支个布帐篷，但是没有床，甚至连块板都没有。”

有一次几个战士为了避雨躲进一个山洞里。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竟是个老虎洞。老虎已在黎明时跑开。这几个战士始终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他们还是老虎先找到这个洞。

白天，山的边沿地区是国民党的天下，一到晚上就成了游击队出没的地方。陈毅和他的部下常趁着夜色离开隐蔽地点，来到村子里，补充给养，侦察地形，偶而还打个伏击，消灭几个麻痹大意的国民党士兵。他们甚至在村子里召开会议。游击队分组下山活动，每组人数从不超过三至五人。正是在这些日子里，陈毅写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著名诗句。一九三八年八月，项英告诉埃德加·斯诺说，一套棉布军装他穿了两年。晚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只要稍有动静就立刻转移。游击队的战士甚至能象野兽那样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即使象从落叶上走过发出的沙沙声和小树枝被折断这样细小的声音，他们也能听出来。他们还能一眼看出草地上是否有人走过。

粮食是个大问题。山上能吃的东西少得可怜。只有向村

民买。在这方面，可以说，地主救了游击队。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给游击队送钱，有时还给大米，以换得平安。游击队警告地主，不把钱和粮拿出来，就别想保住房子、庄稼和家小。游击队在夜里进村取粮，有时也由村民直接送上山。遇到国民党巡逻队在山上搜查，农民就把米袋放在山坡上，留待游击队自取。地主很少向国民党透露游击队的消息。他们知道，一旦游击队发现他们告密，他们不是死便得逃。

地主甚至为游击队买枪支弹药。数量虽然不多，但当时每支枪都非常宝贵。游击队能缴获武器的机会不多。当然，地主的枪是从国民党那里买来的。

女游击队员负责搜集情报。她们打扮成老百姓，出入村子比男队员更方便。每隔六或七英里就设一个联络站，传递情报。

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李乐天司令员的妻子就是在村子里被一名国民党巡逻兵抓走的。她躲在农民的草棚里，敌人还是发现了她，把她枪毙了。当时红军面临的敌人不仅仅是国民党，还有内部的叛徒。

黄长娇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

用黄长娇自己的话来说，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时，她在瑞金做党的工作。她奉命参加了长征，和贺子珍一起在后卫梯队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贺是毛泽东的夫人，也是黄的朋友。

部队出发后，先向南行，在会昌附近渡过于都河，然后向安远和广东省界进发。途中，部队停下来进行了改组。黄

此时已有身孕，上级决定让她和其他五位妇女留下。她们纷纷表示抗议，但上级命令她们留在苏区，进行“地下斗争”，她们只得服从。到底是谁决定把她们留下，动机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可以肯定，这些妇女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这些人中有黄长娇，有古柏的夫人（也已怀孕），还有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

上级决定把她们送到闽西，黄由于怀孕，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有一天跑了。最后，她们翻山越岭向东走去，一路上要躲避国民党的巡逻兵。到达福建长汀的水口时计划又变了。有人决定要她们返回瑞金附近的山区。古柏的夫人刚生了个男孩，她只好把孩子留给一户农民，和其他妇女一起上路。

黄回到瑞金县，成为山区一个地下小组的组长。这时，当地一位党的书记要她装成农妇下山生活。她表示反对，但这位领导人坚持要她服从。黄说她既不会说当地的方言，又不识字，敌人会很快发现她。但他仍然固执己见。根据党的规定，黄离开时应发给二百斤大米和二十块银元，但他只给了她大米，把二十块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几天之后，这位书记投降了国民党。

黄独自住在焦火山一带的密林里，饥肠辘辘，走投无路。她的分娩期快到了，于是她下山躲进一座小窝棚里。当晚意外地来了一支游击队。原来这棚子是游击队的联络站。这支游击队有十八九个人，是山区三个小分队中的一个。

黄对游击队长刘国新说：“我失去了联系，现在只剩下我一人，没有地方可去。”刘同意让她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员每

天只吃一顿饭，而且要到半夜进了村才能吃。他们不敢生火，怕国民党发现。黄马上就要生孩子，游击队觉得让她继续随游击队一起活动有些不妥，于是劝她留在一户农民家里，当游击队的联络员。白天她在山边摸情况，晚上到一座古庙里去汇报。她还把米装在空竹筒里送给游击队。后来由于叛徒出卖，游击队员全部遇难。从那以后，黄独自一人象个农民一样住在山上，一人生活，整天低头不语。人虽然活着，但完全失去了与革命的联系。一九四九年，世道变了，她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成为县人代会的一名代表。她是同一小组留下的五个女同志中唯一的幸存者。

陈毅的伤口始终愈合不了，不断地折磨着他。到了一九三五年六月，他已不能行走。游击队缺医少药，只有四种成药：八公丹、万金油、人丹和济公水。陈毅把万金油涂在伤口上，再换上新纱布。不久，伤口情况有所好转。

夏天，陈毅还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可是到了九月，伤口变得疼痛难忍，腿也肿了起来。为了去南雄开会，他不得不拄着拐棍，脚步蹒跚地翻山越岭。这时他决定彻底治疗一下他的腿伤。他叫警卫员，把他伤口中的脓挤出去。警卫员看到陈毅痛得脸色发白，急忙停下手来。陈毅命令他继续挤，警卫员说他下不了手。陈毅已经痛得浑身发抖，“好吧，”他说，“用绳子把我捆起来，这样我就不会发抖了。”警卫员把陈毅的腿捆在树上又继续挤，直到把脓挤净并挤出了一片碎骨头才停下。然后，用盐水冲洗了伤口，用涂过万金油的干净布

包扎好。(另一种说法是，陈毅本人把有名的香港万应灵药风油精倒入伤口。)陈毅痛得象得了舞蹈病似的浑身发抖，但不久就恢复了自制力，笑着说：“这回它不会再反攻了。”事情的确如此，伤口彻底愈合了，再也没有发作。

龚楚是留下来的重要的指挥员之一。他是中央军委的参谋长和军区主要卫戍部队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团长。一九三五年五月，龚楚杀死该团政委，与广东军阀取得联系，接受了暗杀陈毅和项英的任务。为了取得陈毅对他的信任，龚带领一支“游击队”在油山附近同国民党部队假装打了一仗，接着，龚截住了陈毅部队的五个战士，指望能在他们带领下找到油山游击队的隐蔽地点。其中四个人设法跑掉了，最后一个叫胡小华的被抓住。龚向他道歉，诡称有重要情况要向“周先生和刘先生”（陈毅和项英的代号）报告。胡小华带着龚朝着游击队的隐蔽地点走去，走到离哨兵不远时大声喊道：“这些人是反动派！”说完便纵身跳下悬崖。哨兵开枪发出警告，龚和他的人吓得撒腿逃跑了。

陈毅和项英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他们必须不断转移以摆脱国民党。龚楚企图诱使他们陷入圈套时，他们正在江西的大庾山上。

陈毅和红军主力已失去联系，所有通讯联络都已中断。他们曾设法偷偷捎信给同情革命的著名作家鲁迅和茅盾，希望通过他们和毛泽东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

陈毅急于同红军主力取得联系的心情使他在一九三六年

冬险些中计。一名地下交通员带来消息，说打入大庾山国民党部队的共产党员陈海收到了中央委员会来的来信，要求把它转交给陈毅。

尽管项英表示反对，陈毅仍决定亲自去见陈海。第二天一早，他下山到大庾，找到陈海的住处，一位妇女正在洗衣服。陈向她打听陈海是否在家。这位妇女没有抬头，边洗边答道：“他去团部了。”陈毅以为她说的是“他去糖铺了”，因为设在城外的糖果铺确是一个地下联络点。当他走到这家铺子跟前时，发现大门紧闭，上面贴着封条。一位老人让他赶快离开，并说陈海已叛变，正带着部队在抓人。

当陈毅还在县城的时候，陈海就已带了三百人直奔山上的游击队总部，希望能截住陈毅。陈丕显和杨尚奎好不容易才摆脱敌人藏到山顶的灌木丛中。敌人在山里搜了两个小时，然后放火烧山。大火烧掉了游击队的营地，火苗离藏在密林中的游击队员越来越近。突然，老天下了一场雷阵雨，把火浇灭了。

陈毅从大庾脱身后，在返回梅岭基地的路上又遇到一队国民党巡逻兵。他们拦住他不放，陈毅表示抗议，说自己在县城教书，是到乡下来买茶的——这个地区的茶很有名。一名国民党军官看出陈毅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便走过来对士兵的出言不逊表示道歉，然后要和陈毅讨论文学问题。陈毅怕暴露自己，看到路旁有个厕所，急中生智，便借口肚子痛跑了进去。巡逻队耐心地等着，待最后去厕所找他时，发现人已不在了。

陈毅爬上山回到总部时天色已黑。大火烧毁了一切，周

围一片废墟，看不见一个人影。他不相信游击队已被消灭，开始四处寻找，边走边高声喊道：“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出来吧。”

周围静悄悄，没有一点动静。他接着喊道：“听听我的口音，我是老刘，你们难道听不出来？快出来，咱们一道离开这个地方！”

这次成功了，一个哨兵终于听出了他的声音。不久，队伍集合起来，向更安全的地点出发。后来，陈毅说是马克思在天之灵带来的雷阵雨救了他们的命。^⑪

国民党有时还搜山。一九三六年春，当地的国民党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组织一万农民，带上火柴、刀和粮食，搜山七天。如有违者，格杀勿论。

搜山开始后，二三百名农民编成一组，后面跟着一连国民党士兵。他们上山时，又喊又唱。有一个组的任务是放火烧山，他们故意失脚掉进河沟，把国民党士兵也带进水里，结果火柴全湿了。

到了第三天，农民开始抱怨，说家里无人照看，他们一哄而散，搜山就此结束。

但是，游击队暂时不能在村里筹粮了。他们靠吃野杨梅、竹笋、芭蕉、石鸡和蛇生活。蛇被看作是一种美味，夜间打着灯抓起来很容易。另一种美味是油炸蜜蜂，又脆又香。山里有许多山羊、野猪，还有豹和老虎，都是极佳的野味，但游击队害怕引起注意不敢放枪。

油山、大庾山和梅岭地区的游击战旷日持久。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军主力已在一年多以前结束了长征，所有其他

红军部队也都陆续到达陕北。但这里的游击队仍在战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劫持蒋介石的西安事变，结果导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正式停战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然而对陈毅、项英和三百名衣衫褴褛的男女游击战士（这些是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数千人中的幸存者）来说，事情没有任何变化。

约在一九三七年初的某个时候，陈毅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但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国民党才开始减轻对油山的压力。

最后，陈毅悄悄地下山来到大庾和赣州，和当地的国民党指挥官进行了交谈。他们说会谈必须在更高一级进行。于是项英前往南昌，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叶剑英和博古。消息得到了证实，的确建立了统一战线。然而山里的战斗却仍在进行。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的某一天，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来到广东边隅山区某地一个游击队岗哨身边，轿子后面跟着一些国民党卫兵。下轿的先生衣着讲究，头戴一顶呢子礼帽，上身穿着红军制服，脚上是一双黑皮鞋，鼻子上还架着一副墨镜。

付完轿夫脚钱，打发走国民党卫兵，他上山来到游击队总部，拿出由政委项英签名的介绍信，信中介绍来人是“陈毅”。游击队弄不明白的是，如果来人确是陈毅，他怎么坐上了轿子，还带着国民党卫兵呢？

仅仅两个月前，这里来过一位绅士，自称是党派来的联

络员。可是此人一到，国民党袭击队就跟着摸了上来。

这次是否又是个骗局呢？他们不能粗心大意。他们立刻把陈毅带走，加派了岗哨。陈毅告诉他们成立了新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抗日了。说了好几遍，游击队仍认为他是国民党特务，要他坦白。接着，他们把他捆起来，关在隔壁房间，然后争论起来。陈毅听得见他们的说话声，当他听到他们决定要杀他时，他大声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做！要犯大错误的！”

第二天，许多人把陈毅团团围住，公审大会即将开始，生命危在旦夕。这时走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旱烟袋，陈毅认出来他是游击队的老队长，名叫谭余保。

“你是谭同志吗？”陈毅问道。

“谁是你的同志，”谭反驳道，“你投降了国民党，你是叛徒！”

陈毅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是党组织派他来的。

“什么党？”谭厉声问道，“是国民党吧？我认识你，我在井冈山听过你讲话。当时你讲的是革命道理，可你如今干了些什么呢？你要是不坦白，我就砍掉你的脑袋！”

两人吵了起来。陈毅说必须联合国民党抗日，谭说他完全赞成抗日，但不想和国民党来往。

谭余保怒形于色地喊道：“你们知识分子全是一帮机会主义者。三年来我没有听到你的任何消息，你干什么去了？”

陈毅建议派人去南昌找项英或去武汉找叶剑英核实。

最后，谭让陈毅走开，但没有给他松绑。谭长叹一声：

“我的天！这个叛徒可真难对付。”两人私下又谈了一下，谭最后同意在事情搞清楚之前先不枪毙陈毅。

四天后，交通回来了，带回来的文件证明这个陈毅是真陈毅，党目前的路线和陈毅讲的完全一致。

谭余保不禁痛哭起来，他说：“我们整整三年无法和其他同志取得联系。红军走了三年了，你不知道在这里坚持斗争有多困难！”他给陈毅松了绑，两人坐下来，谈起各自如何死里逃生的经历，一直谈到天亮。然而两人都没有想到，这只不过是以后生死斗争的前奏。

第二十一章

传奇的土地——泸定桥

这个地方在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中被视为圣地，它浸透了战争中英雄们洒下的鲜血。这是一块传奇的土地。二千年以前，三国时期，这里是蜀国的领土。毛泽东对蜀国的兴衰史和那个时代的故事了如指掌。蜀国的五十万大军在不断的征战中，无数次渡过泸水（现在的大渡河）和金沙江。对蜀国的英雄们、那些巫师出没的崇山峻岭和穿山而过的激流，以及蜀国将领们把敌人引入歧途的神奇计谋，没有人象毛那样了如指掌。现在，他指挥的红军就行进在这块传奇的土地上。

踏上了这片土地，就不能不回忆起中国历史上史诗般的往事。毛发现自己进入了儿时心爱的书中所描写的情景，就好象一个英国人突然回到了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的时代一样。

在近代史中，这条横贯四川省的山谷曾经目睹过更加血腥的战争。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这场伟大的历史剧在这里演完了它最后的一幕。太平军最后一位领袖翼王石达开和四万士兵就是在这里全军覆灭的。几天几夜，大渡河水被鲜血染红了。石达开的妻妾儿女和将领都在大渡河边自尽，石达开本人被押到成都施以凌迟酷刑处死。

红军里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第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

大渡河的那天晚上，朱德坐在篝火旁，给战士们讲故事，这个故事他儿时在贫穷的四川老家听过几十遍。那时，有一个老织布匠每年冬天到他家去，把他母亲纺的粗棉线织成毯子。这位老人过去是太平军的一个士兵。他总是在烟气腾腾的炉火旁边讲石达开的故事，讲得是那样认真、那样出神。他说，石达开并没有死：石达开的四女儿是经他搭救后收留的养女。为此，她曾想嫁给石做妾，但石拒绝了。后来嫁给了一个长得酷似石达开的人。太平军战败之后，这位四姑娘说服石达开逃走，而让她的丈夫做了石达开的替身。石达开在这一带飘泊了许多年。不少人都看见过他，其中有一个岷江上的船工，在狂风暴雨中落水，幸而遇到石达开，救了他的性命。老织布匠说，在漆黑的夜晚，人们在大渡河边可以听到阵亡将士的英魂在哀号。要等到有人为他们报了仇，他们的悲鸣才会停止。老人常常引诵石达开的诗句：

“只觉苍天方瞽瞍，
欲凭赤手拯元元。”

朱德对战士们说，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石达开在成都凌迟处死，他本来想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部下将士们免于一死。但他的部下最后也都遭屠杀。杀害石达开的四川省总督骆炳章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十三日，他手领四岁的孩子，和他的数名亲信到大帐自首。石达开和另外三人二十五日解往成都，凌迟处决。孩子要等长大到规定可以杀头的年龄再予审处。

正在讲得出神的时候，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下水（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这些东西怎么做呀？”

朱德收住了故事，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说完，接着讲故事。董必武讲了中国著名神话里的孙悟空的故事。他说，孙悟空当年就是经此地西去印度的，他设法绕过了火焰山，可还是烧了尾巴，“所以猴子屁股上没毛。”“那你的屁股怎么没被烤焦呢？”听众里一个十至十二岁的红小鬼冒冒失失地问。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董必武换了话题又讲了一个故事。

毛不鼓励人们讲这种故事。国民党正在宣传说红军会象太平军一样覆灭，说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仗，大渡河水又要象七十三年前那样被血染红了。毛平静地说，大渡河上绝不会再发生那样一场大屠杀，对此，他坚信不移。他希望他的部队不要担心大渡河水下会有什么水鬼等着把人拖下去溺死。他指出那只是无稽之谈，“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说，“我们是革命者。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同了。历史不会重演。”

湍急的大渡河发源于边远的西北青海省，奔流于起伏的山峦之中，这些山和喜马拉雅山相连。青海是一片只有高山、沙漠和森林的荒原，居民中汉族不多，一九三五年时还没有象样的道路，只有商队来往的小道。大渡河水流湍急，几乎是从正北流向正南，然后东折，泻入成都南边长江的一大支流岷江。大渡河两岸峭壁耸立。五月里，黑色的崖壁上开满了杜鹃、玫瑰和各种蓝色和黄色的花朵，连参加我们一九八四年远征的业余植物学家们都叫不出这些花朵的名字。这里

美得出奇。但对一支军队来说，又是出奇的艰险——渡江艰险，登攀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艰险。河并不宽，但其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漩涡和礁石令人望而生畏，这是个危险的去处。

一九三五年，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泸定桥。美国一位勇敢的女旅行家一九〇八年这样描写过泸定桥：

泸定桥是一座著名的铁索吊桥，建于一七〇一年，桥长三百七十英尺，横跨奔腾湍急的大渡河。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桥板放在桥面的铁索上，两侧的铁索是扶手。但是，只要看到铁索之间的空隙，看到随便铺在桥上的木板和连接两侧铁索的零零星星的木栅，看到整座桥好象轻轻地挂在翻滚的水面上，就不由得觉得这座桥建得很粗糙。不过，印度、西藏、尼泊尔和亚洲高原上其他地方来的旅行者都从这人类智慧的产物——单薄得象蛛丝一样的桥上安全地跨过了大渡河。它隐藏在中国的这个偏僻的山谷里，充满了神秘的魅力。很多人所以要从桥上步行而过，就是因为它晃动得厉害。我和鲍勃也走过去了。……

泸定桥是由一位卢姓工程师在康熙年间建造的，把北京、成都和康定以及拉萨连接起来。当年尼泊尔向北京进贡，那些满载着财物的车队就是从这里经过的。十三条铁索由碗口粗的巨大铁环组成，当年，这些铁环是在炭火上由人工锻造出来的。桥面是九条铁索，两边各有两条，帮助人或车保持平衡。铁索上铺着木板，男人、妇女、车和牲口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过桥。河面在此处不足一百码宽，铁索固定在两端巨

大的石墩上。两岸修着漂亮的琉璃瓦桥楼，顶呈宝塔状，由柱子支撑。那时（现在也是如此），瓦是赭红色的。西头的桥楼几年前烧毁了，后来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复。

泸定桥很美。桥身中部下垂，但由于短，所以下垂幅度不大，即使在暴雨季节，离水面也很高。有人过桥时，整个桥就象一张巨大的吊床一样摇晃。

多年来，人们根据过桥时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编出了很多离奇的故事。有人说，翻滚的河水酷似蛟龙，要把过桥人卷入水底。还有人说，这座桥很长很长，足有“一英里多”。

现实比想象更令人难忘。近三百年了，这座桥依旧为人们提供着方便，只是不再允许车辆和牲口通过了。附近新修了许多小吊桥，还有一两座能走机动车的公路桥。所以泸定桥已不再当作一座普通桥梁来使用，而是成了一个吸引游客的去处。

几年前，一队士兵过桥时，一个铁环断裂了。幸好没有人受伤。从那以后，木板下面用钢缆加固。不过从上边看不到这些钢缆。

毛和他的部队本来打算从安顺场而不是泸定桥过河，安顺场是人们从西岸去东岸时常用的渡口。他们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凌晨到达安顺场。拂晓前，他们对这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发起了进攻。天下着雨，通往河边的小路很滑。但是第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率兵很轻易地拿下了安顺场。一团一连进行了这次战斗，但大失所望，只搞到一

条小船。十七个人自告奋勇乘这条唯一的船过江。每个战士带了一支冲锋枪和七八颗手榴弹。船由八个当地的船工驾驶。在这么湍急的河流中行船要花很大的力气。红军向船工们保证，万一出了事，他们的家属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船刚刚驶离岸边，敌人就开火了。一团有位百发百中的神炮手，叫赵成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法国打过仗。而这时，他只有四发迫击炮弹，但他就用这四发炮弹摧毁了敌人的四门炮。后来，红军在下游又找到两条船，于是点起篝火昼夜摆渡。但光靠这几条船，显然完不成任务。

红军必须迅速过河。他们不能光靠这几条船一次次来回摆渡，这样要一两个星期才能全部过去。他们没有忘记石达开的故事：延误时机是他惨败的原因。石达开为了祝贺夫人生了个男孩，命令部下安营扎寨庆祝三天，等他重新开拔时，河水已经上涨，清军也追了上来。

毛发誓，决不让红军遭到同一命运。他召集朱德、周恩来、林彪及彭德怀开会，决定改变原来计划，不从安顺场过河，而派突击队循着几乎看不出来的小路沿西岸而上，夺取泸定桥，然后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地方过河。从来没有人走过这条路。过往的人通常是从东边一百二十五英里处的成都出发，沿大渡河东岸而上，过泸定桥到西岸，继续西行到西藏和拉萨。或者从拉萨来，沿相同的路线反向而行。

毛和往常一样，再次挑选了出人意外的、几乎无法行走的路线。会上决定红四团当突击队，由团政委（现在是上将）杨成武率领进行突袭。

一切都取决于四团能不能在敌人猜到毛的意图之前，通

过大渡河岸边峭壁上的崎岖小路赶到泸定桥。在这里，河水的流向是从北向南，和从成都到西藏的大路形成一个T形。

由于雪山挡路，从南面很难到达大渡河，要踏上从泸定桥去西藏的西行道路也不容易。山太高了——高达二万英尺。

毛关于行军路线的一些决定曾引起争议，决定沿西岸上行到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又如毛选择皎平渡过金沙江，而没有选择第二方面军后来使用的一个比较容易的渡口。第二方面军毫不费力地就过了江。后来作出的过雪山、草地的决定也有争论。缺乏可靠的情报恐怕是一个因素。指挥员中，只有朱德曾经走过泸定桥，那是一九二二年，他还在四川一个军阀部队里打仗，他和几个同伴侥幸从云南跑回四川。他们就是过了金沙江和泸定桥后才到达安全地带的。^①

一个军事行动就要开始，它后来成为一个传奇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一九八四年，七十岁的杨成武看上去还很健康。这个故事他虽然已讲过多次，但再讲时仍旧兴致勃勃，而且不时地挥动三个细长的手指来加重语气。他有时翻一翻他写的《忆长征》，查找日期或人名。他得意地回忆说，当时国民党飞机撒传单说什么红军的末日就要到了，红军将象石达开一样，血染大渡河，等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五月二十七日午夜以后，杨接到命令，要他从安顺场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约九十英里，夺取泸定桥。他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任务。部队出发了。他记得他们走的是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向右望去，大渡河在悬崖脚下奔流。沿河走了

约九英里光景，他们遭到对岸敌人的射击。这里河面很窄。于是他决定爬山抄近路。他们走的根本不能算路，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挖一个站脚的地方，才能站稳再迈一步。出发前的两天里部队已经跑了二三百里路，所以现在还没出发，他们就已疲惫不堪了。^⑪

在大渡河上游十六英里的叶达顶，四团击溃了一支一百人的守卫部队，然后翻过一座高山。山那边有一条小河，流速很大，木桥已被毁掉。四团战士就地砍树架桥，继续向前走。部队下山时，一个侦察员报告，国民党二十四师在一个叫菩萨冈的村庄外的悬崖上部署了一个营。道路很窄，国民党部队的防地山高坡陡，坡后边下去就是大渡河。杨成武派一小股部队迂回到敌人侧背，爬上山顶从后面进攻敌人。一小时后，他们赶走了国民党部队，继续前进。夜幕降临，他们驻扎在石月亭，休息了一夜。这时，他们已走了二十五英里坎坷不平的小路，一路上打了两仗。^⑫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四点，战士们被叫醒。五点，他们已吃完早饭又上路了。刚走出村子一二英里，一个通信员匆匆赶到，带来了新的命令。杨成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二十五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命令是由林彪签署的。^⑬

当然，电报的这份抄件搞错了。完成任务的日期是五月二十九日，而不是五月二十五日。

五月二十九日！杨成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就

是明天！他们第一天走了二十五英里。他们还要走差不多七十英里，而且一路上还要打仗。平时用两天时间完成这个任务都很困难，更何况一天呢！

但是，正象杨成武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命令就是命令。”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象往常那样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教育了，也没有时间做任何准备。队伍急速前进。战士们沿着狭窄的道路爬上滑下，政委们边走边同战士们说上几句话。他们必须赶在二十九日早上六点之前到达泸定桥。

队伍开始爬猛虎冈时，大雾越来越浓。山顶上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营。红军战士借着大雾的掩护，悄悄摸到敌军阵地。一阵手榴弹和短兵相接之后，国民党守军溃退了。红军紧追不舍，下午二时到达摩西面村。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奎武。这时已是下午六点，还剩下三十五英里。敌人无影无踪。红军继续前进。道路在雾气和蒙蒙细雨中变得很滑，战士们砍下竹子当拐棍。夜幕降临了，红军在黑暗中行军。

大渡河的这段河面很窄。对岸是国民党军队的增援部队，他们和红军一样，也正朝泸定桥扑去。双方有时都能互相望得见。红军没有时间停下来吃饭，战士们空着肚子行军，饿了就嚼口冷饭团子。夜越来越深了。晚上十一点，在一个叫作楚梅的地方，杨成武看见对岸有火光。那是国民党的一个营，点着火把在赶路。怎么办？杨政委大胆决定利用刚缴获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联络信号。他让号兵吹号，告诉对岸，他们也是国民党部队，刚消灭了一股赤匪。那边的国民党部队回答了他们。杨成武命令部队也点上松竹做成的火把。就这样，两支队伍隔河并行了十来英里。“我们把他们给骗了。”

杨成武笑着说。过了一阵，国民党军停下宿营了。四团仍继续赶路。

杨成武当时不知道，一军团一师的同志们正在他后面不远的地方沿右岸而上。右岸的路很好，是条主要的车马通道。五月中旬，道路两旁景色宜人：梨花虽已凋谢，有的果树依旧开着花，葡萄园一片新绿。房屋很坚实，石头地基，泥笆墙，红瓦顶，很有点欧洲巴斯克地区风味。

行进在右岸的一师的战士一路也打了几仗，虽然因大雨耽搁了一会儿，但进展还是很快。大渡河在这里形成一个V字形，窄的地方河面只有一百码，声音可以轻易传到对岸。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左岸四团走过的小路，并不象战士们传说的那么高，有些地方只比河面高出二三百英尺。^①

雨住云散，繁星闪烁。夜深人静，战士们沉重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间或踩落一块石头发出“咕隆隆”的滚动声，都清晰可闻。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的从路旁摔了下去。还有的战士干脆解下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互相连在一起，这样，即使倒下去，也会被拉着走。

这一夜，四团彻底轻装，只带了枪支和弹药。所有的背包，食物和不必要的东西都被丢在路边。战士们手里拿着枪，一路小跑。

破晓时分，他们来到桑田坝，离泸定桥只有两英里了。他们终于及时赶到了。但是怎样才能夺取泸定桥呢？

天亮了，周围景色秀丽。五月底的四川，到处是粉红色的有甜味的樱桃，把整个山谷装点得绚丽多彩。这时正值枇

杷和樱桃的收获季节，西红柿也熟了。夹竹桃花鲜红似火，马铃薯花雪白一片，蜜蜂成群地飞来飞去，山坡上粉色的杜鹃正在怒放。但是，杨成武从阵地里看出去却是另一种景象：桥那边是肮脏的泸定小镇，白色的桥楼和轻轻摇晃的桥身。桥这边国民党兵力很少，对岸却驻守着几百人——假如曾同他们一起点着火把隔河并行的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对岸的兵力就更多了。

四团占领了桥这边仅有的几所房子和一个天主教小教堂，官兵们在这里进行了战前动员。敌人间或从对岸打过来一、两发迫击炮弹，弹片和碎砖乱石四处乱飞。

廖大珠的二连被选为突击队，三连跟进负责铺桥板。杨成武从望远镜里看到，桥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拿掉了。

杨成武认为战士们吃饱饭才好打仗，他命令连队炊事员做一餐好饭。战士们整装待命。攻击将于下午四时开始。杨成武把重机枪布置在桥后面的制高点，掩护部队行动。步枪用来加强火力。他们没有迫击炮和大炮。

廖大珠连长率领二十一个战士组成了突击队。每人带一支冲锋枪或手枪、一把大刀和十几个手榴弹。他们必须在滔滔河水上方顺着没有桥板的摇摇晃晃的粗大铁索匍匐前进。四团的号兵一齐吹响了冲锋号。机关枪开火了。二十二个战士开始冒着危险向前爬行。正在这时，只见对岸火光冲天，原来敌人把桥楼点着了。

这是个好天气。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但是很热。战士们浑身淌着汗水，伏在铁索上一节一节地向桥那边爬去，谁也不去看下面翻滚着的激流。一节又一节，一尺又一尺，艰

难地向前移动着。杨政委焦急地望着。三连的战士拿着新木板跟在突击队员后面，一边往前爬，一边把木板往桥上铺。前面，国民党士兵把煤油浇在没有撤去的木板上，燃起熊熊大火。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突击队员，他们继续向前。到了桥的那一端，他们爬上敌人来不及抽走的桥板，在浓烟和烈火中发起了强攻。他们一边跑，一边端着冲锋枪猛射。当被烟熏黑、衣服也着了火的红军战士冲上对岸时，国民党守军逃跑了。

在这场拚死的攻击中，二十二人中有一十八人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这次勇敢的行动保证了毛的艰难的长征将以胜利、而不是以失败告终。

肃清残敌工作迅速展开。两小时之内，泸定镇和泸定桥已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了。

国民党丢弃了又一个坚固的阵地。国民党指挥官李全山有两个营的兵力（其中一个就是和四团隔河齐头并进的那支队伍）。但是他只用了一个营守卫桥头，而把另一个营部署在河岸上，结果一点也没用上。

“那天晚上真紧张，”杨成武回忆说。他时刻提防着敌人的反攻。他派了一个巡逻队顺着左岸向下游安顺场方向警戒，巡逻队很快带回来一个一师的伤员。他们立刻意识到在安顺场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的离他们很近了。果然，半夜时分，刘伯承和聂荣臻就已赶到，杨成武把他们带到桥边。刘伯承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河面上轻轻摇动的铁索桥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作了多么大的牺牲啊！”

他们走过桥去，看到桥头竖着一块建桥人卢氏留下来的

石碑，上面刻着：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峰入云千里长。

一九三五年，红军来到安顺场时，安顺场有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是清末的秀才，叫宋大顺。石达开在的时候，他还是个青年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访问了他。李富春问，石达开为什么失败了？

老人回答，因为贻误了时机。石达开被大渡河挡住了去路，过不了河，也不能向左转，因为彝人毁了松林河上的桥，而清兵的追击又使他不得南下。

李富春又问，红军和太平军哪个强？老人说，都好，但红军更胜一筹。

人们传说，太平军是由所谓“神兵”组成的，也就是说，他们刀枪不入。然而，在大渡河，他们却一败涂地。后来人们把红军说成是天兵天将，据戴正启医生回忆，他参加了整个长征，不过他那时不是医生，只是个十七岁的卫生员，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听到人们把红军叫作天兵天将。在那以前，他从未听说过这种称呼。

几年前，有人问一个曾在泸定桥打过仗的原国民党军官，为什么红军在夺取泸定桥的时候伤亡那样少？他说，因为国民党的枪支太陈旧，子弹都潮湿发霉了，大部分打不到河对岸。

毛泽东到底把多少人带过了泸定桥和大渡河？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过都河时，他有八万六千人。过大渡河时估计不过二万人左右。

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们受到了奖赏。他们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杨成武将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得到了这些奖品。”

这是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比金质奖章要好得多。^⑬

第二十二章

大 雪 山

毛泽东没有赶到泸定桥去向杨成武和四团的英雄们祝贺。三天之后他才露面，比前来向自己部下祝贺的林彪晚了四十八小时。

在数千名红军走完了突击队匆匆开辟的小路之后，毛才沿着大渡河西岸从容不迫地北上。他一路上大多是缓步而行。据他的警卫员说，这是为了使大家少消耗一些体力。他有时停下来，让工兵拓宽道路，或让红军部队先通过那些摇摇晃晃的桥梁。他在日落之前便早早宿营了，第二天晚上住在磨西面，第三天很晚才到达泸定桥。周恩来和朱德都比他先到。

杨成武在西岸迎接周恩来和朱德，并护送他们过桥。刘伯承和聂荣臻在对岸迎接。周在警卫员的陪同下，亲自换下几块断裂的桥板，等着毛的到来。黄昏前不久，毛终于到了。据敬仰他的警卫员们说，毛走过东摇西晃的泸定桥时，脚下大渡河水白浪翻滚，但他毫不在意。毛在河对岸与他的高级指挥员会合，开进肮脏的泸定城，坐下来美美地吃了一顿米饭、南瓜、土豆，可能还有鸡和肉。

红军过了大渡河，终于甩掉了国民党的追兵，毛和他的部下现在要决定的是下一步如何行动。红军放慢了前进的速

度。毛和司令部在泸定逗留了一天一夜，然后又到化林坪休息了几天。一九三五年六月二日，杨成武率领的突击队又出发了，他们全速前进，目标是东北方向约四十五英里以外的天全一带。

当时的形势仍然充满矛盾。毛虽然摆脱了国民党进攻的危险，已经没有敌人来阻止他与川西北的张国焘及第四方面军会合了。但是毛却不知道张的确切位置，张也不了解毛的位置。其实他们及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一百英里，只是中间被大雪山隔开了。

毛过金沙江时，一、四方面军是否已知道对方的方位，中国的历史学家迄今尚未找到佐证。到了过大渡河时，两个方面军有无联系同样也是一段空白情况。长征初期，一、四方面军曾有一些断断续续的无线电联系。但据张国焘回忆，他事先根本不知要长征，长征开始几天之后他才听说。这同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团”对自己的计划严加保密是相符的。他们的许多最亲密的同僚也象张国焘一样蒙在鼓里。张甚至在听说一方面军已开始行动后仍不明白其意图何在，但推测一方面军出了问题。

一、四方面军相互极少联络的一个原因是四方面军丢失过一个密码本，担心它已落入蒋介石之手。尽管如此，张国焘声称一方面军进入贵州后，他的无线电侦听台便开始为长征当“耳目”。他回忆说，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守在电台旁边，以确保把四方面军侦听到的情报扼要地发给一方面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张收到中央关于遵义会议决

定的通报。中央指示他采取行动帮助一方面军渡过长江。但是没有下文。因为四方面军帮不上多少忙，而且一方面军也从未真正靠近长江上的任何一个主要渡口。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认为，一方面军渡金沙江时，这一指示仍然有效，但没有证据表明一、四方面军是按照这个指示行动的。

通信联络十分困难，这不光是因为担心密码不保险，而且因为两个方面军都在运动中。张国焘决定率领部队渡过嘉陵江，进入靠近西藏的四川西北角。事实是迄今没有找到证据说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后，一、四方面军之间有任何信件或信使往来。有时，他们通过老百姓中间的传闻或国民党报纸刊登的片言只字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消息十分有限。当毛率领部队在贵州兜圈子和张四月份挥师向边远的西北运动时就更是如此。

据张回忆，大约是在五月底或六月一日，他获悉（消息来源不详）一方面军渡过了金沙江。如果张没有记错日子，红军这时实际上已渡过了大渡河。

难怪毛过了泸定桥后要停留一下，要好好考虑到哪儿去找四方面军。

人民共和国康健而久经风雨的主席李先念是位七十五岁的老革命家。一九八四年时他回忆说，一九三五年六月初，张国焘指示他派一支部队去迎接一方面军，当时估计一方面军快到了。但张既未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抵达日期，也未告诉他一方面军的方位。李派自己属下的一个师向南攻克了位于雪山北麓的懋功。^⑪

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坚持认为渡金沙江时，一方面军“应

该知道”张的部队在川西北，而张也“应该知道”一方面军的行踪。这更说明缺乏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一、四两个方面军是相互通气的。

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

夹金山一万四千英尺高，是大雪山的一个要隘。毛泽东何时决定翻越夹金山没有记载。可能是在天全作出的决定，天全是条岔路口，大部分红军在那里停留了几天。

毛当时面临三种选择。他可以沿一条马帮常走的山路插向雪山西面，这条路通往川西北和青海藏族地区的首府阿坝，路程较长，沿途几乎都是充满敌意的藏民聚居的地区。他们也可以走雪山以东通往松潘的路，但沿途遭受国民党进攻的危险极大。

第三种选择就是走中路翻越雪山，这是一条险路，但当地有人包括妇女、儿童走过这条路。毛的决定明确地表现出他一贯的主张：如果没有把握就走偏僻的小路。这就是他在这个关键时刻作出的抉择。可能他（正确地）估计到走这条路能使他最接近自己的目标：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合。

从历史记载看，毛是在经过考虑后进行这场赌注的。他决定翻越雪山时，对越过这座大山后能否与张国焘会合毫无把握。除非当时曾有小贩、牧民或行人把张的消息带给了毛，不过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载。

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决定。毛和他的部队都没有爬过雪山。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来自华南炎热而潮湿的亚热带或半热带地区，雪在那里极为罕见，有些人几乎没有见过雪。大雪山终

年积雪，十分壮观。从山上极目远眺，地平线上雪峰兀立，与加拿大的洛基山脉一样巍峨。顶峰在树线之上，高耸入云。后来修的公路呈之字形盘旋而上。在这里，所有的绿色都不见了。山成了光秃秃的一片褐黄，不久便是雪的世界。即使在五六月间，也还是厚厚的积雪，一直铺到峰顶，铺到雪山的另一边。

在中国，人们敬畏雪山，也迷信雪山。当地居民称夹金山为仙姑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仙女才能飞过此山。^⑫如果到了山顶把嘴张开，山神就会使你窒息。^⑬一位长征过的老战士记得有人告诉他在山上讲话要低声，因为氧气太少了。^⑭一句话，夹金山是座魔山，鸟都飞不过去，人最好对它敬而远之。

红军长征来到仙姑山脚下时，已经过了八个月的跋涉。许多人已经打了三四年或更长时间的仗。对他们来说每天的生活都很艰难，却又使人感到踏实，因为毕竟没有国民党追兵的威胁了。

一九八四年六十五岁的老红军、医生戴正启说，他熟悉红军生活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他闭上眼睛也能把红军长征的生活述说一遍。一九三四年开始长征时，他才十五岁，是一个宣传员，不久就改作了卫生员，现在是政府的一名高级卫生干部。他说，象他这样的普通战士，长征中走的路要比地图上标出的红军在一年中从江西走到陕北的两万五千里路多得多。他们常常一口气走八十到一百六十里，忽上忽下，忽前忽后，走的完全不是直线。许多卫生员为了照料伤病员和

垂危病人，三次甚至四次越过大雪山。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三万至四万里。

他说，哨音一响，一天的生活就算开始了。一般是清晨六时吹哨，但也常常五时或四时吹哨。起床后用十五分钟时间整理行装，归还借来搭床铺的木板、门板和稻草。再用十五分钟洗脸、刷牙（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战士都刷牙）、吃早饭（半磅米饭，有时是红薯）、领干粮、整队。有时先头部队领完干粮，米桶就见底了，其他人什么也领不到了。

戴正启在当宣传员时，身上背着背包、挎包，腰里别着手枪，手上拎着一桶贴标语用的浆糊。他当了卫生员后，就背起了药箱，里面装着凡士林、碘酒、石炭酸、阿斯匹林、绷带和脱脂棉。

每人负重约二十五磅。早晨出发前告诉大家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两次：上午休息一次十分钟，午饭时间二十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趴在路边，等候哨音再一次吹响。^⑬

翻越夹金山前，向所有的战士简单地介绍了高山、冰雪及严寒对健康的危害，要求他们用布条遮一下眼睛，防止雪盲；要求他们稳步前进，不要在高处停留；要求他们在出发前吃饱吃好，穿上厚衣服（大多数人只有补了又补的单军装）。可是，山脚下还是酷暑天气，开始爬了不多一会儿，就大汗淋漓了。^⑭

宣传员把注意事项编成便于记忆的顺口溜，教战士唱诵：

“夹金山，高又高，

注意事项要记牢：
裹脚要用布和棕，
不紧不松好好包。
到了山顶莫停留，
坚持一下就胜利了。
病人走不起，
帮他背东西。
大家互助想办法，
一定帮他过山去。^①

曾当过外交部长，现在任国务委员的姬鹏飞翻越大雪山时是中央卫生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一九八四年见到我们时，他已七十四岁，头发花白，身材相当高，年青时体格更健壮。他告诉我们，爬夹金山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坡度不大，终年积雪的山顶看起来似乎就在眼前，实际上山脚的海拔就已相当高，结果造成大家对高度的错觉。虽然几个月来的行军和缺粮已使大家十分疲乏，开始爬雪山倒似乎很顺利，可是，没多久，进入了一个冰雪世界。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山上没有路，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气力。但谁也没有想到会死，也不知道海拔一万四千或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山上氧气如此稀薄。有的人挣扎着要站起来，结果却永远倒了下去。

卫生员见此情景立即意识到山顶不能停留，哪怕停一步都可能丧命，必须尽快翻过山顶，下到氧气较多的高度上去，不能休息，可实在是太糟了！肌肉麻木得好象不存在了，可是还得坚持走。一旦越过山顶，最好的办法是坐在冰上往下

滑，反正没有路。不少人都这样滑了下去。有些人摔断了骨头，有些人不慎滑下了悬崖。尽管如此，这仍不失为最好的办法。

伤亡的大多是后勤人员，如担架员（当时还有抬担架的）和炊事员。^⑮

炊事员们不顾轻装的命令，坚持负重六十到八十磅，锅里还装着米和其他食品。三军团的炊事员在山顶停下来，为抢救病人做鲜姜辣椒汤。（毛曾告诉警卫员，爬山前要吃些生姜和辣椒。）^⑯炊事员坚持说：“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死在雪山上。”他们把热汤递给别人，两名炊事员却倒下了，再也没有醒过来。红军到达陕北时，这支部队牺牲了九名炊事员。^⑰

对于体弱和有伤的人来说，空气稀薄格外令人难受。据姬鹏飞回忆，当时几乎无法看护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送下山，可是谁也没有气力这样做。往往还没有送到低处，他们就牺牲了。他们常常死在卫生员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姬鹏飞说：“牺牲的人很多，天气太冷，有些是冻死的，有些人根本喘不上气来。”

派了一些人沿途收容掉队的人。这些“掉队的人”往往是掩埋在雪下的尸体。由于海拔太高，水已无法烧开，火柴也很难划着。找不到柴火，看不见村庄，看不见人烟。翻山用了一整天。到了山的那一边后，海拔仍然很高。^⑱

水是个问题。无法把雪化开。战士们不得不刨开地表的冰雪取下面的雪解渴。无法修厕所，因为没有能在冰上和山石上挖茅坑的工具。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鞋。有些人找到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包，四肢冻伤了。有

些战士是光着脚翻过雪山的。大多数人穿着单军装。许多人得了雪盲症，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才逐渐恢复。^{②②}

对危秀英来说，爬雪山和过草地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刻。她说：“过雪山后，我便不来月经了，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②③}

当时，年方二十岁的丁甘茹随后卫部队五军团翻过雪山。他们到得最晚。他说：“翻山前做了许多政治工作。”他指的是各部队的政委告诉战士爬山前要把衣服松开，以便于呼吸，走路要慢，但绝对不能停。他说：“我们好象成了一群马上就要被人领进公园的小学生。”爬到山顶后，下达的命令是：“坐下来往下滑。”他们照办了，但有些同志掉下山去，再也见不着了。^{②④}

一九八四年，李一氓忙于文化交流。一九三五年时，他是一个政委。他对长征中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对大雪山也是如此。他认为翻雪山并不困难。相比之下，翻越五岭的最后一岭要难得多。他说：“雪山不高，上山的路很好走，不陡，下山的路也不陡。”但他承认下山的路上全是冰，很滑，天气很冷。没有人烟，藏族牧民都吓跑了。^{②⑤}

还有一些人觉得雪山没有什么了不起，钟伶就是其中之一。他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时才十二岁，翻大雪山时刚满十六岁。一九八四年，他已是六十五岁的老医生了。但看上去还很年轻，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上身穿一件浅蓝色衬衣，再配上灰色的裤子和袜子，完全是一副专家的模样。他在江西老家参加红军时还不够领枪的年龄。他在宣传队工作，负

责往墙上刷标语。他家里很穷，一年中有四个月缺粮，不得不向地主借，欠下了永远还不清的债。

钟医生在长征途中是个卫生员。他说：“当时我们是红小鬼，年纪轻，生命力旺盛，体力恢复得很快。我想得不多，只知道吃饭、睡觉、行军，从来不去想会有什么危险。我们坐在吹足气的猪皮筏上过河，我从未掉下去过。”

翻越雪山有种种困难，但钟医生一点也不在乎。他应该穿上暖和的衣服，但他没有。他只有一件汗衫和一件单布褂。当时是六月天气，可是夹金山上却下着雪。他穿的是草鞋，也没有裹绑腿，脚却没有冻坏。他从未感觉气短。有人交代他不许停，不许休息，要一口气走完。他就这样翻过了雪山，没有看到一个人死去。据他回忆，三军团医疗队中他所认识的人中没有人牺牲。

“请记住，”他强调说，“当时我还年轻，困难对我影响不大，想得也不多。”^{112⑩}

党的总书记胡耀邦比钟伶只大一、两岁，可他对翻雪山的回忆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他记得看见了国民党的飞机。那些飞机飞不到红军所在的高度。“我们朝着飞行员大声喊：‘上来，上来呀！’”他说。第二座雪山最要命，用了两天时间才翻过去。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宿营，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挤在一起取暖。他说：“我们年纪轻，挺过来了。”^{112⑪}

总之，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翻越雪山是长征开始以来最艰苦的一关。其艰苦程度超过湘江之战，超过翻越五岭，也超过四渡赤水。比起只有少数人参战的抢渡金沙江或

飞夺泸定桥来更是艰苦得多。有些指挥员也病倒了。一军团年富力强的司令林彪在夹金山顶上几次失去知觉，靠了警卫员的帮助才翻过山去。红军情报局局长徐迪宁也是如此。^⑲据警卫员说，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去帮他，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未穿棉袄。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不久便湿透了。路上又遇到一阵冰雹，只好躲在油布下避一避。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毛把他扶起来。而当毛停下来鼓励战士往前走时，又是陈设法帮助毛重新迈开步子的。^⑳

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说长征中过雪山最困难。战士们手拉着手以防摔倒。山上不是下雾就是刮风，积雪常常从山头崩落。魏头晕目眩，浑身无力，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一口气，越走越慢。起风了，魏看见自己的一个同乡倒了下去。还没等他走到跟前，那人就已停止了呼吸。战士们把尸体放在山缝里，用雪掩埋好。下午三点他们到达顶峰，开始下山。^㉑

下山后，周恩来频频咳嗽。他着了凉。这是一场大病的最初症状，这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㉒

四方面军派李先念去迎接一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当时驻扎在理县（杂谷脑）。他带领他的第八十八师和九军第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一部于六月八日占领懋功（今小金），六月九日占领下山必经之地达维。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电告李先念，预计一方面军六月十日可以到达。李先念十分惊讶。他没想到会这么快，怀疑韩的报告不准确。他电示韩再核实一下，韩回电说：“情况准确，他们业已到达。”^㉓

情况是准确的。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于六月十一日翻

过雪山，并于六月十二日上午到了达维。^{③②}这里距雪山不到二十五英里。当一方面军的侦察兵发现四方面军派出的部队后，一时敌友难辨，双方都打了枪，但无人伤亡。当吹响军号，双方便弄清了对方的是谁。^{③③}

一方面军的部队川流不息地开进达维。李先念急忙从懋功赶来。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仍在病中）、朱德、彭德怀、叶剑英、林彪等都下了山。李先念回忆说：“当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欢乐气氛。人人兴高采烈。一方面军风尘仆仆，看上去人困马乏，四方面军战士的身体情况比较起来好得多。”^{③④}

当时，达维还是个不显眼的村子，有一百零六户人家。附近的小山上有一座大喇嘛寺。这里盛产鸦片，是个鸦片之乡。至少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罂粟。每年初秋，达维一带村村卖鸦片。

六月十四日晚，在村外喇嘛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盛大集会。幸存者估计一万人参加了大会。毛阐述了团结和北上抗日的必要性。晚会演出了戏剧、歌舞，还举行了会餐。食物和其他用品都是四方面军从地主手里没收来的。^{③⑤}

李伯钊又唱又跳，观众反复要她再来一个。她跳的苏联水兵舞，受到热烈欢迎，这是她在莫斯科学会的。大家不让她停下来！她也好象精力特别充沛，跳上一整夜也不在乎。^{③⑥}

当晚，毛和李先念谈了一次话。毛问李三十军有多少人（李以前指挥第九军，此时指挥第三十军）。李说有两万多。毛问他多大了。李说二十五六。五十年后的今天，李对当时未

做好迎接一方面军的准备工作仍然感到抱歉。“我们到后他们跟着就到了，”他说，“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我们作了最大努力，甚至补充给他们一千来人。一、四方面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可争吵的。”

第二天，毛和他的司令部人员继续前进。还要翻过不少山，包括一些雪山，才能同张国焘最终相逢，这将是他俩在一九二三年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上各执己见以来的第一次重逢。

第二十三章

毛 张 会 师

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于六月十五日晚抵达懋功，在那里耽搁了几天。六月十六日晚，毛在懋功河边的天主教堂里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就住在教堂对面的一所漂亮房子里。周恩来、朱德、博古和洛甫住在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里。毛几乎总是与他的同志们分开住的。

通往懋功的高山隘口几乎终年积雪。一九八四年五月下旬与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样，残雪点缀着绿色的草原，爬上高达一万一千英尺，山坡的杜鹃花也披着银装。

毛及其同伴策马沿狭窄的懋功河谷走着。气候温和的山谷里，丁香色的杜鹃花已从墨绿色的叶子中探出头来。山坡上长满了一片片的柴罗兰——或者是在外行眼里看上去象紫罗兰一样的花朵。山谷不很宽，没有多少土地可以耕作，房子也很少。尽管下着雨，但比起翻越夹金山来要轻松愉快得多。

与毛同行的指挥员只有几个。这大概不是偶然的現象。他已派三军团的彭德怀和一军团的林彪率领大部分人马向不同的方向前进。也许他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这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

毛于六月二十四日抵达两河口镇，可能在一座相当壮观

的喇嘛寺的底层住了下来（这座寺院的底层现已被拆除，用来堆放木材）。

六月二十五日上午仍在下雨。毛一直在等待，直到有消息说，张国焘就要到了。于是毛和他的一行便前往离镇约三里多路的一个叫作抚边的村庄。那里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墙上刷着口号，街上贴着标语，红旗上用白字写上了欢迎口号。村与村之间装上了电话，这样，两支军队可以保持联系。还在草地上搭起了一个讲台，以便举行仪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两支主要的共产党军队及其领导人第一次会师。五年来，张一直率领第四方面军在作战，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毛自一九二七年以来，除博古和李德让他靠边站的一段时期外，也同样地一直在战斗。

大雨倾盆而下。毛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等待着。下午五时左右，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沿着泥路，溅着泥水过来了。毛及其一行走出暗褐色的帐篷，迎上前去。一会儿，马队便来到了跟前。张身材魁梧，面色与毛久经风箱的脸色比较起来显得白净，他翻身下马，和走上前去的毛拥抱。

红军欢呼起来。数千群众欢呼起来。两人登上讲台，制服上滴着雨水。毛致欢迎词。张作答词。接着两人肩并肩一起走进城里，在喇嘛寺里举行了宴会。当时在场的目击者李群，一九八四年时已六十四岁，依然十分壮实，整齐的外衣下面露出一件衬衣。他是亲眼看到他们两人一道行走和这一切的，他兴奋极了。当时他才十五岁，是第四方面军的一名红小鬼，他认出了张国焘。有人喊道：“那是毛泽东！”他曾

多次见过张国焘，认为张说话温和，对部下战士和气。

一切庆祝的表面排场都有了——旗帜、标语，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堆的饭和菜，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还有当地酿造的类似贵州名酒茅台的烈性白酒。

但是骨子里——而且就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潮流：怨恨，敌意，猜疑。

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说：“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

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但是第一方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大概不超过二万人，尽管张国焘不可能作精确的计算，因为毛已将其部队分散到好些地点。张也夸大了自己的实力，就象长征开始时第一方面军夸大自己的实力一样。但是不难看出，第四方面军比第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张有七万至八万战斗部队，可能还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他与毛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

从两位领导人身上也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有位红军战士由于见到四方面军的马长得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斥责道：“别羡慕那些马！”那天晚上对四方面军确是赞声不绝。后来在参加长征的人员中产生了一种

感觉，认为张是个野心勃勃可能不讲原则的人，是故意在炫耀自己的成就，对毛的部队流露出傲慢之意。也许是毛的人过于敏感。但是使他们感到恼怒的是，毛及其司令部人员站在雨里等候，而张骑着马象旋风一般地驰来，下马之前差一点溅了他们一身泥。四方面军还把张叫作“主席”，他们听来也很刺耳。“主席”这一头衔是他们专留给毛泽东的。四方面军的军帽也比一方面军的大，于是四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大脑袋”，一方面军的人被叫作“小脑袋”。

宴会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张国焘认为欢乐只是表面现象。毛三句不离吃辣子，他说，不能吃辣子就不是真革命。祖籍江西的博古表示异议，他坚持说，江西人中不乏伟大的革命者，而他们并不喜欢吃湖南的辣子。毛勉强但笑呵呵地承认了这一点。张国焘听后觉得很“无聊”。他感到不快的是，似乎无人有兴趣请他讲四方面军的成就，也没有人告诉他遵义会议的细节。而毛的人则声称，张国焘对第一方面军的经历不感兴趣。

晚宴后，张请朱德进行谈话。两人一直谈到清晨三点。张是否试图把朱拉到自己一边来呢？也许有可能。或者他只是想向朱探听消息。朱对此未作任何记录。张写的回忆录是在他与共产党的同志们决裂以后很久才写下来的。他引用朱的话说，中央红军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他说朱估计一方面军的人数为一万，这点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太远。所有的大炮都丧失了，机枪所剩无几，每人只有五六颗子弹。

这些与事实相当接近，张国焘的回忆录中引用朱德批评毛和赞扬张的四方面军的那些部分则不那么可信。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写道，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象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⑩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的这种态度与他们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难说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政治观点上的差异。然而，从照片上来看，张看上去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同瘦骨嶙峋的“长征战士”（特指一方面军的领导人——译注）相比，他显得柔弱。

实际上，一九三五年三十八岁的张国焘，他的资历在共产党中是首屈一指的。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是该校的学生。他们就是在那时认识的。两人都在一九二一年建立共产党的十二名创始人之列。从早期起，张便是党的领导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在南昌起义中，他与周恩来在一起，发挥了一点小小的作用。他在莫斯科待过三年。一九三一年，上海的中央局派他去领导非常重要的鄂豫皖根据地。从那时起，他便一直驰骋疆场，战绩可与毛在江西的战绩相媲美。他同蒋介石打了不少大仗，而且取得了胜利。他两次转移根据地——第一次是从鄂豫皖边区转到川陕边境，后来于一九三五年春转到川西北。和张国焘一起转战各地的有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就是徐向前。徐向前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国的十名元帅之一。虽然张国焘的作风与毛不一样，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比当代中国史学家所承认的要大。

张喜欢独立行动，常常与中央委员会发生争议（就象毛一样）。一九三二年，他从鄂豫皖转移到川陕一带，因未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便擅自行动而受到批评（有点儿象毛在井冈山的情况）。可是他的转移是成功的，批评也就自然消失了。转移到川西北的行动遭到了更多的批评，但是此时中央委员会正在长征之中，通讯联络几乎中断，因此张不可能受到严厉的谴责（事实上也没有）。

张已作出安排，或者试图作出安排——要在他展开活动的几个省里与当地的军阀和睦共处。一九三二年入川后，他给四川军阀杨森以及四方面军驻扎地区的军阀田颂尧写了信。田拒绝接信。杨虽收了信，但却因事不关己，不加理睬。张给孙蔚如也写了信，孙是陕西仅次于杨虎城的第二号军阀，孙与张国焘达成了协议。解放后，孙成为陕西省的副省长。^⑪

张入川后没有搞土改，也没有建立苏维埃政府。中央委员会对此进行了批评。大约两个月后，他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大概是在他决定要留在这一地区之后。^⑫而现在，张同四方面军占领的川西北地区的军阀没有什么谅解，因为他足以对付他们可能发动的任何军事进攻。^⑬

就在会师之前，张再一次独立行动。此时他已控制了很大的地盘——金川、小金（原懋功）、松潘和黑水等县。这几个县今天的面积是八万九千平方公里，一九三五年时可能还要大得多。一九八四年的人口是七十五万。三十年代中期大概是二十或三十万。对中国来说，这是人口稀少的地区。但这里土地肥沃，是个产粮区。张还有八万战斗部队和同样数

目的非战斗人员。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就在毛和一方面军到达的前夕,张宣布成立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它不是正式的苏维埃组织,而是一个符合当地少数民族(在当地其实是多数民族)比例十分高的情况的混合政权。周纯全就任主席。首府设在北川。北川位于成都东北约八十英里处,周围多雪山,居民多为藏族。周纯全的第一项工作是教他的士兵吃糌粑。糌粑是藏民的主食,用青稞面做成,又称“五味茶”。但名不符实,吃时要用手抓。^⑭

张国焘的军队与毛的第一方面军不一样。张的部队中有许多妇女,包括一支有两千人的妇女战斗团。他与少数民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主要原因是他不象第一方面军那样经常转移,因此能够用事实证明,他的部队与那些到处掳掠的军阀部队不一样。跟其他红军部队一样,他打富济贫,把一部分粮食、鸦片、布匹、钱财分给穷人,留下的部分足够满足自己的需要。此时他的军队粮草充足,还能向非常穷困的第一方面军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⑮

从现存的材料看,张没有干预鸦片生产。鸦片是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但是他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⑯

张不准战士抽鸦片。但也有例外。有个名叫金禁川的老中医,他有鸦片瘾,就获准抽一点鸦片以支撑精神。^⑰

所有红军部队的内部保卫工作都非常严。彭德怀在狱中自述中写道:“不依靠群众的单纯肃反观点,造成军内人人自

危（他是指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的情况），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限制。”他补充说：“原属政治部领导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为政治部平列机关。”^⑮四方面军的情况也是一样。李先念一九三一年时是四方面军的一位年轻排长，他回忆说，张国焘到四方面军后，下令进行大清洗。许多人被逮捕和处决。曾任红一军军长的许继慎也被处决。许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也是徐向前的同学。长期同张共事的徐向前一度也遭到了指控，但他设法证明自己的无辜而解脱了。

尽管张有李先念所说的这些错误思想，但他是打了几个漂亮仗的。然而，张继续逮捕和处决他所不信任的军官。

李先念说：“我可以向你举出四十位在西方面军清洗中被杀害的同志的名单。”一九三一年，几乎所有的团级干部都遭到清洗，很多团里缺乏领导人。李说，他因此当上了团的领导。因为他的领导原是国民党军官，给清洗了，后来复了职，在战斗中阵亡了。李认为二方面军清洗的人比第四方面军还要多。^⑯

两河口喇嘛寺里举行盛宴时，一位名叫廖承志的画家却由张的军队看管着，郁郁不乐。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四方面军之前曾在上海担任海员工会的秘书。据说一九三四年，有人注意到，他的党员登记表上面写着，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代表，他的母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是被指控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双手被绑在身后，强迫行军。

没有比这更荒唐的指控了。在中国或张国焘的情报部里没有不知道廖承志的身份的。

他的双亲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革命家。他父亲廖仲恺在孙

中山领导下制定了联俄联共的政策，孙死后被国民党右派（可能包括蒋介石）暗杀于广州。对廖承志的指控只能是出于一种恶毒的偏见。要不是他幸而能画画和绘地图，他早就被处决了。他刻蜡纸也刻得很好。廖的母亲何香凝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的挚友。^{②③}随着岁月的流逝，廖本人也成了孙夫人的密友之一，并在毛泽东的政权中担任要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重庆被国民党绑架，由于宋女士的积极干预才免遭不幸。后来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九八三年去世。长征中，张国焘一路上带着他，直至四方面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陕北。周恩来立即加以干预，使廖获得释放。廖获得自由后，把画图纸、蜡纸和刀笔等放在一张桌子上，然后对着它象对着祭坛一样鞠躬。廖说：“要不是你们，我就完了。”他是已故的飞虎队创始人之妻陈香梅的舅舅。^④

党内的亲莫斯科集团被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徐以新是这个集团的第二十九名成员。（实际上还有许多其他人，总数可能达一百。）由于徐以新年纪很轻，被人称为“半个布尔什维克”，这批人有时统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徐以新被派到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二年他代表四方面军同国民党的杨虎城将军在川陕边境举行秘密谈判。后来张国焘违背协议，于一九三四年二月消灭了杨虎城的一个团。徐以新表示抗议，张国焘就把他抓了起来。因此，两河口会议时，徐也是一名囚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担任了驻巴基斯坦大使。

四方面军的另一名囚犯是罗世文。他原是四川地区党的

书记。他带了三百人到川西北加入张国焘的队伍。张不信任他，把他软禁起来。后来他在重庆被国民党抓获并杀害。^{②②}这类例子很多。

六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共产党领导人在两河口那座古老的喇嘛寺里举行会议。据张国焘回忆，出席会议的有六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洛甫。刘伯承和红军保卫局首脑邓发也在场，可能还有张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徐向前。^{②③}

马尔康博物馆工作人员文星明介绍的与会人员略有不同。他说会议参加者有：毛、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洛甫、刘少奇、凯丰、聂荣臻、张国焘、林彪和李富春。^{②④}

周恩来主持会议。毛首先发言。他提议红军继续北上，并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据张国焘讲，毛说共产国际曾建议红军向外蒙古方向移动，这样容易和苏联取得联系。据博古讲，这原是共产国际建议的万不得已的办法，是在长征开始之前用无线电发来的。博古证实，自“那时”以来，即前一年的八月以来，红军已有十个月没有与共产国际联系了。^{②⑤}

张国焘回忆说，毛的讲话给他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毛既未提抗日（他想，大概因为当时他们对日本人的情况所知不多），也未提到前往陕北，大概因为还不知道那里有共产党的根据地。

有关这次会议的情况，中国人现在的说法有些不同。现在的说法是周恩来首先发言，重点谈了三大问题：抗日的战

略，北上的问题和领导权问题。^{②③}

张国焘称，他对毛的甘肃——宁夏计划提出两个替代方案。一是进一步扩大川北、甘肃和西康的现有根据地。二是穿过甘肃走廊，向位于大西北的新疆挺进，到了那里就有可能与边界那边的苏联取得联系^{②④}

胡华教授也许是最了解情况的现代史专家。据他说，会议决定巩固张国焘在川西北建立的苏区。大家一致同意夺取松潘。松潘位于大草地的边缘，扼守着绕过沼泽地带的道路，攻下松潘就可以打开通往甘肃的道路。^{②⑤}

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一项五点决议，但内容从未公开过。

其中有几点是批评张的，特别批评了他把根据地转移到川西北。如果张的话可信，毛嘲笑了张的这一行动，认为这样做是放弃根据地，增加了长征的困难。张称两河口没有作出正式决定，毛答应还要进一步讨论。这大概与事实不符。会外有许多交谈，双方一直在摸对方的底。张不断打听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情况。

两河口会议开了三个小时。据张回忆说，午饭后，周恩来找他，建议两个方面军组成统一指挥部，张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建议合并某些部队。张对此表示高兴。傍晚，周送来指示，要部队北上。张说他争论了几句，但还是接受了。

据聂荣臻讲，这一指示的内容是：

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至全中国的胜利。^{②⑥}

幕后却在进行活动。彭德怀在狱中自述里回忆说，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带了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来看他，并送给他二三百元银洋。黄坐下就问会理会议的情形，并说什么欲北伐必先南征。彭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策略。^{③①}

聂荣臻也讲了类似的情况：六月二十七日张国焘请他吃饭。席上，张一再说聂荣臻和其他人很疲劳，称赞他们干劲很大。张说他已决定拨两个团给他们补充部队。使聂遗憾的是，这两个团实际不过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只有一千人左右。

聂回忆说，彭德怀当时也在场。当他们从张住处出来时，聂问彭：“张为什么要请我们两人吃饭？”彭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聂说，我要。黑夜中聂边走边思忖，张究竟想干什么？^{③②}

聂荣臻说，有好多麻烦事。有些人向张提供的遵义会议情况有误，结果加深了张对毛的疑虑。^{③③}

不管毛和张的关系如何——中国现代史专家用“冷淡”来形容两人之间的关系——第一和第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相处一般都是十分融洽的。^{③④}

杨尚昆将军的夫人李伯钊与宣传部长陆定一合写了一首歌来纪念这次会师。

一九八四年，李伯钊已七十三岁。她轻声为我们唱道：

一个英勇善战，
不畏艰难；
一个腹有良谋，

运筹帷幄。

“头两行，”她说，“是写第四方面军的。后两句是写第一方面军的。”

李伯钊对懋功有着一段辛酸的记忆。那里有一位十九岁美丽活泼的女青年找她要求加入红军。她名叫厩香，母亲是汉族，父亲是个卖剪刀、针线的藏族小商人。她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她的母亲已去世。她叫李伯钊“大姐”，恳求让她参加红军。当时的纪律很严，规定不再吸收妇女。厩香态度十分坚决，晚上就睡在宣传部办公室的地板上。

李伯钊去找李富春（他是蔡畅的丈夫）。她说这个姑娘无父无母，非常穷，坚决要求参加红军。在李伯钊的请求下允许让这个姑娘留下。厩香在队伍里帮着背东西，能在没有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她性格爽朗、活泼，为李伯钊及其助手们做了不少饅饼和其他好吃的东西。

“她在过草地时死去，”李伯钊说，“她在荒野里迷了路，再也没有找到她，她大概是饿死的。我仍然怀念她。”李伯钊说着眼角里噙着泪珠。

六月三十日上午，毛在周恩来可能还有朱德的陪同下又出发了。他北上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其中的梦笔山是雪山第二高峰，高达一万四千多英尺。梦笔山比夹金山低二百英尺，爬起来也容易些。他们越过隘口，沿途大都是雪线以下的牧场，没有遇到大的危险。山路漫漫，他们不得不在山坡上扎营过夜。他们也许是碰上了好运气。有些红军战士回忆却遇到了可怕的困难。五十年以后的五月底，山上还有

大量的积雪。

第一方面军沿着同一条路线走了过去。张国焘第二天才出发，情绪不太高。他回忆道，他感到毛和第一方面军待他很不好，对他进行了诽谤。他们故意欺骗他，他们走了，他反而感到高兴。^③

红军即将面临严重的危机。

第二十四章

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红军行进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来越深入到被英国探险家埃里克·泰克曼爵士称为“中国最鲜为人知的地区”。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是个未经勘测的空白，没有人来探过险，没有人居住过，而且也不能住人。这里实在不象是中国。凡是中国人来到这个只有月亮、雪山和一望无际的荒原之地都会感到不适应。甚至连英国专家管理的中国邮政也没有达到这个地区。懋功和松潘以远就没有邮局，会理以南没有邮政所。

自红军进军金沙江接着翻过大雪山向草地挺进以来，他们的行踪在地图上就再也找不到了。由于人烟稀少，人们无法从村落住房上找出自己所在方位。这里只有藏民，四个世纪以来，他们缓慢地进入了这个无人知晓的地区。

现在，甚至藏民也因害怕而逃到更荒凉的地方去了。只有小股藏民在山头上向没有戒备的红军战士放枪或扔石块。战士们奉命不准还击。可是，他们渐渐地开始违反命令了。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可怕的荒野。红军从未见过人烟如此稀少的地方。这里看来是危险地带，无房可住，连个问路的人都没有。从早到晚不见人影。偶尔能见到一头牦牛，活像一个缓缓移动的烂布堆。没有人，没有食品。有时找到吃的，可又不是大米，而是青稞。伙伙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好。他

们来自南方——中国的粮仓。不少战士吃生青稞吃坏了肚子。

红军对这个地方困惑不解。不是因为无知，也不是因为迷信。他们已远远地跨过了一道地理屏障，进入雪山高原。不论是爬雪山还是过草地，他们都是在海拔一万英尺，或一万一千英尺，甚至更高的高度上行军。连绵不断的雪山，山脉走向如何谁也不清楚，他们面前似乎有翻不完的山，雪峰一座连一座，隘口一个接一个。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头？还能不能回到熟悉的故土？令人迷惘。

两河口会议后又过了几天，毛率领部队下了雪山，他们走出了只有几间房屋的村子（现在叫红军村），沿途丘陵起伏，走了十二英里后，来到卓克基官寨——一座城堡式的藏民土司宫。

这座土司宫是一座用石块砌成的七层塔楼，所用木料都经过工匠的精心雕凿，远远望去，宛如一座拔地而起的亚洲比萨塔，这是红军在六千英里远征中所见到的奇景之一。土司宫四周筑有坚固的石堡，有三四层楼高，上面砌有诺尔曼城堡那样的炮眼和箭垛。土司宫面积极大，据说，它的房屋和庭院可以容纳五千到六千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时一方面军的全部人马。两条小河在土司宫外汇合，成为它天然的护城河，它的背后是高耸的石崖。

土司宫坚不可摧，迄今已存在几个世纪。它的主人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红军迫近时已弃城而逃。毛和他的司令部随即进驻土司宫。这座七层建筑，四周的柱子漆成红色、黑色和绿色，一层层的阳台雕刻精细，山墙上镶着装饰用的宝石。直到今天，长征老战士提到它时仍不免叹为观止。住房

壁上装饰有挂毯和藏文条幅，屋里摆着缎面靠椅和雕花家俱。楼里还有一个收藏有藏文和汉文经典古籍的图书馆，有一层楼全是佛堂，佛龕上嵌有玉石和金银饰品。玻璃窗清洁明亮。

底层是厨房，里面有巨大的炉灶，还有大得惊人的用铁或铜制作的锅、盘子和水壶，足可供一支大军备炊之用。底层的一侧是马厩，二楼用来贮存食品，粮食米面都装在桶里，盐糖调料放在柜橱里，宰好的整只牛羊放在搁板架上，豆子和食油装在陶罐里。此外，这一层还有工具房、武器库以及卫兵和军队的宿舍。

三楼是土司的住房。客厅里镶有大理石和孔雀石，卧室内有一张木床，几把古色古香的椅子，一个镶嵌着螺钿的衣柜和一张红漆书台。毛就在此下榻。四楼全是佛堂，除了佛龕佛像，系着红纓的铜锣鼓外，这里还有藏式雕象，藏文幢子和经书。

房间虽然富丽堂皇，但毛在此稍事休息后即先走一步。红军大部队留在卓克基休息，补充给养，继续对藏民进行宣传。

藏民一向仇视汉人，国民党又从中挑拨煽动。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天宝是藏族，他原是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一员。他记得小时候就有人告诉他，汉人常常进攻打藏民。红军迫近时，国民党到处造谣，说什么共产党来了要杀藏民，还要吃藏民的孩子。藏民自然害怕并仇恨红军。四方面军先到，一方面军后到，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在此驻扎了好几个月。他们宰牛征粮。尽管红军付了银元或打了借条，藏民仍然觉得红军拿走了他们的财产。

“一方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停留，”天宝回忆说，“他们穿过的是一个空荡荡的村落，沿途十室九空，人都跑光了。部队要生存下去，不得不见牛就杀，把埋在地下的粮食挖出来。很难说每次都付了钱，这样影响当然不好，但另一方面，红军必须生存下去。所以很难讲谁是谁非。”

进入这个地区，人人神经都很紧张。随时有可能遇到藏民的伏击。红军战士有的受到袭击，有的被抢劫一空，有的被剥光衣服，有的甚至被杀。红军由于伤亡太大，部队的人员组成已不平衡，干部多，战士少，有些部队几乎都是干部。上下关系也有些紧张。

一天，毛的卫士长陈昌奉竟然也对另一个警卫员大声叫嚷，而那人也不相让，两人争吵不休。原来，陈昌奉患了严重的腹泻。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腹泻时粪便溅到了那个警卫员的身上。毛听后大步走了过去。“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他口气象一位严师，“我们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那么多人，现在剩下的不多了。这样争吵值得吗？”警卫员们听了都感到惭愧。陈昌奉主动帮战友洗了裤子，那个警卫员不让陈洗。他们俩后来一起动手拾掇干净，继续长征了。

红军翻山越岭，穿过马塘（那儿几乎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茅屋都没有，毛在吊铺上渡过一个雨夜）、马河坝、黑水，沿黑水河畔向毛儿盖进发。黑水河河水湍急，咆哮的水声犹如万马奔腾。他们一路上不时停下来，收割农民遗弃在田野中的青稞，收割时朱德总是打头阵。他和青年男女战士开玩

笑，说他们不象他那样能背四五十斤粮食。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却是例外，她是一位身体强健的中国农家姑娘，她肩上至少背着一支枪和背包，手不停地挥动镰刀，毫不比她丈夫逊色。人人都知道，筹粮是红军的当务之急。

七月一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地区，大约于七月十日进驻了藏民的村子。村里有近四百户人家，房子一般是两层，多数用石头砌成，屋顶平平的。这些藏式农舍的四周，挂着祈祷用的白幡。村口的路旁有守护神像（现在还存在），它们象是《仙境术士》里的巫神，一脸凶相，站在那里为村民降魔驱贼。毛儿盖一带盛产青稞，此时地里的青稞业已黄熟，等着开镰收割。据说一年的收成可以吃三年。

红军在毛儿盖停留的时间相当长，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休整，缝缝补补，修理枪械补充粮草。同时，现在，也只有现在，红军的领导者们可以讨论一下前途了。因为所有的迹象表明，情况将肯定会好起来。

果真如此吗？面前就放着一个大困难。毛儿盖位于松潘县城以西约三十英里，离红军要去的甘肃只有六十英里。这点路程似乎微不足道，但事实上，就是这短短的距离也很可能使人致命。毛儿盖处于大草地边缘。中国人委婉地把黄河以南的这片茫茫泽国叫作大草地。红军在这里跨越了中国大陆的一条地理分界线，这片隆起的高原成为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黄河就发源于这个世界屋脊，穿过小半个华北，途中拐了个大弯，最后归入大海。历史上，它的滔滔河水多次改道，常常是在远离故道数百英里外的地方冲

出一条新的河道，它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

就在这连接着中国两大水系的高原上，红军从长江流域跨入了黄河流域。

红军要越过人们美其名曰的“草地”，这块土地却似个死亡的大陷阱。它完全泡在水里，恐怕千军万马陷下去也不会留下痕迹。唯一的一条能通行的道路又必须经过国民党军队把守的松潘。因此能否拿下松潘对红军至关重要。两河口会议上一致同意必须拿下松潘，任务交给了张国焘。

红军刚刚进驻毛儿盖，周恩来就草拟了攻打松潘的作战计划。他把计划交给了张国焘，但张却改变了计划，至少现代史专家是这样认为的。他不是立即组织攻打松潘，而是派他的三十军前去佯攻。三十军包围了松潘，却没有发起攻击。松潘的守军人数不多，指挥官是胡宗南。一九四三年国共合作期间，胡宗南在重庆的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当时我们人很少。我的司令部设在城里的一座庭院里。我记得我曾想过如果红军包围了松潘，要是我被抓住，该怎么办？”胡宗南还记得，他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当过他的老师。“他会照顾我的。”胡宗南独自想着。

但是，胡宗南不需要找他的老朋友帮忙。援兵一到，三十军就撤走了。现在，人们认为张改变进攻松潘的命令是故意破坏，因为张不想北上。他认为国民党太强，红军应该向西和向南走。

这也许是周恩来病倒前草拟的最后一个作战计划。自过雪山以来，他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尽管他自己不说，警

卫员们都知道他相当虚弱。他们想方设法让他多休息，而周总是按习惯工作到凌晨二点。他常不上床睡觉，而是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儿，醒来又继续工作。

“副主席更瘦了，他的长胡子更长了。”警卫员魏国禄这样写道。

周这次病得很重。他差一点丧生。他的体温曾上升到华氏一〇四——一〇五度（摄氏四十度以上）。毛派人去请傅连璋大夫，但是傅离得太远（傅当时在四方面军），后来从一方面军请来一位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⑪周的病与他的肝有关，中国人叫肝脓肿，似乎是一种急性肝炎。他一连几天不退烧，神志昏迷，说胡话。红军战士轮番从附近山上取雪，用雪给他降温。他的妻子邓颖超来到他身边，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无法照顾周，这与有些故事中的说法相反。看来，她到处寻找能充饥的野草野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她确实为周炖过补品白木耳羹。周末能出席在七月底八月初举行的毛儿盖会议。^⑫

据杨尚昆将军回忆，周大约病了两个月，七月的部分时间再加上整个的八月和九月初。“他得的是肝炎，”他说，“我们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部队一旦行动，就必须用担架抬着周走，毛指定三军团负责此事。彭德怀的三军团仍拖着两门迫击炮行军（红军当时共有八门这样的炮），他决定把炮扔掉，这样腾出了四十名战士。

彭把照顾周的任务交给陈赓。陈是高级政治委员，三十一岁，生性腼腆，长着一张娃娃脸，脸颊红润，鼻梁不高。他

曾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学员，后来成为红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

孙中山的军队初战广东军阀时，陈赓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蒋介石的一师人马被击溃，绝望中蒋举枪自杀，陈救了他一命。“我必须死在这儿，我已没脸见人。”蒋哭喊着。陈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敌人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正要扣动扳机自杀，陈背起蒋撤到了安全地带。

后来陈赓被国民党抓住，蒋试图诱使陈归顺国民党。尽管陈嗤之以鼻，蒋还是让陈逃脱，显然，他想用软的一手把其他共产党指挥员争取过来。^⑫

“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周开玩笑地对陈说，“现在要救我的命了。”^⑬

不久，周的身体渐渐复原，在同张国焘摊牌时他没有起什么作用。

连日来表面上的平静仅是假象。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在进行着紧张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还是政策、个性和权力，这也是长征中出现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张国焘多年来自处一方开展斗争，而且颇有建树。他同毛泽东之间没有那种使人亲近的个人关系。尽管他也在莫斯科住过很长时间，但他并不喜欢那些“布尔什维克”。他同一方面军所有的政工和军事领导干部都谈过话，但看来他没有找到同盟者。他同朱德的关系算是最和谐的了。尽管朱德的态度似乎有点模棱两可，尽管他曾设法使张和毛观点一致起

来，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事实证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张的人。李德的回忆录表明，虽然他从不信任也不喜欢毛，但他对张国焘并无好感。博古也是如此。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回忆录都表明，张未能把他们争取过去。

反过来也是一样。毛的人也试图争取张，但也没有成功。只有周恩来能够凭借自己的外交手腕使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可是他的病使他无法这样做了。

李先念当时是张手下一位优秀的年轻指挥官，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张有“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的野心”。

李先念认为张国焘会这样想：“一方面军人少兵弱，而我有八万人马。应该由我来作决定，并进而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⑩

部队向毛儿盖缓缓前进时，争论还在继续。张和他的一些代言人一直力主西进去青海，深入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毛和他的拥护者则认为那些地方太偏，一无资源，二无足够的粮食，三是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兵源，红军到了那里将无处存身。如果北上，进入甘肃、宁夏，就到了汉族地区，那里有粮食，还可以招募新兵。毛争论说，越向西走，红军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就越小。

到了毛儿盖和离开那儿以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⑪

两河口会议对一、四方面军合并所作的初步安排，于七月十八日开始生效。那一天，发布了一个命令，周恩来放弃了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在此之前，张出任军委副主席，和周恩来和王稼祥担任同样的职务。朱仍然担任主席。张的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成为总政治部主

任。翌年十二月，毛担任了军委主席，毛、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七人主席团。^⑬

这一切都似乎在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但争论就象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正在嗒嗒作响。^⑭关于毛儿盖会议，有关的回忆录说法不一，在开会地点、会议次数、哪些人出席了会议等问题上，众说纷纭。但是，对会上发生的事情倒没有多少分歧。长征史专家胡华认为开会时间是八月六日，地点在沙窝的一个喇嘛寺里。

张国焘也说会议是在沙窝召开的。沙窝是一个美丽的藏族村庄，周围是葱郁的山谷，距离毛儿盖约五六英里，好象是“世外桃源”。张抱怨说，一方面军包围了会场，控制了所有的入口，不让他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会议，强迫他通过一连串检查岗。他说：“既然中央机关自卫得如此严密，总司令部用不着替它们的安全操心了。”^⑮聂荣臻说，会议在张的十一师师部举行，胡华同意这个说法。聂说，他曾听到毛斥责张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张调集了很多部队到会场。看来是双方各执一词。^⑯

张和聂荣臻都谈到，张在沙窝会议上建议让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张说，他是想让年青人参加会。聂认为，张企图使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增加新人。两种说法可能都对。尽管张的部队人数占很大优势，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他却是孤掌难鸣。

没有迹象表明会上谈过日本问题，中国现代史学家断定，会议上没有人谈过要联蒋抗日，组织“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有争论，因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共产国际第七

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通过一项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从决议措词看统一战线似乎起源于中国，事实上，共产国际与红军没有联系，也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他也是林彪的堂兄）来到陕北，毛这才知道有这么个决议。林离开莫斯科前熟记了决议内容。他乘飞机来到中蒙边境（可能跳伞降落）然后扮成商人步行到陕北，在保安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同洛甫不期而遇。^②

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张国焘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了会议。现有材料表明会上没有产生什么分歧。会议决议得到了通过。^③

八月初，双方达成妥协。政治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不妨先搞一个军事计划。他们同意把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两个方面军混编，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成立一个混编的指挥部。部队仍由朱德任总司令。朱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因为毛和张都信任他。

张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最高司令部随主要由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的左路军行动。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各剩下二千人至三千人）编入了左路军。

右路军也是混编组成的，先头部队是林彪的一军团，另包含彭德怀的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右路军设有前敌总指挥部，由四方面军的徐向前负责，叶剑英任参谋长，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实际上，右路军和左路军都在张国焘指挥下。他大约有八万人，而一方面军可能只有两万左右。

毛和正在生病中的周恩来、负伤的王稼祥、还有洛甫、博古、李德和中央直属队编入右路军。

几乎整个七月和八月的大部分时间全用于完成这些安排。就初步目标达成了协议，向岷县方向进发，以插入甘肃南部。^②

国民党终于开始警惕起来了，它开始调动部队。夜间，毛儿盖一带的气温已经很低，该行动了。两路军约定在八月二十三日出发。根据计划，左路军向阿坝前进，右路军向巴西前进，巴西在草地的那一边，离毛儿盖有几天的路程。

第二十五章

魔毯

这位西藏人，古铜色的脸上布满皱纹，穿着棕色的羊毛长袍，系着橙色的腰带，脚穿软皮靴，头戴时髦的毡帽。他说，夏日里，一望无际的草地是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朱红色、紫罗兰色、蓝色、黄色、玫瑰色、紫色、白色等等，你所能想象出天下所有的颜色，在这里应有尽有。

他讲的这片草地，是一个内陆的萨格苏海，地处长江和黄河分水岭之间一个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原上。这里看来象春天英国康瓦尔丘陵草原一样的平静，但要是把这片隐藏着邪恶的草原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相比，《恶之花》会显得象天使一般的美好。

到了八月中旬，这里的花草已开始迅速凋零，但是当你在正午经过这片平坦的大地时，它们的绚丽色彩在阳光照射下，仍然会刺痛你的眼睛，它们的芳香仍然使你心旷神怡。当黎明来临时，一马平川的地平线上，闪烁着白雪反光的小山丘点缀着这绿宝石般的草原。

今天，这片青葱的田野大都已经开沟排水，土地的肥沃堪与美国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相媲美。到处是白色的绵羊，黑色的牦牛，一顶顶毡帐篷星罗棋布，那是牧羊人放牧时的宿营地。

五十年前，情况似乎大体相同。但是当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帐篷，没有牧民，没有牦牛，也没有羊群，只有寂寞的野花引诱人们到它们中间去。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始终由杨成武率领的非凡的一军团第四团，作为先遣团进入这片令人愉快的美丽的“海洋”，他们看到的就是这般景象。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杨成武领受先遣任务时，他的司令林彪最先告诉他草地的危险。他说这项任务很艰巨，指示杨成武到毛儿盖进入草地前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草地的危险，是在意料之中的。毛泽东警告杨成武，在野花的下面隐藏着沼泽，一分钟之内就能把人吞掉。因此，杨成武必须设法在这片沼泽地带找到一条道路，以便整个红军得以安全通过。摆在面前的敌人是大自然，而不是人。当务之急是必须很快通过草地，摆脱草地。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的部队正准备再一次集结来消灭红军。毛泽东仔细地向杨成武询问了他的部队的情况和衣着。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一忽儿烈日，一忽儿冰雹，时而下雨，时而大雾，时而雨雪交加，狂风怒吼，就象魔鬼的恶作剧。

五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六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气温在摄氏零下六七度（华氏二十度）；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可是，早上八时，天色突然变暗，乌云聚积起来，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接着大雨和着狂风倾盆而下，瞬间又是雨雪交加。没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到处茫茫一片，赶路的马帮

躲避在背风的地方，一群群的牦牛和绵羊变成了缓缓移动的雪堆。大雪下了两个小时之后减弱了下来。旷野上又刮起了大风，风中的太阳变得苍白、黯淡，颤颤发抖。风没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丝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在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毛泽东问杨成武：向导问题怎么办？杨说，他找到一个年老的藏民，六十多岁，他熟悉草地的一草一木。我们用担架，由六名战士抬着他走。毛泽东同杨谈完之后，杨即率部队出发，出发前，杨又专门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她说了几句话。邓颖超的丈夫周恩来病重，没有见他。

四团通过了几座沙石山冈。山冈上满都是黄色的樱草花，或者叫藏报春，一簇簇紫色的山花，白色星状山花，还有接骨木饱满的果实——它那毛绒的白花，此时，已变成可以酿酒的浆果，仿佛给大地铺上了花毯，这无疑是一曲鲜花的交响乐。然而，在长征老战士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描绘这美好景物的片言只语。他们无心欣赏这些美景，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张国焘还谈到了这些“美丽壮观”的鲜花。

下午三时左右，四团正在拚力奋进，但眼前的景象忽然起了变化。乌云密布，遮掩了大地。疾风穿过三千年来人迹罕至的野草丛生的荒原，撕裂着行进中战士们单薄的衣衫，寒气刺骨。这个一度如花似锦的乐园每年只有五天无霜期，年平均温度刚过摄氏零度，七月是摄氏十度半多一点（华氏五

十一度)。

用县长杨秋的话说，草地没有夏天，只有延长了的冬天。红军经过的每天夜里都是天寒地冻。杨成武和他的部下所走的路并不好走——这里压根就没有好路可走——不过是藏族牧民踏出来的小路。东边有条好走的路，但因张国焘没有打下松潘，那条路走不通。左边的路（即张国焘要走的路）也比较好，但他远在西面，而且他坚持要去阿坝。

除了杨成武和他的部下竖起的路标，小路上没有别的标志。没有界标，只有漫无边际的齐腰深或高过腰际的野草，草的下边就是水。草地里有小块的硬地，足可以经得住一个人站在上面，但它们在野草底下，很难辨认。沼泽软得象豆腐一样，积水经常漫过胯骨。掉进沼泽里的人，伙伴还没来得及拉上他们，便消失了。有时连救援者也会同被救者一起消失在泥潭之中。

天下着雨。八月和九月是草地上雨季高峰。无法保持干燥。没有地方可以宿营，人们抱着自己的膝盖，蜷成一团坐在小丘上过夜，小丘小得连腿都伸不直。

没有食物。每人额外积存的四十斤口粮也快吃光了。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因此饭量也大。可是无法煮饭，无处生火，也没有木柴。他们只得嚼着未经磨过的麦粒。部队有半数人染上了讨厌的痢疾和拉血。粗糙的麦粒几乎要磨破他们的肚肠。

不过，今天的居民说，这里在夏末鸟很多：从北极飞往南方的大雁，随季节迁居的野鸭群、鹈类等等。有时，飞行中的鸟群黑压压的一大片，遮住了太阳，落在沼泽地里把草

丛弄得沙沙作响。一年后，当第二方面军过草地时，贺龙将军指出害人的沼泽中鱼多极了。他每天花一点时间去钓鱼，在通过这片可怕的大地时，他一路上就不愁吃的了。

过草地时发生的某些悲剧也许是由于红军不会狩猎或捕鱼。而且，他们也不熟悉“野菜”的性能。这些“野菜”现在陈列在当地的博物馆里，说明这是红军当年为了活命不得不吃的食物。在展览柜中有一盘盘的多汁的蒲公英绿叶，有一碗碗的荨麻（可用来作鲜美的汤）和其他营养丰富的野生植物，而战士们当时却不了解它们的用途。

那个象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危秀英，她也搭救了好几个女同伴的性命。那天，她去给藏族妇女作宣传工作，回来时，发现同屋的伙伴给她留了一些蘑菇汤，她尝了一口就放下了，味道太苦了。她发现，她的同志们全都躺在地上，好象都已睡下了，她大声地嚷道：“往里点，给我让个地方。”可是，她们睁大着眼睛，看着她，谁也不说话，也不能动弹，她们全都瘫在那里。她赶快取来冷水，泼在她们身上，使劲摇晃她们，她们终于醒过来了。她责怪她们说：“你们可真是好同志，把蘑菇都吃光了，只给我留下点苦汤！”她哪里知道，就是那些蘑菇使她们瘫倒了。

象红军中其他人一样，危秀英在进入草地之前就准备好了粮食。但粮食不够吃。她拣了些可食用的植物，吃炒过的青稞麦粒。她和她的朋友们用手从火里直接取出烧好的青稞粒。青稞粒被火烧黑了，很快她们的脸也变黑了。危回忆道：“我们大家都长了胡须。”

粮食，粮食，粮食。每天都是这个问题。那个模样象赫

鲁晓夫的老红军曾宪辉还记得他们进出草地时看到的青稞田。四周没有人烟。战士们收割了青稞，留下了借据。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在保安时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

过草地有五天到七天的路程。最先走过草地的人，日子最好过。他们可以沿着杨成武的先头部队给他们标出的小路走。小路很窄，容易消失。每过一天，路就变得模糊难找。体重的人和牲口踩坏了狭窄的小道，使小道淹没在水下和草底，因此很难知道向哪里插脚。杨定华说，过沼泽地有点象走在摆动着的浮桥上，挪动一步就摇晃，而且你的脚很快就会陷进一堆抖动的草丛里。泥巴不仅滑，而且象胶一样粘。一旦掉进去，就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

他们一再迷路，甚至连藏民向导都难以辨明方向。一眼看去，各处的景物都一模一样。只有当太阳冲出乌云时，他们才能改正前进的方向。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一九三七年在延安见过一位长征老红军莫许的日记。他讲述了一个在泥淖中挣扎的同志的情况。莫许扶他站起身来，但那人又跌倒在黑水里，紧紧地攥着步枪。他又试图去拉那个人起来，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那个战士就要断气了。莫许想给他一些炒青稞吃，但他已不能嚼了。莫许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自己的干粮袋里。那位战士咽了气。莫许继续行军。那位战士的遗体蜷缩在沼泽地里。当莫许在路上休息取出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放在手里时，那位垂死的同志的悲惨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无法咽下那些炒青稞。

毛的警卫员陈昌奉在红军下雪山时病倒了，康复后又患了疟疾，疟疾好转后进入草地时又复发了。毛让他休息，给他服药，他才得以继续长征。

在他看来，这片草地是：“举目四望，不见一棵树木，茫茫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⑩

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里杳无人迹。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回忆道，“我连一个人也没见到。村子里空空荡荡。我只记得有几只野鸟；到达班佑时，我们才见到了一些牲口。但是房子里还是空的。”^⑪

经常无法烧开水或做饭。地太湿了，没有干燥的树枝（常常连一点树枝都没有）。人们嚼着没有煮过的硬麦粒，嚼得牙痛。

老红军给青年人不断打气。河水大约三英尺深，但红军到达这里时，河水开始上涨，水流湍急，中央纵队在渡口被阻。邓颖超为她的丈夫周恩来担心，她本人生了病，仍然躺在担架上，也停下不能前进。战士和指挥员都聚集在周围。她问一位指挥员，“河水有多深？”指挥员回答说，“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她把年青战士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互相手拉着手涉水过河就不会发生问题。蔡畅是毛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身着红军制服，脚穿草鞋，腰带上挂着一支手枪，也在这个纵队。杨定华说，你从她的装束看不出她是一位妇女。但是战士们都熟悉，一下就认出她来了。他们喊道，“大姐，给我们唱支歌吧！唱《马赛曲》。”蔡畅微笑着回答说：“好吧！别喊了，我给你们唱。”她唱了。杨定华虽听不懂歌词，但也

受到了鼓舞。

杨定华还想起长征中其他几位妇女的情况。有一次他看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写着让军队渡江的命令。杨定华知道，康克清七年前参加红军时还是个文盲。看到这个变化，杨内心非常高兴，并为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毛在长沙时的老师、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也在河边，他身边有一头毛驴。毛走上前来问他为何不骑上毛驴。徐特立解释道，因为毛驴驮着三个病号的行李。徐特立在补他的旧裤子，身上穿着一件破皮袄。他背着的干粮袋里装着八斤炒青稞。

当晚，整个部队渡过了后河，他们高兴地燃起了熊熊的篝火。这次总算踏上了干燥的河岸，也有了干柴。杨定华和几十名战士围在篝火周围取暖、炒青稞和休息，精神又焕发起来了。不一会儿，毛泽东和彭德怀来了，在篝火旁坐下，他们同战士一样，浑身都是泥巴，看来很疲劳。

“同志们！”彭德怀以指挥员的口气，用嘶哑的嗓子喊道，“咱们请毛泽东同志讲点有趣的故事吧！”大家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一位著名的作家成仿吾也来了，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他谈到他在日本和欧洲的学习生活以及他如何成为一名作家。遗憾的是，杨定华没有把毛和彭所讲的故事记下来。这是在草地上度过的第三个夜晚。前面还有四天的行程。^⑫

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拣走了。

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都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丁甘如在后卫部队，属五军团。他们的部队进入草地时，别人早已过去了。丁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参加红军，当时十五岁。

对丁甘如（原为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一九八四年离休）来说，从爬雪山开始，情况就日趋恶化。藏民不断进行骚扰。丁甘茹也认为，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里上的隔阂。

五军团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穷困的人。有钱人和地主早已跑掉了。如果一个红军战士掉队，少数民族的人就立刻把他抓来剥光他的衣服，让他活活冻死。五军团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丁回忆说，“我们只能吃剩下来的一点东西。有时可找到一头猪，我们总是设法用钱买下来。可是这种情况太少了，因为这一带全都被搜光了。我们只好吃前面的同志们丢下的猪皮。”

他说，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是些多年陈粮，吃起来味同嚼蜡，”他说，“但它毕竟是粮食。”

在后卫部队前面的红军指挥部的人们患了可怕的腹泻和

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就象麻雀从马粪中拣燕麦粒一样，他们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丁甘如说，“草地是对我们最艰苦的考验。”^⑬

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他在长征中是位医护干部。象大多数同志一样，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草地更可怕的了。

他说，“看起来好象走在一条路上，但在几行人走过去之后，这条路便变成了积满了水的水沟。”

没有可宿营的地方。没有干燥的土地。没有树木。很多人到达草地前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几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浆里再也爬不起来了。

姬鹏飞说：“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默默地死去……”

草地的地势高也是原因之一。许多医生自己已体弱有病，但他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越沼泽，去寻找那些掉队的人。^⑭

涂通今医生一九八四年是解放军医学研究所所长。他高高的个子，银灰色的头发，仪表堂堂，带着角质架的眼镜，讲起话来措辞严谨，有权威性。他说，空气稀薄使人变得虚弱。每个人跌进泥沼之中，就象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样。医生用樟脑和嗅盐抢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戴正启医生一九三五年只有十六岁，在红军中已是服役一年的老兵了。他是一位爱思考的人，曾多次回忆过草地的情景。他认为要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草地是不可能的。人们生病和死亡还有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冻死、饿死或被藏民的冷枪打死，饮食中缺少盐分，也是一个原因。红军在长征中本来缴获过大量食盐，但是他们怕麻烦，没有带到雪山草地这边来。草地没有盐，他们的食物中缺盐，因此造成死亡。他说：“我看到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倒下了。我们赶快跑到他跟前，只听他低声唸着家乡的名字说：‘告诉我的亲人，我死了。’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当然，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战士浑身老是湿漉漉的，饥寒交迫。但这不是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因为过去他们也挨过淋，受过冻，挨过饿。虚弱也不是唯一的原因，他们在毛儿盖已休息过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草地上杳无人烟，”戴医生说，“这就是原因。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象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道理就在这里。”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⑬

八月二十七日——对某些部队来说是进入草地的第六天——一军团到达巴西，这是草地东北边缘的一个藏族小镇。毛可能是在八月二十八日到达的。先头部队总是前进得更快一

些，比其它部队要早到几天。

许多部队分别到班佑或阿西或附近其他村落。必须把部队分散开，免得把村子里那一点点粮食都吃光。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他们请他统计一军团的伤亡人数。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损失了一百多人，并且已经埋了一些人，但还有一些人的尸体没有找到，无从埋葬。他们的电报写道：“请携带一些工具，沿路负责掩埋。

十天以后，他们收到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⑮

右路军到达巴西和班佑时，张国焘直接控制下的左路军正在向西南约四十英里的阿坝一带移动，同右路军所走的路线平行。

九月三日，张国焘拍电报给右路军，说他在阿坝被阻。白河（又称噶曲河）的洪水使他的部队无法继续北上。他建议部队南下。人们难以觉察到沼泽地的水是流入两条流速缓慢的河里去的，白河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条是黑河，也叫墨曲河。两条河均流入黄河，也称玛曲河。这些都是藏名而不是汉文名称。

张国焘的电报触发了长征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场危机再次使红军面临灾难，它的政治影响延续了多年。^⑯

第二十六章

黑暗的时刻，光辉的荣耀

据杨尚昆将军五十年后回忆，那是一个美丽的月夜。雨停了，雾散了，满月当空，星光闪烁。午夜两点，他踏着洒满月光的小道去执行一项紧急的秘密任务。

“那是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一九六〇年对埃德加·斯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那天夜里，毛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

麻烦事越来越多。毛和张国焘的谈判进展很不顺利。人们不安地悄悄议论着。谣言四起。毛为了谨慎行事而预先更换了密码，并限制部队之间的通讯，以保证安全。

把部队莫名其妙地分为右路军和左路军这种作法并不成功。毛在右路，张在左路。张手下的徐向前将军和陈昌浩政委指挥右路。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部队，分别担任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张和毛对对方的指挥都很不习惯。许多证据表明，在左路军的“统一指挥部”里，真正发号施令的是张国焘。同样，毛（只要他能做到）在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各军团里也是如此。

从好的方面看，这样做导致一种不稳定的休战，而糟糕

的是，它助长了各种阴谋诡计。这种编队本身就孕育着摩擦和猜疑。

红军这时正分散在藏区草地的边沿一带。张国焘和总部工作班子驻在藏民最大的居住点阿坝。他的大队人马停在白河的西岸。这时正值汛期。按预定计划，张的部队如要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并和右路军会合，就必须渡过白河。

右路军的指挥部设在班佑，一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地方。这里是一片藏民的毡包，其中有一些呈传统的圆锥形，在相互交叉的格状支架上铺上毡子。藏民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个牧场，这种可以迅速拆装的毡包很适用。其他都是用牛粪砖垒起的、外面用泥抹光的永久性建筑。在棚舍之间肮脏的小道上，到处是圆锥型的干牛粪堆。在夏天，人们把牛粪摊在篱笆围墙上下凉晒，干燥后的牛粪既可充作燃料，又可当作建筑材料。如今，藏民都跑光了，毡包里一空如洗。

快到班佑的时候，队伍里传开了要在“洋房”里过夜的笑话。在一些红军战士看来，这没什么稀罕。他们说，如果真的要睡洋房，那最好是日本房子。

结果，队伍穿班佑而过，直抵巴西，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巴西是个村子，有一百来所茅草房和一座大喇嘛庙，这景色使杨定华想起了上海的查尔斯顿电影院。这里有不少房子可供红军过夜，粮食供应也不错。庙里有一座很大的佛像，左右两侧各塑有一对相互拥抱的男女。杨说这表现了两性的热恋。据说这是一座爱情之庙。不断有红军战士进来看一眼。

右路军指挥部设在班佑，不在村里，而在村旁的一片柳林里，但村里几座较大的毡包已打扫干净用来开会。那片林

子一九八四年还在，既干净又美丽。那时大约有七十户人家住在这个村子里。除增加了一所二年制的学校以外，村子从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过之后直至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到处依旧是散乱的毡包和牦牛粪堆，小巷里垃圾成堆，恶狗游荡。我们到达的五月三十日，地上还积着残雪，一群群身着藏袍的男女和花花绿绿的孩子前来参加马市和观看赛马。下雨了，骑手们打开了黑色的雨伞。

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杨尚昆就把指挥部设在这里。毛单独住在小河对岸一箭之遥的地方。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约四英里外的巴西。第一军团继续向前到达俄界，刚刚进入甘肃的境界，离此地有两天的路程。

毛有时在班佑指挥部，有时在巴西。周恩来和王稼祥都住在巴西，两人的身体渐渐康复，但仍不能下床，由第三军团照料。

九月三日出现了重大危机的首次迹象。那天，张国焘发来了一份电报，说因为白河（噶曲河）河水上涨，他无法渡河，他已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而重提他原来向西向南推进的主张。

张的电报在毛一派人中引起了恐慌，人们认为这是张的一个计谋，企图推翻毛儿盖决议，并将共产党的全部力量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毛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同意他的观点），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上，并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电报一个接着一个。杨尚昆记得，在一份电报里，中央委员会提出派人支援张，帮助他渡河。

由于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更加紧张了。李先念

率领的第三十军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和在松潘的胡宗南指挥的四十九师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战斗中把他们一举击溃，胡宗南身受重伤。红军缴获了大批饼干、罐头和香烟。香烟送给了烟瘾很大的毛和他的同事们。李先念回忆说：“他们高兴极了，说这可比鸡还要好吃。”这期间红军还和国民党马鸿逵的一支凶悍的回民马队打了一场遭遇战。国民党的军队愈来愈多，引起了红军领导的担忧：假如红军在此地滞留过久，蒋介石很可能就要发动一次强大攻势。而张国焘也开始把蒋进攻陕甘的这种可能性作为反对进入甘肃和陕西的理由。

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当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到达巴西后，他把十一团隐蔽在毛住处的附近——以防万一，并且从那时起每天去看望毛。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

九月九日上午，张国焘给他的心腹助手、右路军指挥部的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电文本应由陈昌浩本人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言，结果，电报由一名译电员译出并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

叶剑英是个忠实可靠的参谋，他没有看那份电报，而直接带到了会场。陈昌浩正在台上，人们还在发言。叶想把电

报递上去。陈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⑩

电报似乎很紧急，所以叶剑英就看了一眼。他立即领悟了它的重要性，尽管“叶并不了解其中的阴谋”，^⑪据杨尚昆说。

这份电报的电文从未公开发表过，但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经常引用它。电文可能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他们可去查阅。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命令右路军改变方向，重新穿过草地，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李先念记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正如谢伟思所指出，总的来看，这些话“明确地包含了不祥的、威胁性的意思”。“斗争”这个词在党内通常用来指互相对立的路线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或者用在象“阶级斗争”这样的词里。^⑫

叶剑英借口上厕所，走开了。其实，他转身来到一二百米开外的毛泽东的办公室，把电报交给了毛。毛抄了一份，告诉叶别让别人知道他已了解电报的内容，^⑬并对他说：“你干得漂亮。”

叶回到指挥部。陈昌浩还在台上讲话，会议仍在进行。叶机灵地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⑭

根据彭德怀的回忆，他在听说这份电报之前就曾敦促毛采取预防措施。毛的部队早已分散。第一军团距此有两天的路程。附近还有张的两个军。“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军团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彭问。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毛拒绝了这个意见。^⑮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

九月九日下午，大约是应陈昌浩的要求，毛和陈见面了。陈向毛泽东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杨尚昆认为，毛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但是，杨说，陈“对张唯命是从，毛根本劝不动他”。^⑩

于是，毛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必须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同事们商量。他说，周恩来和王稼祥正在第三军团司令部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彭认为，这只是毛为了摆脱指挥部和陈的“势力范围”而使的一计。^⑪

毛泽东火速赶到巴西附近第三军团所在地牙弄。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改变方向，并且又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坚持执行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原定计划，前来和他们会合。会上还议论了各部队的力量对比——第三军团只有四千人，第一军团人数也大致如此。张占有很大优势，毛及其同事们认为，张很可能强迫他们服从他的意志。

刻不容缓。第三军团受命于凌晨二时出发。为了给即将进行的活动打掩护，派叶剑英去通知陈昌浩，如果部队要回头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整个部队在十日天一亮就去地里割青稞。陈没有表示反对。

“陈昌浩一点也不担心，”杨尚昆将军说，“他未感到需要特别警惕：毛只有那么点人，不敢自行离去。”

最危险的任务落到了杨尚昆和叶剑英身上，他们必须离开指挥部，但又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如果有可能，叶还答应带上由一方面军的人组成的二局，即带上情报局的地图和人员一起走。^⑫

杨尚昆还要让他的工作班子和政治部里尽可能多的人去“筹集粮食”。刘英记得，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把命令传下去。她半夜里被叫醒，让做好立即出发的准备。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洛甫传话说，张国焘企图分裂党，所以，他们必须离开。^⑮杨尚昆还有个私人问题：他的妻子李伯钊不在班佑，到四方面军李先念的三十军去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了，他俩分离了一年多。杨不能用明信片通知她，这将泄露机密。但他终于给她捎了个信儿。李伯钊回忆说，她那时被“看管得很严”，无法脱身。^⑯

凌晨二时，杨尚昆和叶剑英悄悄地溜出了指挥部营房。叶还搞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是钉在作战室墙上的，有一张掉在地上，他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和杨走出营房。他们让警卫员带着驮有行装的骡子先走一步，二局和政治部工作人员在半夜一时三十分就离开了。^⑰

杨和叶正在明亮的月光下赶路，后面忽然传来马蹄声，二人赶紧躲到阴影里，一队骑兵疾驰而过。显然，他们在搜寻叶和杨，他们认为这两个高级干部一定骑在马上，并且有人护送，所以根本没有理会阴暗处的步行者。^⑱

在第三军团司令部里，毛给林彪和聂荣臻发了电报，让他们作好准备：原命令可能有变。彭德怀紧张万分，生怕叶和杨脱不了身，天亮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彭德怀这才松了一口气。^⑲

杨记得，他看到毛、周恩来、王稼祥和彭德怀都在等着他们。毛说：“我们真为你们担心。”^⑳

这时，陈昌浩已发现毛的人逃走了。他先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拿着听筒回头看了看徐向前司令，说：“出了一件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

徐向前回答说：“你见过有红军打红军的吗？”他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不能打。换了陈昌浩，也许是另一种回答。徐向前的话在以后的五十年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地被引用。

党的历史学家胡华一九八四年说：“这是党的历史中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徐和叶为制止一场冲突立了功，他们两人都有功劳。”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毛保护了这两人免遭“文化革命”之苦。

陈昌浩没有派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到巴西去。其中有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人们都知道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他最后死在苏联。

毛决定对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三军团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进。

会议在“查尔斯顿剧院”式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旁边一个村子里，俯瞰着白龙河的支流巴西河（其实是一条小溪）。

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的字样的标语旗在开会的喇嘛庙前示威。他们喊口号时就象和尚在唸经。

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

不强迫。然后，他请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见他，其中也包括李特。这时，李德很警惕。他身高体壮，站在近处盯着李特，以防他拔枪向毛射击。

毛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说对了，几乎一天也不差。）

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以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上午八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这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发生的事一模一样。那年，毛在井冈山前，面对一批不听指挥的人 and 不愿跟他走的人也这样告诉他们，让他们回家，他率领着剩下的人继续向井冈山行进，从而平息了一场动乱。

杨尚昆还记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处境。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后来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处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

不到一小时，毛也出发了。他没有和别人走一条路，而是在警卫员及几名亲密战友（周恩来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的

陪同下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巴西河。那时（今天仍如此），桥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悬挂着一只牦牛头，保佑木桥免遭洪水、恶煞之害。过河之后，直上对面的大山——纳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

今天很难判断毛认为张要发起进攻的威胁是否真实。或许没有那么回事。但毛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威胁，因而不愿冒险。他一面上山，一面把后卫部队留守在每一个山口和要塞，以防四方面军追上来。杨尚昆说：“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②③}

向青教授——一位保守而谨慎的学者——指出，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客观证据或文字材料可以证明张国焘准备以军事行动迫使毛及其部下就范。他认为，假如确有此事，后来在延安处理张国焘问题时就会摆出来。他补充说，张国焘确实野心很大。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至今对这个问题还在激烈的争论。^{②④}

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也说，没有发现张国焘准备武力解决中央的证据，他也没见到过这份出了名的电报。但他相信张国焘确有野心，想接管整个红军。这一点在延安时曾批评过他。李先念说：“从最坏的方面讲，这是张国焘篡夺党权的一次公开尝试。”

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细分析了那份电报（但他显然没有看到电文）。他的结论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公开威胁要“军事解决”。但是他说，

党内很多人都认为张确曾这样威胁过，或者说张的行动暗含着这样的威胁。毛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个附注里强烈地暗示张打算“军事解决。”²⁷

王年一举出两位权威人士，他们曾毫不含糊地说张打算采取“军事办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话说长征》中肯定地指出，张曾“秘密下令进行军事解决”。另一位是吕黎平，他在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写道，当值班军官陈茂生在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正在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说，电报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但是，经查阅所有的官方文件，王年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电文里确有这样的话。他指出，任何中央文件里都没有提出这种指控，延安开会期间或是张国焘逃离延安后的公报里也没有提到这种指责。

毛的行动使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拉回阿坝，根本不提要释放毛的部下。他在阿坝那所大藏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反对毛——周——张（洛甫）——博北逃。”张号召红军干部批判毛，并要朱德表态。

朱德说：“北上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我本人不能违背这个决定，我也不会带领红军反对这个决定。让朱批判毛，对世界舆论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世界上都认为朱——毛是一个人。至于决定北上一事，我已举手赞成，不准备放弃自己的观点。”

“你竟然是这么个老顽固！”张国焘怒气冲冲地吼道。

刘伯承被激怒了。“你这样对待朱德是什么意思？”²⁸宋侃夫回忆称，当时对朱和刘使用了非常刺耳的语言。宋是张国

焘指挥部的电报电话员，开会时在场。在会上，毛的人都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逃跑主义分子”。^{②③}

有人在会上喊：“打倒朱德！”^④

张国焘很快就南下了。他的三十军和四军再次穿过草地同他在卓克基会合。侯国祥——一个大个头、沉默寡言和秃顶的六十八岁的干部（一九三五年，他才二十岁，是四方面军一位热情奔放的政治干部，属李先念的三十军）——还记得，离开卓克基不久，部队行军的口号就改了。原来的口号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周、博古。”现在改为“打到成都吃大米”。^⑤

张国焘南下了；毛泽东则北上。

九月十二日，毛把部队集中在俄界。这是一个小小的安全地带。一位姓杨的土司控制着这片藏族地区，他是从明朝以来杨家第十九代传人，藏名为谢代。自从杨家的第一代祖先从十四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着，每年纳贡之后，便自成天地，安然自得。这位第十九任土司向国民党纳献盐巴和粮食，对红军也一视同仁。他保持中立，对任何一方都不怀敌意。他把粮仓向红军敞开。虽然没有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但是一方面军回送了一些步枪，国民党过去也是这样做的。杨家一直延续至今。第二十代杨土司一九八四年时五十六岁，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他在二十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封为中将，但后来他却投靠了共产党。^⑥

毛和其他中央委员在俄界开了一、两天会。他们把严重

减员的部队重新编组成一支部队，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把它称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这说明毛是很现实的，他认识到，和张国焘强大的第四方面军相比，他的部队数量太少了。四方面军由于编入了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实力又有了增强。

这支先遣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纵队：前一军团，由林彪兼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前三军团，由彭德怀司令兼任指挥，李富春任政委；前军委纵队，叶剑英任指挥，邓发任政委。杨尚昆将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③③}

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③④}毛没有接受把张国焘开除出党的建议。^{③⑤}象往常一样，会议之后，红军又匆匆上路。他们向腊子口进发了。腊子口最窄处只有十到十二英尺宽，是通往甘肃南部的咽喉。政治局会议是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召开的。九月十四日清晨，红军已沿着白龙江右岸向腊子口进军。^{③⑥}白龙江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激流，顺着被水冲击而成的峡谷绕过莫牙。在那儿警卫员为毛号到了一所很不错的藏民房屋。住有四五百名喇嘛的旺藏寺也在这里，庙里洁净雅致，一尘不染，这使红军战士难以置信。每处卧室外都种着白色或红色的菊花，向阳的一面，白色、蓝色或紫色的牵牛花争相斗艳，院里还有葡萄架。杨定华认为这里完全可以住下五六千人。^{③⑦}很多部队都在莫牙额外多休息了一天。

但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还是杨成武——却没有休息。九月十五日，这支突击团在莫牙接到了预期的任务——

攻取腊子口，然后去甘南的岷县。规定两天内攻下腊子口。而命令到达时已是黄昏了。所有的人都行动起来，作好出发准备。晚十一时，队伍在夜色中集合在路旁草地上。哨音响了，团长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在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

他们在夜里沿着白龙江行军，穿过一片片黑魆魆的树林，翻过一座座山头。这时，又下起了鹅毛大雪。（据说战士们曾高喊：“真好看哪，大家来吃白糖吧！”）^③队伍在凌晨二时饱餐了一顿，休息片刻后继续赶路。

途中，他们同国民党十四师的一个营打了一场遭遇战，把他们打散了。从俘虏口中得知，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已在腊子口修筑了碉堡。十六日下午四时许，先头部队到达通往隘口的通路。这里景色宜人，先经九龙峡，过一个山口后，就到了腊子河，这是一条狭窄而湍急的溪流。刚从高原地区过来的红军战士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片亚热带风光：茂密的原始森林，数不清的蕨类植物，壮观的飞瀑和成片的杜鹃花。

山口窄得出奇，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似乎都是悬崖峭壁。右边的一整块峭壁，几乎拔地而起，高达一千英尺。人是爬不上去的，甚至连山羊也无处插足，只有鸟儿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山口宽一百英尺，然而到了咽喉处，就只有十二英尺了。过了山口又有一处断崖，但没有那么高，参差不齐的怪石虽不好走，但并不陡峭，如果上面没有机关枪对着你，也许可以攀登。

小得连鳊鱼都容纳不下的腊子河就在这峭壁下流过。小路尽头是一座打进峭壁的两根树干架成的三英尺宽的小桥，

过了小桥沿峭壁而行，又走上用长铁钉固定在岩石上的高悬的窄道。国民党在那里修了碉堡，只要有人企图过桥进入隘路，就会遇到倾盆大雨似的猛烈射击。如果有哪个疯子想爬上峭壁，那么他一抬头就会看到枪口正对着他的脑袋。

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

杨成武把战士们集合起来说：“我们一定要拿下腊子口。要是拿不下，就得重回草地去！”

从晚上九时开始，四团趁着夜色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都失败了。国民党军队坚守着阵地，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把手榴弹象开花棒棒糖似地往下猛投。几名战士过了桥，但无法爬上峭壁。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只能蜷缩在桥下。

这个地区有国民党的三个团，其中两个营大约四五百人把守着山口。^③

毛把指挥所设在离山口三百码的地方，通宵指挥着战斗。俘虏告诉过四团，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上路。形势越来越令人担忧。

半夜时分，毛命令停止正面进攻，因为正面进攻的结果是严重的伤亡。于是把一些会爬山的战士集中起来，命令他们从后面爬上最陡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消灭国民党守军。

大约三十至六十名战士——十二人是苗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战士——在浓重的夜色里集合在一起。他们只携带手榴弹和铁器——匕首和短刀。没有登山工具，他们把皮带、绑腿和绳子连结在一起，抓着它攀登危险的岩山。这些山里人悄悄地爬上去，很快就从忧心忡忡的指挥员的视线中消失了。

战斗继续进行。突然信号弹升上天空——红色，而不是表示成功的白色，失败了！随后数次强攻也未成功。天快亮了，国民党增援部队眼看就要开到，指挥员们开始觉得大势已去。正在这时，山谷中响起了阵阵爆炸声。原来是那些“山里人”登上了国民党守军背后的山峰，正往下甩手榴弹呢。不出几分钟，国民党士兵乱了阵脚，纷纷滚下山坡，溃窜逃命。四团剩下的兵力都冲进了敌人阵地，一阵砍杀，天险腊子口被攻占了。疲惫不堪的宣传队员兴奋地扯起已经沙哑了的嗓子唱起了战斗的凯歌：

炮火连天响，
战号频吹，
决战在今朝，
……
开展胜利的进攻，
消灭万恶的敌人！

部队很快通过了腊子口。他们再也不用返回草地了，再也不用拣从别人的粪便中冲洗出来的麦粒和玉米粒来充饥了。

四团又奉命出发上路了，它的下一个任务是攻占哈达铺，那是个汉族集镇，食物充足，对红军十分友好。^④

第二十七章

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半左右，红军开进了哈达铺。这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此时健康状况已大为好转）、彭德怀、林彪及其他高级指挥官率领的主力部队。先头部队已于两天前抵达这个甘肃小镇。

红军到家了。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穿过了陌生的藏族自治区，终于回到了汉族地区，回到了汉族同胞中间。尽管这里的汉民都信奉伊斯兰教，红军战士觉得，哈达铺就象是他们的家，那里的人长得和他们一样，语言也一样，毫无隔阂之感。他们知道，虽然前面还要翻过许多山峦，还要涉过许多河流，还要进行许多战斗，但是，再也不会受饥挨饿了，再也不用后撤退却了。

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二万四千里走进这座古城的男女战士，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来欢迎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红军战士。

在这里，每个战士领到了两块闪闪发光银元，这些银元是被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腊子口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大家都要吃好。”他们确实吃得不错，只要用五元钱就可以买一头一百磅重的猪，二元钱买一只肥羊，一元钱买五只鸡，一毛钱买十二个鸡蛋，五

毛钱买一百磅蔬菜。食盐和面粉也得到了补充——红军在当地没收了一吨盐，六吨面粉，以及许多大米、麦子和小米。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们每顿饭有三荤两素，比过年还吃得好。这简直是天堂。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一些战士吃得太多，撑坏了肚子造成减员。

周恩来和总部的办公室设在一座清雅的寺庙里，毛泽东则住进了一座漂亮的商人的庭院（现仍完好）。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哈达铺只有二三千居民（五十年后翻了一番），他们看到红军战士讲究礼貌，行为端正，纪律严明，哈达铺的男人十分高兴，他们说：“真是好战士！”哈达铺的妇女见到女兵，觉得十分惊奇——这些短头发、穿军装、皮带上挂着手枪的人真是女的吗？她们把女兵请到家中，仔细端详，摸摸她们的胸脯，跟着她们去茅房。消除了疑虑，确信她们真是女兵后，她们又高兴地让女兵们讲战斗故事。

哈达铺的老百姓对来访者的的好奇心和好客态度至今未减半分。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夹道欢迎来访的外国游客，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西方人——那些浅发碧眼的怪人。

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了哈达铺，下一步要去哪？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他们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他们要去打日本。但这只是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了的目的地。长征以来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自己只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体的目标，此时也是如此。

现在，在距江西的出发点成千上万里之遥的哈达铺，长

征确切的目标才日渐明确了。

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官们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证明他们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毛泽东的朋友、著名的群众领袖、英勇无畏的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统帅着他的部队。二十五军的徐海东也在那里。

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十天之后，毛泽东在榜罗镇公布了他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在部队集中起来后，召开了政治局、中央委员及高级指挥员的会议。政工干部分别向所在部队讲话作宣传。毛本人也在早晨六点钟向在一所小学里召集的军、政干部会议讲了话。他讲了抵抗日本侵略和陕北根据地的问题，讲了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从根本上加强纪律等问题。政委们当天就向部队传达了这一讲话。根据各种回忆录说明，这时的毛泽东开始越来越强调抗日的路线了。

就要到家了。红军已踏上了家乡土地，正朝着自己的同志和根据地前进。他们面前只剩下一千里的路程了。诚然，在同四方面军张国焘发生冲突之前，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希望。但是，他们感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毕竟经受住了在第四方面军问题上发生的危机，证明红军仍然是一支活跃的有生力量。它虽然只剩了六千人——可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一年来，他们征战南北，含辛茹苦，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

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他们不再是一伙在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面前衣衫褴褛、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他们渡过金沙江之后，战斗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一边了。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组织严密，上下团结，能征善战，有共同的精神和目标。此时，作战部队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干部，普通战士幸存无几。这些干部深信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他们就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力量。

这种想法在最后一千里的长征途中举行的集会上和毛的讲话中已见端倪。正如他在哈达铺所说的，我相信所有的“指挥员们、战斗员们在经过了上万多里的长征的洗礼和战火的考验之后，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将会以你们的勇敢无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我们的目标——完成长征北上，打击日本侵略者。”

第二天，照例是早晨六点钟，这支红军队伍在毛和彭德怀率领下（林彪和聂荣臻率领着前第一军团剩下的部队）向北进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通渭。在那里，又进一步进行了政治宣传鼓动工作。那天晚上，通渭城的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广场事先搭好了一个讲台，四周红旗飘扬。驻在城里的所有部队都集合在这里，杨尚昆、保卫局局长邓发和参谋长叶剑英分别讲了话。他们高唱《马赛曲》，会后举行了这个城镇空前盛大的宴会——大小盘子中盛满了猪肉、牛肉、鸡肉；还演出了文艺节目。李克农和袁欣为大家唱了歌、表演了魔

术。

红军向北疾进。他们遭到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马家军骑兵的骚扰，但并不严重。一天下午，他们越过西（安）兰（州）公路，翻过高达一万一千英尺的六盘山，然后在山的另一边宿营。

十月十四或十五日，正当他们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五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他们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到了面前，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陈问他们是谁，其中一个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主席递交一封信。他在哪？”

据陈说，他们是红军二十六军司令员、毛的朋友刘志丹派来的代表。毛会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大声告诉他们，二十五军和二十六军的代表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北苏区了。

十月十九日傍晚，毛泽东的队伍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他们的北面是万里长城、南面是华夏祖先黄帝的陵墓，在黄河以南这片黄土高原上，在这块中华民族发祥的土地上，红军找到了自己的家；他们在贫瘠的吴起，在黄土窑洞里，找到了自己的家。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将越来越习惯于窑洞生活。

这时，马家军骑兵东闯西窜，仍不断骚扰红军后续部队。彭德怀命令战士们加快前进，他不愿让落在后面的部队死在

凶残的国民党骑兵手里。他们翻越了老爷山、子午岭，进入了陕西。在那里再次与马家军骑兵交火。这一带的地势比较平缓，利于骑兵活动。红军被搅得不得安宁。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的当天晚上，就亲自召集指挥员开会。他建议“砍掉这条尾巴，即马家军骑兵，结束几周来红军所受的骚扰。”二十日，毛泽东对红军和吴起地区的游击队进行了部署。这里有三条河流穿过吴起，毛将他的部队部署成半月形，引诱马家军骑兵进入中间的洛河河谷地带。二十一日凌晨，毛泽东进入大马梁山顶上的观察位置（山顶至今仍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作为标志）。

马家军骑兵共四个团，每团约一千人，他们首先发起进攻，进入了河谷。毛的部队人数不比他们多多少。上午七时，红军向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开了火。不到两小时，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及其他三个团都从战场上落荒而逃。

那天战斗后的下午，毛会见了两位地方领导人，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毛立即叫来两名可靠的干部——贾拓夫和王首道，派他们带一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他们的任务是：救出二十六军绿林式领袖刘志丹及其同志们（数目不详）。他们正坐待二十五军伙伴的处决。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

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就在那个可怕的夏天，刘志丹赶回陕北老家保安。他父亲是保安的一个小地主（旧照片上的刘家大院远比不上毛的韶山故居），这一年庄稼颗粒无收，佃农交不出租子。有一位名叫袁耀秀的红军老战士，他曾在刘志丹手下工作过，一九八四年时七十七岁，仍住在吴起镇。他回忆说，那一年刘志丹二十六岁，身材比一般人略微高些。他英俊、细瘦，脸总是红扑扑的，常常带着微笑。他能言善辩，有着一副洪亮的嗓子，对着上千人讲话，每个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

每当刘志丹走在保安街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常常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讲上几个钟头。大家都知道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在这个偏僻的穷山沟里，就连地主也并不很富有）。

地主贴出告示——不管饥荒还是干旱，佃农必须交租。刘家也要刘志丹写这样一个告示。他说，岂有此理，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粮食交租纳税。他不仅不写告示，还来到佃农中间，组织他们抗租。他问道：“这样的情况你们究竟还能容忍多久？”刘家的许多佃农纷纷响应他的号召，起来反抗。政府也被迫宣布暂停交纳租税。

刘志丹在一九二五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曾在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九年，担任了陕北地下党委的成员。

刘志丹是位人民的英雄，人人都知道他，并传诵着他的光辉事迹，亲昵地称他为“老刘”。他们说，他把自己家的财产都没收了。“他献身于追求真理和人民的解放。”战士袁耀秀这样的描述他。^⑩

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他对人民的热爱超过他对辩证法政治说教的感情。一九三一年，他组织了一支革命队伍（二十六军前身）。可是，就在那一年，一位名叫杜衡的政委兼省委书记正指责他拒不与国民党打大仗。刘志丹靠边站了。“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追随者杜衡取而代之。结果，他把二十六军引向了惨败。只有刘志丹和少数几个人逃了出来。杜衡本人后来被国民党俘虏，成了叛徒。^⑪

刘志丹突破重重包围回到了陕北，人们纷纷前来投奔，他很快重建了第二十六军。另一位游击队司令高岗带着几百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

高岗担任了刘志丹的政委。他能力很强，但正如一位中国人所说，他有“乱搞女人”的坏名声。刘志丹对此当然不能容忍，对高岗行为放荡不羁的问题，有一次刘曾提出要处决他。^⑫

刘志丹第二次重建的二十六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到一九三四年，他在陕北已经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包括了二十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刘志丹的二十六军和另一支号称二十七军的小部队共有五千人。^⑬

但是，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三位中央委员会代表流

落到陕北，他们都对刘志丹怀有敌意，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与国民党有秘密接触。实际是，他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着联系。^⑭

红二十五军，即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四年春派程子华去的那个军，经过十个月的颠沛流离，终于来到了陕北。

程子华坐着担架来到陕北，他的同事徐海东司令员也是坐着担架来的，两人都坐了几个月的担架了。

二十五军及其指挥官程子华和徐海东的艰难历程不啻为人类求生的又一史诗。程子华从江西出发，途经汕头、上海和汉口，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抵达河南，来到了二十五军。他率军来到豫西边远的桐柏和伏牛山区。^⑮

一九三五年早春，二十五军转移到了附近的陕南。一天，当他们正在庾家河开会的时候，国民党六十师——蒋介石最神速的一个师，从朱阳关席卷而下，从背后袭击了他们。战斗非常激烈。程子华一九三零年时左臂曾受伤，他习惯于用右手托着左胳膊。现在，一颗子弹再次击中他的左臂并穿透了右手，使他落下了残疾。（五十年后，他只能使用一只象爪子似的右手）。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边穿过，从后脑穿出。他昏迷了近一个多月之久。二十四岁的钱信忠医生，当时正站在这两位指挥员身旁。他也负了伤，但不严重。他是上海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毕业生，他用磺胺柯衣定为两人治病，这是一种德国早期制造的磺胺类药品。他说，如果没有这种药，要挽救他俩的生命是不可想象的。^⑯

后来程子华的伤口严重感染。他的胳膊是用一把普通的利刃刀动的手术，甚至连可用来止痛的茅台酒也没有。吴焕

先政委接任指挥。二十五军终于在陕南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他们知道刘志丹和二十六军在北部活动，但没有取得联系。一九三五年七月，他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第一方面军正向陕北进军，正当他们也向那里运动的时候，吴焕先牺牲了。程子华和徐海东从担架上又接任指挥，程任政委，徐任军长。^⑪

程子华记得，在九月十八日，二十五军在陕北一个名叫永平镇的地方与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十五军团。仍躺在担架上的徐海东任司令员，刘志丹任副司令员，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⑫看来一切都顺利。这支联合部队在甘泉与张学泉的一个师交锋，打了一次胜仗。

在此之前，二十五军曾俘虏过了一名国民党军官，名叫张汉民，张说他是地下党员，并说刘志丹可以证明。他们不加理会，却当即处决了他。后来，陕北党里的“布尔什维克”们批评了刘志丹，并设法说服二十五军，让他们相信刘志丹实际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二十六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队伍内部的逮捕开始了。起初，没有动刘志丹。他们对下级干部进行清洗时，把刘志丹调开去执行一项任务。但当他骑着马赶路时，碰到了一位年轻的通信员，身上带着一封写给十五军团领导的信，这位年轻人把信交给了刘志丹，信中有一份即将准备逮捕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刘志丹本人。刘志丹把信重新封好，告诉通信员把信送给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然后，他到保卫局去报到。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桌上，对保卫局的人说：“我知道你们在找我。”他以为这会消除他们的疑心。然而，保卫人员却把他关进了牢房。他们没有想

一想，真的国民党特务早就逃跑了。哪会自己送上门来。疑心病迷了人。

一九八四年，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已五十六岁，她身材纤细，有着橄榄色的皮肤，高高的颧骨和一张圆圆的小脸，口才很好，讲了她所知道的一切，一九三五年时她仅五岁，但没有忘却那年的九月和十月。她和母亲到关押刘志丹的地方，站在外边，希望能看他一眼，但失望而归。

主持肃反的人不愿人们知道抓起了谁。他们甚至把刘志丹的马也关了起来，以免人们看到它单独拴在马厩里而引起议论。当囚犯被押解过街时，犯人头上都套上一个布罩。有一天，这位五岁的女孩和她的妈妈从一队蒙着布罩的犯人旁边走过，其中一个人咳嗽了几声，她们觉得咳嗽的人就是刘志丹。

刘力贞神态庄严地谈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一天，她和母亲一道去看瓦窑堡城门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那次是毛挽救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人员的性命。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赶到，并亲自派人到瓦窑堡营救，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当时就恶运难逃，人头落地了。这是在封闭的阴谋政治圈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又一例。

周恩来在十一月底到了瓦窑堡，他将被捕人员迎出牢房。战士们早就议论纷纷，为了解救牢房中的同志，必要时全军一道动手。毛不愿责怪（有责任的）军人，他认为，由于他们对某些事情无法理解，使他们成为愚昧无知的受害者。^⑪

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之后，刘力贞只见过他一面。她回忆说：“我觉得陌生，过了好长时间才敢走近他。”

他脚上曾带过镣铐，所以行走很困难。毛安排他负责组织和指挥二十八军。一九三六年三月，他东征去与国民党作战。不久，他在战场上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刘志丹的女儿说，她父亲生前没有什么嗜好，只喜欢抽烟。直到今天，她的母亲全桂荣仍在父亲的遗像前燃着一支烟。全桂荣已七十九岁，但精神不减当年。这位娇弱的妇女不无羞怯地告诉我们，她与刘志丹是早在襁褓之中就定了婚的，在她十七岁、刘志丹十八岁时两人完了婚。“我怕你们会取笑我”，说罢，她不好意思地眨眨眼睛。她虽拄着拐杖，但却身强体健。刘志丹牺牲时，她正患伤寒，未能参加葬礼。一九四三年，当刘志丹的遗体被安置在他的诞生地保安（为纪念他，已改名志丹）纪念堂时，她让人打开了棺盖，看到他穿着她缝的衣服时，她感到欣慰。刘志丹牺牲时，除了手枪和战马之外，别的一无所有。她要求将这两件遗物送给需要的人。

她摸着脑袋，以一副挖苦的神态说：“当时，国民党还要出二百块大洋买我的脑袋哩。”她说她年轻时，是个“不问政治的人”，对政治毫不关心，直到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军队抄了他们的家之后，“我才参加了革命”。有人说：“该是参加的时候了——可你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呢？”

全桂荣和女儿刘力贞为爱德加·斯诺一九三六年在保安给她们照的一张像片感到自豪，照片上的刘力贞戴着一顶小

红军帽，帽上的红星是她母亲给缝上去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被红卫兵砸烂了。刻有革命领导人的题词的纪念石碑被毁了，刘志丹的家再次被赶到了农村。仝桂荣提醒他们说：“这不是新鲜事，只不过是一九三五年的重演”。刘力贞说，这是和过去一样的迫害——只不过这次是来自“左”派。刘力贞是医生，被迫到农村去劳动。她丈夫张光，现任西安一家报纸的编辑，当时也被送到一个生产队。刘志丹的弟媳写了一本关于刘志丹的长篇小说。毛的秘密警察头子康生在毛面前说，这是一份拥护高岗（被指控为叛徒）的政治文件，于是她和丈夫双双被捕，横遭虐待。与刘家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受了株连。

刘志丹的女儿瞪着炯炯有神的两眼严肃地说，刘志丹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他的精神。至今，当老战友们见到她母亲时都禁不住流泪。她们怀念她的父亲，珍视他对革命的贡献。^②

红军来到陕北，并非处处都是危机，有时也有人间趣事。毛泽东越来越爱开洛甫和小刘英的玩笑了。自从刘英与“中央队”一起工作以来，她与洛甫几乎形影不离。这难以逃过毛的眼睛。洛甫是党的总书记，他和毛大部分时间在一起。

刘英和洛甫一起到达瓦窑堡后，就决定结婚。“从渡金沙江以来，我们关系越来越密切，”刘英回忆说，“但到了陕北之后，我们才生活在一起。”

他们本来决定不举行婚礼。“我们太穷了。”刘英说。由

于毛对他们的婚事感到非常高兴，并要他们举行一个招待会，这样才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但未设盛宴。

从江西直到延安时期，洛甫一直在毛的左右。后来，他们明显地逐渐疏远了，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洛甫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外交部长。刘英和毛的夫人贺子珍关系很好，一九三七年，她们一起去了莫斯科。洛甫任外交部长时，刘英也在外交部。

洛甫和刘英的爱情（洛甫三十五岁，刘英二十七岁）是长征中仅有的几起恋爱之一，双方感情始终如一。^{②1}

陕北也有悲剧。红军刚刚到达吴起镇，赫赫有名的突击团——一军二师四团的指挥员杨成武和王开湘就患起伤寒，王比杨更严重。仅仅几天之后，杨成武就得悉王已不在人世了。原来王开湘在持续高烧（温度高达摄氏 40 度）、神志昏迷的情况下，从枕下抓起手枪，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王有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支手枪和一块金表。整个长征途中，他每晚都擦手枪，直擦到闪闪发亮才罢手^{②2}

几乎与此同时，在长征中一直被抬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病情突然恶化。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人们以为他活不成了。杨尚昆一直陪着他。

后来成为军队卫生部门负责人的王彬医生为受伤的王稼祥治疗，王的腹伤严重的时候，腰部曾插入一条引流的橡皮管。人们这时才发现，王稼祥濒于死亡的原因是腐烂的管子造成伤口感染。管子拔掉了，伤口进行了处理，他的烧也退了生命得救了。^{②3}

后来，王稼祥很快被送往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花了半年时间才使他的伤口愈合，并使他基本上康复。他们曾设法使他的体重增到一百三十二磅，但未成功。后来他在苏联接替要回国的康生，担任了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毛虽然找到了家，但斗争并未完结，同敌人的斗争，红军队伍内部那种随意发动、有悖常理的斗争都不会完结。但是，就在这片沟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风怒号，红沙飞扬的黄土高原上，毛和共产党将深深地扎下根来。他们在陕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一年，而是住许多年。毛在吴起镇只停留了三天，随后即前往瓦窑堡。在那里，住到一九三六年初；然后去保安，在那里直住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这十年是革命的酝酿时期（这是革命孕育成熟的十年）。

毛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务。现在，他只有自己的一方面军残部和争吵不休的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但是，他预料队伍将迅速扩大。不久，由贺龙和肖克率领的二方面军，由难驾驭的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以及编入四方面军的毛自己的那些部队，还有朱德和刘伯承等指挥员都将前来会合。毛对此深信不疑。

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他诗兴油然而生。他把一张木凳拉到松木桌旁，让警卫员点上煤油灯，这盏灯从红军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之日起一直陪伴着他，他从锡制文具盒里取出砚台，研好墨，用驼毫小楷笔蘸了一下墨汁，开始在一张宣纸上写起来，诗句一气呵成：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结束了。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永远也搞不清楚。长征开始时，有八万六千人，长征结束时只剩下不足六千人，但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征途中，红军不断招募新兵，充实力量。那些“损失”的人也并非全都牺牲了，有不少人脱队逃跑了。

计算数字并没有多大意思。这是用热血和勇气谱写的史诗，是胜利和失败的史诗，是沮丧和憧憬的史诗。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

中国革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中汲取无尽的力量。

第二十八章

生 死 与 共

假如说在红军的队伍里也有一对生死朋友，那么，这对朋友无疑就是二十六岁的六军团司令员、身材修长的肖克和三十六岁的二军团司令员、相貌英俊的贺龙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靠近黔、川、湘、鄂交界“四角”处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

六军团和二军团在这里正式合并组成了后来的第二方面军。也正是在这里，肖克和贺龙开始了他们之间密切而持久的合作。

任弼时政委在向部队宣读红军最高司令部的贺电时，场面热烈感人。在这深山荒野之中，肖克和贺龙根本无从知道，给他们拍贺电的红军司令部已经在长征的路上走了十天了。

肖克和贺龙的会合，丝毫没有象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面一样引起那种病态的猜忌。肖克在五十年之后回忆道：“我们和贺龙会师的时候都特别高兴。我们需要他，他也同样需要我们。”

一九八二年，肖克赋诗纪念那次会师。一九八四年，肖克向一位来访的客人背诵了这首诗，当时他正在研究一张铺

在地板上的长征路线图，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

八千健儿挥戈东向，
沅澧波涌狂飙燎原，

.....

抚今追昔怀梵净山。

贺龙和肖克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见过面。现在，他们要生死与共了。在长征前，他们分别和蹇姓姐妹二人（姐姐蹇先任、妹妹蹇先佛）结婚，而且不久每人都有了一个孩子，贺龙的是个女孩，肖克的是男孩。

贺龙在南腰界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根据地。现在，他们必须依靠三样东西：他们的腿、嘴和枪。余秋里那时二十岁，是军校分队的负责人，已有了五年军龄，参军前是个赤贫农民。他解释道，贺龙的意思是说，他们必须继续前进，用宣传来争取群众，用枪杆来阻止敌人。——余秋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当肖克和贺龙一九三四年秋在四省交界的地方会师时，贺龙只有一小块没有明确界限的根据地，六十英里长，三十英里宽，有十万人口。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根本不足以养活一支军队。这是贺龙从前常到的地方，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贺龙和肖克都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贺龙一八九六年生于靠近“四角”之地的桑植县洪家关村一个贫农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大姐贺英练过武，领导着一支游击队，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父亲是个裁缝。

家里人把希望寄托在贺龙身上，希望他能振兴家业。

贺龙十岁的时候，曾跋涉近三百英里，买了一百匹马，在回家的路上又把这些马卖掉，而居然没有被盗。他念过小学，种过一年地，还开过客店，这一切使他联想到穷人的生活。在一位名叫陈图南的教师——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影响下，贺龙也报名参加了孙中山的革命。贺清楚地记得，“我不仅仅是签上了名字，而且还按了手印。”

一九一六年旧历二月十六日，贺龙发起了他的第一次革命行动。他带领一伙农民，手持菜刀，袭击并捣毁了盐税局，缴获了一些枪支，逮住了税务官，并砍了他的脑袋。

贺龙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

贺龙曾对他的同事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上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

他从来不讲究礼节。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一九二五年，北京的军阀封他为警备司令，还给了他一套漂亮的军装——镶着金边，缀着金扣，肩章上镶着用金子和钻石做的军衔，还佩有漂亮的黄色绶带。他穿着这套军装照了像，后来给他的革命同志们看照片，并开玩笑说：“瞧我的鬼军装！”（“文化大革命”中，这被说成

是暴露了他的“军阀思想”。)

蒋介石一直试图把贺龙争取过去。他派贺龙的一位旧友试图劝说贺龙回到国民党里来。贺龙把那人臭骂一顿，并枪毙了他。(这在“文化革命”中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里通国民党。)与此同时，蒋要把贺龙家的人斩尽杀绝。国民党杀了贺家一百个人，其中包括他的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结合——贺龙是个老革命，肖克比他年轻十岁，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类型。贺龙豪放爽朗，留着小胡子。他说，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海伦·斯诺把贺龙称为洛钦瓦。(英国作家司各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位农民英雄——译者注)

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⑩

贺龙手拿菜刀、揭竿造反的时候，肖克还是一个八岁的小学生。肖克领导六军团还显得太年轻，但是他办事准确，原则性强，胸有成竹。他说自己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小知识分子”家庭。实际上，他的父亲是个破落乡绅家里的秀才。肖克于一九〇八年八月出生于湖南的五岭地区，他勤奋好学，是个优秀的诗人。他身材细瘦，脸上长满雀斑，小时候一场病使他的头发几乎全掉光了。他于一九二七年进入黄埔军校。他告诉海伦·斯诺，他的一个兄长“因和土匪有来往”而被处决了。

这两个人互相补充——贺龙性格开朗，走在街上总要吸引很多人，他还是个出色的演说家；肖克为人则比较内向，有点好为人师。但是他象所有勤奋而认真的人一样，总要寻根究底地调查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善于计划，行动坚决。贺龙和肖克都认为他们的政委任弼时在政治上非常英明。肖克五十年之后还说，二方面军之所以成为一支精悍的部队，应归功于任弼时。^①

“他是个出色的将领，”肖克在谈到他的朋友、十五年前在“文化革命”中蒙冤惨死的贺龙时，声音沉重而满怀激情地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我敬爱的老上级。”

在贺龙和肖克会师的三个星期以前，一位不寻常的观察员——一个外国人——出于偶然的機會也参加了长征，他将（非出于自愿）伴随红军达十八个月之久，后来发表了他的印象记。

肖克解释道：“有一天，我们来到贵州省会东边的旧州，打败了一股地方部队，接着占领了黄平县老城。”在这里，肖克的部下在一所天主教堂里发现了一张三十六英寸见方的大幅中国地图——地图是法文的，而他们谁也不懂法文。肖克说，幸亏教堂里有一位“神父”会讲一点中文。这个人名叫鲁道夫·博萨哈特，瑞士人，是中国内地的一位新教徒传教士。肖克早已把他的名字忘掉了。

博萨哈特被带到肖克的司令部。晚饭后，两人坐在一张方桌前，把地图打开，肖克一一指出各个地点。在一支小蜡烛的微弱光线下，博萨哈特把这些地点的名字读出来，然后

两人一起想出中文的译名。他们在地图前工作了一个通宵。这一天对肖克来说是难忘的，当他在军事学院谈及这件事时，脸上还露出一分喜色。

肖克说：“我们现在有了一张贵州地图，真让人高兴！”

博萨哈特和另一个传教士阿诺利斯·海曼跟肖克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一起参加了长征。海曼待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四百一十三天，博萨哈特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二日复活节，共五百六十天，与他们一起被俘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不过，妇女和孩子们很快就被释放了。博萨哈特的印象记是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唯一印象记。

对博萨哈特来说，六军团和二军团会师的那天是个欢庆的日子。乐队在他和海曼的囚房外面奏乐，他享受了被俘以来第一个休息日。他和海曼都在洗衣服。他发现自己成了他们说的“中国千百万虱子的美餐”。

他和海曼从一个过路的农民那里买了两磅蜂蜜，大吃了一顿。

博萨哈特开始对长征有了一点了解。他和海曼一前一后排成单行走，他们的前面是一位掌旗兵，扛着一面红旗，旗上有一颗黑色的星，星的中央是白色的锤子和镰刀。掌旗兵用一幅油画的帆布做了一个防水套子。画上是耶稣躺在马槽里，周围站着牧羊人和他们的羊群，伯利恒之星在空中闪烁。博萨哈特追述说：“跟着红旗走，最初觉得很别扭。但是一旦红旗被卷起来，我就感到自慰了，因为我意识到，我前面的星是明亮的晨星。”

有时，俘虏们被绑起来。博萨哈特和海曼被一根绳子拴

在一起，或者一个卫兵走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绳子，象牵狗一样牵着他们走。俘虏们被带来审问，假如他们被当成探子，就要挨一顿打，然后拉出去由手持大刀的十几岁的年青人处死。^⑫清晨，他常看到那些被处死者的尸体躺在路边。每个尸体上都别着一张纸，上面写明死者的罪状。

肖克满怀热情地怀念博萨哈特。他觉得欠了这位传教士一笔人情债，因为博萨哈特曾帮助他识别地图。五十年之后，肖克派人查寻博萨哈特，发现他还健在，住在英格兰，已经八十八岁了。用一九八四年十月《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文章中的话说，他还清楚地记得他作为“第二个外国人”在长征路上的所见所闻。（第一个外国人是李德。）

博萨哈特头一次见到贺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那天，这位传教士正和一些俘虏一起走着。俘虏中间有一个人称“廖胖子”的年轻富翁。这时，一个被博萨哈特描写为“相貌堂堂、留着黑胡子”的人骑马经过他们身旁，对这个年轻人叫道：“嗨，胖子，你最好赶快多交点赎金，否则我们就要砍掉你的脑袋。”这人就是贺龙。博萨哈特获释不久，被叫去给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生在桑植的贺龙的女儿编织婴儿服。博萨哈特是自学编织的，并因此而出名。他给红军战士织过毛衣、围巾和手套。贺龙的副官拿来了各色毛线——黑、棕、绿、紫、白，有些上面还带着德国的商标。博萨哈特想，这一定是从哪个传教团搞来的。他得照着两件童装做——一件中式小内衣和一件半西式外套。他画了纸样子，然后就用人们给他的一支漂亮的不锈钢钩针织起来了。

博萨哈特还没完工，队伍又上路了。他把尚未最后织好

的小衣服交给了贺龙。^⑬

关于贺龙孩子衣服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到了延安，他们决定把那时已经一岁的孩子送到西安去。她名叫贺捷生——意思是出生在胜利的时刻。康克清拿出朱德一件破旧柔软的衬衣给捷生做了一些内衣裤。^⑭

博萨哈特认为，和他一起行进的俘虏被扣着不放，大都是因为红军要从他们身上索取赎金来资助长征。向传教团索要的赎金是七十万美元。结果，为海曼付了一万块银元，博萨哈特则一文未付。但是，从那些被俘的中国人身上的确榨出了不少所谓“罚金”。有些人被扣了一年多时间，这期间他们的亲属有时交些钱来。根据博萨哈特的印象，这种以索取罚金为目的而俘虏的人有几百甚至几千名。红军逼近时，地主一般都闻风而逃了，但常常留下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亲戚或信得过的仆人在家照看财产。红军就把这些人逮起来，直到地主交了一笔适当的罚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罚金，人质有时就会被处死。^⑮如果人质年纪太大，或病弱跟不上长征的队伍，他们也会被杀掉。

博萨哈特认为，他和海曼之所以被扣留这么长时间，都是由于一九三四年圣诞节一次草率的逃跑行动。有些传教士的命运比他们坏得多。一九三四年九月六日，长老会教徒约翰·斯塔姆和贝蒂·斯塔姆这两位美国人连同他们三个月的女儿一起在安徽被俘。斯塔姆夫妇被处死，孩子被丢在一边，无人照管，二十四小时以后才被人发现。报上把这孩子叫作“奇迹婴儿”。共产党人拒绝为此事承担责任。在博萨哈特被俘的同时，中国内地教会一位名叫福开森的老传教士也被俘，

后来，就毫无音讯了。^⑩

一九三六年一月，海曼被释放以后，另外一个传教士在贵州东北的石阡被俘了。他叫海因里希·凯尔纳，是圣新会的一位德国教士。

凯尔纳二十八岁，在中国已经两年了。他身体不结实，适应不了长征中缺衣少食的艰苦生活。有时，博萨哈特和凯尔纳有马或骡子骑。但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步行。他们经常住在地主的谷仓里，睡在粮堆上。他们有时也席地而睡，一般身下垫一块木板。

博萨哈特所在教会的同事们坚持力争使他获释，他们接二连三地派代表进行谈判。但凯尔纳的教会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使他获得自由。^⑪最后，他丧失了生命。

二军团正取道乌江附近的猴场由东向西穿过贵州。猴场的一个富裕房产主告诉博萨哈特，一年前，“朱德司令的军队”从那里经过，队伍里有两个穿着讲究的外国人，可能是俄国人。其中之一恐怕就是李德。假如真有第二个外国人，那么，这人到底是谁，始终是个谜。

肖克很高兴向西转移。因为贵州的东部和湖南的西南部太贫穷落后了。鸦片是那里的主要作物。无法在那个地方征兵，除非部队也要抽鸦片的人。那里所有的人都抽鸦片。孩子一旦感冒了，父母就把鸦片烟吹到孩子的鼻子里作为治疗。红军有一条铁的纪律：不准队伍里有一个抽鸦片的人。但是又招不到别的人，于是他们把这些人也招来，然后让他们逐渐减少鸦片吸食量。医务工作者对他们进行宣讲，并且给他们注射硫磺液。一个月以后，大部分人的烟瘾都戒了。^⑫

在长征途中丧失左臂的独臂将军余秋里，一九八四年已是一位高级军事官员了，他长得矮胖而壮实，宽宽的脸膛上常带着热情的笑容，说话时声音爽朗，举止粗犷，喜欢挥动他那仅剩的一只胳膊做夸张的手势。他于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家里很穷，只有一亩一分地。八分地种水稻，三分地种芝麻和花生（共合六分之一英亩）。靠这一点土地是养不活他的父母、兄弟和他自己的。十五岁时，他参加了红军。

当六军团从毕节往西南行动的时候，已升任十八团政委的余秋里看见贺龙和司令部人员站在通向赫章路上的一座桥边。贺龙让余带领他的团沿路向前走六英里阻截敌人。

余发现得章坝村附近的一座山上有国民党部队。他派了一个排从侧翼进攻。这个排一去不复返。他又命令发动正面进攻。

他说：“我听到那么多轻机枪的扫射声，大吃一惊。后来我意识到，这种被我当成轻机枪的武器其实是驳壳枪——一种二十响连发手枪。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真是艺术品，尖端技术。我们缴获了八支这种枪。”

在余秋里的红军生涯中，他从来没下过不成功则成仁一类的死命令。“但是，那天我下了这样的命令，”他说。敌人几乎摧毁了他的指挥所。他甚至把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参加战斗了。十点钟，一粒驳壳枪子弹穿进了他的左臂。打断了的左臂垂在身边，露出了骨头和筋腱。

他一直坚持到晚上。他用一条毛巾缠住伤口，用力捂着以减轻疼痛，他还把淌着汗水的伤臂浸泡在冷水里。一个医

生把他的胳膊紧紧地包扎起来，战士们抬着他继续转移。

余秋里说：“我是个九死一生的人。”过金沙江的时候，他的胳膊还包扎着。他乘的筏子突然翻了，把他掀到水里。不久前缴获滇敌的一条羽绒被子使他浮在水面上，救了他一条命。

和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才拆掉了绷带，只见伤口已爬满了白蛆。医生们用抗菌素清洗伤口，换上新绷带。他又被抬着过了草地。九月末，在甘肃的徽县，医生为他做了截肢手术，用一把日本剃刀割掉腐肉，用兵工厂的锯子锯断了骨头。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缴获来的麻药，也没人知道该用多大剂量，他又一次险些丧命。^⑬

队伍正翻越乌蒙山。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长征结束时写的一首诗里描写过乌蒙山：“乌蒙磅礴走泥丸”。^⑭肖克记得，他们在乌蒙山里走了大约两个星期，三月二十三日出山。在宣威附近的虎头山打了一场恶仗，击败了云南司令孙渡。军阀龙云刚刚被任命为贵州和云南两省的总司令，想让他手下的指挥官露一手，但结果还是打不过红军。

红军下山到了盘县，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苏区。但是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他们收到四方面军的一封电报，指示他们北上。他们得选择好出发的时间，赶在三月、四月或五月长江上游春汛到来之前。

在毕节和盘县停留期间，贺龙和肖克扩充了队伍，他们此刻约有一万八千人了。孙渡司令带着他的二万四千人的部队一直尾随贺龙和肖克，一般总是和他们拉开一、两天的距离。（孙渡后来说，他以为红军有四万人。）^⑮

贺龙和肖克没有与孙渡或他的上司龙云达成什么“让道放行”之类的协议，但希望他们多少能采取中立态度。

贺龙在毕节碰到了一位很有名望的长者，他叫周素园，当过贵州省的省长，曾经是清朝的举人。贺龙问他为什么没有逃跑。“我为什么要逃跑呢？”这位学者一边回答，一边指着 he 书架上马克思、列宁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书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也是。”贺龙请他给军阀龙云和孙渡司令写信，他照办了。他在信里告诉他们，红军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但红军并不是来同他们打仗的。他提醒他们，蒋介石希望得到云南，而且有前车之鉴，贵州的王家烈已被搞掉了。

信里提到经典著作《春秋》里面的一个故事“假途灭虢”。讲的是一个大国国君向一个小国国君“借”路去攻打一个强大的敌人，在回来的路上又把这个小国吞并了。这学者还提到侍幼明鉴——历史中的二十例教训。湖南军阀何键也暗地里警告龙云，要他当心蒋介石可能耍的花招。^②

何键的警告有特殊的意义。他是个铁杆反共分子，但当蒋介石垂手取得贵州后，他警惕起来了。他通过他的女婿李觉捎信，提醒他的云南同事不要为蒋介石提供可乘之机。他强调说，各省的队伍应相互照应，不用替蒋的中央军操心。

龙云接受了这个意见。他告诉李觉：“我们大概不会赶上红军。”这样，龙云和湖南方面的湘军就没有去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既难以获得给养，又必须沿着金沙江边崎岖山路行军；龙云怕他们对云南地方军发动攻击，因此不允许他们靠近昆明。

龙云说：“还是让国民党中央军自己去追赶红军吧。”他对他们说：“如果你们需要给养，跟蒋介石要。”龙云怕他们对云南发动攻击，因此千方百计不让他们靠近昆明，并让他的部队在昆明建造防空工事。要知道，红军是没有飞机的；国民党有。^{②③}

龙云尽管作了这些策划，却并没有使贺龙和肖克畅行无阻地到达金沙江——但是有所帮助。

当肖克和贺龙准备离开盘县前去和四方面军会合时，龙云以为红军处境不妙。在红军进入云南，准备通过昆明以北约五十英里的一座吊桥过普渡河时，龙云趁机派了一支大部队前去阻截。

龙云估计错了。共产党先头部队已于四月六日拿下了吊桥，七日清晨击溃了守桥的工兵特别旅。

肖克和贺龙发现龙云调动的大批部队之后，就在四月七日晚召开紧急会议，改变了计划。他们决定对昆明发动佯攻，希望这样能迫使龙云撤回他的部队。

龙云果然中计，他匆忙把部队撤回了他的首府，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从富民附近过了普渡河。云南的情况就是如此。没有再发生别的战斗。^{②④}

传教士博萨哈特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们越过了云南边界，翻过了乌蒙山，踏上了一条条艰难曲折的小路。这些路对他已经很难了，对体力迅速复退的凯尔纳神父来说就更艰难了。

在他们开始走上平原的时候，博萨哈特听说他要被释放

了。后来，肖克终于告诉他，红军靠近昆明时就放他，但凯尔纳还得继续跟他们走。

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下午，肖克宴请博萨哈特，进行了轻松的谈话。肖克将军表示很奇怪，象博萨哈特这种在外国受过教育的人居然还相信上帝。肖克说：“你肯定知道我们人类都是从猴子变来的。”

博萨哈特对肖克说，进化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在他看来，“相信我们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比相信上帝需要有更坚强的信念”。

现任政治局委员、当时的六军团政委王震对博萨哈特说：“你给报纸写文章时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看到我们待穷人多好，我们是按原则办事的，我们并不是报道中诽谤我们的所谓土匪。”

肖克说，他不反对博萨哈特作为一个游客再回到中国来，“甚至允许你办一所学校，条件是你不能用对上帝的信仰来麻醉学生和老百姓。”

吃饭时，凯尔纳神父也在座。饭后，博萨哈特警告一个他称作“吴法官”的负责管理俘虏的人说，如果神父得不到比较好的照料，是会死的。他要求给凯尔纳配备一个勤务员，保证凯尔纳有水喝，能洗澡，有烤火的燃料和铺床的稻草。吴法官答应改善一些。他们还要让凯尔纳喝到一些咖啡和可可。

第二天清晨，红军早已上路，博萨哈特走进了富民县城。这天是复活节。他的苦难结束了。

很多年之后，博萨哈特听说，他获释后十天，神父就死

了。共产党人没收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地主的一口制作考究的棺材，雇脚夫把这口很沉的棺材抬到山坡上，把神父葬在那里。红军继续前进。谁知棺材太沉，脚夫们拿了工钱，等红军一走，就把棺材放在山坡上。不久，棺材被路过的土匪撬开，他们指望在里面找到随葬的绫罗绸缎。但看到的却是神父骨瘦如柴的尸体，身上穿着用最廉价的黑布做的法衣。他们觉得不值得为这浪费时间，扔下盖子，走了。那天夜里，狼来了……^{②3}

六军团和二军团甩掉敌人后，从富民直奔金沙江。这是一场速度的竞赛。他们走的是通往大理和美丽而著名的洱海的大路，然后去鹤庆和丽江，这是金沙江的两个渡口，位于一方面军过江渡口皎平渡的西北一百五十英里。他们离西藏很近了。这里的山要高得多，但是河两岸的路却很好走，山也比较低，不超过一万英尺。金沙江在这海拔约六千英尺的地方奔流着。近两万英尺高的玉龙山峰，山顶积雪，冰川秀丽，十分壮观。^{②4}

二方面军一路驰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偶而有几架国民党的双翼飞机懒洋洋地在他们上空盘旋侦察。

他们到达丽江时，那里举行了一番庆祝。当红军穿过这个汉族和纳西族混居的镇子时，受到了群众的夹道欢迎。人们象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欢迎贺龙和肖克。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和在毕节一样，丽江也有一位出名的清朝学者，名叫和松樵。他不是翰林，而是进士。他曾经是孙中山的部下。他和丽江县长王凤瑞商量之后，决定欢迎共产党人通过县境。王

自己跑到山里去了，等贺龙和肖克走后才回来，他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他是军阀龙云的门徒，但在共产党人的统治下继续做事，而且升任了高职。一九八四年时，他还在世，是年已八十四岁的老翁了。^{②①}

四月二十五日，先头部队选择了渡江地点。沿金沙江四十英里的一段距离内有五个主要渡口，大部分部队是从石鼓过的江，这里江面平静，有平展舒坦的沙滩。贺龙的部队四月二十六日开始过江。肖克的部队走了四十英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石鼓，第二天开始过江。他们有很多船，到二十八日黄昏，一万八千人马全部过了江。虽然没有一人被敌人打死，但由于马匹受惊，一条船翻了，淹死了十七人。一个司号员担任警戒，每次国民党飞机飞临渡口上空，他就吹号报警。

他们准确无误地向北挺进，在彝人区里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在藏族区里却遇到了一些麻烦。肖克说：“我们用银元买粮食、食物和其他东西。我们有了伤病员，少数民族人民就给我们牲口帮忙。”

七月二日，贺龙和他的部队到达四方面军设在甘孜的司令部。在此之前，肖克带领部队已到了。肖克回忆说：“他们非常友好。我们刚刚翻过雪山，每个人就领到一件暖和的毛衣。大家的精神都很不错。”^{②②}

第二十九章

浪子回头

自命不凡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同毛分裂之后，自感反而万事诸多不顺。（当然，张声称是毛搞的分裂。）

张的第一个行动是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毛的手中夺过来。他分别在阿坝和卓克基的喇嘛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毛集会。他宣布成立民族独立特别政府。他宣布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他宣布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自命为总书记。这一声明是在离马尔康约二十五英里的卓木碉发表的。

后来，他下令举行党的代表大会，以批准他的这一系列行动。而在大会举行之前，新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总书记将负责实施领导。

张并没有公布他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名单。他未同他亲自选定的委员们商量，为的是不想使他们感到难堪。同时，这样也就不会遭到公开拒绝而使他自己陷入窘境。这份名单迄今从未公布，仍然收藏在他那些得势的对手的文献档案中。看过这份名单的人说，没有被张任命为中央委员的人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和博古。但他保留了大部分军界要人，包括朱德、彭德怀和林彪，还有各军团的最高指挥员。他还任命王明为中央委员，王是位有争议的亲苏派政治局委员，

长期以来一直住在莫斯科。当然，张把自己所有主要的军政同事都塞进了他的中央委员会。

在被任命为张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一位知道名单的人。这个人就是朱德。朱德是张的随行人员中一个受控制的将军，名义上他是所有部队的总司令，但很快就被搞得有职无权了。

张国焘究竟是否图谋除掉朱，简单地说，是否试图把朱杀掉，对此事五十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

北京保守的党史专家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他们怀疑根本没有发生过如此耸人听闻的事情。他们声称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这同张用军事威胁毛的问题一样。一位党史专家说：“关于这一事件，我们唯一的证据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说法。”

史沫特莱是一位激进美国人，她的朋友们说她是迷恋上了那位虎背熊腰的将军。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住了很长时间，为她后来撰写的朱德传记收集材料。有时她整天都跟朱德待在延安的窑洞里。她教他跳舞——她有一台手提式留声机，还有《为卡罗来纳而呐喊》、《节日》、《西波涅》等唱片。朱德的舞步十分轻盈。她陪着他一起下地干活，还陪他上前线。她称不上是一位毫无偏见的证人。她在她撰写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说，朱德“从未跟我谈起过他在西康实际上已沦为张国焘囚犯的那一年的事情”。这也许只是一种外交遁辞。她在书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朱德和张的矛盾。而关于朱德跟张在一起的这一年，她却大量引用了一位未披露姓

名的“红军政工干部”的话。这位干部是否就是朱德本人呢？

这个人告诉她，张命令朱德反对毛，并同他断绝一切关系，但遭到朱的拒绝。接着，张命令朱德反对党的北上决定，又遭到朱德的拒绝。

此人还告诉史沫特莱：“张国焘说他给朱德时间再考虑考虑，如果仍然不服从这两项命令，就把他枪毙。”此人援引朱德的答话说：“你要枪毙就枪毙，这我无法阻止你。但我绝不接受你的命令。”

康克清是一位刚毅的女性，思想坚定，身体健壮，她穿着中国妇女运动传统的素色衬衫和男式深褐色条纹衣裤。一眼就能看出她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领导作用。她作为朱德的战友和同志，并肩进行了长征（她说，“我从来不叫他丈夫，总叫他同志”）。

几十年时间过去了，但康克清对张国焘的憎恶情绪依然不减当年。一九八四年秋，她已七十三岁，她仍然坚信张当时对朱德“不断施加压力”，试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来。“接着，张就对朱德耍了一个小花招，”她说，“张让人宰了朱德的坐骑，撤了他的警卫。他还把我们隔离开来，使我们无法见面。”

朱德曾跟她谈过此事。他说：“张的这些伎俩为的是杀人不用刀。”

宰马和撤警卫，都是在部队准备离开阿坝时发生的。朱德没有马可骑了，他准备徒步行军，但战士们又给他找来了一匹马。想到一个总司令竟象普通士兵一样徒步行军，他们

都感到内疚。康克清当时的任务是收容掉队的战士。她本来分到了一匹骡子可以帮她的忙，但现在这匹骡子也被留了下来，康克清认为这是故意的。还有一次，一些伤员试图夺走她的骡子。

张蓄意要杀害朱德吗？

“我说这是些小花招，”康克清抿着嘴唇，脸色严肃，厉声重复道，“把总司令骑的马和他的警卫部队撤掉是重大行动。”

还有好多次，总司令由于没有马，不得不步行。他也不能在总部的小灶吃饭。他必须自己筹措伙食。这在当时并非易事。

党史专家们也许会争论不休，但是康克清心里非常清楚张国焘的图谋。也许张并不打算采取直接行动，但是他故意使朱德身陷危境。

张国焘及其手下的人要“打到成都吃大米”。这是在卓克基反毛会议后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深得战士们的喜欢。胡中贵是张的第九军里一名普通战士。他十三岁时就参加了红军，是一名红小鬼。一九八四年他六十三岁，他记得在村里的墙上就刷过这样的标语，还有“起来保卫家乡”，“北上抗日”。他还记得有一首歌就叫《为成都而战》。他非常喜欢这首歌。谁都不喜欢藏族地区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欢草原和雪山。

现年六十八岁的叶英孔，说起话来柔声细气。他曾是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员，由于工作的方便，把张国焘和他的指

挥员们的行动都看在眼里。当时，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各军团、同毛以及中央委员会联系都用无线电。在四方面军内部则用电话联络。张喜欢亲自打电话。如果电话打不通，他马上就暴跳如雷。（许多高级官员脾气都相当急躁。事过之后，他们又很友善。）叶英礼认为，张和朱德虽吃住、行军都在一起，但是朱德没有实权。

许多战士都不知道上层的这种摩擦。但是关于朱德的事有不少谣传，有的说他的马被宰了，他的警卫被撤掉了；有的说他和刘伯承受到压制；有一位战士还听说朱德被迫挑了三天水。

杨尚昆将军记得朱德曾告诉他自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朱德说他在张国焘那里同原一方面军的人直至连一级的下级官兵都见过面，并同他们谈过话。这使张国焘感到惴惴不安。

杨将军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从未考虑过要拯救朱德和刘伯承。杨将军曾向毛建议用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毛不同意并斥责了他。“如果你提出用某人来换，”毛说，“他（张）也许就会杀死刘伯承。在目前情况下，倒是安全的，他能够活下去。”

毛同留在四方面军的原一方面军指挥员之间没有私人通信。^⑩

张国焘向成都的进军，开始挺顺利。加上一方面军的一些部队，他有八万人。十月的一天，他们离开卓克基，向南跋涉。当时，虽然天气晴朗，但已秋风萧萧，颇有几分寒意。

许多部队都还穿着夏装，粮食不充足。但所幸敌情并不严重，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他们顺利地攻克了丹巴、懋功和达维，击溃了国民党部队三千来人，还抓了不少俘虏。^⑪

国民党方面真的担心成都受到攻击，便忙着集结部队。他们调来了二十四军、二十军和二十八军。让国民党的一个“模范师”守卫着通往成都的山口天全。

张于十月十日从丹巴出发前往天全、泸定和著名的泸定桥。毛北上时走的基本上也是这条路，不过，张现在是背道而行。

张的中路纵队包括三十军、三十一军和九军的二十五师，统归王树声指挥，李先念任政委。十月二十四日，中路纵队越大雪山夹金山，攻打宝兴。右路纵队渡过大渡河，奇袭天全，击溃了国民党的“模范师”。张率领大军向东北方向挺进，到达芦山，日益逼近成都。这时，他们已毙俘国民党部队约一万人。^⑫

四方面军节节胜利，张国焘踌躇满志。现在大军已到达成都西南约六十英里的地方，正沿着一条大路迤迤前进。

蒋介石心中七上八下，急忙调集了八十个团约二十万人马来保卫成都。他把部队部署在挺进中的四方面军的北、东、南三面，略成半圆形摆开，等待着张的到来。十一月十六日，四方面军攻占百丈。三天后，国民党集结了大约十个旅的兵力，在百丈东面三英里处发起反攻。他们在飞机和重型火炮的掩护下，对红军进行波浪式的进攻，如潮水一般成团成团地蜂拥而上。

百丈座落在开阔的平地上，周围是低矮的山丘，没有天然屏障。今日的旅行者可以看到附近平地边上有一座大山，当时可能是被国民党占领着。红军被击退，向南撤到岷山，向北撤到九峰山。七天内，张国焘损失了至少一万人。

张国焘下令要四军军长许世友去同蒋介石最能干的将军薛岳“决一死战”。

“敌人一下子就把我的一个团全消灭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许世友回忆道，“这使我非常震惊。”他的三十四团被消灭了三分之二。团长和政委都牺牲了。^⑬

五十年后，李先念对于百丈一战仍然是怨愤满腹：“我是那次战斗的一名指挥员。我们没有打赢。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我们只得往北走。当地人都是藏民。语言不通，很不方便。而我们到了那里，必须吃饭，于是，我们拉走了他们的牛羊。这样，我们和藏民的关系怎么能搞好呢？”^⑭

张不得不把他的部队一直撤回到西康的甘孜。这是荒凉的藏民地区，远离任何有关的战场，可以不受蒋介石的威胁。可是，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他部队的作战力量却已减至四万人。这是一个低潮。他回忆道：“对藏民来说，红军只不过是一伙前来抢他们粮食的恶人。”甘孜有位活佛曾对他说：“红军贫困潦倒。他们搜寻粮食和其他物品，比刘文辉（国民党四川军阀指挥官）还凶。”^⑮

这期间，他们没有打仗，因为当时严重的问题是生存。

就在这时，出乎意料地冒出一个来自莫斯科的人。他叫

林育英，是林彪司令员的堂兄。从一九三二、三三年以来，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劳工分支工会联盟的代表，与王明一起工作。自从陈云于一九三五年八月抵达莫斯科以来，共产国际加紧恢复同中国的联系。这个工作并不容易。他们曾经从外蒙古派出一个代表团，装扮成商队，携带了无线电设备，试图穿过沙漠进入中国，但在戈壁沙漠以南，被马家骑兵或者流窜的土匪歼灭了。

林育英这次先是乘飞机去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后来他也许是在边境跳伞进入陕北的。他装扮成一个小商人，他没有携带电台、文件、密电码和证件，没有任何可能泄露他身份的东西。事先，他已把指示统统背诵下来，特别是共产国际八月一日关于统一战线的声明内容（人们以为声明出自中国共产党），毛对这份声明却一无所知。

林于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到达陕北。一天，他在保安附近的一条小路上赶路，走到一个小村时撞见了洛甫，接上了关系。等毛和周从前线回来后，林向他们作了汇报。^⑪

要谈的事很多。长期以来，长征和红军的生存占去了毛的全部精力。且与外界隔绝，对莫斯科感到焦虑的事件——希特勒的崛起，德意日三国联盟，法西斯的危险，以及斯大林认为这一系列矛头针对苏联乃至全球性的攻势等等，毛所知甚少。

斯大林担心希特勒在欧洲、日本在东方这两个战场上发动一场战争，中国的地位突然因此而突然显得重要了。斯大林想同蒋介石组成统一战线，以阻止日本的进攻，首先共产党内部必须组成联合战线，毛张之间的争吵，显然已为当今

的形势所不容。

林育英的工作，第一步是同张国焘建立联系。密码电报经常来往于毛张之间，尽管电报的内容很冷淡。十二月底或一九三六年一月初（根据张的回忆），毛打电报通知他“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浩（这是林育英在党内的代名）已经到达。^⑪用张国焘自己的话来说，他对此感到“欣喜若狂”。毛转达了林的口信，告诉张，共产国际已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统一战线的决议。林还说他希望来西康，但“由于交通不便”，不知是否能够成行。^⑫

林是张的老朋友、老同事，深得张的信任。早在一九二二年，他们就一起参加工会运动，林是在那时加入共产党的。他的同族弟弟林育南也曾与张共过事。一九二五年前，林育英在莫斯科学习，曾在上海、汉口和哈尔滨担任要职。

林作了不少工作，设法使张、毛和解。他还有其他任务。他告诉毛，莫斯科同意红军在必要的时候可去蒙古，必须保存有生力量。对张也是一样，他可以去同苏联毗邻的新疆。

林育英还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一个建议，他告诉毛，中国共产党应建立国际联系。他们不应只是一支在中国偏僻内地作战的与世隔绝的小部队。这一具体指示也许为埃德加·斯诺于一九三六年夏去陕北铺平了道路。在这之前斯诺已经申请进入“红区”并争取了一段时间。林育英抵达后，斯诺的请求不久就获得批准。这时，刘少奇正好在天津重建了党的地下北方局。他为斯诺进入“红区”给予了帮助。^⑬

林的无线电外交说服了张国焘。张悄悄地放弃了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以此来换取召开党代会解决所有组织问

题的承诺，林还作了担保。毛同意承认张担任中央委员会“东南局”负责人。其实应该是“西北局”，但是在翻译密码时出了差错。^{②①}

肖克和贺龙到达甘孜时，林的协调工作已经完成。朱德又恢复了总司令的职务，二、六军团的到来又加强了他的自信心。刘伯承也重新担任总参谋长。张愿北上同毛再次会合。这使肖克感到，恶劣气氛大部分已经消除了。^{②②}

这里面还另有个蹊跷：张已经争取到莫斯科的同意，进行他渴望已久的西征——如果张的话是可信的话，斯大林曾答应在新疆省设置一条供应线。张后来辩称，斯大林赞成西征，是为了使共产党远离蒋介石，避免发生冲突。^{②③}

乌云消散，久经沙场的老将朱德发布命令，四方面军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前往陕北与毛泽东会师。许世友把雪山草地称之为“死地”。为了让二方面军得到一段时间的休整，部队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才开拔。^{②④}

八月，部队已到达兰州以南地区，正向宁夏和黄河挺进，这时又发生一场争论。张要过黄河北进宁夏，然后或北上到蒙古边境，或西进到新疆，以便建立同苏联的联系，但政委陈昌浩想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实际上，这将成为毛的陕北根据地的延伸。^{②⑤}

这是张和陈昌浩第一次发生重大争执。最后，陈服从了张的决定，这一决定事实上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作为林育英达成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莫斯科无疑是赞同这次北渡

黄河的行动的。

有人让李先念看了一封毛和王稼祥（应为洛甫——译注）拍来的电报，具体指示李的三十军渡过黄河。李先念回忆说，这封电报他看了二十遍，以确保“深刻领会电报的精神”。李先念确信：“这跟张过去分裂红军的企图不一样。渡河符合中央委员会的具体指示。”^{19②3}

张试图说服其他部队跟他一起走——包括二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一天下午，在干涸的湖边的一座小草房里，美国医生马海德在张的身边，他亲眼看到房里有不少摊开的地图，张正企图说服贺龙率二方面军渡过黄河。贺龙拒绝了，他对张说：“去你妈的。”^{19②4}

这一命令使红军遭到了空前惨重的灾难——张的四方面军的覆灭。渡黄河取得了成功，他们是在离靖远不远的虎豹口渡河的，李先念把它称之为“老虎渡”。只伤亡了一百人。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导致了悲剧。^{②5}

张的三万五千人中两万人刚渡过黄河时，国民党的一个精锐师冲了过来，占领了渡口，把张的部队分成两半。第九军和第三十军、第卫军（毛的老铁甲军）以及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他是这次行动的实际指挥）的司令部分队已经渡河到了西岸。张国焘、朱德、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军官学校和参谋部被阻隔在东岸，他们未能渡过黄河。^{②6}

渡河西征的部队主要是被马家骑兵歼灭的。马家骑兵凶猛强悍，能骑善战，他们头上缠着白头巾，配有快射卡宾枪、马刀和皮鞭，他们骑马飞奔，如风驰电掣一般。他们骑着短

腿马在两小时内就能跑完红军徒步行军整整一天的路程。马家骑兵身材高大，浓须大眼，脸形酷似高加索人。据埃德加·斯诺说，他们一天要洗五次澡。^{②9}

马家军阀拦阻了共产党西路军北进道路。西路军经张国焘同意后，掉头西进。多年之后，李先念说，如果他们当时立刻西进，他们能够不费气力地拿下甘肃西部和新疆，但现在已经晚了，马家骑兵已经开了杀戒。妇女团也被全部消灭，两千名女兵惨遭杀害、酷刑、强奸，或被当作奴隶卖掉。^{③0}

这支惨遭厄运的部队，也就是张国焘称之为“西翼”的部队，仍然在挣扎，他们不时受到穆斯林骑兵的骚扰。电话员叶英礼当时在五军第三十九师。他们在黑河以南、祁连山以北的临泽被围，但是他们终于突破了包围圈，同三十军和九军的残部会合了。^{③1}

他们凭着仅存的一架无线电收发报机，同陕西的中央委员会保持着联系。陕西让他们设法一路打回来。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他们继续西进。马家骑兵把包围圈越缩越小。九军最后一部分部队被消灭，政委阵亡，军长孙玉清被绑在炮口上炸得粉身碎骨，李的副手熊厚发也遭杀害。^{③2}

幸存的人情绪低落。部队建制给打烂了，没有粮食，指挥员也阵亡了，“只有精神力量才使我们挺了过来，”李先念说，“如果我们不战斗，我们的脑袋就会搬家。”

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陈昌浩拿出中央委员会命令他返回陕西的电报。徐向前将军也是在这时候离开的。因此，决定由李卓然领导，由李先念担任军事指挥。^{③3}

他们转进山区。马家骑兵发动又一次冲锋。他们在群山

顶上人迹罕至的孤零零的康隆寺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摆脱敌人以后，他们决定把部队分成小队，分散穿过敌人的包围圈。有一位指挥员程世才自杀了。（原文如此。程世才，现仍健在。——译注）电话员叶英礼同一支小部队留下来掩护李先念和残部。他们化整为零，四五人一群，设法争取返回陕北。叶英礼和许多人都装扮成乞丐，一直走到甘肃的武威，被武威的国民党部队围捕，强迫去修路当劳工。“他们大概知道我们是红军战士，”叶英礼说，“但是他们就是想要这样让我们做工累死拉倒。”¹⁹³¹

李先念率领一队人马越过高高的祁连山，进入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他们没有地图，用指北针和星座来判断自己的位置。他们估计已经到达长城尽端的酒泉，接近古代丝绸之路附近的安西。这条丝绸之路穿过佛教圣地敦煌，向西到达哈密、曲甲、喀什、撒马尔罕，一直通往波斯。

李先念于一九八四年回顾时，他摇着头说，当时他向安西发动了攻击，结果是又一次惨败，死伤数百人。此后，他只剩下大约一千名男女战士了。他们被赶进戈壁沙漠，那里没有道路，没有地名，没有粮食，没有水，没有希望。（他们历尽艰险，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先后到达新疆东部的星星峡——译注）。

一天，西边天空出现了一架飞机，盘旋后就降落了。一个穿着褐色皮飞行服的人从飞机里跳了出来。他就是前往莫斯科通报遵义会议情况以来一直未曾听人提起的党的特命代表陈云。他被派往新疆执行救援西路军的任务。飞机把李先念等人接到迪化。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乘卡车进入延安。

除他的部队外，他是最后一个回到“家”里的人。一九三八年春天，四五百名战士也到达延安。由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促使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们才死里逃生。

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和第一方面军的部队最后终于在兰州以东八十英里稍偏南的老集镇会宁会合了。当时，有一位美国人在场目睹了这一情景。^{③⑨}

他就是乔治·哈特姆。他生于纽约布法罗，肄业于北卡罗莱纳大学和贝鲁特的美洲大学。他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医学学位。他二十六岁，褐色的眼睛炯炯发光。当时的情景他几乎都看在眼里。

一方面军的十五军团的部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从西门和北门攻入了会宁城。攻城部队有八百人，而守城部队只有当地的四百名士兵。国民党于十月五日试图把城夺回来，但被击退了。一方面军更多的部队在老将陈赓的统率下进入会宁。

会宁是座典雅的老城，四周筑有城墙，东南西北各有一座漂亮的城门，人口约二千。一九八三至八四年间，这里仅剩下的西门城楼被修葺一新，十分壮观。

会师那天，城里旌旗招展，标语遍布，当四方面军在徐向前将军的指挥下进城时，群情激动，口号声、欢呼声震耳欲聋，呈现出一片欢乐景象。这是一个金风送爽的秋日，阳光明媚，暖和宜人，早晨无霜，夜间稍有凉意。这真是个好日子。^{④⑩}

庄稼已经收割完了，被一捆一捆地码成大堆存放着，等着严寒把院子里的土地冻结实了好脱粒。有些农民正在清理田地准备过冬。这里不是小麦产地。一九三六年时，他们主要种植小米、玉米和荞麦。土豆、西葫芦、南瓜都已收割完毕，都堆在屋子的石灰墙下。一串串的辣椒，还在晾晒。

十月八日晚上，大家欢闹了一夜。第二天，张国焘和朱德同总部一起到达时，大家更是欢天喜地，热烈欢迎。刘伯承没有来，他在渡渭河时受了伤。^{③⑦}

十月十日，在城里的孔庙前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孔庙至今仍是会宁的中心。当时孔庙前有一个大广场，现已不复存在了。广场上以往每年总要举行几次集市。

马海德个子不高，精力充沛，几个月前他同埃德加·斯诺一起来到陕北，并开始担任红军医生。他坐在庙前的主席台上，同张国焘、徐向前、朱德等大人物和其他许多人坐在一起。他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他显然是个外国人。那时，大家都知道共产国际在促使两军会合中发挥了作用。消息马上传开了。马海德于是成了共产国际的代表。^{③⑧}

朱德在会上讲了话，但现在谁也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会上宣读了中央委员会从陕北发来的贺电。客人们围着新鲜的羊肉、鸡肉、猪肉饱餐了一顿。大家喝着当地土产的氐氐酒。人人都是喜笑颜开。谁也不想匆匆离开这欢乐的地方。大多数部队在这里一直驻扎到十月二十日左右。而贺龙和肖克率领部队直到二十二日才绕过会宁到达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③⑨}

哈特姆当时还没有取他的中国名字马海德，他写下了自己的印象：

关于朱德：“瘦得象鬼，但身强力壮……留着大胡子，……看上去不象军队统帅，……而是象红军之父……”

关于张国焘：“政委……肥胖，高大，肌肤滑润。我感到纳闷，其他人都瘦成皮包骨头，他怎么保养得这么胖……”

关于那一天：“多么激动人心的会师……人们伸开双臂互相拥抱，纵情欢笑，流出了热泪。”¹⁹⁴

十二月二日，张国焘、朱德和周恩来骑马进入保安。林彪在城外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带到红军学校。军校门前站着毛和他的部下。学员们欢呼雀跃。毛泽东和张国焘登上木制的讲台，发表了讲话，互相祝贺。长征结束了，兄弟们又亲如一人。毛和他的部队走过了两万五千里，也就是七千英里。其他部队至少也走过了同样的路程。他们翻山越岭，渡江涉水，英勇作战，打败了敌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把红军的信息传递给人民大众。

面前的任务是建设一个新中国。

第三十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

一九五九年六月底，毛泽东登上了庐山。这座高达四千九百英尺的秀丽山峰，巍然屹立在扬子江畔，西面是中国的工业重镇武汉，是中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当江城武汉热气逼人时，庐山却是花团锦簇，凉风习习。这里曾是传教士的避暑胜地，也是毛喜欢的一个去处。

毛刚去过长沙附近的韶山，那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韶山之行深深地打动了。自他一九二七年告别韶山投身革命以来，韶山已有许多人献出了生命。正象毛在诗中所写的那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此刻，毛正坐在平台的藤椅上，远处长江隐约可见。他在等候上山的同志们。和以往一样，毛又挥毫赋诗，笔力雄健，一挥而就。题为《登庐山》：

“跃上葱笼四百旋，

.....

冷眼向洋看世界，

.....

毛的同志们会聚在山上，六月的庐山到处花香袭人，而毛写下的诗句却发人深思。

庐山距离井冈山不过二百英里。一九二七年，毛率领衣

衫褴褛的“赤匪”登上井冈山时，山下正在悬赏追捕他。他那时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但信仰却象一团烈火，在他胸中燃烧。

对事业的信念使他上了井冈山，又使他在长征中越过了万水千山。当他的卓越的战友们聚集陕北时，当他的一方面军、贺龙和肖克的二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以至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的残部会师陕北时，这一信念已经象钢铁一样坚韧。革命已有了自己坚不可摧的队伍。长征付出了惊人的代价，牺牲的同志不计其数。尽管前面的征途上还有许多艰险，但是，长征的收获肯定远远超过了付出的代价。

长征幸存下来的领导干部和指挥员，其中大多数在日后的战火中也安然无恙。留在赣南的队伍损失最大，尽管如此，也还有不少幸存者。

与蒋介石的斗争是激烈的，自己内部也有过激烈的斗争。毛在等候同志们上山出席政治局会议及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时，他的脑子里不会不想到一系列的斗争。

长征中，没有任何革命领导人投敌。长征的每一步都使他们变得更为坚强，最后毛取得了一致公认的领袖地位。长征是在怀疑、猜忌、阴谋与恐惧的气氛中开始的，当时毛不在领导圈内，而长征结束时，大家都有了坚强的信心，毛也随之成了领袖人物，他用事实和手腕争取了不少反对过他的人。唯独张国焘在一九三八年不辞而别，投奔了蒋介石，而后再流亡香港和加拿大。博古在延安接管了《解放日报》，要不是一九四六年死于飞机失事，他会在后来的革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洛甫和王稼祥已成了毛的坚定的支持者。十分精

明的周恩来曾经是毛的对手，此时已成为他的一位出色的参谋长。

毛坐在藤椅上，遥望蓝天，思绪万千：有谁会选中陕北作为革命根据地呢？这里既荒凉又偏僻，到处是黄土高原，褐色的土地，光秃秃的，没有树，没有草，没有水，无情的风沙打在人们的脸上，象弹片一样厉害。陕北人烟稀少，农民贫穷而又目不识丁，疾病流行。去古都西安要穿过沙漠，步行一个星期。多少年来，陕北的群山一直是盗匪的巢穴，是一片被不法之徒、封建宗族和秘密帮会左右着的土地。

然而，毛十分清楚，事实也证明，那里的环境对革命十分有利，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之后，更是如此。西安事变导致了国共停战，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有了延安，毛才有可能考虑问题、进行写作和研究中国的未来。在延安，毛把自己的队伍锻炼成为一支革命的精锐部队，赢得了中国。在这里，长征精神发展成为延安精神，毛就是用体现这种精神的哲学、制度和策略来缔造他的共产主义国度的。

毛率领大家在长征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夺取中国。他们打垮了蒋介石。尽管美国支持国民党，而斯大林则想在长江以南保留蒋家王朝，但是，蒋还是被赶出了大陆。毛泽东他们在世界上站住了脚。在朝鲜，他们把美国打得不得不停火谈和。毛深知，他们一直在努力创造一种能使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

事情发展如此迅速，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甚至比毛自己预料的还要快。此刻，毛稳稳地坐在庐山之巅，沐浴着和煦

的阳光，可能已经忘却了这一点。

马海德是位美国医生，一九三六年他和埃德加·斯诺一起去了陕北，从内部目睹了中国革命。一九八四年我问他，一九三六年他在保安时是否认识邓小平，马说，当然认识，人人都认识邓小平。但马有没有想过邓有朝一日会成为全中国的领袖呢？“从未想过。”马海德眨着眼睛笑着说，“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毛能成为全中国的领袖。当时我们想，中国革命不会在我们这一代获得成功，我们以为要等到下一代，即毛以后的一代。”

现在，毛坐在山上，赋成七律一首，正等着他的同志们的到来。他脑子里考虑着一连串的问题：大跃进（一些土钢铁厂）和公社化（一群群蓝蚂蚁）的后果；他和俄国及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出现的大裂痕（为了原子弹）；自己队伍中某些同志的观点和态度（爱挑毛病）。

“冷眼向洋看世界……”毛在诗中写道。冷眼……，革命英雄们的这次聚会，看来并没有多少诗意可言。

指挥过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作战的老将彭德怀上山前到湖南走了一趟。他去了自己的老家乌石村和毛的老家韶山冲。有人报告说大跃进后农村问题严重，他想去核实一下。（有些外国专家估计，大跃进使一千至二千万农民死于饥荒。找不到这方面的官方统计材料。）

彭看到的是一场灾难。农民缺粮，田园荒芜，工业衰败，干部思想混乱，统计生产数字弄虚作假，按北京的命令一再加码。谁也不如彭那样心直口快，他给毛写了一信，说明了

自己的观点。毛的反应犹如彭在他的座椅下安了一枚炸弹。彭因此被罢官、流放，被冷落达十六年之久，最后被害致死。彭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一位用脑子的中国观察家认为，“一切从此完了。”在百花齐放运动（知识分子想争取言论自由，结果遭镇压）和庐山会议以后，再也无人敢对毛表示异议。人人缄口不语，说话太危险。“百花齐放运动”封住了党外人士的嘴，庐山则使党内鸦雀无声，接踵而来的便是“文化大革命”。

彭被赶出了中南海，安排住在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从事一些体力劳动。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在我的戎马生涯中，从未有过片刻的休息，现在人老了，除了种桃子别无他事可做。”一九六二年他给毛写了一封八万字的长信，回顾了自己的历史，也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把手稿的部分抄件送回乌石村保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受到宽宥，毛派他到四川担任战备建设副总指挥（毛当时担心美国人会发动进攻）。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已迫在眉睫。不久，彭便落入审讯者的手里。他一遍又一遍地写简历材料，以为只要说真话就可以获释。事实并非如此，他一再受到审讯，在拳打脚踢的情况下，他的肺被踢破，肋骨被踢断。他多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这一切开始时他已六十八岁，到临死前七十六岁时还没有结束。他是一条硬汉子，受审多达一百三十次。最后终于卧床不起。为了折磨他，不许他坐起来，不许他喝水，不许他上厕所，不许他翻身。他的身体全垮了，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他没有交代一个字。他的朋友杨尚昆将

军写道：“彭德怀是一位为了救中国而寻求真理的人”。

毛要彭承认的“罪名”是什么呢？是这位老师组织了一个阴谋推翻他的“军事俱乐部”。不待说，既不存在什么“俱乐部”，也没有所谓的阴谋。

冷眼向洋看世界……。毛不再接近那些与他一起长征过的人了。洛甫认为毛和斯大林一样，说毛“整起人来毫不手软”。毛让洛甫领教过他的厉害。庐山会议后一个月，洛甫失去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让他去搞经济工作。他的妻子刘英也丢掉了在外交部的工作。

长征途中不论遇到多大危险，刘英从来都是处之泰然的，但在述说她丈夫临终前的情况时，七十五岁的刘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她攥着手帕，揪着衣襟，两眼闪烁着泪花。他们罗织罪名，指控他是间谍，说他是苏联特务。刘英说：“中国的封建传统历来是：丈夫落难，妻子受株连。”他们要她说洛甫是苏联间谍。后来他们夫妇双双入狱。他们对刘英说：“你必须交代，说出来就是对党的贡献。”刘英不干，坚持说，毛提倡的是“实事求是”。于是他们说她在革命与丈夫之间划不清界限。

洛甫被拉到红卫兵面前进行批斗，刘英陪斗。根据林彪的命令，限他们于三日内出发去广东，由广州西面的肇庆军分区负责监护。他们在那里过了六个年头。洛甫写了些经济论文，可是写出来又有谁看呢？他的健康每况愈下，高血压和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他要求到北京治疗，但得不到批准。他还要求搬到上海附近的老家去住，也遭到拒绝，最后把他送到江苏省无锡。因未得到适当的治疗，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

日死去，终年七十六岁。死后没有开追悼会。一九七八年，他和彭德怀等人一起得到平反。最后开了追悼会，刘英也得到平反。在胡耀邦总书记的支持下，她成了一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

朱仲丽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见到毛的“担架阴谋”的同伙王稼祥时才二十三岁，用她的话来说，“还非常年轻”。她对那一天的情景记得很清楚。当时，她是大会的值班医生，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走进大厅时，她正站在大厅门口。毛说了一句关于“牛皮公司”的双关语，她没听懂，但因紧张而满脸通红。毛说：“要想开‘牛皮公司’，就得学会不脸红。”

她脸红起来一定很漂亮。从那天以后，王通过介绍认识了她，不久他们就结了婚，王稼祥刚从莫斯科带回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重要口信：承认毛是中国党的领袖，党内不要再为此事争吵不休。斯大林还说，中国人不必担心统一战线政策会使中国沉入民族主义革命的汪洋大海。

王回国途中，差一点回不成延安。他在兰州以南遭到土匪袭击，警卫员跑了，他随身带有不少党的宣传材料，另外带了一些枪支和大量美钞。他设法使土匪相信他带的都是纸张。接着从西安去延安时，半路又翻了车，幸好除了摔坏一副眼镜外，没有别的损失。

王和朱仲丽没有孩子。朱流产后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王有一个前妻生的男孩，王的前妻死于难产。

毛多次说过一九三四年他之所以能够在长征途中恢复领

导权，王稼祥是有功的。到了一九六七年，王却被押起来，还被拉上台批斗。红卫兵骂他，中联部有人朝他脸上啐唾沫，还有一个想帮造反派把周恩来赶下台的外国人打过他的耳光。王被打翻在地，引起心脏病发作。

这仅仅是开始。王被关在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内，不见天日，与世隔绝，达一年半之久。朱仲丽可以为他做饭，但必须把饭交给看守。不许她同自己的丈夫见面或谈话。王一个月只能洗一次澡，自来水被切断，王的妻子不得不向邻居借水。

朱仲丽是医生，可是不许她为丈夫治病。王用药全凭看守一句话，看守说王得了感冒， she 就把感冒药交给看守，看守说王发烧了， she 就把退烧药交给看守。王在长征中受过重伤，以后身体一直没有真正复原，此刻王的健康迅速恶化。王的儿子被红卫兵折磨至死。

一九七〇年，根据林彪的命令，王搬出北京，南下到了武汉西北的信阳。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情绪更差。王一生救过许多人，其中包括他的连襟海军司令肖劲光，作家和毛童年时代的好友肖三，可能还有被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怀疑是间谍的马海德。然而此刻王稼祥自己的生命已到垂危阶段。他的妻子尽力抢救无效，一九七四年一月王溘然长逝，时年六十八岁。

毛冷眼看着他的世界……。薛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晚，第一次见到贺龙时，她才二十二岁，那是在延安南门外的一个纪念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二十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

她很漂亮，是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她和一些女友（其中有一个名叫叶群）听说贺龙要来，便提着小灯笼赶到南门。贺龙很会讲话，声音又洪亮。薛明回忆说：“我对他佩服极了，他在我眼中是个英雄。”

现在，薛明虽已六十八岁，但体态仍很端庄。谈话开始后，她的女儿晓明在她身边坐下，晓明长得十分清秀。薛明自幼丧父，由当裁缝的母亲抚养成人。她的老家在天津城外。她说：“我想帮助我妈妈生活，但我从小就想当个男孩。”

她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因此认识了叶群。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她现在对叶群恨之入骨。她认为叶群历史肮脏，在陪伴薛明和其他一些女青年去延安前可能就是国民党特务。

到了一九四二年，贺龙就已成为薛明办公室的常客。贺龙长征时的妻子，这时已同他分手，跟了别人。

薛明与贺龙的第一次谈话就与叶群和林彪有关。她说：“贺龙显然对我做了一些调查。”贺龙告诉她林彪正在追叶群，而叶却把林彪写给她的信拿给朋友们看。贺龙说你要是真爱一个人，就不该把他的信到处拿给别人看。贺要她把这些话转告给叶群。叶群和林彪不久正式结婚，他们没有请薛明参加婚礼，也没有请贺龙。

薛明钦佩和尊重贺龙，但对他也有所保留。在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八十比一，情况相当特殊。她比贺将军年轻得多，贺四十六，而她才二十六岁，年龄相距甚远。她说：“女学生不嫁老头子。当时我们这些姑娘中流行这么一句话：老干部不错，但不懂得爱。”但她还是被吸引住了。贺龙健谈，性格

开朗，可是只要和她在一起，就变得笨嘴拙舌。贺的一些老战友登门劝她，其中包括贺龙的政委任弼时、和孙中山共过事的林伯渠。“他们都说贺龙是个好同志，”她回忆道，“我感到有些压力。”

贺龙和薛明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那一天结了婚，恰逢南昌起义十五周年。他们在延安南门外西北军营里办了一桌简单的酒席。“我们婚后生活十分愉快，”她怀念道，“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龙成为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可是“文化革命”开始后不多久他就失势了。薛明认为是叶群和林彪干的。

“林彪想篡夺军权，而贺龙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她说，“于是林彪开始陷害贺龙。”

一九六六年底，周恩来告诫贺龙夫妇不要回家，因为红卫兵肯定要抄他们的家。周担心这对贺龙心理上会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因此去了西山。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至十一日，红卫兵抄了贺龙的家，砸开了贺的保险柜，抢走了一千多份机密文件。贺龙和薛明在西山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可后来渐渐连周恩来也无法再保护他们了。西山处在军队控制之下，即在林彪、叶群和秘密警察头子康生控制之下。

不久，贺龙被迫出席批斗会。康生认为贺龙这个人太难斗，最好采用“医疗手段”。贺龙已有多年的糖尿病史，一直在用胰岛素治疗，在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时，他们非但停了胰岛素，还给贺打葡萄糖针。真是杀人不见血！

贺龙和他的妻子被囚禁在一座四合院内，不许外出。当

时正是七八月份，天气十分炎热，院子里断了水，只能在下雨时接一点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

看守当中有一个战士，有时哼起一首关于贺龙的老歌。他们知道这个战士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但起码是同情他们的。

薛明一直与贺龙在一起。在他临终前六个小时，救护车把他拉走了，他们不让她跟着去。

“我不知道医生干了些什么，”她说，“这是审讯‘四人帮’之前和审讯期间要调查的问题。”

人们知道，医院继续给贺龙注射大量葡萄糖，未用胰岛素。正式的死亡书上只字未提葡萄糖。

薛明被关押了六年，送到贵州去强制劳动，用的是假名字，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她说，“我成了山里的神秘老太婆”。一九七一年，林彪和叶群外逃因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后，周恩来把薛明接回北京。他花了不少时间才找到她。她最小的女儿黎明在陕北一所青少年劳教所关了一段时间后，与她一起流放。她的儿子鹏飞被关进了监狱。现在他是军队中一名副部长。她的大女儿贺晓明也受到监禁。晓明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的一名历史工作者。

谈到贺龙，肖克悲痛地说：“他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是红军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他不畏艰辛，骁勇善战。”

当问他这样一个英雄怎么会遭逮捕，受折磨，并被用药物害死时，他沉思良久后说：“我可以拿自己做个例子。我早年参加革命，可尽管如此，‘文化革命’中还是挨了整，我被革职审查，送到江西去干了两年半的体力活。”

肖克说话时很平静。

“我在去农村途中，写了一首诗，”他接着说，“我喜欢写诗。”

他拿过纸和笔，写道：

我自江西来，
又回江西去。
昔日草鞋行，
今朝飞车遽。
轻装怀马列，
悠然赴“五七”。
战地黄花衰，
孟冬西风急。
云山赋归欤，
老骥兮伏枥。

只剩一条胳膊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余秋里从舒适的扶手椅上一跃而起，表演他在“文革”期间怎样被红卫兵强迫“坐飞机”。

他们用膝盖顶住他的后背，迫使他弯下腰来，并把他的胳膊和断臂同时由身后向上举，就象一架即将起飞的喷气飞机。这是红卫兵的拿手好戏。

“比较起来，我的日子还算好过。”余微笑着说，“我没有放弃斗争。我过去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从来没有在白区（国民党区）工作过，从未被捕过，也从未写过回忆录。”

他们指控他是贺龙的门徒和彭德怀的支持者。他们在他的家中搜了三天，一无所获。后来毛说，余犯过错误，但一直是位好同志，可以改过。于是他的名字便上了一批二保的

名单。^⑩

李先念主席认为自己在“文革”中十分幸运。他没有被“拉下马来”，虽然只差一丁点儿。他“靠了边”，同时受到周恩来和毛本人的保护（常在别人准备开会批斗他时叫他去开会）。一九六七年二月，李先念和包括聂荣臻、叶剑英和陈毅在内的一些将军一道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批评了“文革”。这次会被称为“二月逆流”。与会者被戴上了“小爬虫（而不是大龙）的帽子。李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〇年一直靠边，这使他没有倒大霉。他说后来在批邓那段时间里他又“靠边”了，这使他不必要把邓小平叫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⑪

杨成武是长征中飞夺泸定桥担任突击的第四团勇猛的政委。他在“文化革命”令人眩晕的政治斗争中跌了跤。起初他是“文革”的宠儿，取代了他的上司罗瑞卿，出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罗瑞卿则同杨尚昆将军一道“坐飞机”，后来从六层楼的窗户跳下（或被人推下）而致残。

杨成武青云直上，当上了党中央候补委员，但很快又成了林彪阴谋的牺牲品而入狱七年。他被指控为反对“文革”，派人去殴打毛的妻子江青。^⑫

肖华的长征组诗深受周恩来和毛泽东赞赏，但他本人却很快成了“文革”的打击对象，作为人民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他曾经受住了两次严峻的打击，可是第三次把他投进

了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半。他的《长征组歌》也被禁演，整他的人说，他的歌是为了颂扬老红军指挥员们而谱写的（差不多个个都是林彪的对头）。

警卫人员十分注意，不许肖华在监狱里吟唱他写的歌。“我只能在心中唱。”他说：“‘四人帮’千方百计要置我和我的歌于死地，但他们未能得逞。”^⑩

杨尚昆将军的境况与众不同。他蹲监狱的时间比其他长征指挥员都长。在林彪宣布“调查”发现杨从事过“地下”活动后，杨就被抓了起来。“地下”活动的含意是杨尚昆和罗瑞卿及彭真等人一道，一直在策划反毛的军事政变。林彪信誓旦旦地说：为此“毛主席已多日睡不好觉了。”^⑪

杨将军于一九六六年七月被捕，一直关押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们骂他是“黑将军”，在红卫兵的万人群众斗争会上“坐飞机”，说他是俄国特务（鬼才知道是从哪年到哪年当的特务），又是美国特务，因为他抗战时期和美国赴延安工作团保持友谊。也许更严重的是，暗中传说他偷录过毛主席的谈话。杨将军未提及“坐飞机”和受折磨。他把那段时间说成是“强迫休息”。可是他的矮小而有才华的夫人李伯钊却被弄去打扫一座六层大楼的厕所，整天爬上爬下，跪在地上擦洗，腰和腿都受了损伤。杨和他的妻子失去联系长达九年。李伯钊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在北京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在“文革”中受过折磨之后，她的健康一直未能恢复。

“但我还是值得庆幸的，”杨将军摇了一下头说，“我家无一人被整死。有些同志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被整死了，他

们的孩子被整死或成了残废。”

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受过相当的教育，老大现在部队工作。他的女儿被迫下乡。三个孩子都被强制劳动过。

他再次强调说：“我是相当幸运的。”一九八四年他七十六岁，强健而矍铄，在中央军委担负着重要的工作，是邓小平的亲密助手。

李德于一九三九年离开中国。他与周恩来、周的夫人以及毛的弟弟毛泽民乘坐同一架飞机离开延安回莫斯科。多年来，李德一直试图离开中国，但一九三七年王明回到中国时警告他留下来别走（当时正值斯大林在搞大清洗），李德就打消了走的念头，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甩掉了农民出身的中国老婆，与一位漂亮的上海女演员李莉莲结了婚。周恩来后来答应她可以去莫斯科与李德团聚，可是她一直没有去。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毛泽东在莫斯科时竭力劝斯大林把他杀掉，周恩来和毛泽民都作证反对他。说他的坏话。当代中国史学家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⑮事实是，斯大林不再允许李德过问中国事务。他可能被监禁了一段时间后即被流放，在六十年代初中苏分裂前一直没有露面。他后来突然出现在东柏林，一九七四年去世以前，一直忙于写反华文章。

曾经为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陪同毛泽东去莫斯科，这是毛第一次会见斯大林，也是唯一的一次。

伍成为中共党内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打交道的专家。一九六七年他被当作俄国特务而被捕。他苦笑着说，“同时也把我当作南斯拉夫的特务。”他被关押了八年之久，其中有六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二年访华时，他仍身陷囹圄，与世隔绝呢。^⑪

庐山会议结束时，朱德深为感慨地对他的同志们说：“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饭碗里吃过饭？！”

一九六七年，紫禁城旁中国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称朱德为“黑司令”。红卫兵抄了他的家。他的夫人康克清被游了街。朱德被指控为“厚颜无耻”地自称是红军的创始人。一九七六年七月，他比毛早两个月离开了人世。

胡耀邦在“文革”中的遭遇不算最坏，但受的罪也不少。一九六四年，解除了他团中央负责人的职务，毛派他到陕西去当省委书记。毛说胡“需要做些实际工作”。不到两年，他又回到北京，挨红卫兵批斗。他是所谓的“三胡”之一，他与胡克实和胡启立同是共青团的三个最高负责人。他被隔离至一九七四年。随后可能是由于邓小平的推荐，担任了党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后来又当上了党的总书记。

陈毅受攻击时是中国外交部长。疯狂攻击他的红卫兵们实际上图谋夺取外交部的大权，进而整倒周恩来。在一次批斗会上，一群迫害狂嚎叫着把一顶高帽子戴在陈毅头上。陈

毅请求准许他赴约去见法国大使。他摘下那顶高帽子，要红卫兵妥为保存：“我肯定还用得着它。”说笑话救不了他，他丢了官，失去了自由，身体也垮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逝世了。医生开具的死亡证明书上说他死于癌症。两年后，他的夫人也去世了。不管医疗结论如何，陈毅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夫妻都是死于被称为“文化革命”的这场瘟疫的。^⑪

毛身着睡衣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他喃喃地说：“陈毅是个爱国的好人，是位国际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毛脑子里想的是什麼谁也猜不透。^⑫当年陈毅率领将士在瑞金附近的山区活动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断头今日意如何？……”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那一天，却无人来吟诵这首诗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始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头号对象就是他本人时，已经为时太晚了。在中南海大院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住宅紧挨着毛泽东的住宅。七月十二日毛畅游长江刚回到北京，刘即漫步走到毛的房前，想同老邻居谈谈，却被警卫挡在了门外。他又打电话，没人接。刘的住房有一扇窗户对着毛喜欢散步的那条小径。刘坐在窗前，从清晨直至黄昏，等毛出来，但毛一直没从那儿走过。^⑬

刘少奇有一大家子人。他的儿女被卷入了红卫兵运动的漩涡，没过多久他们便惨遭毒打。他的大儿子和大女儿被流放到中缅边境，大儿子在那里死于非命，大女儿则被关进了牛棚。他的二儿子刘允尧被关进监狱。年仅十岁的小女儿也

遭到同学的殴打，不准她上学。他的三儿子源源和源源的朋友（是正受迫害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儿子）身无分文，想去血库卖血，竟遭到了拒绝。他的三女儿平平也被监禁起来。^②

刘少奇及其家人所遭受的屈辱和折磨罗列起来恐怕能写成一本书。他的子女写了一封长信，列举了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北京的《工人日报》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发表了这封信。信很长，但比原信要短得多了。刘的遗孀正在写一本关于刘少奇的书，但只写一九六〇年刘在湖南宁乡度过的那四十四天的情况。刘在宁乡的老家距离毛的家乡只有三十多英里。那时刘少奇也正在设法了解农村的情况，对毛的大跃进、公社化等政策的后果进行评价。

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试图通过电话和刘少奇及其家人保持联系。后来红卫兵闯进来扯掉了刘的电话。周告诫刘一家不要离开中南海这一受保护的区域。但红卫兵设圈套将刘的妻子王光美骗了出来：他们骗她说，刘平平受重伤已送进医院。在斗争会上，他们给王光美穿上一件衩一直开到臀部的古怪旗袍，并在她的脖子上挂了由许多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他们还用小红书（毛的语录）抽打刘少奇的脸，打得他脸颊出血。他们拿走了刘的安眠药，刘只好彻夜不眠。

他们把王光美关进了北京西山的秦城监狱。毛的遗孀江青和“四人帮”成员现在被关在那里。

王光美的一项罪名是她的名字中有美国的“美”字，而她的哥哥王光英的名字中有英国的“英”字，显然她是美国特务。实际上光美这个名字的含意是“光荣之家的美丽姑

娘”，而光英的意思是“光荣之家的英杰”，都是非常典雅的传统的中国名字。确实，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努力想把“亚美利加”一词译得讨人喜欢，故译为“美国”，即美丽的国家；把“英格兰”译为英国，即英雄的国家。但对王家来说，这些名字还有另一层特殊意义：王光美的父亲曾任中国的外贸部长，王光英出生时他在英国，而王光美出生时他在美国。这样，这些名字才有了这一层微妙的含意。^②

刘少奇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彻夜不眠，耀眼的灯光把他的房间照得雪亮（而他的妻子却被关在一片黑暗之中）。一九六九年十月，按照林彪的命令，衣衫不整、重病缠身的刘少奇被用飞机押解运送到河南开封，关进了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他被扔在地下室的地上，陷于半昏迷状态。当时他正患着肺炎，而从北京押送他来的看守人员却带着他的药品飞回了北京。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去世了。他躺在水泥地上，数月未理的头发已有一尺多长，口鼻都变了型，嘴角流着血。他的死和死时的情景在多年之后才得到公开的承认。

这场苦难开始前不久，正在养病的刘少奇曾对子女们说：“要是马克思能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半真半假地设想马克思正在九天之上俯视看整个世界。

刘少奇和他的同志们都未觉察到，俯视着他们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毛。正如毛所写的那样，他冷眼看着全世界，看着大地和海洋。

令人费解的是：毛的目光在庐山上为什么变得如此冷峻了？他为什么要残酷地整起自己长征中的同志而使中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呢？长期以来，他们不是一直在共事吗？

今天中国没有人能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一位聪明的过来人说，答案也许是因为毛坚信“破”是社会变革的根本手段。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毛在长沙第一师范时曾在杨昌济教授的指导下学过弗雷德里奇·泡尔森的《伦理学》，他在自己的那本书的空白处这样批注道：“我们急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旧世界的毁灭，必将导致新世界的建立。新世界难道不比旧世界更好些吗？”

一九二〇年，毛潜心攻读佛学哲理，“破”的原则便印入了他的脑海，并扎下了根。他深信“破”本身就是可贵的。

参加过长征的中国人都认为“文革”的混乱局面不是偶然的。导演这场运动的正是毛本人。是的，林彪、江青和“四人帮”起了作用，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说并未超出毛谋划的范围。

这些参加过长征的人也不同意西方关于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夺回个人的权力的观点。他们相信毛从来就没有失去过权力。

他们认为，发生的一切是因为毛对革命急于求成。毛觉得中国的变革不够快，也不够大，旧的东西根深蒂固。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并未出现。他开始出击了，他发动了百花齐放运动、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他试图使尼基塔·赫鲁晓夫和他一道搞一场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世界革命大进军，但

未获成功。他的种种努力无一奏效，他越来越感到失望。健在的长征老同志说，毛是个非常激进的人。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激进程度有增无减。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中国通伊文思·卡尔森对毛及其革命十分了解，他曾说过：“毛是幻想家，是一个天才。他比他所处的时代要先进五十多年。但他是个危险的人物，因为他的许多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②

毛从这些失败中汲取了一种教训，而他的同志们则汲取了另一种教训。庐山会议前，他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重游了故乡韶山，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这是他三十二年来第一次回老家。毛知道农村并非太平盛世，他知道彭德怀这个直筒子老兵也去过湖南，并以挑剔的眼光巡视了一番。而韶山地方当局可能为毛布置了一个假象。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是他回来后写了“遍地英雄下夕烟”和“别梦依稀咒逝川”的诗句。

彭德怀看到的是混乱和灾难，毛看到的则是“稻菽千重浪”。他愈发凶狠地把心中的怒火发泄在他的老战友身上。

人们不禁想起这与斯大林的情况多么相似。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搞掉了老布尔什维克。清洗是不是这两家共产主义制度的共同点呢？这是否证明阿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所有的权力都导致腐化，而绝对的权力则导致绝对的腐化呢？这种说法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特别是在认真研究了俄国和中国革命都具有的偏执狂特性之后，尤为如此。斯大林的多疑，早年在家乡格鲁吉亚时就表现出来了。毛则早在江西便进行过清洗。

但有一位熟悉毛的中国人却不同意偏执狂的说法，他同意洛甫关于毛和斯大林“整人”都很厉害的说法，但他并不认为毛患有偏执狂病。他说“毛依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完全理智地采取行动。问题是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掺了假，而不是毛的脑子有病。”

也许是这样吧。尽管这样说有点为毛开脱了。肯定有人勤于向毛提供关于他的老战友的虚假情报。他那个权欲熏心的妻子江青在庐山就搞了不少幕后活动，而且从此以后她越搞越凶。

可还有些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毛《登庐山》一诗的尾句是：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园里可耕田？”

毛写的是诗人陶渊明，他出生的地方离古今闻名的秀峰庐山不过七英里。陶是一员名将的重孙，公元四〇五年以后不久便弃官回庐山过起农民的简朴生活来。他与世无争，尽情领略大自然的美景，用诗句记录不断流逝的时光。

在庐山，毛坐在藤椅上，遥望鄱阳湖，目光冷峻，头脑清晰。他“跃上葱笼四百旋”，登上了庐山之巅，但谁能说前面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庐山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也许象陶渊明一样，他不久也将撒开公务，返回韶山，在那里象陶那样生活：

“不戚戚于贫贱，
不汲汲于富贵。”

象陶所写的那样，毛不愿意再生活在樊笼里，他要“复

得返自然”。

这种情绪是不会长久的。毛在取得庐山的胜利之后，便无情地朝“大乱”前进。一九六三年，他写了另一首诗：

“只争朝夕……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一九六六年七月六日，就在他那次著名的畅游长江之前，他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每隔七八年牛鬼蛇神就会跳出来一次。”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乱”滚滚而来。毛亲自掌舵。他以冷峻的目光紧盯住自己的目标——他的老战友，那些“害人虫”，拿朱德的话来说，那些在长征中和他同吃一碗饭的人，那些毛认为由于胜利而丧失了革命热情的人。现在，他要进行一场新的更加伟大的革命。如必要，他可以单枪匹马地干。这场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将摧毁一个目前不完美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不完美的制度，并同时摧毁那些意志衰退、不完美的长征战友。任务是严酷无情的，但这将为建立完美的社会制度扫清道路。毛此时的思想完全沉浸在对这一完美的社会制度的憧憬之中了。

第三十一章

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赣北新建县一处从未启用过的军校校长住宅的小院里，每逢夕阳西下，梧桐树开始投下长影时，邓小平就走出红砖瓦房，开始散步。他微低着头，迈着轻快的步子，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着，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散步，以至他的脚步在红色的土壤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他的女儿毛毛从窗口看着他散步。邓小平当时正被流放，时刻都在看守者的监视之下，她也受到同样的监视。

她后来说：“看着他那坚定而又敏捷的步伐，我心想，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一定更明确、更坚定了，他为今后的战斗做好准备。”

当年，那些穿着灰褐色制服、身负行李背包、肩挂粮袋、腰挎驳壳枪、脚穿草鞋、目光坚定的人们，为了自己向往的前景而艰苦跋涉，翻山涉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斗。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员。自那时起，漫漫的长征岁月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

看来，他们当时所向往的这种前景在思维敏捷的邓小平的头脑中刻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邓小平这个最不可能（或许也是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中国领袖的人，现在却已成了中国的领袖。

当时，邓小平在贵州的五岭、川滇边界的金沙江江畔和陕北的黄土高原并不驰名。一九六九年他被关在新建县的营房的那些日子里，邓小平这个名字也不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从长征过来的人中，没有一个象邓小平那样有气魄。邓多年来稳步地、几乎出奇地上升。尽管他屡屡被打倒，但都能再次爬起来，沉着应战。长征后，他曾担任刘伯承师长的第一二九师政委。这支部队参加了对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作战，后作为第二野战军，把蒋介石赶出了大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毛主席宣告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随后，邓成了毛在中国广大西南地区的总管。一九五二年，他来到北京。他参与一切重要工作：党的书记、政治局委员。对他来说，这些职务都不在话下。一九五七年，他陪同毛赴莫斯科，与尼基塔·赫鲁晓夫摊牌。在中国国内，他的工作是主管农业、工业和教育。

邓小平没有变。他还是襟怀坦白，性情直率，老老实实。他察觉到了大跃进的灾难，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来。他不象另一些人，到庐山来时口袋里揣着两份不同的发言稿——彭德怀得势时用一份，毛取胜时则用另一份。

麻烦就在后来。毛后来说邓（和刘少奇）“见了我就象如丧考妣那样”板着面孔。或者象“文化大革命”的一位领导人陈伯达所形容的那样：“要与邓小平平等讨论问题，比架梯登天还难”。

这就是邓。他反击了，他采取了多年前在江西出问题时所采用的办法，作了自我批评。但没有奏效。他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头号走资派是刘少奇。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

邓销声匿迹。他被软禁在家中，不许与外界联系。他的孩子们都四分五散，挨批斗，并被送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他的长子邓朴方被红卫兵推出窗外，脊骨摔断了，下肢瘫痪，还不许就医，造成了终身残疾。一九六八年十月，邓和夫人卓琳以及自生母去世后扶养他成人的继母都被送到长征启程的江西。在江西，邓小平住在南昌郊外一所空着的步兵学校里的一幢两层楼房里，那里曾是校长的住房。象中国当时的所有学校一样，这所步兵学校也因“文化革命”而早就关闭了。

象许多参加过长征的人的遭遇一样，邓小平过了三年这样的监禁生活。他当时六十五岁，但他拖地、劈柴、敲煤、生炉子取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曾在雷诺汽车厂里做过工。此刻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的机工手艺。上午他和夫人在一家拖拉机厂里劳动，他操作机器，她则擦洗电线线圈。在二十分钟的来回路上，每次都有武装看守监护。这条路很滑，邓有时滑倒。没有得到许可，他们是不准讲话的。

下午，他们在自己园子里劳动，养鸡、种菜。他们把钱省下来，希望能把孩子们接到身边来。他们最小的女儿毛毛（邓榕）和幼子邓梓方（他因皮肤黑而得绰号“小黑人”）在陕西农村的生产队劳动。

邓小平没有受过拷打，还获准从北京带些书来。晚上，他看书，有时看马、列的书，有时看中国历史书籍，有时看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他的继母做针线活。他们从收音机里收听晚间新闻。

他们渐渐地与一起劳动的工人建立了友情。在这段漫长的禁闭时期，邓打过桥牌吗？看来不可能。要打也只能三人

打，他与缠绵病榻的妻子和年迈而精力充沛的文盲继母一起打。象延安时期的许多人样，邓逐渐喜欢上了桥牌。一些国际桥牌手认为邓打桥牌具有世界水平。当权后，几乎天天打桥牌。万里是他的牌友，万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曾任北京市副市长，是他的老朋友，“文化革命”初期就成了斗争对象。据说，有时他还与杨尚昆将军打牌。另一个牌友是人大副秘书长丁光禄。纽约的桥牌冠军凯瑟琳·魏与邓打过桥牌，称邓是桥牌好手。他告诉她：“打桥牌使我思维保持敏捷。”他打牌争输赢，但不赌钱。输者得钻桌子，邓输的时候，牌友们总是说：“你可以免了。”他总是说：“不，我要钻，这是我们打牌的规矩。”然后，他就钻了起来。由于他的身材矮小，钻桌子对他来说比较容易。

打桥牌和玩扑克牌在延安时期都很流行。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有时一夜一夜地在一起打牌。毛打起来就不愿停手。根据斯诺的看法，他是个“大赌徒，但不善于下大注吓倒对方”，他打牌喜欢下大的（但是假的）赌注。海伦·斯诺报道说，毛常常一个人自己玩牌，他整小时地玩兰米牌戏。

在“文化革命”中，邓首先考虑的是他残废的长子的身体状况和切身福利。一九七一年，他获准把受伤的朴方带到江西。此前，朴方一直住在北京北郊的一所福利中心，生活条件很差，躺在床上，编织铁丝篮子，挣一点钱。接到江西后，在没有充足的医疗设备的情况下，邓夫妇和邓的继母尽力照顾这个年轻人。卓琳尽管自己身体不好，还亲自看护她的儿子。邓给他按摩，并帮他洗澡。以后，邓开始请求当局把儿子送到北京，以便得到适当的治疗。直到一九七三年，邓

朴方才获准由他妹妹毛毛陪同去北京。最后，邓终于通过中国当时在纽约联合国的代表黄华的帮忙而得以将邓朴方送到美国去诊治。美国医生说，邓朴方的治疗耽误太久，下肢已无法康复了。他现在担任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理事长。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日，邓和夫人被召去参加会议，听政治报告。自一九六六年他们被捕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这时，邓朴方和毛毛都已与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当邓和夫人由武装警卫押送回家时，他们什么也没有说。然后，卓琳向毛毛示意，毛毛跟着母亲来到厨房。在厨房里，母亲悄悄地在女儿手上写了四个字：“林彪已死”。

一九七四年二月，邓小平被召回北京。漫长的毛时代行将告终。“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它的破坏性甚于一场战争，工业濒于崩溃，教育被取消，党被搞得四分五裂。刘少奇等许多人都死了。毛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思维和情绪不稳定。他的夫人江青及其“四人帮”同伙暂时受挫，但准备卷土重来。周恩来患了癌症。

毛再次求诸这个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本来，毛完全可以象他对待刘少奇那样把邓打得稀巴烂，或者象贺龙那样，最后被人折磨死。但是，毛没有这样做。他把邓找回来，说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说他从来不会不加思索就直接处理问题，而是设法解决问题。他处理难题负责任。毛还说，邓是个好战士，懂得如何与俄国人斗。象邓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

随着周恩来的体力逐渐衰弱，邓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事务。一些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他们说邓步子迈得太快了，太缺

乏耐心了。邓希望中国走上正轨。他感到时间紧迫，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国已发生的一切。他知道谁已被害、谁受了折磨以及哪些能干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仍被关在监狱里，他了解人们已付出的代价，正象他自己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一样，他知道抓革命不搞生产这种荒唐的做法对经济的破坏，他知道军队迷失了方向，他知道仍然潜伏在毛身边的“四人帮”正在用他们的恶毒思想来影响这位老人的意识。邓深知这一切的危害。

尽管邓聪敏能干，但他无法拨快时钟。由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的去世，以及后来人们为悼念周而爆发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四人帮”再次把邓拉下马来。但时隔不久，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倒台了。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说服和激烈的争论，他再次掌了权。

这就是掌握中国前途的人。他顺乎天意、人心，为履行他的职责，他不仅花了精力和发挥了独创精神，而且实践了他在新建县步兵学校院子里一晚又一晚散步时所构筑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这些思想说来也很简单。首先，使国家重新走上轨道，把“四人帮”及其支持者压制下去（因为他们毕竟曾获得党内多数人的支持）。整顿军队，使工厂恢复生产，让年轻人正常上学，把“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找回来，为他们平反昭雪，让他们在社会上发挥有益的作用。

然后，再争取实现最中心的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使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中国之外的许多人，

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都认识不到这项目标的艰巨。靠小窍门或“大跃进”一类的口号是不可能实现这项目标的。中国什么都需要：技术、科学、教育、消费品、食品等等。它还必须制止人口增长，才不致淹没在婴儿的人海之中。它必须使农业增产，不管用什么方法，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于这些任务，邓小平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戳穿了一切蜘蛛网，使他看到了——他带上台的人也看到了——一个没有旧框框的中国真相。他们的目标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毛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但是，此时他们开始公开说，共产党宣言已发表一百多年了，马克思研究的社会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而且马克思也从未研究过中国。他怎么可能对一个他所处的十九世纪无法想象的技术超级世界提供答案呢？列宁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沙皇俄国，而那与一九八五年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呢？毛了解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封建农民社会，那也过去很长时间了。

然而，现在已是一九八五年。世界以超音速的速度在前进。中国也必须有超音速的解决办法。中国必须寻求现实的答案。它再也不能靠口号和空话过日子了。正如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随着时代发展。”

这是令人兴奋的想法。仓促得出错误的结论是很容易的。老一辈的党员同志不能理解胡耀邦总书记所说的“新长征”。随着邓小平让那些参加过长征的杰出老人退休运动的开展，军方也越来越急躁不安了。

但是，年复一年，邓小平的劲头越来越大。他在位于中国渤海湾海滨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会

儿，接着对他的朋友说，他感到精神抖擞。他说，“我的任务是设法活得长一些”，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中国。

邓在他的新长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这就是年轻的一代，特别是象他家那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轻一代。中国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辈人之间的关系，从未象现在这样因共同的经历而变得如此密切。不仅象邓这样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年轻一代引进了新思想、新见识，他们的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识出乎意料地来源于美国。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学习。如果现在中国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业、利润刺激、个体化和企业家精神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回国后，向他们的父母亲介绍了他们对西方的亲身感受。

在进行新长征的同时，中国实行了邓小平所说的“开放政策”，经济、技术和贸易实行开放，学习外国文化，其他思想体系和学习外国的技术，使中国得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创造洋为中用的方法。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开放政策”不象中国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事实并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〇七年），当时中国的首都还在长安（今天的西安），中国号称有多达一万名外国人，这个大帝国的繁华首都里能看到各国的男女专家、艺术家、商人、学者等等。随着最后一个朝代清政府的衰败，孤立主义、闭关自守、排外主义的倾向日趋严重。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来都不是内向的。它向中国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汲取各种思想和启示。

正如历史学家李锐所指出的，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态度。毛“对西方不感兴趣”；他的社会比较封闭，更符合前清的传统。邓则相反，他如饥似渴地寻求新思想，对中国从西方获得的新东西非常感兴趣。

自长征结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长征已给中国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神与团结。它甚至证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泽东本人晚年可怕的异想天开，从而使中国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一条毛根本不会选择的道路，但目前人们对长征的认识还是很不完全的。也许中国人会说，再过一二百年，我们也许能真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次长征。眼下我们可以象中国那样来看待长征——这是一次充满了集体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希望的举世无双的行动。

注 释

第一章 月光下的行军

陈毅是这样告诉王愿坚的。(王愿坚是军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成员,长征历史学家,写过有关长征的电影剧本和解说词。1984年3月5日北京采访)。陈毅也许在更早一点就听到红军撤离的传闻(瑞金博物馆资料工作者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中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1934—1935年期间担任陈毅助手的陈丕显基本肯定这一说法。陈毅的三个子女的看法也一样(1984年6月11日北京采访)。十月九日这一日期,见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一章。1980年,北京。

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采访。

海伦·斯诺:《中国红区内情》178页,1979年纽约。

刘英: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陈昌奉,毛的警卫员,在其《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中没有提到这一点。这本1959年初版,并多次重印过的回忆录存在不少遗漏和失实的情况。

摘引自在南昌江西省图书馆查阅的1934年10月10日的《民国日报》。该图书馆的楼房曾是蒋介石的南昌行辕所在地(戴向清,党史教授,1984年4月14日南昌采访)。

孔宪权:1984年4月24日遵义采访。这次对国民党军队司令官的砍头示众是唯一的一次。反省起来,党认为这样做影响很坏。

凌家传,南昌博物馆工作人员,1984年4月3日采访。

这一日期系根据1984年3月28日在北京对伍修权的采访,及伍的回忆录确定的。长征命令的发布日期是10月7日。该命令指

出，长征将于10月10日开始。各地单位的行军开始的日期不一。通常把10月16日这一天作为长征开始的日子是因为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团在该日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奥托·布劳恩（李德的德文名字）在其回忆录中没有就长征开始日期一事提供任何线索。他说开始时他住在瑞金郊外军营地带的一所小房子里，这一带驻有中央委员会、临时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部等（李德：《共产国际代表——1932—1939》31—33页。加州，斯坦福，1982年）。

成仿吾：《长征回忆录》18—21页。北京，1977年。

⑩ 王愿坚：1984年3月5日北京采访；伍修权：《我的历程——1908—1949》第七章，北京，1984年；陈丕显：1984年6月13日北京采访；蔡晓迁（音译）：《江西苏区和红军的西逃》，201页，台北，1970年。

⑪ 王炳南大使：1984年3月20日北京采访。

⑫ 毛泽东住宅细节来自本人于1984年4月9日在干都的实地观察；贺子珍怀孕情况来自本人1984年4月15日在南昌对毛的警卫员吴吉清的采访。

⑬ 伍修权：前书第七章；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北京采访。

⑭ 关于把毛泽东送到苏联去的建议是在1934年4月广昌战役以后由博古和李德签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提出的。5月间收到的回电，鉴于毛对红军和苏区的重要作用而拒绝了这一建议。在博古宣读这一答复时，当时担任苏区经济部长的吴亮平在场。李德情绪低落，而洛甫建议接受国际的决定。吴亮平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后来曾担任毛的秘书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吴在1936年毛和斯诺谈话时做过翻译。（胡华：1984年3月23日北京采访）

⑮ 毛关于博古的这段话无法有斯诺大量的笔记和文稿中找到，这是本人一位老友听斯诺讲的。毛的支持者经常宣称毛是被放逐到干都去的，并受到监视或软禁。李德的看法则相反，他宣称毛去干都是

伙同林彪和其他高级军事指挥员密谋反对博古和他自己。

①⑥ 1984 年的中国历史界一致认为无论在于都或之前毛泽东都没有受到软禁。

①⑦ 担任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断言，离开根据地的决定事先没有同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高级军事指挥员进行过讨论。他还说，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告诉他（彭本人不是成员），也没有同他们磋商过。（彭德怀《回忆录》，189—191 页，北京，1982 年）

①⑧ 这次谈话的细节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1984 年 3 月 21 日北京采访；于都县博物馆张德明，1984 年 4 月 9 日于都采访；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次谈话发生在瑞金，事先他和林彪已获知将要进行一次“战略行动”，准备工作将秘密着手进行。他们除了被告知要同二、六军团会合外，什么也不知道。毛中断了这次谈话，建议两位客人参观一下前任党的中央书记瞿秋白开办的图书馆（《聂荣臻回忆录》第八章，北京，1983 年）。

①⑨ 成仿吾：前书 18—21 页；吴吉清：1984 年 4 月 15 日采访；伍修权：前书第七章。

②⑩ 伍修权估计挑夫达三千人。有的人估计高达五千人。

②⑪ 钟书棋：瑞金博物馆资料员，1984 年 4 月 11 日采访；张德明：1984 年 4 月 9 日采访；陈昌奉：前书 24—25 页，陈昌奉在书中说，他们一行出北门，行二十里到渡口；张德明则说他们一行出的是东门，走了一小段路就到渡口了。

第二章 “赤匪”的兴起

加伦的真实姓名是 V .K .布廖赫尔。他后来成为斯大林在远东的最高指挥官，直到 1938 年在大清洗中遭处决。蒋介石对他颇为器重，正如李德告诉海伦·斯诺的那样，蒋在 1935 年或 1936 年想把他搞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海伦·斯诺：《延安笔记》）

蒋介石自然不晓得，这种阵地战的新战法并非毛泽东和朱德所为，而是由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新代表强加在红军头上的。

哈罗德·艾萨克所著《中国革命的悲剧》提供了可靠的描述（见 176—177 页，加州，斯丹福，1951 年）。也可参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75—76 页。顾顺章于 1930—1931 年之交的冬季，在汉口街头看杂耍时被捕，这时他担任共产党内的秘密警察头目。他叛变后向国民党供出情报，致使党在上海、汉口和其它大城市中的机关遭到破坏。（雅克·古尔勒迈兹：《中共党史——1921—1949 年》，221—222 页，纽约，1972 年）。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457 页。

党史学家胡华，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1984 年 10 月 30 日北京采访。

江西大旅社自 1949 年起就一直是一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

斯大林的命令是由尼古拉·布哈林签署后通过电报发出的。布哈林那时还领导着共产国际，但不久就被罢免，并于 1936 年被清洗枪毙了。罗明纳兹在武汉把斯大林的命令交给了党的中央委员张国焘，张则将其转交给在南昌领导起义的五人委员会。周恩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和起义的指挥。其他几个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和彭湃。（前委由周、李、恽、彭等四人组成。谭平山列席前委会，但不是前委委员。——译注）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里，没有提到张国焘的名字，但在一幅描绘起义前夕的一次委员会会议的油画里有他的形象（凌家传，1984 年 4 月 3 日采访）。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和罗明纳兹和周恩来的会面。他说，虽然他对这次行动有疑问，但他最终还是给予全力支持（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第一卷 674—675 页，第二卷 5—8 页，劳伦斯，坎萨斯州，1971 年）。凌家传引述张国焘对委员会成员的话：“除非你们肯定能够成功，否则就不应该发动这次起义”。罗明纳兹在二十年代末同斯大林决裂，1935 年自杀身亡。虽

然他威胁说不允许任何共产国际顾问参与南昌起义，但不过是一句空话。M. F. 库曼宁（音译）是派到贺龙部队的一位苏联军事顾问，他陪贺龙一道来到南昌，并参加了行动。他在中国一直住到 1928 年。（《在中国的土地上》，149—159 页，莫斯科，1977 年）可能还有别人也参加了。

队伍离开南昌后，曾向广州方向转移，但没有到达目的地。大部分部队不是打散了就是被消灭了。他们确实是在 9 月 24 日到 10 月 1 日期间攻占了汕头，但是周恩来病倒了，被悄悄地转移到香港，并在那里同贺龙、叶挺和聂荣臻等人会合。朱德、陈毅、林彪及其残余部队则暂时栖身在一位友善的国民党将军的驻地。（南昌起义的细节引自凌家传 1984 年 4 月 8 日的介绍，并见雅克·古尔勒迈兹在 1962 年 7 月出版的《中国季刊》的文章，161—168 页。）聂荣臻在 1921 或 1922 年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那时他是留学比利时的科技生。他后来领导实施了中国的核军备计划。（聂荣臻同志的入党时间是 1923 年初。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由赵世炎、刘伯坚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译注）

所有这些都成了斯大林大清洗的牺牲品，1936 年是拉狄克和布哈林，1938 年是米夫。米夫的真实姓名是米哈伊·阿列克山德罗维奇·弗托斯。他取代罗明纳兹成了斯大林的“中国问题专家”。

⑩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毛和中国革命 1893—1954 年》，173—179 页，纽约，1972 年。

⑪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58—159 页）对毛的这次被俘有一段文字。关于军官在井冈山密谋一事是韩素音在 1966 年听人所说的。毛当时说，谁要是不愿意随他上井冈山可以自便，并赠送路费。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离开了部队（韩素音：1984 年 8 月 19 日私人通信；可参阅韩著《早晨的洪流 158—159 和 175 页》）。

⑫ 何长工 1984 年仍健在，住在北京，担任军事学院的副院长。

他新近发表了一本题为《难忘的日子》的回忆录。长征时，他曾担任九军团的政治委员。

⑬ 关于离开井冈山的日子，当地的官员有两种说法：即1月14日和1月29日。各个部队离开的日期有所不同，但主力是在1月14日离开的。

⑭ 见斯诺《红星》一书160页。几年之后，朱德留恋地对史沫特莱谈起他同王佐、袁文才的那次谈话。他记得两人说起一个叫朱聋子的土匪总是说：“不必知道怎么打仗，只要知道怎么包围敌人就行了”。朱德毕生遵循着这条原则（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232页，纽约，1956年）。

⑮ 韩素音：前书206页。虽然彭德怀早在王佐、袁文才出事之前的1929年8月就离开了井冈山，但他领导的红五军却以某种方式卷入了处决二人的行动。后来大字报攻击彭时，他声明，如果发现红五军通过消灭王、袁而获利（有人指控红五军夺取了王、袁的武器），他情愿偿命赔罪（张援远：1984年8月14日书信）。长期以来，无人愿意为这个被认为是“糟糕和错误”的决定承担责任，这也许是什么井冈山纪念馆没有提及此事的原因。不过王、袁二人的画像还陈列着。此事的大部分细节来自对茨坪井冈山纪念馆工作人员桂玉麟的采访。何长工的故事及捕获尹道一的故事来自江西省外办张野副处长，1984年4月6日南昌采访。

“文化革命”高潮期间，每天有三万以上的红卫兵来到井冈山，造成严重的食物、住房、卫生和医疗问题，最后，军队动用直升飞机运送食品和疏散病号。这样的高峰期持续了两个多月，直到政府开始劝说青年不要再去了，每日上山的人数才逐渐降到二万，然后又降到一万。没有死亡人数统计（对井冈山县县长的采访；1984年4月7日）。

第三章 前 夕

这些数字是北京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估算出来的（秦兴

汉：1984年4月11日瑞金采访）。还有其他种种估算，最高时达到四万。然而这些数字都必须大打折扣才行。曾同陈毅共事的陈丕显将军提出的数字是三至四万（见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2页。）

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瑞金纪念馆采访。

陈丕显：前书第一章；王愿坚：1984年3月5日北京采访；陈丕显：1984年6月13日北京采访。

陈毅之子陈昊苏：1984年6月13日北京采访。陈毅的老朋友和同事陈丕显在五十年之后的现在说：“要是把陈毅也抬在担架上参加长征就好了。”（陈丕显：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

人大党史教授胡华：1984年3月21日北京采访。

《聂荣臻回忆录》第十章。

关于红军的实力五十年来一直存在争议。这里的数字是根据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花名册统计出的实际数字，列为两栏：一栏是十月八日当天的实有人数；另一栏是截止十月十二、十三和十四日各部队获得兵源补充后将达到的数字。第一栏的总数约七万人。此处提供的系第二栏的总数，合计为八万六千八百五十九人。一九三四年扩红高潮中征募的新兵先是编在同地方赤卫武装在一起的独立团里。这些独立团后被编入各军团。第三、五、九军团各补充两个团。一九三四年九月刚刚组建的八军团也补充了一个团。七军团和九军团都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就组建了的。中央两个纵队里作战部队很少。江西于都纪念馆的张德明认为整个作战部队的人数有七万，这个数字看来比较可靠。一方面军号称十万大军系出于宣传目的，这也符合红军历来的做法。为了迷惑敌人，夸大实有军力是常有的事。部队番号也频繁变动。不少“军团”叫作兵队（原文如此。——译注）或师更贴切些，随着兵员消耗加重，情况更是如此。提供这一档案资料的研究员阎景堂认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八日两个累计总数都是准确无误的。红军使用“方面军”一词，是指在同一指挥下的一组军团。第一方面军在初建时

只有一、三军团。所谓“军团”就是“军”，由一军事指挥官和一政治委员率领（二人共同率领，通常政委的地位还要高一些）。这些番号一直保留到长征完结，虽然越来越名不符实。

国防部高级研究员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北京采访。

危秀英：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⑩ 南昌省纪念馆资料。

⑪ 曾宪辉：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⑫ 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瑞金采访。

⑬ 井冈山纪念馆资料：1984年4月9日。

⑭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241页。

⑮ 江西省党校党史教授戴向清：1984年4月14日南昌采访。

⑯ 戴向清：1984年4月14日采访。

⑰ 吴兴：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⑱ 杨成武：《忆长征》7—11页，北京，1982年。

⑲ 危秀英：1984年4月15日采访。

第四章 “独立房子”的主人

奥托·布劳恩（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87—88页。伍修权在李德和项英谈话时担任翻译，但他不记得项英关于毛的一番警告。他记得李德对项英说：“我想你可以靠打游击生存下来。”（伍修权：1984年8月28日采访）。

乔治·哈特姆（马海德）：1984年北京采访。李德自1939年离开中国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一直居住在俄国。他虽然没有象斯大林的绝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那样遭到处决的厄运，但被禁止过问任何中国事务。他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也许受到警察的监视，也许在一段时期内受到监禁或流放。他的回忆录在1969年首次刊登在东柏林杂志《地平线》上，并在他死后的1974年成书出版。

大部分取自马海德对他的印象，马在延安时同李德过往甚密。这个时期苏联的做法似乎是，所派遣的情报人员均使用填有本人真实姓名的护照，据说“干净的护照”更有助于掩护，更不易引起怀疑。正因为如此，理查德·左尔格，这位最初是“国际”的工作人员而现在属于军事情报系统的鼎鼎大名的苏联间谍，使用一本填有本人真名的德国护照来到上海。（F.W.戴京和G.R.斯托里：《左尔格案件》第65页，纽约，1966年）。

希特勒上台使经费来源中断。红色救济会的负责人遭到国民党的逮捕和关押。（胡华：1984年8月21日北京采访）王炳南大使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党内的“俄国派”比毛泽东要强大得多，因为那时中国党的“领导、理论、策略和经费——所有这些，都是俄国人提供的。中国党就是共产国际的一分子”。（王炳南：1984年8月20日北京采访）

海伦·斯诺：1982年1月10日采访。

李德：前书第26页；史蒂夫·尼尔逊：1985年1月采访。

西奥多·德雷珀：1981年10月采访。

戴京和斯托里：前书；尤金·丹尼斯的妻子佩吉曾经是共产国际的交通员，她描述过1934年夏秋之交上海地下活动的情况。虽然她曾写到丹尼斯当时访问过“苏区省份”，但在1985年1月问到她时，她承认她可能搞错了。丹尼斯肯定没有去过江西。他违反国际的纪律，通过其妻向国际送去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他向她解释，由于国际在华人员中间对红军撤出江西一事争论不休，他已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见。也许他的电台已遭到破坏。（佩吉·丹尼斯：《一个美国共产党人的自传》第82—84页，康涅狄格州。威士帕特，1977年）

尼尔逊：1985年1月采访。

⑩ V.B.约翰逊：《纷乱的年代》第125—126页，宾州，1967年）

⑪ 李德：前书 29—31 页。

⑫ 如果李德确如其回忆录所介绍的那样出生于 1900 年，那么他 1914 年充其量不过十四岁。

⑬ 取自 1984 年 3 月 28 日对伍修权的采访。李德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参加过奥地利军队、成为战俘、参加红军进行内战或当过骑兵的经历。伍修权基于他同李德的私人谈话，认为所谓街垒战，越狱等情节均不属实。他说，从李德宣称自己抵达莫斯科的 1926 年到他来到中国的 1932 年，这期间的时间根本不足以使他学完在伏龙芝学院的课程。而且他感到，李德的俄语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就达到那样高的水平。伍认为李德在奥地利那套故事多多少少是真的。李德在回忆录里宣称他应用在伏龙芝学到的知识在 1936 年训练了红军的一个骑兵师。他说他不是骑兵，只是被派到坦波夫的一个骑兵师工作过一个时期并参加过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演习。李德回忆录的英译本没有提到坦波夫，总的来说有不少谬误，（李德：《中国纪事》225 页，莫斯科，1974 年，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 167 页）

⑭ 这里对李德的评价反映了伍修权和胡华的意见。“太上皇”的比喻来自王愿坚。

⑮ 王愿坚：1984 年 3 月 5 日采访；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182—183 页，纽约，1965 年。

⑯ 胡华教授坚持认为外国把博古称为“总书记”是不正确的。他说，1931 年 6 月被捕叛变的向忠发是中共的最后一任总书记，直到 1956 年中共八大选举邓小平担任这一职务止。

⑰ 伍修权：《我的历程》第 10 页。

⑱ 这是根据翻译伍修权的报告得出的。许多年以后，尤其在 1960 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莫斯科的宣传机器也吹起了同样的调子。他们说，毛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也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称毛是“亚洲的希特勒”，称中国是由一群“匪帮”掌管着。

①⁹ 这本很薄的小册子出版时题为：赤色中国——毛泽东主席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步，1934年1月22日。它的英译本在1934年末由纽约的国际出版社出版，售价每册五分。胡华（1984年3月21日）在北京说，小册子把毛的报告全编选掉了，只留了一段话。检查一下英译本的情况似乎确实如此。这已不是向第二届苏维埃大会的“报告”了，而成为鼓吹“苏维埃民主”、“苏区财政政策”、“苏区婚姻方式”、“反帝运动”和“苏区劳工政策”的宣传讲话了。读起来，与其说是在瑞金做的讲演，不如说是向外国发行的宣传材料。

②¹⁰ 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②¹¹ 由于林彪在“文化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反毛的阴谋和他轰动一时的死亡，北京把他描述成一个李德的支持者，然而这也许是不准确的。一位叫胡继熙的法国华裔学者曾引刊登在1934年7月中共期刊《革命与战争》中的林彪的文章，认为该文包含了对李德战略的几乎毫无掩饰的攻击和对毛的支持。（胡继熙：《中国季刊》第82期，250—280页，1980年6月）李德在回忆录里带着一种委屈的情绪提到林彪的这篇文章。（第74页）

②¹² 这是胡华对伤亡状况的估计。周恩来的估计取自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88页。彭德怀对广昌战役的评论见其回忆录189—192页。刘伯承的故事来自王愿坚。

②¹³ 彭德怀：前书189—192页。

②¹⁴ 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②¹⁵ 彭德怀：前书189—192页。

②¹⁶ 这里所述基本上是伍修权提供的情况。个别细节来自王愿坚。而胡华教授听到的说法则更加可怕：据说肖劲光因其“反领导”的态度被撤销军籍，下放当了挑夫。（当时公开指责肖劲光是因黎川失守而撤职查办的——译注）肖直至红军到达延安前一直没有恢复领导职务。但据长征老干部李一氓回忆，肖在长征时已担任了干部营的负责

人（肖担任红大上干队队长——译注）并自始至终和他一道行军（李一氓：1984年3月22日北京采访）。

②⑦ 胡华：1984年8月23日采访。

②⑧ 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

②⑨ 这是向青教授在1985年1月14日纽约采访时得出的结论；部分细节来自伍修权和胡华。

③⑩ 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76页。1936年春，刘长胜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并带回一台大功率电台和新的密码，中共同莫斯科的联络得以恢复。1935年2月，处在地下状态的上海中央局的成员黄文杰被捕，但他没有叛变。（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李德显然以为这数起被捕事件都是同时发生的。（李德：前书第79页）盛忠亮最终来到美国，并著有《中国革命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一书（盛在俄国期间曾就读于该大学）。

第五章 最初的行动

吴吉清：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伍修权：《我的历程》第七章。

这是江西省党校戴向清教授的结论。苏联方面的文献毫无补益，它们中间大多数仅能指出，撤离苏区的决定是1934年9月做出的。但也有一些不同说法。如由A.S.帕利弗塔依罗编撰的《中国现代史论文集》（莫斯科，1959年）说，这一决定是中央委员会在“1934年夏天”做出的（261页）。V.G.萨波日尼科夫在其《战火中的中国——1931—1950》（莫斯科，1977年）一书说，这一决定是由中央书记处在1934年9月6日做出的，并在9月8日召开中央和红军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讨论了突围计划。

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瑞金采访；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肖克：1984年3月9日北京采访，1984年6月11日私人通信。

程子华：1984年3月30日北京采访。

1984年4月13日宁都介绍。

彭德怀《回忆录》182—183页。

根据胡华对当时情况的再现。李德的评语来自其《共产国际代表》一书62—63页。

⑩ 杨成武：《忆长征》第14—15页，北京，1982年。

第六章 计 谋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310—312页，纽约，1956年。

张盛继：1984年6月4日兰州采访。

彭海清：1984年6月8日保安（志丹）采访。

这是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提供的红军档案材料。（1984年10月24日北京采访）这些代号由军委在1934年10月13日下达给各部队，并于10月15日起生效。这些代号包括：一军团——南昌；三军团——福州；五军团——长安（西安的旧称）；八军团——济南（山东省会）；九军团——汉口。第一军委纵队——红安；第二军委纵队——红章。一军团的三个师各有一以“昌”结尾的代号。一师——广昌；二师——建昌；三师——都昌。三军团的三个师的代号都以“州”字结尾，四师——赣州；五师——苏州；六师——汀州。各团的代号由各所在军团制定。

长征开始时，代替患病的王稼祥担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是副主任李富春，他是毛的老朋友，他的妻子蔡畅同毛的友情还要更久一些。

各军团的指挥人员如下：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后在领导一一五师时投奔了国民党），政委黄甦；九

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到达陕北后担任过三十军的政治委员）。红军到达黎平以后，八军团合并到五军团，两个中央军委纵队也合并在一起，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陈济棠不愿看到共产党撤出根据地。有一些证据表明，他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了。李德对这一情况的说法是含混不清的。他坚持说博古曾就此事请示过共产国际，并说这是同莫斯科所进行的最后一次联系（李德：《共产国际代表》78—79页）。胡华教授不相信外国关于共产党付给陈济棠五万元买路钱的传闻。（胡华：1984年3月21日采访）。

来自胡华。这批电台设备是经由杨虎城的代表武志莘和四方面军的代表，后来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徐以新转交的。转交地点在汉中附近（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胡耀邦：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

1931年1月，红军缴获了一台十六瓦功率的电台，但功率不足以发射到上海（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红军当时有两个无线电通讯局：二局负责截获和破译敌台通讯，三局负责内部通讯。二局人员中有李克农等人，1984年以前均已牺牲或去世。（胡耀邦：1984年6月14日采访）后来担任过外贸部长的李强曾在上海受过密语和电台操作的训练，他后来还发明过一种新式天线。其他参与此事的人还有：后任邮电部长的王子纲，总工会副主席宋侃夫，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另一位主要专家是李白，他在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时牺牲在上海（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胡华：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⑩ 李一氓：1984年3月22日北京采访。

⑪ 《民国日报》资料：南昌省图书馆。

⑫ 共产党一方在情报方面的失败同蒋介石相比可以说是半斤八两。菲利浦·贾飞在其未发表的《一个旅行者的游记》手稿中曾得

到 1934 年 10 月发行的《今日中国》第一期的情况，他是这份杂志的编辑。这期《今日中国》刊载了一篇关于江西苏区根据地的文章。实际上，整个杂志的主要消息来源是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地下据点。直到两个月以后的 12 月 1 日前后，贾飞和他的同事才从上海的地下党那里获悉长征已经开始（贾飞：《游记》第 127 页）。

第七章 担架上的“阴谋”

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第 173 页，纽约，1967 年。

刘英：1984 年 6 月 14 日北京采访。

钟伶：1984 年 6 月 11 日西安采访。

刘英：1984 年 6 月 14 日北京采访。

胡耀邦：1984 年 6 月 14 日采访。

朱仲丽：1984 年 10 月 30 日北京采访；刘英；伍修权。

胡华：1984 年 3 月 23 日采访。

伍修权：1984 年 3 月 28 日采访。

刘英：1984 年 6 月 14 日采访。

⑩ 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 88 页。

⑪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 10—11 页；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第 5—6 页，纽约，1980 年。

⑫ 罗伯待·佩恩：《毛泽东》第 30 页，纽约，1962 年。

⑬ 这篇精辟透彻的分析文章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在 1983 年 12 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撰写的。它刊登在《时代的报告》杂志上并翻译成英文连载在 1984 年 4 月和 5 月的《北京周报》上。李锐估计毛在长沙师范的五年半时间里一共写了一百万字的读书笔记。

⑭ 此处所述毛阅读的书籍和哲学信仰基本取自李锐的研究文章。毛的笔记本存放在故乡韶山村，蒋介石同共产党反目后，出于对

国民党报复的担心，全部加以销毁，仅有一本幸存。

⑮ 赛珍珠（质量很低）的英译本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纽约，1933年）。

⑯ 李锐提供。毛曾对斯诺谈到过他母亲的性格（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15—116页）。

⑰ 肖的引语来自李锐（1984年4月30日《北京周报》23—24页）。斯诺曾写到毛“遵循和学习”华盛顿使用的游击战术。这也许言过其实，因为毛根本无从学到华盛顿的实际战例。看来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华盛顿的一支弱小的军队经过多年战争打败了英国，面对强敌而进行退却时设法保存自己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一切使毛深受鼓舞（斯诺：《旅行于方生之地》第169页）。

⑱ 来自李锐。方维夏是长沙第一师范的主要教师，也是李锐父亲的朋友。他参加了革命，长征开始时留在中央苏区，1935年在赣西被国民党杀害（李锐：1984年10月26日采访）。

⑲ 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第52—53页，怀特布莱恩，纽约，1977年。

⑳ 李锐：上书第34页。

㉑ 华盛顿又成为另一位亚洲革命者——胡志明学习的榜样。

第八章 妇 女

海伦·斯诺：《中国共产党人》215页。威斯特波特，康州，1972年。

康克清：1984年11月2日采访。

李伯钊：杨尚昆将军之妻，1984年6月15日北京采访。

斯诺：前书173页。

危秀英：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迪克·威尔逊：《长征》70页，纽约，1979年。

伍修权：1984年8月28日采访。

⑩ 康克清：1984年11月2日北京采访。

⑪ 丁玲：1984年3月23日北京采访。

⑫ 海伦·斯诺：《延安笔记》第46页。

⑬ 海伦·斯诺：《中国红区内情》第214—217页。

⑭ 李德：《共产国际代表》55页。

⑮ 李红：《贵州青年》文章，1983年第2期。

⑯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26页。

⑰ 李锐：1984年10月26日采访。

⑱ 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334页。

⑲ 李锐：1984年10月26日采访。

⑳ 胡华：1984年10月采访。1977年第三期《东方地平线》刊载苏珊·韦格兰关于杨开慧牺牲的细节报道。胡华肯定了这些说法，但有几处小的出入。韦格尔说杨开慧是1930年10月26日遇难的，然而这也许只是她被捕的时间。在1960年以后的中苏激烈论战中。莫斯科一方面把杨开慧和毛泽建之死的责任推在毛的头上，另一方面却缄口不提毛攻打长沙（包括早先一次失败的攻打）均是在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㉑ 见威利斯·巴恩斯顿《毛泽东诗词》，纽约，1970年。“文化革命”中的大字报对杨开慧的孩子的情况有过许多报道。这些报道未必都准确，但总的来说，已得到其他方面，包括胡华的肯定。毛的第三个男孩曾交给老百姓照料，随后就失踪了，许多年之后找到时，他在一个公社当会计。大卫·米尔顿和南希·米尔顿在其《风不止》（153—155页，纽约，1976年）一书中谈到了大字报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第三个男孩的存在已为胡华所证实。特里尔的《毛泽东》一书

说，孩子的外祖母救了他们，并把他们的名字改成杨云福和杨云寿。1984年我在中国听说，毛岸青有几个子女，据说他由于脑部受伤失去了工作能力。受伤的原因一说是上海讨饭时遭到毒打，一说是苏联医生治疗错误。据说毛岸青的妻子大部分时间要用来照料他。

②② 《革命文物》1980年第2期。

②③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1984年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她的母亲在当地地下党的协助下从江西逃到延安，并在延安病逝。

绝大部分细节取自《贵州青年》杂志1983年第二期刊载的关于贺子珍生平的文章。这篇引人入胜的文章作者的笔名叫“李红”，她的父亲是贺子珍在上海度过最后十年的那家医院的大夫。1978年和1983年秋，李红两次采访了贺子珍。这些细节的绝大部分从未在中国发表过。贺子珍于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去世。1986年，中国准备出一本回忆贺子珍的书。

②④ 贺子珍怀孕的情况是吴吉清提供的（1984年4月14日南昌采访）。许多长征幸存者，包括不少身居高位的人，在1984年仍对贺子珍在长征中的经历毫无所知。

②⑤ 海伦·斯诺：《中国共产党人》230—249页。

②⑥ 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②⑦ 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②⑧ 海伦·斯诺：1984年8月私人通信。

②⑨ 李锐：1984年10月26日采访。

③⑩ 海伦·斯诺：《中国红区内情》182—184页。

第九章 第一场大战

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提供了红军在1934年10月8日武器清点数字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是首次公布。同李德在其《共产国际代表》第81—82页中粗估的数字相比，这里的数字显得略小一些，但李

德是在没有原始记录的情况下，在事情发生后三十年凭记忆写的。各种武器的分配情况如下：步枪等——一军团：8383支；三军团：8287支；五军团：4925支；八军团：3476支；九军团：3945支；军委纵队：1987支；中央纵队：2240支。迫击炮——一军团：8门；三军团：8门；五军团：2门；八军团：2门；九军团：2门；军委炮兵营：16门。

一军团有子弹546,649发，迫击炮弹612发；三军团有子弹482,736发，炮弹680发；其他部队的子弹与炮弹数量分别为，五军团：213,661和93；八军团：180,351和104；九军团：208,697和164；军委纵队：70,610和880；中央纵队仅有98,936发子弹，没有炮弹。

出征时，红军有马338匹，其中一军团90匹；三军团71匹；五军团49匹；八军团21匹；九军团29匹；军委纵队34匹；中央纵队44匹（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北京采访）。

莫文骅的估计见《伟大的远征》158页，莫斯科，1959年。《伟大的远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北京，1958年）一书的俄文本。这本书译得十分准确。由于本人熟悉俄文而不通中文，故使用这部译本。刘伯承估计有四十万敌军（见其《回顾长征》65页，北京，1978年）。1984年，刘伯承九十二岁，住在北京的医院里，成为健在的长征高级指挥员中最年长者。胡耀邦是在采访中提出自己的估计的。

余秋里：1984年10月31日北京采访。

由于缺乏文字证据，关于是否存在“走廊”的问题很难得出结论。国民党方面的文字记录中没有提到“走廊”。但薛岳谈及湘江战役时那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曾被引用做为这种说法的间接根据。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矛盾十分激烈，1936年就有过一次流产的桂系反蒋运动。桂系军阀同样反对共产党，红军指挥员对战斗的情况莫衷一是，就是因为战斗本身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顺利渡江变成危急的后卫战。各个不同地点的战斗情况也大不相同。徐梦秋对存在某种“安排”是

很肯定的，但他仍谈到战斗的激烈程度。胡华教授也提到徐梦秋关于“安排”的说法（胡华：1984年10月24日通信）。然而，徐梦秋在1937年会见海伦·斯诺时，对这一点却不是很明确的。他说到为渡湘江苦战了五天——显然是指战斗的最后一段时期（尼姆·韦尔斯，即海伦·斯诺：《红色尘土》65页，威斯特波特，康州，1957年）。1938年，徐梦秋在为部长征回忆录作序时，提到湘江之渡是“平静”的。陈志让曾引用另外一条共产党方面的材料说，缪楚黄提到白崇禧撤回他的部队，为红军渡江留下一条通路。（陈志让：《中国季刊》第40期，第32页，1969年10—12月）。

谭政：《伟大的远征》第166—167页。

伍修权：《我的历程》第七章。

李德：前书第90页。

取自杨成武《忆长征》第四章。杨的这本书出版时叶剑英作了序。（原文如此，实为聂荣臻作了序——译注）

一里合半公里或 $\frac{1}{3}$ 到 $\frac{1}{4}$ 英里。

李伯钊：1984年10月31日，北京，采访。

⑩ 八军团的情况取自莫文骅：《伟大的远征》158—165页。

⑪ 《聂荣臻回忆录》第八章。聂荣臻、杨成武和彭德怀均把一军团的位置放在右翼。彭写到一军团在右翼一方同湘军作战，而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和他的同事说是三军团在右翼，一军团在左翼。

⑫ 聂荣臻：前书第八章。

⑬ 莫文骅：前书158—165页。

⑭ 聂荣臻：前书。

⑮ 刘伯承：前书第七章；秦兴汉：1984年3月8日，采访；肖华：《艰苦的岁月》97—98页。

⑯ 《彭德怀自述》360—361页。

⑰ 李德：前书89—90页。

①⑧ 作为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当时也在场，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采访时又补充了细节（1984年3月28日采访）。王愿坚对此事的说法相似（1984年3月5日采访）。李德对这件事的说法是混乱的，他把周子昆和后来担任海军司令的肖劲光搞颠倒了。他同肖劲光之间积怨甚深。（李德：前书91页）

①⑨ 李德：前节89，91页。

第十章 改变行动路线

孔宪权：1984年4月24日遵义采访。

定一：《伟大的远征》170—176页。定一即陆定一，长征时是位杰出的党的干部和宣传工作者。他的地位稳步上升，进入政治局并担任了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他在文化革命中被打倒，遭到逮捕并于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同杨尚昆将军、彭真和罗瑞卿将军一起受到红卫兵的揪斗。罗将军此时因从六层楼上跳楼自杀（或被推下）而受重伤。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四个人的胳膊被“监护”他们的士兵强力扭在身后。就在这次批斗或在以后的一次批斗中，陆定一的四肢被绳子捆住，全身吊起，来回摇摆，他倍受折磨，伤势严重，红卫兵只好放弃继续批斗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485—486页；爱德华·E·赖斯：《毛的道路》，272—274页，伯克利，加州，1972年）。

曾宪辉：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孙日昆：贵州博物馆资料工作者，1984年4月16日贵阳采访。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315—316页。

曾宪辉：1984年4月18日采访。

李德：《共产国际代表》92—93页。

魏国禄：《周恩来长征片断》6—8页，北京，1978年。

对蒋介石军队数字的估计有很大差别。胡华教授提供的数字是十万，是诸数字中最低的，但这只包括在湖南的国民党中央军。伍修权将军的数字是二十万；王愿坚的数字是三十万，而肖华将军的数字则是四十万。造成差别的根本原因是在统计总数时包括了不同方面的地方军队。

⑩ 大多数中国材料认为会议是12月10日举行的，但党史学家孙日昆认为，会议是在12月份头十天也许在10日这一天举行的。周恩来关于此事的回忆就是他提供的。是周的遗孀邓颖超转告他的（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采访）。

⑪ 徐梦秋编撰了《随军西征的经历》文集并为之作序（上海：193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日）以后，该集中的材料也以其他方式发表过。海伦·斯诺在其《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报道过徐梦秋。徐晚年的情况来自胡华（1984年3月21日和1984年3月29日采访）。

⑫ 关于黎平会议的情况，胡华教授（1984年3月24日采访），伍修权将军（1984年3月28日采访），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采访）和吴定国（黎平文化馆馆长，1984年4月21日采访）之间，没有大的分歧。李德说这次会开得“很短”，并说他建议让追击的国民党部队赶到前面去，然后绕到敌人身后，向湘西北前进并同那里的二、六军团会合。没有人对他的意见感兴趣。

⑬ 黎平会议公报发表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一般被认为就是会期，但贵州博物馆的孙日昆和他的同事认为会期是十五到十六日。在不少情况下，会议公报的日期要晚于会议实际召开时间一天或几天，这是由于文件需要时间编写和传阅。关于黎平会议本身，胡华教授称它为政治局会议；王愿坚称之为中央会议；孙日昆及其同事指出公报署名是中央委员会和军委；吴定国也说是政治局会议，刘伯承也这样说（见其《回顾长征》第8页）。

①④ 直到本人 1984 年 4 月访问贵州黎平前不久，中国史学界里才把徐记货栈确定为黎平会议的会址。但确定会址的工作早已进行多时，包括询问当地居民，拍摄有可能成为会址的房屋的照片。然后，这些照片送交给何长工，他就是那位争取王佐参加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那位杰出的政治委员。还送给黄鹤显以及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这些照片是 1978 年送到北京去的。范金标记得会场的隔壁是一家德国路德教教堂。教堂早已不复存在，但唯一符合范的记忆的房子就是徐记货栈。1984 年，这所房屋已恢复其 1934 年的原貌。有关这所房屋的情况是吴定国提供的。

①⑤ 黎平会议的基本情况来自吴定国（1984 年 4 月 21 日采访）和党史学家孙日昆（1984 年 4 月 18 日贵阳采访）。最初计划中的一部分是在湘南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李一氓被任命担任从事这一工作的营的教导员。这个根据地计划设在湘江以西的山区，那里的党组织基础比较好，可能以为同毛在井冈山上的根据地差不多。当时预计，一旦红军向西转移，就会吸引国民党军队西进，离开这一地区，以利这一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的重建。“不幸的是，事情并未象我们预计的那样，”李一氓后来回忆说，“我们赶到那个地区，但又不得不分散，因为那里的战场形势不允许我们进行工作。”胡华肯定了李的说法。他说，湘南根据地计划仅仅是辅助性的，要等到红军主力同二、六军团会师之后才进行。他还说龚楚也参予了这些计划，那时他留在江西，后来叛变投敌并企图诱捕陈毅。龚在其美国出版的《我和红军》一书中写到了这些经历（胡华：1984 年 8 月 23 日北京采访）。在黎平，没有人能够记得外国人曾到了那里，虽然那里的路德教教堂已说明外国人曾到过。我们一行的到来引起成千围观，警察在军队士兵的帮助下维持秩序。

①⑥ 孙日昆：1984 年 4 月 11 日贵阳采访。

①⑦ 孙日昆：1984 年 4 月 11 日贵阳采访。

第十一章 进 遵 义

过新年的细节来自陈昌奉《长征中》30—44页。新年命令摘自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277页；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文章谈到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有可能是后来加上的——“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长征故事》11页，北京，1958年。）这项命令是由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签署的。（阎景堂：1985年3月1日通信）秦兴汉将军认为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时间是1935年1月1日，也许就是该命令发布的日期。秦补充说，这项命令明确说明了要在贵州建立根据地。李德回忆他在渡过乌江的第二天向毛建议让红军停止前进，并同从湖南方向赶过来的三个敌军师进行战斗。陈昌奉回忆毛明确指出，正是由于敌薛岳、周浑元三个师迫近，红军才必须赶快渡过乌江。这次开的很长时间的政治局会议很有可能讨论了敌军三个师迫近的问题。李德在写自传时，没有原始笔记参考，仅凭自己的记忆，以及参考他本人于1939年在莫斯科写的汇报，和其他能在苏联搞到的有关文件。

四团作战情况取自刘亚楼《长征故事》21—22页；六团作战情况取自王赤成《长征见闻》（22—28页，北京，1963年）；架桥情况取自黄超田《回忆长征》（26—32页，北京，1975年）；攻取遵义情况来自遵义纪念馆田兴咏主任（1984年4月24日采访）。

在夺取遵义的日期问题上稍有不同。架桥也许在1月4日，进入遵义城也许在1月5日。官方的记载认为红军是在1月7日夺取遵义的，包括毛在内的指挥部是1月8日入城的。贵阳和遵义的权威人士同意上述看法（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采访；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采访）。遵义入城情况取自魏国祿《周恩来在长征中》11—12页。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315页。

《聂荣臻回忆录》10页。

柏辉章公馆，毛和博古的住所以及天主教堂的情况来自本人

实地观察（1984年4月24日）；其他细节来自遵义纪念馆田兴咏主任（1984年4月24日采访）。

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遵义会议房间的描述来自本人实地观察；座位安排情况来自伍修权，他说现在使用的桌椅都有所改变（在场有人也说“有所改进”）。今天摆在这里的椅子显得很华贵，黑木材料，椅子靠背是竹子编成的。所有的椅子整齐地围着桌子，给人以庄严之感，又象是戏剧中的一台道具。那个据说被李德盛怒下踢翻的烤火盆（伍说李德并没有这样做），不知搬到哪儿去了。出席人员的名单取自新华社1984年3月4日援引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材料。就是这个委员会在1982年发现了陈云的传达提纲。据说陈云在1935年8月24日前后四渡赤水过程中向中央纵队的干部作传达报告的。早些时候认为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也出席了会议。王稼祥情况来自其遗孀朱仲丽（1984年10月30日北京采访）。伍修权在其回忆录中和接受采访时均提供一些材料。

伍修权：《我的历程》第七章以及采访。

伍修权：前书第七章。

⑩ 伍修权：前书第八章以及采访。

⑪ 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⑫ 王愿坚：1984年3月5日。

⑬ 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⑭ 《聂荣臻回忆录》第九章；伍修权：前书第七章；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⑮ 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李德：《共产国际代表》98—107页。

⑯ 第三梯队的司令员是红军后勤部长叶季壮。解放后，他担任过外贸部长。刘英接替工作的政治指导员李林凯现已去世。刘英回忆

时说,这支梯队是个大难题,因为很难雇到挑夫来取代偷偷溜走的人,他们怕国民党报复,最后只好工作两三天就让回去。陈云负责这次改编。原来梯队的大部分工作都由李维汉(罗迈)为首的地方工作部负责(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①⑦ 伍修权:前书第七章。

①⑧ 伍修权:前书第七章以及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①⑨ 《聂荣臻回忆录》10—11页。

②⑩ 胡华:1984年8月23日采访。

②⑪ 李德:前书103页。

②⑫ 伍修权:前书第七章和第二章;聂荣臻:前书11页。

②⑬ 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②⑭ 聂荣臻:前书10页。

②⑮ 聂荣臻:前书11页。

②⑯ 彭德怀:《回忆录》105—200页。

②⑰ 此处展示的遵义会议情况是汇集多方材料而成,但主要参考材料是伍修权的回忆录和他在北京接受长时间采访时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和引伸。胡华教授补充了许多重要的细节,王愿坚也提供了少许花絮,但这些材料的可靠程度则无法证明。李德的评论则从反面提供了一种看法。他的记忆不甚准确,而且,正如伍修权形容的那样,他像个与世隔绝的囚徒。李德的回忆录不过是他企图粉饰自己的过失,诋毁以毛为首、周恩来为副的反对他的人们的一种努力。一部分细节来自伍修权在1985年1月举行的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当时公布的文件。现代中国史学界确认,陈志让在《中国季刊》第40期(1969年11—12月)第1—17页发表的遵义会议决议的文件是准确无误的。

第十二章 毛泽东掌权

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时说,这支梯队是个大难题,因为很难雇到挑夫来取代偷偷溜走的人,他们怕国民党报复,最后只好工作两三天就让回去。陈云负责这次改编。原来梯队的大部分工作都由李维汉(罗迈)为首的地方工作部负责(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①⑦ 伍修权:前书第七章。

①⑧ 伍修权:前书第七章以及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①⑨ 《聂荣臻回忆录》10—11页。

②⑩ 胡华:1984年8月23日采访。

②⑪ 李德:前书103页。

②⑫ 伍修权:前书第七章和第二章;聂荣臻:前书11页。

②⑬ 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②⑭ 聂荣臻:前书10页。

②⑮ 聂荣臻:前书11页。

②⑯ 彭德怀:《回忆录》105—200页。

②⑰ 此处展示的遵义会议情况是汇集多方材料而成,但主要参考材料是伍修权的回忆录和他在北京接受长时间采访时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和引伸。胡华教授补充了许多重要的细节,王愿坚也提供了少许花絮,但这些材料的可靠程度则无法证明。李德的评论则从反面提供了一种看法。他的记忆不甚准确,而且,正如伍修权形容的那样,他像个与世隔绝的囚徒。李德的回忆录不过是他企图粉饰自己的过失,诋毁以毛为首、周恩来为副的反对他的人们的一种努力。一部分细节来自伍修权在1985年1月举行的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当时公布的文件。现代中国史学界确认,陈志让在《中国季刊》第40期(1969年11—12月)第1—17页发表的遵义会议决议的文件是准确无误的。

第十二章 毛泽东掌权

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是方维夏的朋友，支持孙中山，也是长沙第一师范的主要教员。方维夏是毛参加创立的长沙新民学会的成员，也是对毛影响很大的杨昌济教师的密友，他在赣南和粤北从事游击战争期间牺牲。李锐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从事新闻工作，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并担任过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1952年调来北京，由于他有理工文凭，被任命负责水电发展工作。在大跃进年代里他担任毛的秘书。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撤职，李锐也被解职。在随后二十年时间里，他被下放劳动、放逐和关押。他在北京秦城监狱（江青目前关在这里）度过了八年。1979年到1982年他任电力部长，后来又担任了党中央的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现已退休，集中精力进行毛泽东和党史的研究。他关于毛青年时代的一部二十万字的著作于1957年出版，后被撤销。一部三十万字的新版本已于1980年出版（李锐：1984年10月26日采访；阎景堂：1984年11月3日采访）。

⑫ 胡华教授做出了这一总结。名目繁多的委员会带来很大混乱。胡华说，由于在做决定的问题上屡次三番出现问题，所以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把所有的问题提交二十人的军事委员会处理是很不便的。在遵义附近一个地方，就是否应攻打当地军阀一个据点一事出现了争论。军委决定攻打，但毛不同意。军委又否决了毛的意见。当晚，毛找到周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服了周，二人在第二天又把问题提到军委会上，同时建议成立由周、王稼祥和毛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处理日常军事工作，这一建议得到批准。

⑬ 胡华：1984年10月14日采访；向青教授：1985年1月14日。

⑭ 北京大学党史专家向青：1984年8月18日北京采访。李德说，陈云的使命是劝说莫斯科向中国的红军提供军事援助。（李德：前书105页）所谓“百万红军”是“布尔什维克”早在1932年就在中央苏区大力宣传的主意，完全是脱离实际的。

⑮ 宋庆龄女士的住宅藏有电台一事已由两位重要党史学家所

证实，他们是胡华（1984年3月29日北京采访）和向青（1985年1月14日纽约采访）。但是《红旗》杂志皮平非的文章（1984年4月16日）说，（《红旗》84年4月16日出版的第八期没有这篇文章。——译注）电台是潘汉年领导的，放在路易·艾黎的住宅。路易·艾黎谈到过他住宅的顶楼曾被用来存放电台。可见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疑点。

对潘汉年的指控看来毫无根据。指控说，潘在日本人占领南京时被捕，答应为日本从事间谍工作之后被释放。宋庆龄女士的一位密友回忆说，1953年的一个星期天他被叫到宋的官邸，宋女士气色十分不好。她说：“潘被抓了。”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潘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陈毅当时是市长。另外一个当时被指控为日本间谍的人叫刘尊棋，1985年他是英文《中国日报》的编辑。他曾被流放北大荒达二十五年之久。

第十三章 “棉里藏针”

杨尚昆：1984年11月4日北京采访。

杨尚昆：同上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498—499页。

红七军军长是张云逸，红八军军长是俞作豫。张后来成为大将并担任过广西省政府的主席，他于七十年代初去世（阎景堂：1984年10月27日采访）。

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采访。

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细节来自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和胡华（1984年10月29日）。洛甫曾告诉斯诺，在整个中央苏区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即

同一般“阶级敌人”有区别的政治犯，不超过一千人。他估计，在江西处决了四百到五百名地主和数百（不超过一千）名高利贷者，在长征过程中处决的地主和官吏不超过一百名（斯诺《中共杂记》88页，哈佛，1957年）。

⑩ 杨尚昆：1984年11月3日采访。

⑪ 毛泽覃的独立师政委职务虽然没有撤销，但他在这段时间里和在于都的毛泽东住在一起（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⑫ 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⑬ 罗迈文章《为捍卫党的路线而斗争》批判邓的正式指控有：
在军事上执行单纯防御路线，反对党的进攻路线； 反对攻打大城市和把红军扩大到一百万员额的政策； 对四中全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不信任。

⑭ 细节来自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罗明夫妇均参加了长征，但在贵州留了下来，因为罗明在1935年3月的娄山关战斗中被炸弹炸成重伤，其妻又患病（胡耀邦：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二人痊愈后，先是为地主干活（罗明当帮工，罗明的妻子当厨工），后来逃回广东梅县，从那里又去新加坡和马来亚当了教员。解放后他们返回祖国，罗明担任了华南大学的校长（张援远：1985年1月11日来信）。1985年，罗明仍健在，时年九十岁，担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回忆1950年在北京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看见罗明的情景：一个人走上前同他握手说：“你不认识我啦？我就是罗明路线呀！”（杨尚昆：1984年10月24日采访）。

⑮ 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

⑯ 王愿坚：同上。

⑰ 杨尚昆：1984年10月3日

⑱ 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采访。

⑲ 关于邓主动要求调动的说法来自阎景堂。这一说法同其他说

法有矛盾。一种说法形容邓像普通战士一样参加了长征；另一种是李一氓提供的，他说他同邓一道在干部团行军，每人都有一匹马。阎是从党的文件研究部门取得上述说法的，而该部门是通过访问长征期间的领导干部来了解情况的。由于邓不愿就其经历接受采访，所以他早期的许多活动情况仍多少有些模糊。胡华教授认为，邓虽然被指控追随罗明路线，但由于领导上意见分歧，所以处理得比较宽大。当时周恩来和洛甫都主张从宽处理，而罗迈主张严厉惩处（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②① 关于邓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职务一事已由杨尚昆将军主持进行了调查。邓在遵义会议前就担任了这一职务的主要证据是他本人的回忆。1985年1月在北京举行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对此给予肯定。周的遗孀邓颖超回忆说，她在黎平会议以前一直担任着秘书长的的工作，由于患病，这一职务改由邓小平担任。如果她的记忆是准确的，那么秘书长基本上是一闲职，因为不论在长征开始前还是在长征期间，她都病得无法履行公职，正如她在1984《中国建设》中写的“我不过是休养队的病号罢了”。北京史学专家提供的党中央秘书长任职情况如下：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蔡和森和王若飞；瞿秋白任总书记期间：年仅二十三岁的邓小平；向忠发任总书记期间：李立三；“党中央到中央苏区以后”，即博古当政期间：邓颖超；“黎平会议以后”：邓小平；“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英；“1935年底”：王首道（后来担任过交通部长）。

刘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事实，直到她同本人谈起之前，仍不为党史界所知。刘英这一回忆得到康克清的确认（1984年11月2日北京采访）。

②① 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第十四章 摆脱危局

遵义纪念馆副馆长，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采访。

廉臣（陈云）：《伟大的远征》66—67页。

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采访。

解放后，这一地区仍遗留有严重的“土匪”问题。在某县，土匪杀害了除二人以外的全部“剿匪队”成员，后调来解放军正规部队才将土匪消灭。土匪依仗宗亲制度并同在贵州、湘西的国民党残余部队保持联系，正如在缅甸、老挝和泰国边界的“金三角”的国民党部队一样。国民党在遵义地区的指挥官柏辉章，在解放军取得胜利的前夕投降了共产党，并被任命协助当地的剿匪委员会工作。后来发现他给国民党军队暗中报信，在1951年被审判处决了。到1952年土匪才消灭干净（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遵义采访）。

这位被形容成被红军吸收的前国民党军医“廉臣医生”，在1958年北京出版的长征回忆集中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部文集于1959年在莫斯科以《伟大的远征》为题译成俄文出版。（本文章以及其他收入集子的文章曾在1936到1937年期间单纯发表过。）“廉臣”的回忆文章是书中的第篇文章，也是最宝贵的文章之一。文章的记述在过泸定桥后中断了，据作者解释，这是由于他另有公务。作者的真实身分就是陈云，这是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时才披露的。陈云中断记述的真实原因是，在那时他被秘密派往莫斯科，向俄国人通报遵义会议决议去了。

谭政：《伟大的远征》205—210页。

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采访。

魏国祿：前书24页。

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丁甘茹：1984年5月13日成都采访。

①② 成仿吾：《长征回忆录》53—55页，北京，1977年；五十年以后的今天，康克清试图缩小这场战斗的危险程度：“当然，如果我们行动慢了，我们有可能被抓住。”在她看来，青杠坡一仗打得“还是好的”。这一仗不打不行，否则敌人就追上红军了，整个形势就会更糟。

(康克清：1984年11月2日北京采访)周恩来夫人的一位年轻的警卫员顾玉平，把这次渡赤水河的突然行动说成是“迷惑敌人”的战术。

⑪ 战斗细节来自实地观察，遵义纪念馆田兴咏（1984年4月24日采访），来自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秦将军的解释对澄清那些相互矛盾的细节尤为有助。谭政的记述是现有关于林彪和第二师作战行动的最好记载。李德的回忆录在这方面的论述是矛盾百出的，他说毛两次到林彪的指挥所，但指挥所设在何处，毛为什么来，都没有搞清楚。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的著作都未提到这场战斗，就连廉臣（陈云）也只字未提青杠坡战斗。无论毛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1936年斯诺在保安的采访中提到这次战斗。实际上，围绕这场战斗，日后还出现了相互指责。1959年毛批判彭德怀以后，有人企图诿过于彭，让他当替罪羊。曾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的肖华，当时不点名地评论了青杠坡战斗。他说：“我们打的不很理想，伤亡相当大。军阀的军队反倒没受损失。”（《星火燎原》第三卷83页）

⑫ 吴吉清：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⑬ 肖克：1984年6月11日通信。

⑭ 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⑮ 丁玲：1984年3月23日北京采访。

⑯ 廉臣（陈云）：前书68页。

第十五章 牵住蒋介石的鼻子

卡琳·杰尔南特：未发表的论文引用1935年2月23日天津《大公报》。

孙日昆：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

彭德怀：《回忆录》365—366页。

来自本人1984年4月25日在娄山关实地观察。

秦兴汉：1984年3月6日北京采访。

杰尔南特论文，引 1935 年 3 月 6 日天津《大公报》。

张爱萍：《伟大的远征》230—232 页。

孔宪权：1984 年 4 月 24 日采访。

胡耀邦：1984 年 6 月 14 日采访。

⑩ 杨尚昆将军不同意胡耀邦对王彬医生的高度评价。他认为王要对王稼祥治疗上的问题负责，王稼祥由于腹伤在整个长征过程中都要坐担架。王彬在长征结束后成为红军卫生部门的负责人（杨尚昆：1984 年 10 月 26 日北京采访）。

⑪ 孔宪权：1984 年 4 月 24 日采访。

⑫ 秦兴汉：1984 年 3 月 6 日北京采访。

⑬ 孔宪权：1984 年 4 月 24 日采访。

⑭ 廉臣（陈云）：《伟大的远征》70—77 页。

⑮ 廉臣（陈云）：前书 70—72 页。

⑯ 刘少奇子女提供：1985 年 2 月 15 日。

⑰ 胡华：1984 年 4 月 24 日采访。

⑱ 彭德怀：前书 365—366 页。某些中国人士对刘少奇是否走完了长征有疑问，胡华认为，刘一直长征到了陕北，参加了 12 月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然后赴天津北京重新组织当地党的工作，特别是加强一二·九运动之后的党的工作（胡华：1984 年 3 月 23 日）。刘的遗孀王光美也赞同这一说法（1985 年 6 月通信）。不少西方的研究专家对刘少奇是否参加了长征长期抱有疑问，现在，这一点已可毫不含糊地加以肯定。

⑲ 孙日昆：1984 年 4 月 18 日贵阳采访。

⑳ 刘伯承：《回顾长征》11 页。

㉑ 《毛泽东诗词》11 页，北京，1976 年。

㉒ 1984 年 4 月 27 日实地观察；1984 年 4 月 28 日采访秦兴汉和田兴咏。

- ②③ 孔宪权：1984年4月24日采访。
②④ 成仿吾：《回忆长征》59页。
②⑤ 秦兴汉和田兴咏：1984年4月28日采访。
②⑥ 王天锡：贵州《文史资料选辑》，1964年4月版。
②⑦ 陈士榘：《伟大的远征》55页。
②⑧ 王天锡：前书。

第十六章 兵不厌诈——毛泽东计胜一筹

王首道：关于九军团活动，见《伟大的远征》第281—286页。
罗炳辉妻子的情节，见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73页以及1984年3月30日对戴正启医生的采访。

陈士榘：《伟大的远征》第255—260页。

杰尔南特在未发表的论文中引用1936年4月南京《中央日报》。

康克清：1984年11月3日北京采访，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16页。

史沫特莱：前书第314页。

张爱萍：《伟大的远征》第255—268页。

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112—114页。

杨成武：1984年3月15日北京采访。

邓华：《伟大的远征》第271—280页。

- ①⑩ 张爱萍：前书第271—275页。

①⑪ 廉臣（陈云）：《伟大的远征》第69页；张爱萍：前书第274页。

①⑫ 据国民党报纸报道，杨尚昆约于1935年4月27日受伤。天津《大公报》错误地报道了一军团政治委员杨乃昆（原文如此——译注）在白水遭毙。该报导比较准确地报道了一次红军伤亡消息，颇不

寻常。(杰尔南特第八章,第25页;杨尚昆:1984年10月26日采访;张爱萍:前书第287页。)

⑬ 李红:《贵州青年》1980年第2期;《红旗飘飘》24卷:“对贺子珍一张照片的联想”,《革命文物》1980年第2期。顾玉平是邓颖超的公务员,他错误地把这次轰炸地点写成扎西附近,看来他把轰炸地点与贺子珍生孩子的地点弄混了。

⑭ 海伦·斯诺:私人通信。

⑮ 钟赤兵尽管受伤还是完成了长征。他坚持要乘担架走,听说人手不够后,他要了一匹马,不顾伤势骑马上了路(杨尚昆:1984年10月26日北京采访)。蔡树藩开始长征时是九军团政委。1935年8月1日九军团改编为三十二军,蔡树藩改任军委纵队政治部主任;红军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三十军政委(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北京采访)。

第十七章 金 沙 江

小E.J.卡恩:《中国通》第57页,纽约,1975年。

约翰·塞维斯(谢伟思)和卡罗琳·塞维斯:1984年12月2日采访;卡罗琳·塞维斯1984年3月通信;赛勒斯·卡内1935年5月1日致佩吉·达罗的信。

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

蒋和妻子从昆明仓皇逃遁的事,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问世起就不断流传。蒋夫妇的确去过昆明,不过是在战事结束之后。卡罗琳·塞维斯记得很清楚,蒋夫妇是六月中旬到昆明的,恰在她从东京返回后,1935年7月生小孩前。当时鸦片业已收获,地方当局甚感宽慰(因为蒋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反对鸦片(卡罗琳·塞维斯:1984年12月2日采访))。

廉臣(陈云):《伟大的远征》第75页;魏国禄:《随周恩来

副主席长征》第 28—30 页。

王首道：《伟大的远征》第 284—286 页。

徐继涛：1984 年 5 月 5 日云南省博物馆采访。 徐继涛：
1984 年 5 月 5 日采访。

徐继涛：1984 年 5 月 5 日采访。

⑩ 会理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中华：1984 年 5 月 7 日采访。

⑪ 徐继涛：1984 年 5 月 5 日采访。

⑫ 徐继涛：1984 年 5 月 5 日采访。

⑬ 吴兴：1984 年 4 月 15 日南昌采访。

⑭ 徐继涛：1984 年 5 月 5 日；此地以及沿途其他地区的地势描述，来自本人实地观察。

⑮ 主要细节来自 1984 年 5 月 8 日在皎平渡对仍健在船工张朝满的采访。他所讲的与莫文骅（红军先遣队成员，《伟大的远征》第 281—284 页）、肖应棠（《星火燎原》第三卷，北京，1982 年）等的说法稍有出入。根据某些说法渡江用了七天时间。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干部团渡江的时间是 5 月 3 日，而不是当地权威人士认为的 5 月 1 日。

⑯ 本人实地观察。细节来自 1984 年 5 月 7 日在会理对王中华的采访；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 45—49 页。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李一氓在其回忆录中得出同样结论，该文以“一氓”为笔名刊于《伟大的远征》。文章提到山洞闷热难忍，他不得不移到外面山脊处（第 302—322 页）。

⑰ 徐继涛：1984 年 5 月 5 日采访。

⑱ 莫文骅：前书第 290—299 页。李一氓感到，沿着火焰山（神话中美猴子在此烧焦了尾巴）热气逼人的羊肠窄道行进，是长征路上最艰难、最危险的经历之一。本书作者一行也有同感。（一氓：〔李一氓〕：前书第 303—322。）

①⑨ 张朝满：1984年5月8日金沙江采访。

②⑩ 王中华：1984年5月7日采访。

②⑪ 有关龙云的情节是云南博物馆徐继涛提供的。许多1935年在昆明生活过的外国人认为，龙云亟望红军迅速北上入川；他担心蒋介石对他有所图谋。美国行为孤僻的生物学家和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他当时日记里写道：“假若我是龙，我将让他们（共产党）经过，让（国民党）见鬼去吧……蒋封锁共产党北去的道路，逼他们南下入滇，但龙无疑会玩弄手腕，让他们从西边溜走……蒋将蒙受挫折，活该。”1949年龙云参加了共产党政权，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S.B. 苏顿：《在中国边境省份：生物学家兼考察家约瑟夫·洛克的坎坷生涯》第246—248页，纽约，1974年）。

第十八章 歃血结盟

当地摄影者曾拍下房屋被烧的照片。在1982年会理博物馆失火前，那里还保存着几张。几乎可以肯定，不存在长征的照片，长征中没有人带照相机，仅在当地照相馆找到过几张拍照的集体合影。除了黄镇的几幅粗糙素描外，没有任何反映这一壮举的形象东西。

王中华：1984年5月7日会理讨论会。

王中华：1984年5月7日采访。

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117页。

杨尚昆序：《中国元帅的回忆》（彭德怀自述的节译本）15页。

彭德怀：《回忆录》第19—23页。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中国战歌》第167—168页，1943年纽约出版。

彭德怀：前书第9—10页。

吴兴：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①⑫ 海伦·斯诺：《中国红区内情》第62页。

- ⑪ 李德：前书第 114—116 页。
- ⑫ 聂荣臻：《回忆录》第八章。
- ⑬ 彭德怀：前书第 368—369 页。
- ⑭ 刘英：1984 年 6 月 14 日采访。
- ⑮ 彭德怀：前书第 367—369 页。
- ⑯ 王中华：1984 年 5 月 7 日采访；聂荣臻：前书第 13 页。
- ⑰ 彭德怀：前书第 369 页。
- ⑱ 对此问题争论颇多。两个方面军从一月中旬到六月初这个期间没有通讯往来，是成都四川省博物馆研究专家沈果正的判断（1984 年 5 月 19 日采访。）
- ⑲ 李德：前书第 117—118 页。
- ⑳ 一氓（李一氓）：《伟大的远征》第 303—322 页。
- ㉑ 文彬：《伟大的远征》第 322—325 页。
- ㉒ 文彬：前书第 325 页。
- ㉓ 文彬：前书第 324—325 页。
- ㉔ 廉臣（陈云）：《伟大的远征》第 80—81 页。
- ㉕ 戴维·克罗克特·格雷厄姆：《中国西南土教研究》第 75—79 页，史密森学会华盛顿，1961 年。
- ㉖ 廉臣（陈云）：前书第 89—96 页。
- ㉗ 肖华：1984 年 3 月 18 日采访。
- ㉘ 彭海清：1984 年 6 月 8 日保安采访。
- ㉙ 丁甘如：1984 年 5 月 18 日成都采访。

第十九章 留下来的人们

江西党校戴向清教授，1984 年 4 月 14 日采访。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

李伯钊：1984 年 6 月 15 日。

陈丕显：前书第二章。

钟书棋：1984年4月12日瑞金采访。

钟启松：1984年4月10日长冈采访。

所有细节均根据陈丕显的回忆录。他没提电报的日期，只说“二月初”。贵州博物馆党史部孙日昆说，从遵义给陈毅发了电报，把遵义的决定通知了他和项英政委（1984年4月13日采访）。这是档案中找到的唯一电讯件，没有其他与陈毅或项英来往的电报；戴向清教授说（1984年4月14日采访），在2月12日或13日，陈毅和项英电报中央委员会要求同意转入游击战。他们2月13日等了一天，直到下午五、六点才得到答复，同意他们依靠当地资源、用自筹给养的小组方式开展活动，不再局限于原中央苏区范围。他说这是档案中查到的。

戴向清：1984年4月14日采访。

陈丕显：前书第二章。

⑩ 这是陈丕显回忆录中的说法。据他本人讲，给中央委员会的电报是遵义会议后发的，在当即收到的复电里讲到遵义会议的情况。（陈丕显：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瑞金博物馆资料人员钟书棋说，红军总部关于遵义会议的电报是“三月初”接到的（1984年4月11日采访）。赣南游击队一位干部刘建华证实，在仁凤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的时间是“在二、三月间”（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关于电报及日期上说法显然有矛盾，但支持前一说法的证据占优势。阎景堂在档案中查到证据，第一方面军曾于1935年2月5日、13日、23日和28日给陈毅发过电报，但无法确定收到了几份，阎能肯定2月28日的电报没有打通。据说遵义会议后，曾派出一个排找陈毅通报会议的情况。

⑪ 陈丕显：前书第15—19页。

⑫ 刘建华：1984年4月14日南昌采访；某些细节根据1984年4月14日对戴向清的采访和1984年4月10日对于都县博物馆馆长

张德明的采访。

⑬ 陈丕显：前书第8章。在最后的一次突围行动中，贺昌和其他多人牺牲，国民党声称俘虏1,400人，缴获657枝枪和18挺机关枪。到三月底，被俘人员达5,700人。国民党没讲击毙数字（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3—26页，台北，1969年）。

⑭ 陈丕显：前书第20页。

⑮ 陈丕显：前书第20页；1984年4月14日对宁都博物馆工作人员采访。

⑯ 阎景堂：1984年11月3日北京采访。

⑰ 有关这些妇女的资料有几个来源。名字是瑞金博物馆资料工作者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采访）和阎景堂（1984年11月3日采访）提供的。关于她们的遭遇的情况也是来源于钟和阎，胡华补充了些细节（1985年1月11日通信）。黄长娇的事迹取自1981年南昌出版的《江西历史文献资料选》。这个名单显然是不完全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母亲被留下了，她是个医生，因年高体弱无法进行长征，与母亲生别对邓颖超是个沉重打击。

⑱ 《历史文献资料选》，前书。

⑲ 阎景堂：1984年11月3日采访。

⑳ T.A.夏，《中国季刊》1966年1—3月第25期第176—212页。瞿秋白的遗骨于1955年6月18日移入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毛题词称他“宁死不屈”，“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遗骨被掘出，坟墓被毁，现已重新修复。

㉑ 钟书棋：1984年4月11日瑞金博物馆采访。

㉒ 阎景堂：1984年11月3日采访。

㉓ 钟书棋：1984年4月12日采访。

㉔ 李锐：《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第5页。

㉕ 来自1984年10月24日对胡华采访。古柏曾任第四军（第一

方面军早时番号)前敌委员会秘书,后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他于1935年3月在广东省龙川县鸳鸯坑村牺牲(阎景堂:1984年11月1日采访)。师长谢唯俊也在罗明事件中受到打击,后在陕北战死。

第二十章 死时逃生

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27—129页,1941年纽约出版。

刘建华:1984年4月15日南昌采访。

陈丕显:1984年6月13日北京采访。

斯诺:前书第130—132页。

刘建华:1984年4月15日采访。

《江西历史文献资料选》1981年南昌版。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30页。

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

事件根据陈丕显:前书第5章第23—27页。龚楚的故事见其著:《我和红军》(胡华:1984年3月23日采访。)有些细节来自刘建华的文章。

①② 陈丕显:前书第11章第44—50页。

第二十一章 传奇的土地——泸定桥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1—29页。

文彬:《伟大的远征》第338—339页;史沫特莱:前书第312页。

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288页。

约翰·塞维斯(谢伟思)的母亲格里丝的印象。

现有一座新修的标准钢筋水泥结构的泸定桥,位于原来吊桥

下游约半英里。有解放军战士站岗，他不让拍照。在安顺场也有一座钢筋水泥桥，在安顺场和泸定间有十五座人行的吊桥和一座通车辆的水泥桥。

杨得志：《忆长征》第 79—81 页，北京，1978 年。

肖华：1984 年 3 月 16 日北京采访。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 197 页。

⑩ 史沫特莱：前书第 134—139 页。

⑪ 杨成武：1984 年 3 月 16 日北京采访。

⑫ 张福臣：1984 年 5 月 22 日安顺场情况介绍。

⑬ 在大渡河行动上，说法上略有差异。这里主要依据是对杨成武的采访以及当地档案人员提供的资料。林彪电报错误地将行动完成日期写作 5 月 25 日而不是 5 月 29 日，该电文在 1971 年林彪下台死掉前曾刊在 1964 年北京出版的英文版《长征见证人的回忆》（第 98—99 页），以后删掉了。

⑭ 大渡河印象据 1984 年 5 月 22 日本人实地观察。

⑮ 这一部份主要根据对杨成武将军采访时他的回忆和已出版的《忆长征》书中的内容，并补之以在安顺场和泸定的情况介绍、对肖华将军的采访以及本人的观察。秦将军也提了些建议。

第二十二章 大 雪 山

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 56—61 页；魏国祿：《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第 34—39 页。

杨成武：《长征纪实》第 99—111 页，北京 1962 年。

陈昌奉：前书第 62 页。

杨成武：1984 年 3 月 15 日采访。

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卷 2 第 361 页。

1984 年担任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李先念曾是张的第三十军的

政委。他印证了张关于密码本的说法。他说他知道密码本丢了，他们担心落进蒋介石手里，因此，长征开始前极少发报，随后一个长时间内根本就不发报。（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北京采访。）

张国焘：前书第362页。

张国焘：前书第364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72页。成都四川革命博物馆高级历史研究人员未能找出任何档案材料来证明，在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后某个时间，大约1935年5月10日之前，两支方面军之间相互了解对方的位置。（沈果正、贾克：1984年5月19日成都四川革命博物馆的采访。）他们没有找到1935年1月22日到6月12日张国焘发报中央委员会祝贺越过大雪山并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期间任何电报来往的证据。同一天中央委员会给张国焘的贺电复了电（成都情况介绍）。长征作家王愿坚认为，在毛的部队到达夹金山另一侧前，毛对张的去向也只知道个大概。（王愿坚：1984年3月5日采访）。李一氓认为毛从农民的传言中了解到张的大体去向。（李一氓：1984年3月22日北京采访）。

⑩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⑪ 秦将军认为，在一方面军过金沙江的时候，四方面军仍在运动中；毛知道它正朝川西北运动，但无法知道其准确位置。毛确实（正确地）推测到张在雪山西麓。由于张国焘与毛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对立，许多诸如此类的细节都难以确定。张最终与共产党决裂，投向蒋介石。

⑫ 蒋耀辉：《长征纪实》第110页。

⑬ 陈昌奉：前书第69页。

⑭ 张盛继：1984年6月4日兰州采访。

⑮ 戴正启医生：1984年3月30日采访。

⑯ 解放军医学研究所主任涂通今医生：1984年3月31日北京

采访。

- ①⑦ 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采访。
- ①⑧ 姬鹏飞：1984年3月14日北京采访。
- ①⑨ 陈昌奉：前书第68页。
- ②⑩ 谢方祖：《回忆长征》第106—108页，北京，1978年。
- ②⑪ 姬鹏飞：1984年8月14日采访。
- ②⑫ 解放军医学研究所主任涂通今：1984年3月31日北京采访。
- ②⑬ 危秀英：1984年4月15日采访。
- ②⑭ 丁甘如：1984年5月13日成都采访。
- ②⑮ 李一氓：1984年3月22日采访。
- ②⑯ 钟伶：1984年6月11日西安采访。
- ②⑰ 胡耀邦：1984年6月14日采访。
- ②⑱ 杨定华：《伟大的远征》第358—359页。
- ②⑲ 陈昌奉：前书第67—70页。
- ③⑩ 魏国禄：前书第43—49页。
- ③⑪ 涂通今医生：1984年3月31日。
- ③⑫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 ③⑬ 有些资料说一、四方面军会师日期为1935年6月16日。这其实是双方指挥员正式相互发报的日期，（秦兴汉：1984年3月6日采访）。

- ③⑭ 小金县办公室主任周国清：1984年5月25日。
- ③⑮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 ③⑯ 周国清：1984年5月25日采访。
- ③⑰ 杨定华：《伟大的远征》第359页。

第二十三章 毛 张 会 师

周国清：1984年5月27日采访。

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成都四川省博物馆采访。

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采访。

有关张国焘和毛泽东会面的情景，长期来就众说纷纭。见证人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张本人的，另一种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28—332页），援引朱德或他的一个同僚的。下雨和张骑马等等细节看来是准确的，已被包括张在内的其他来源所肯定。然而，史沫特莱提到的会面日期为7月20日，地点为“二河口”，后者可能系“两河口”之误（“二”和“两”同义），而会面是次日进行的。张的说法中塞满他和毛日后发生的政治争论，这多少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内心情绪。这里以及后几页的情节，多是依据中国当代历史和档案以及本人实地观察。

徐立新（音）《张国焘的动摇和觉醒》第六章，台北，1981年。

李群：1984年6月6日西安采访。

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采访。蔡啸迁曾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后投向国民党，他估计会师时中央红军力量约七、八千人。他认为张国焘约有七万人的有生兵力，以十对一占优势。然而，他觉得毛的干部远胜过张部（蔡啸迁：《江西苏区和红军西窜》第三章，台北，1970年）。

文化秘书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马尔康采访；韩素音：《早晨的洪流》第293页。

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卷2第378—379页。

⑩ 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第123页。

⑪ 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采访。

⑫ 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采访。

⑬ 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采访。

⑭ 强国焘：前书第370—372页。

⑮ 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采访。

①⑥ 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采访。

①⑦ 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采访。

①⑧ 彭德怀：《回忆录》第335—336页。

①⑨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②⑩ 谢伟思：1985年3月6日采访。

②⑪ 胡华：1984年3月23日和1984年3月29日采访；马海德：1984年3月19日采访。

②⑫ 胡华：1984年3月23日和1984年3月29日采访。朱光原是上海中央局工作人员，后到了四方面军。张不信任上海的中央局，把朱光抓了起来。他把川陕根据地创建人、当地苏维埃主席旷继勋当作托洛茨基分子处决了。川陕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也被当成犯人，一路上捆着手脚。1935年6月曾偷偷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要他干预，这事被张获悉了。在1935年7月一次夜行军中，曾中生被从一座高桥上推到河里淹死了。后又散布谣言说他从监禁中逃脱后不见了。这些案件的资料都是来自胡华。

②⑬ 张国焘：前书第378—379页。

②⑭ 李德声称他在6月28日在两河口参加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两河口会议是6月26日召开的，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译注）他描述说这次会议是“平静”的，认为主要决议会前已定，只是形式地通过一下。他说他同意毛向北、向西行动的建议，还说几乎没人提及抗日问题。其他任何人没讲过政治局开过两次或更多次会议，也没有说过李德与会了。看来李德又把日期弄错了，他是经常这样的。他这段话其余部分与当代中国历史记载看来吻合（李德：前书第124页）。

②⑮ 张国焘：前书第383页。

②⑯ 周国清：1984年5月27日采访。

②⑰ 张国焘：前书第380页。

②⑧ 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②⑨ 大概在这次或随后的一次会议上，同意了张国焘让他的几名支持者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徐立新肯定，由张国焘提名进委员会的有徐向前、王树声、周纯全、曾传六、李先念、何畏和李特等人。蔡啸迁又补充了傅钟和曾福两个人。他说，中央红军的干部很不满意，感到毛对张让步太多（蔡啸迁：前书第三章）。会议的细节来自张的回忆录、胡华教授、沈果正（1984年5月19日采访）和聂荣臻的回忆录第三章。

③⑩ 彭德怀：前书第372—373页。

③⑪ 聂荣臻：前书第8章第14—15页。

③⑫ 张国焘提到他与博古共进的一次晚饭，席间两人就政治局的工作、党的路线、遵义会议和其他政治问题交谈并争论了许久。博古也许是聂荣臻回忆录中提到的那些令人忧虑的汇报的根源（张国焘：前书第394—399页）。

③⑬ 感到欢欣是肯定无疑的，但也有些麻烦事。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六团的一名老战士李群，回想起一、四方面军战士间一次怒气冲冲的争吵。四方面军一方责怨一方面军杀了他们的马，双方摆开了架式，还开了枪，但无人受伤，争论也得到了解决（李群：1984年6月8日保安采访）。秦将军对开枪一节表示怀疑。

③⑭ 张国焘：前书第398—493页。

第二十四章 人迹罕至的地方

许多细节根据本人考察和采访。天哪，那座土司宫现已半为废墟，成了鸡栖猪出没的场所，雕刻和装饰早已荡然无存。有的细节取自杨定华：《伟大的远征》第362—363页和蔡啸迁：《江西苏区和红军西窜》第348—349页。1980年作者曾遍游西藏，没有见到任何一座能与之媲美的宏伟建筑物。长征时，卓克基只有这座土司宫及附属建

筑、一座庙宇和一连串藏族房舍。每年秋季，这里是重要的鸦片交易场所。现在，它属于马尔康的郊区。马尔康在红军路过的时候，除了一座小喇嘛庙和几间房屋外一无所有，而现在已成为有一万八千人口的一个繁荣工业及行政中心。

天宝：1984年5月18日成都采访。

文星明：1984年5月25日采访。

杨定华：前书第364—368页。

杨定年：前书第369—371页。

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孙逸之医生：1984年3月31日北京采访。

李先念：1984年6月16日采访。

吴吉清：1984年4月5日采访。

⑩ 魏国禄：《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第50—54页。

⑪ 聂荣臻说沙窝和毛儿盖两次会议周均未能参加（《聂荣臻回忆录》第八章）。杨尚昆将军回忆说，周主持了两河口会议，但因病重未能参加毛儿盖会议。（杨尚昆：1984年10月26日采访）。周的警卫员魏国禄所讲，给人的印象是周的病四、五天就好了，在过草地时已能履行职守了（魏国禄：前书第50—55页）。这完全不对。开始过草地时，周病得无法接见杨成武，直到抵达巴西后一个时候，周才开始恢复工作。

⑫ 埃德加·斯诺：《中共杂记》第97页。

⑬ 杨尚昆：1984年10月26日采访；胡华：1984年10月29日采访。

⑭ 李先念：1984年6月16日采访。

⑮ 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⑯ 阎景堂：1984年10月24日采访。

⑰ 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①⑧ 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卷2，第411—412页。李德的说法使事情更加混乱。他说在毛儿盖前，政治局于6月底在梭磨开过一次会。他可能指的沙窝。他说他参加了。彭德怀把政治局会议地方说成黑水（彭德怀《回忆录》第379页）。

①⑨ 聂荣臻：前书第8章第15页。

②⑩ 事实上，这个决议是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1935年6月起草的，于1935年10月首先刊载在巴黎一份中文报纸上。（向青：1985年1月14日纽约采访。）毛去世前，中国出版的材料都把统一战线的决议和立场归功于毛的智慧和远识。这些材料强调了毛儿盖会议“北上抗日”的作用。然而有关会议的事实材料和与会者的回忆都不能证实这一点。李德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不过那时他已是毛立场的坚决支持者），他说这些说法完全不对（《共产国际代表》第130—131页）。

②⑪ 胡华：1985年2月4日通信。

②⑫ 部队编组的细节来自胡华教授。由于见证者存在争论，以及当代历史学家和档案人员缺乏精确的资料，这里提供的说法有失完备。张国焘回忆录中的说法不准确，常常令人迷惘不解，缺乏细节，并带有论战的口气。他把不同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并遗漏时间、日期和其他重要细节。聂荣臻和彭德怀的说法均比较肤浅。与聂一样，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也是如此。问题也许在于有关档案（包含上述说法所基于的详细史料）尚未公诸于世。李德通过苏联途径获悉这些文件，并充分用来帮助他的回忆。他把会议日期写作“八月份第一天”，还直接引用了署期为8月5日的公报。公报内容详尽，它号召北上打国民党、建立川陕甘苏维埃、最终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与日本打仗的事只是一笔带过。文件基本上反映了毛的观点，李德对此是赞同的。李德说，毛得到除张国焘外政治局成员的完全支持（李德：前书第132—134页。）张国焘提到参加“沙窝会议”的人有：毛、

朱德、博古、洛甫和他自己，邓发（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凯丰（青年团领导人）列席了会议。王首道做记录，张说他是“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国焘：前书第412页）。

第二十五章 魔 毯

杨成武：《星火燎原》卷3第153—159页；1980年，北京出版。

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卷2第420页。

若尔盖县长杨秋：1984年5月27日采访。

杨秋：1984年5月27日采访；贺龙的遗孀薛明：1984年6月14日北京采访。

红原县博物馆：1984年5月27日采访。

危秀英：1984年4月15日采访。

曾宪辉：1984年4月18日贵阳采访；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203—204页。

杨定华：《伟大的远征》第373页。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38页。

⑩ 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第80页。

⑪ 胡耀邦：1984年6月15日采访。

⑫ 杨定华：前书第378—385页。

⑬ 丁甘如：1984年5月13日采访。

⑭ 姬鹏飞：1984年3月14日采访。

⑮ 戴正启：1984年3月20日采访。

⑯ 聂荣臻：《回忆录》第8章。

⑰ 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第二十六章 黑暗的时刻，光辉的荣耀

这是1960年毛对埃德加·斯诺提问的答复。（埃德加·斯

诺：《红星照耀中国》修订本第 432 页，纽约 1969 年。）杨尚昆对月夜的描述：采访。杨定华对那天夜晚巴西附近天气的描写则截然相反：“很黑的夜晚……天空布满乌云……没有月亮……”。（杨定华：《伟大远征》第 381 页。）蔡啸迁说红军沿包座河溯流而上，天“漆黑，下着小雨”（蔡啸迁：《江西苏区和红军西窜》第七章）。

这段描写来自本人 1984 年实地观察以及杨定华颇为生动的忆述（前书第 378—389 页）。

张国焘争辩说白水河的一条支流（应为喀曲河——译注）阻挡了他的去路。这条河通常只有没膝深，部队可涉水而过。它突然涨到了十英尺深，几乎一千英尺宽（张国焘：《回忆录》第 421 页）。多数中国专家认为这是夸大其词。李先念当时是张的三十军军长（应为政委——译注），他承认河流是处在洪水期，但他说几天内水就会落下去（李先念：1984 年 6 月 15 日采访）。张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这段时间是两路红军部队之间电报频繁往来的情况，而长征回忆录的作者及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都提到过这些电报，但其内容仍未公布。

杨尚昆：1984 年 4 月 3 日采访。

杨定华：前书第 390 页。

李先念：1984 年 6 月 14 日采访。杨尚昆说在班佑被击溃的敌军是一个旅。

杨尚昆：1984 年 4 月 3 日采访。

彭德怀：《回忆录》第 375 页。

聂荣臻：《回忆录》第 8 章。

⑩ 胡华：1984 年 3 月 29 日采访。

⑪ 杨尚昆：1984 年 4 月 3 日采访。

⑫ 李先念是在 1984 年 6 月 15 日采访时讲这番话的。“彻底开展”一词是按中文直译的。这是毛泽东 1937 年 3 月在延安讨论张的电报时讲话中用的词。李先念没听到报告但读了报告全文。中国专家解

释说,张的话的含意是,在党内他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斗争还未定局,他现在要把这个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

⑬ 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⑭ 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⑮ 彭德怀:前书第376页。

⑯ 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⑰ 彭德怀:前书第377页。

⑱ 彭德怀:前书第377页。

⑲ 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⑳ 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李伯钊:1984年6月15日采访。

㉑ 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㉒ 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㉓ 彭德怀:前书第377页。

㉔ 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㉕ 大部分细节来自1984年4月3日对杨尚昆将军的采访。蔡啸迁对此事件尚有一新奇说法。他说在约离巴西十到十二英里处,行进中的一方面军部队突然遇到四方面军的一支宣传队,他们喊叫着:“不要跟着大鼻子(李德),快回头吧。向北去死路一条,向南才是出路!”这一示威举动使中央红军情绪动荡,毛和彭德怀都亲自出面讲话来鼓舞士气(蔡啸迁:前书第7章)。

㉖ 向青:1984年3月16日采访。

㉗ 这些陈述是根据在北京对杨尚昆将军的内容广泛的采访和随后他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回答,以及在北京对李先念的同样广泛的采访。俩人都是所述事件的主要参加者。北京的党史学家胡华教授根据党史档案和他自己的研究提供了一份详尽记事。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

将军和他的研究人员、杨将军的夫人李伯钊、洛甫的遗孀刘英和其他人，也在采访中提供了一些细节。对张国焘、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回忆录均进行了认真地查对，在时间、地点以及事情发生先后顺序上，都存在某些小的差异，但除了张国焘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重大分歧外，均无关紧要。而这些分歧大多数是由于张替自己的行为和政策辩解以及指责毛而导致的。他回忆录中这一部分满篇充斥争论，而对日期、地点、电文内容、行动等基本事实却大都丢弃不写。张争辩说，在得知毛离开前，他对出现的危机一无所知。他没谈到电报往来一事，对李先念所称“那份著名电报”也只字未提。如果中国党的档案保管者能够公布有关电报和文件的内容，这里所介绍的情况会更加充实。对地形的描述，多是根据 1984 年在这一地区的旅行时的观察。

②⑧ 胡华：1984 年 3 月 29 日采访。

②⑨ 宋侃夫：1984 年 6 月 6 日西安材料。

③⑩ 杨尚昆：1984 年 4 月 8 日采访。

③⑪ 侯国祥：1984 年 4 月 18 日贵阳采访。

③⑫ 迭部县副科长魏东海：1984 年 5 月 30 日采访。

③⑬ 这是阎景堂和当代军史专家的结论。这些变更有可能在红军队伍到达哈达铺以后才生效。彭德怀在《回忆录》中说（第 380 页）他和叶剑英在毛的直接领导下率领这支部队。李德的回忆（第 140 页）说彭被任命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毛是政治委员。杨定华说（第 391 页）长征在“红军最高领导人毛和彭”的指挥下继续进行。

③⑭ 聂荣臻：前书第 8 章。

③⑮ 彭德怀：前书第 379 页。

③⑯ 杨定华：前书第 394 页。

③⑰ 杨定华：前书第 397 页。

③⑱ 杨成武：《星火燎原》第 440—441 页。

③⑲ 李道吉：1984 年 5 月 30 日腊子口采访。

④① 细节来自本人对腊子口和通往腊子口沿途的实地观察以及迭部李道吉县长和魏东海副县长的情况介绍（1984年5月30日至6月1日）。腊子口战斗情节来自迭部县负责人的介绍、四团领导人杨成武以及杨定华在《伟大的远征》一书中的记述。在腊子口守敌兵力规模上说法不一。这里依从当地情况介绍。杨成武提到三个团，显然太大了。彭德怀说是邓宝珊之一个团（彭德怀：前书）。实际数量看来是两个营。这里采用了当地介绍中提到的爬崖敢死队说法。其他陈述中没有提到少数民族战士或毛的命令。在林彪飞黄腾达期间出版的一些材料中，曾强调了他参与了这次战斗。这里所依据的三份主要材料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第二十七章 家

杨定华：《伟大的远征》第455页。

1984年5月31日岷县讨论会；1984年5月31日本人实地观察。

杨定华：前书第453—472页。

这是陈昌奉在《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中所讲的。随着本文记述的继续，读者即可发现对他的说法产生怀疑的地方。

杨定华：前书第498页。

袁耀秀：1984年6月8日吴起镇采访。

袁耀秀：1984年6月8日采访。

袁耀秀：1984年6月8日采访。

保安刘志丹纪念碑志，1984年6月8日。

①② 袁耀秀：1984年6月8日简介。

①① 房成祥教授：1984年6月12日西安采访。

①② 张光，刘志丹之女刘力贞的丈夫：1984年6月12日西安采访。高岗成为中国革命参加者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1949年初他担

任了东北特别区（满洲）的首脑。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被逮捕，被控阴谋搞“独立王国”。他在狱中自杀了。很久就怀疑他与俄国人建立了特殊关系。他的名字曾被收入莫斯科《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后来该书编者要求订户将其各自行删去，另一个被删去名字的人是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

⑬ 房成祥：1984年6月12日采访。

⑭ 张光：1984年6月12日采访。郭洪涛和朱理治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7月从天津地下党北方局来到这里，第三个人叫聂洪钧，到得晚一点。他们声称刘志丹是“富农路线”的追随者，在军事行动上缩手缩脚。

⑮ 程子华：1984年3月30日北京采访。

⑯ 钱信忠：1984年3月30日北京采访。

⑰ 程子华：1984年3月30日采访。

⑱ 房成祥：1984年6月12日采访。

⑲ 1984年6月8日吴起情况介绍。高岗曾说过在被关押的人中已有一些人被处决。他说，“若非中央停止了这场清洗，其前景将不堪设想。”（郭华伦：《中共史论》第87页—96页中引用，台北）。

⑳ 这些关于刘志丹、二十六军和二十五军错综复杂的故事是依据刘志丹家庭仍健在成员的谈话，这包括他的遗孀全桂荣、女儿刘力贞和女婿张光。有些细节来自陕西党史专家房成祥教授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的徐昂绍。北京外交部的张援远也提供了一些细节。二十五军的情况是该军军长程子华和随军医生钱信忠提供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说法是混乱不清的（第209—214页）。他虽然在保安会见过全桂荣和刘力贞，但他关于此事的消息看来得自其清洗的煽动者之一。程子华没有介入多少。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时，该军已处于徐海东的有效控制下。毛不允许对他们二人搞任何报复行动。

高岗在后来给陕北政治干部的一次报告中谈到，这些煽动清洗的

人说刘志丹是“白军军官”，“从来就是胆小鬼”，并说高岗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华伦：前书第87—96页中引用，台北出版）。

②① 刘英：1984年6月14日采访。

②② 杨成武：《星火燎原》第257—261页。

②③ 杨尚昆：1984年10月26日采访。

第二十八章 生死与共

肖克：1984年8月9日北京采访。1984年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在1934年则是六军团的政工人员。据他回忆，他大概在1934年12月从国民党报纸上第一次听到长征的消息（余秋里：1984年10月31日北京采访）。

肖克：1984年3月9日采访。

余秋里：1984年10月31日采访。

海伦·斯诺：《延安笔记》第47页。

贺龙的遗孀，薛明：1984年6月16日北京采访；丽江军分区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史洛明：《回忆贺龙》，上海，1979年。

刘冠群：《我所知道的贺龙将军》，北京，1983年。

薛明：1984年6月16日采访。

史洛明、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1984年7月1日《中国日报》报道，1984年武汉一个叫严争颜的语文教师，因诬陷贺龙被判七年徒刑。严争颜的父亲就是1933年12月那个派熊贡卿去游说贺龙加入国民党的国民党官员。“文化大革命”中，严争颜写信说，贺龙是因封官太小而拒绝的，后又为灭口处决了熊贡卿。毛的妻子江青和“文革”小组头子陈伯达则利用了该信和严的证词，炮制了诬陷贺龙的案子。

①④ 长征老战士，吴松：1984年6月4日兰州采访。

⑪ 肖克：1984年3月9日采访。

⑫ R.A. 博萨哈特：《主刻制之手：在中国被俘的日子里》第24—25页，伦敦，1935年。

⑬ 这个孩子的母亲是蹇先任，她与贺龙结婚时才十九岁，后来两人在延安离婚了。肖克的妻子是蹇先佛（长征老战士，张仁士：1984年6月4日兰州采访；罗斯·特里尔：《白骨精》第151页）。

⑭ 史洛明：前书；斯诺：《延安笔记》第47页。

⑮ 博萨哈特：1985年1月24日通信。肖克活捉的最重要的俘虏之一是张振汉将军，他是国民党第41师师长，于1935年夏初被俘。他受到极好待遇，博萨哈特与他混得很熟。张在红军大学担任作战战略教官（肖克：《回忆录》第二章第6—7页）。1937年5月10日他被释放回国民党去。（韦尔斯〔斯诺〕：《红色尘土》第139页）。

⑯ 博萨哈特：1985年1月24日信；1937年博古对海伦·斯诺说，在斯塔姆被害地区没有正规红军，只有“赤卫队”（斯诺：《延安笔记》第116页）。

⑰ 博萨哈特：前书第179页—182页。

⑱ 肖克：前书第二章。

⑲ 余秋里：1984年10月31日采访。

⑳ 《毛泽东诗词》第19页。

㉑ 有关军事行动的情况以及发给贺龙、肖克电报一事均由丽江军分区副政委王庆和提供（1984年5月1日采访，第4页）。兰州西北师院的范圣予教授说（1984年6月3日，兰州采访），二方面军曾发出一份寻找党中央的明码电报，这份电报一方面军和中央均未收到，而被四方面军收抄下来。因此，要二方面前来会合的电报是张国焘和朱德发出的。有的说法认为这道命令只有朱一人签署。奇怪的是，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只字未提这份电报令，也没解释二方面军何以前来与四方面军会合的。

②② 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②③ 王庆和说有关文件都保存在档案里。一些地方将领倒向共产党一边，在1949年留在了大陆。军阀龙云的地方军队司令卢汉参加了解放军，后成为云南省长。孙渡留在大陆。湖南军阀何键的女婿李觉也留下来了。留下来的还有张忠，他是军阀龙云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后来成了云南第一副主席。被龙云和他手下的人赶走的国民党指挥官是樊嵩甫和郭汝栋两人。

龙云尽管小心防范，最终还是中了蒋介石的计。1945年蒋令龙云派出两个师去印支接受日本投降，并用计把另一个师调出了云南。龙云跑到香港，后回国担任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国防委员会委员。军阀何键解放前就死了。（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②④ 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②⑤ 博萨哈特：1985年1月24日私人通信。

②⑥ 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②⑦ 王庆和：1984年5月1日采访。

②⑧ 肖克：1984年3月9日采访。

第二十九章 浪子回头

张国焘：《共产党的兴起》第426—427页。

曾看过这一名单的胡华教授指出，整个程序不仅违反了共产党的章程，也不符合党正常政策。假如张与他提名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先联系的话，许多人会拒绝他的（胡华：1985年1月11日通信）。

海伦·斯诺：《延安笔记》第61页。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330—331页。

斯诺：前书第48页。

康克清在北京的一次采访中强烈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成都

四川省博物馆的沈果正则表达了历史专家的典型观点（1984年5月19日采访）。他坚持说，警卫战士没有受命限制朱德的行动，朱德从未被软禁过，他在各部队中自由行动，同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人员谈话，并和他们一起打篮球（朱德酷爱篮球）。沈缩小在朱德马匹的问题上的争议。

胡中贵：1984年6月2日会宁采访。

叶英礼：1984年6月11日西安采访。

李群：1984年6月8日保安采访。

⑩ 杨尚昆：1984年4月3日采访。

⑪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第十章，北京1983年。

⑫ 许世友：前书第10章。

⑬ 许世友估计国民党的兵力有十个旅；四川博物馆的沈果正认为是四个旅。秦兴汉确认了损失一万人的说法。

⑭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⑮ 张国焘：前书第440页。

⑯ 向青：1985年1月14日采访。

⑰ 向青：1985年1月14日采访。

⑱ 张国焘：前书第444页。

⑲ 向青：1985年1月14日采访；海伦·斯诺：私人交谈；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私人通信。

⑳ 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㉑ 肖克：1984年3月9日采访。

㉒ 张国焘：前书第448—449页。

㉓ 许世友：前书第10章。

㉔ 张国焘：前书第457—459页。

㉕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㉖ 马海德：1984年3月19日北京采访。

②⑦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②⑧ 张国焘：前书第461页。

②⑨ 在国民党统治后期，有三个姓马的人在西北穆斯林地区占据了要位。马鸿逵是宁夏省主席；马步青是该省前主席；马步芳是著名穆斯林领袖马克勤的儿子，马步青的兄弟，担任该地区主要军事领导人。一个马在新疆同人民解放军打仗时被击毙，马鸿逵跑到台湾，后到美国靠养马为生。另一个马令人难以想象地成为台湾一位驻外大使（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322页）。

③⑩ 幸存者之一是张琴秋，她后来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③⑪ 董振堂率领三十七师到达临泽以西约十二英里的高台，在这里被敌消灭。董将军牺牲（叶英礼：1984年6月2日采访）。五军三十九师由张国焘的亲信黄超带领。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五军政治委员李卓然和他们在一起。

③⑫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③⑬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③⑭ 叶英礼：1984年6月11日采访。

③⑮ 史沫特莱：前书第343—347页。

③⑯ 李英群，会宁县长：1984年6月2日采访。

③⑰ 就在这次或另外一次场合，马海德观看了中国医生为刘伯承治疗的情况，刘被一个国民党飞行员从机侧扔下的炸弹炸伤。马海德惊奇地发现，他们不是用探针把碎弹片取出来，而是硬挤出来。

③⑱ 胡华：1984年3月29日采访。

③⑲ 李英群：1984年6月2日采访。

④⑩ 史沫特莱：前书第344—347页。

第三十章 “冷眼向洋看世界”

毛泽东：《诗词》第38页。

马海德：1984年3月9日采访。

王炳南：1984年3月20日采访。

彭德怀《回忆录》第1—11页。

特里尔：《毛》第274页。

刘英：1984年5月11日采访。

《巴黎—北京》第二期，第94页，1979年11月份。

薛明：1984年6月16日采访。

肖克：1984年8月9日采访。

⑩ 余秋里：1984年10月31日采访。

⑪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⑫ 杨成武：1984年3月13日采访。

⑬ 肖华：1984年3月16日采访。

⑭ 爱德华·E·赖斯：《毛的道路》第243页。

⑮ 马海德：1984年3月9日采访。

⑯ 伍修权：1984年3月28日采访。

⑰ 陈丕显：1984年6月13日采访。

⑱ 李先念：1984年6月15日采访。

⑲ 刘少奇子女的信，1980年12月5日北京《工人日报》。

⑳ 刘少奇子女的信，1980年12月5日。

㉑ 刘萍萍：1985年1月29日采访。

㉒ 霍尔多·汉森：《华北赤线后的旅行记》，始于1938年6月，私人出版，第25页。

第三十一章 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

邓蓉（毛毛）：《北京周报》1984年9月3日第17—18页；
《中国建设》1985年第四期。

爱德华·赖斯：《毛的道路》第184页，第262页。

杨尚昆：1984 年 11 月 3 日采访。

北京出版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每天都刊登一个桥牌栏。在北京有人开玩笑说，就象毛推动游泳风靡全国一样（通过他 1966 年 7 月 12 日闻名的畅游长江），邓使打桥牌广为流行。

胡华：1984 年 10 月 27 日采访；李先念：1984 年 6 月 15 日采访。

伍修权：1984 年 3 月 28 日采访。

译者的几点说明

一、索氏《长征》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和当事人的谈话，翻译时以忠实于原著为原则，未一一进行核对。

二、注释共四万字，据作者本人说，书中凡涉及争议问题，不尽一种说法、观点时，出现在正文中的说法可代表作者的看法，其余看法列在注释中。另外，注释里还有不少重要的背景材料，是正文的重要补充。

三、注释原文有些差错之处，其中有的已根据译者当时陪同采访时的记录作了校正，但仍有遗漏和搞错的情况。

四、个别人、地、书、文件名，查不到出处和标准译法，只好端译。参考书名，按其它文种版本的原名译，如《西行漫记》是中文译名，而索氏参阅的是英文版本，故译作《红星照耀中国》或《中国上空的红星》；又如《彭德怀自述》已译成英文，题为《中国元帅的回忆录》故取《回忆录》；又如《李德回忆录》，英文版《共产国际代表》，俄文版《中国纪事》，两本索氏皆有参阅。

五、参加本书译校者，除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外，还有杜安夏、张志明、周文重、陈国清、唐苓、傅莹、施燕华、张幼云、梅江中、徐亚男、王铁利、吴红波、陈乃清、王弄笙、邹明榕、高志凯、马振岗。

编 后 记

本书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今年已七十八岁。在他漫长的记者和创作生涯中，曾为反映现代战争而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足迹深入到苏联卫国战争前线，遍访世界大战的许多战场，以他犀利的目光和鲜明的观点，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内幕。他的许多报道和作品早已誉满美国，蜚声世界文坛。他的名著《列宁格勒被困九百天》已成为反映二次大战中苏联前线情况的经典作品。这本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书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国一出版，立即引起全美的轰动，《时代》周刊等许多报刊大量报道，接着欧洲、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也竞相表示要翻译出版。

从事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写作，是索尔兹伯里多年来的夙愿。他极其崇敬埃德加·斯诺，并深受其感染和影响。埃德加·斯诺在其《西行漫记》序言中曾写到：“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索尔兹伯里今天以实际行动完成了这位先行者的未竟事业和意愿。为了写作此书，索尔兹伯里在十多年前就开始酝酿和准备。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关长征的各种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并于一九八四年专程来到我国，在他的好友谢伟思和他的七十岁的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他以红军般的勇敢和坚毅，不顾年迈（当时

七十六岁)有病(心脏病),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坚持越过了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七十四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沿途他考察体验了自然界的复杂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象,向老红军、老船工、老牧民们了解历史和现状,了解民俗风情,遍觅革命遗迹,博采轶闻轶事。更为重要的是,他有机会亲自访问了参加过长征的我国现今的许多领导人和健在的老将军,会见了不少党史军史研究人员,多方探索和考证了长征中的一些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对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直到弄清事实为止”。因此,全书不仅反映了长征这段壮阔的历史,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参加过长征并正在领导新长征的我国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各异性格和多姿的精神风貌。这是在我国国内经过重大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出现的一本颇具特色的文史兼备的新著。

本书(包括详尽的注释)汇集了不少关于长征的历史背景材料,并有作者对中国革命历史事件及其领袖人物的坦率评述,充分地表达了一个外国作家自己的观点,这对我国读者,尤其是各级干部及文史工作者,很有参考价值。作者多次表示了以此书献给中国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愿望。为此,我们特组织翻译出版了这部书。

本书在翻译校订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领导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得到了外交部、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的具体帮助。作者索尔兹伯里本人在访华期间又曾会见了本社领导

及有关人员，交谈了如何反映中国红军长征及写作、出版此书的有关问题。今年三月间又专为本书写了序，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很多同志参加了本书的校订，特别是索尔兹伯里访华期间的陪同译员张援远，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和研究员阎景堂，以及人民大学教授胡华等同志，对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谢忱。本书译文忠于原著，只对原文中一些明显的差错之处，进行了校正。但由于翻译出版的时间仓促，对有些史料，特别是作者采访记录和引用的国外资料，未能一一核对，差错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三月